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三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

第三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1)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 …………………………………… (6)
——发动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 …………………………………… (9)
——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 …………………………………… (11)
——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 瞿秋白 (13)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海丰农民运动（节选） ……………………… 彭　湃 (22)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央报告决议案 …………………………………… (71)
（一九二六年一月）
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 ………………… (72)
（一九二六年一月）

PDG

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 ……………………………… (76)
（一九二六年一月）
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 ………………………… (83)
（一九二六年一月）
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 ……………………… 任弼时 (89)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 ……………… 恽代英 (94)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
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 …………………………………… (97)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 ……………………………………… (100)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 (105)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中央地址问题 ……………………………………………… (109)
（一九二六年二月）
国民党工作问题 …………………………………………… (111)
（一九二六年二月）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 (112)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孙中山先生逝世
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 ………………………… (114)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 李大钊 (120)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 ……………………………………… (128)
——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祺瑞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 ……………………………… (133)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 陈独秀 (136)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 陈独秀 (138)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 ………………… (142)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 (144)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国民党右派大会 ……………………………… 陈独秀 (146)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 ………………………………………… (153)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 ……………………………… (154)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 陈独秀 (162)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我们的功罪 ……………………………………… 李求实 (167)
——斥醒狮派诸领袖!
(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 …………………………………… (177)
——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
（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 ……… (187)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
会议宣言 ………………………………………………… (192)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
委员会议整理党务决议案 …………………………… (196)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二十日）
附二：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训令 …………………… (199)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三：中国国民党对于整理党务案宣言 ……………… (201)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 赵世炎 (205)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
告全国民众 ……………………………………………… (211)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 ………………… 任弼时 (216)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 刘少奇 (222)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信 …………………………………… (225)
——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信 ………………………………………… (228)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农村教育 …………………………………… 毛泽东（236）
（一九二六年六月）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恽代英（242）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 陈独秀（249）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252）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
政治报告 ………………………………………………（265）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274）
（一九二六年七月）
组织问题议决案 ………………………………………（278）
（一九二六年七月）
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 ………………………………（285）
（一九二六年七月）
职工运动议决案 ………………………………………（291）
（一九二六年七月）
农民运动议决案 ………………………………………（299）
（一九二六年七月）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308）
（一九二六年七月）
商人运动议决案 ………………………………………（311）
（一九二六年七月）
学生运动议决案 ………………………………………（313）
（一九二六年七月）

PDG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315）
（一九二六年七月）
军事运动议决案 ……………………………………（317）
（一九二六年七月）
妇女运动议决案 ……………………………………（319）
（一九二六年七月）
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 ………………………………（322）
（一九二六年七月）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 李大钊（325）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一号 ……………………………………（330）
——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二号 ……………………………………（338）
——关于省港罢工的通告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 周恩来（344）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 ………………………………（348）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 …………………………（350）
——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 瞿秋白（352）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 ………………………… (358)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 李大钊 (361)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中央通告第十二号 ……………………………… (367)
——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给重庆的信 ……………………………… (369)
——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 瞿秋白 (372)
(一九二六年八月)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 毛泽东 (384)
——《农民问题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 (389)
——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 (391)
——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直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 (393)
——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 (395)
——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对于国民党扩大会的意见 ………………………… (399)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PDG

中央通告第十八号 …………………………………… (402)
——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给广东的信 ………………………………… (404)
——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 (406)
——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 陈独秀 (408)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 恽代英 (414)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 (417)
——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 (418)
——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
(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
告民众书 …………………………………………… (421)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 ……………………………… (424)
——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
意见 ………………………………………… 李大钊 (426)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粤区来信 …… (430)
——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 …… (435)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 …… (442)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 …… (446)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局与
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 (452)
——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李大钊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 …… (458)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目前农运计划 …… (46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议决)
中共中央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
问题之结论 …… (463)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革命与武力 …… 陈独秀 (465)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复粤区的信 …… (469)
——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局给江西地方的信 …… (472)
——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 (475)
——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 ………………………… 李大钊 (479)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复加同志的信 …………………………………… (482)
——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
附一：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 ……… (483)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同志信)
附二：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 …………… (485)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 周恩来 (488)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 陈独秀 (493)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 ……………………… (501)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 …………………………………… (503)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 …………………………………… (509)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 ……………………………… (51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 …………………………………… (514)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政治问题议决案 …………………………………………… (517)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
吴廷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
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 周恩来 (519)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 ………………………… (524)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PDG

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自从鸦片之战到辛亥革命的几次国民革命运动，因为没有有组织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政纲，没有正确的策略而失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的意义，就在他能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以有组织的领导，革命的政纲与正确的策略。

第一次大会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政纲，确定中国民众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障碍。大会迄今两年，已把中国的民众运动放在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这可证之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五卅运动。但是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底还没有完全深入广大的群众，而且反帝国主义是反对其为一种制度之意义亦未能被群众所了解，并未能被国民运动领袖所透彻明了。国民党的领袖没有能个个明白：利用帝国主义间与军阀间的冲突以促进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运动之政策，更有时有专对某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有被他国帝国主义利用及给民众以错误领导之危险。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在如何能使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群众，如何使民众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正确的观念，及指示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如何。

国民革命运动不是只有了目标就能成功的，所以第一次大会决定革命的策略：采取联合苏俄与组织工农的政策。联俄的政策非特帮助了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革命基础，更给了中国革命民众一种重大之意义，就是要对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全世界革命的势力必须联合起来。五卅运动得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的同情与赞助，于是中国民众更明白了解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使中国国民运动与革命先进的苏俄之关系更形巩固，并应规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方法。

自第一次大会采取了发展工农势力的策略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权下之区域，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加以帮助，因此广东已有六十万农民组织起来了，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能与帝国主义奋斗至半年之久。在这次五卅运动及广东与反革命奋斗中，更可看出工农阶级在国民运动中之地位而证明第一次大会所采取的政策之不错。但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对于工农运动不是明白的反对，即是暗中的破坏，因此工农势力的发展有极大的妨碍。国民党党员更有对于工农运动态度的错误，不知反对工农要求改善生活的阶级斗争，即是反对工农运动的发展，亦即违反要工农参加国民运动的宗旨。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以严厉的处罚。

国民党自从第一次大会后方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在这两年中其组织已渐次发展全国各部。但是组织尚未能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从五卅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尚不能指导全国的民众运动，虽然在广东一隅已有相当指导的能力。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决定如何能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的党，使其组织能如网一样的布满全国，使有指

导全国运动的能力。

自从第一次大会后，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革命政纲的，有革命策略的政党之后，国民党中旧有之反革命分子势在淘汰之列；因为他们的利益与革命是相反的，国民党既然成为真正指导革命的团体，决不能与他们相容。虽然这班反革命分子一批一批的退出国民党，借口于反共产主义，其实是反对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中国人民能建立廉洁政府，他们出党后做帝国主义军阀的工具，公然拥护其利益之事实已完全证明他们反共产主义的不真。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知道独立的中国与廉洁的政府是与他们的利益是有妨害的。所以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并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在这两年中，国民党所以能继续依照党纲进行革命工作，全靠对于反革命党员能有坚决的态度。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追认旧中央对于党中反革命分子的开除而确定革命的纪律。

第一次大会后党中的斗争在广东更形成武装的斗争。从商团事件起到最近统一广东军事行动止代表两年不断的最剧烈的斗争。党指导下的革命政府要与香港帝国主义、北方军阀、省内军阀、政客、买办、反革命党员等反革命势力，一齐奋斗。只靠革命政府能坚决采用左倾的政策，才能把危害广东革命基础之一些反革命势力扫除。现在更进行巩固此基础之工作以发展全国之国民运动。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赞许革命政府过去为巩固革命基础之政策，并指示其将来保障此革命基础与借之以发展全国革命运动之方针。

这两年中国国民党党内发生反对共产党在党内合作的问题，本党党员自从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正式允许加入国民党，努力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进行国民革命工作，对于第一次大会

的政策，是最有力的拥护者，在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中是最勇猛的奋斗者。因此惹起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之妒忌，国民党内之反革命分子与假革命分子，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他们的反对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本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本党党员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共产主义者，最注重客观的事实，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但他们也看见达到这目的的路程。他们认定在现在中国是在必须经过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产主义者与其他真正国民革命者一样，要做反帝国主义运动。既然共产主义者与国民革命者在这时期目的相同当然须要携手合作，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因怕惧革命势力联合而思破坏之。不论何人反对此种联合，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与国民运动起见，是因为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政策的实行与左派势力的发展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与革命政策的实行。本党决无心占据国民党，如国民党与国民运动需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时，本党党员不待国民党的命令，必可立即退出。但是现在既未到此时期，本党决不因帝国主义走狗之反对而退出。本党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责任是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建筑在左倾的政策上面（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策）。本党党员真能信奉孙文主义者，因为他们能在行动上表显他们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员及实行第一次大会政纲与政策的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本党党员是最好的国民党党员，因为他们最能恪守国民党纪律与尽他们的职务，如有违背国民党章程、政纲与不尽职的，非特愿受国民党之正当处置，并须更受本党之惩罚。信仰孙文主义而忘掉联合革命势力共同

反对帝国主义，不是真正的孙文主义的信徒，犹如信仰马克思主义忘掉了忠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假马克思主义者，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变成反革命党，假孙文主义者，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其结果必变为反革命党。所以希望第二次大会审查是否第一次大会对于容纳本党党员加入之议决尚属有效及授权与监察委员会以革命的纪律与革命的政策审定党员之是否忠实。

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开会时正在北方民众五卅运动失败后重新崛起时，正在广东刚才肃清反革命势力而罢工尚未解决正与香港帝国主义奋斗时，当右派西山会议后正进行破坏国民党时，第二次大会之责任如何重大。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使国民党自身有了一个基础，使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有了广东的革命基础，本党希望第二次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

——发动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各级同学们：

最近北京的政局，已经显然表现出军阀统治的崩败；冯玉祥下野，段祺瑞不日要下台，奉张[1]自郭松龄倒戈之后，军事力量上也受了巨大的打击，孙传芳、吴佩孚更没能力独自攫取政权——于是北京方面的政治便显然现出极动摇的状况。这是“五卅”以来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结果。可是，人民方面如果没有继续的积极的有力运动，迅速的从军阀手中征取政权，那就奉张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而扑灭了郭松龄，吴佩孚公然表示停止反奉，国民军受了这种奉直联合的恐吓而散乱自己的势力（冯玉祥下野，第二军内的直系分子抬头）——帝国主义者便不难帮助反动的奉直军联合而恢复军阀统治的新反动政局。

我们职任，应当赶紧联合国民党、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等革命群众，督促右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商会等人民团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出兵，反对“五卅”重查结果的总运动里，引导他们进一步而力争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召集；主张由

广州国民政府联合国民军，人民团体代表及一切反奉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我们应当指出现在广州国民政府对外的省港罢工交涉，能有胜利的形势，正因为这一政府受农工商兵等一般民众的赞助，人民有结社、集会、罢工、言论的自由，所以关税自主、“五卅”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中国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只有像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才能解决。再则我们应当指出，广州政府之下如今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已经扫除一切反动军阀，苛捐杂税烟赌拉夫等的压迫政策和腐败现象完全消灭，亦是因为有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及一般民众实力的赞助，所以北部军阀统治的根本铲除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也只有建立像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这种宣传和运动是现在使民众革命化的必要方策。

我们宣传的口号是：1. 国民军应与人民联合继续反对奉系军阀及一切卖国军阀；2. 冯玉祥不应取消国民军名义，尤其不应取消极的态度；3. 反对奉直反国民军之联合；4. 反对护宪和法统；5. 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国民军及其他反奉势力，以及全国人民团体代表（商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等）共同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6. 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罢工之绝对自由；7. 释放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政治犯（山东，江西，湖南……），启封一切爱国团体，尤其是上海总工会。

我们运动的方式：1. 各地各种团体应根据上述口号分别电致冯玉祥、国民军、广州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团体；2. 各地应由国民党（左派党部）、学生会、工会等发起召集各团体联席会议，讨论这些时局问题，反对“五卅”重查结果和日本

出兵；3. 在民众之中，根据上述的口号及主张做极广泛的宣传。

钟 英[2] 白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

——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同学们！过去全国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这是我们过去看轻学生运动的错误，因为中国学生运动（普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学生运动）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有不少的政治作用，即是一般中等以上的青年学生，因为社会环境之养成多富于政治趣味。为学生运动前途更有力的发展及党与团指导得力计，两校中央特从新决定：

（一）以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学生团体以内之党团书记，由当地党的执行机关指定之，团的执行机关可指定党团中一人向团负责，党团开会时党与团执行机关均可派人出席。

（二）以后党与团均须注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及团的组织，团尤须注意于中学及高小以内的发展。

（三）为扩充学生运动群众力量，以后须在各高小组织学生会，并使加入当地学联（学总亦将通告各地）。

（四）各地须注意寒假期内，利用回乡学生扩大我们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

关于以上决议，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中学生运动的发展

及团的青年化工作，有极重大的关系，望各地严格遵照执行。

钟 英[1]
曾 延[2] 白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2〕共青团中央的代号。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

——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各级同学们：

对于此次政局的分析与应付，在前第七十一号通告中已说过，兹更补说于下：

（一）目前政局是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影响直系有渐趋于日奉直联合之势。故最要紧的是人民和进步武力的联合战线。此时直奉妥协虽在进行，然尚未成功；国民一、二、三军表面上似不和，然实际上尚甚合作，均此时须极力鼓吹人民、国民军、国民政府一致反奉的联合战线。

（二）我们在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实际进行上，我们应恢复去年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或重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或恢复或重组须按各地情形便利为准），但无论恢复或重组，我们务须极力扩大其范围，务须与各种社会阶级的派别合作，极力免除不必要的分裂现象。

（三）在现时政治情形之下，对于实际能否解决政局，我们不必存过分的希望。我们的根本责任是在乘此机会宣传

民众与组织民众，在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势力，扩大革命的势力。

钟　英[1]　白

一九二六、一、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 秋 白

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号，这里节选其中的第一、二节。

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

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哪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

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孙文学说》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1]国家主义派。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

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

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二、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许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孙镜亚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

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末，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末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

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末，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末，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

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瞿秋白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曾琦、左舜生、李璜。

PDG

海丰农民运动（节选）*

（一九二六年一月）

彭　湃

第一节　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年，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

* 这是《海丰农民运动》一文的第一、二、三、八节。该文是彭湃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陆续写成的，最早以《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为题，刊登于一九二六年《中国农民》第一、三、四、五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其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并出版。

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都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末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度衙门。甚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

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诸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挪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削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他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仿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蛊蛀或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度度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都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鬃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誓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耕也好，不耕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农民哑口无言。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 凭单付护弁四名
>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 此　致
>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 □□兄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一）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分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PDG

二、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三、佃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无微不至。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亦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变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之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二）佃农之亏空

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格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稿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二、种子费约五元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耕八斗种的田地呢？那末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左：

甲、收入之部

（1）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2）禾稿——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支出之部

（1）肥料——三十元

（2）种子——五元

（3）农具消费——五元

（4）工食——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

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利害了。

（三）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斩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祖宗遗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是借债——高利债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方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其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多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几世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目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他，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番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他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他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

深潭的亏空，仍不能厌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乃更进一步嫁妻卖儿的政策以抵租债者。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时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听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

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通通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予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黄目青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局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又所谓校长所谓教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甚么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么算学，明日教甚么格致，再教甚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

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第八节 “七五”农潮始末

民国十二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很平稳的发展。旧历六月某日半夜狂风大雨骤作，少顷，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的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枝都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的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我们此时对于农民，当此将近收获的时期而遭这种奇灾大祸，觉着很可悲伤。

农会当此之时，也大活动起来了：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堤壆……等等。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农民们有所谓“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之慨。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农会召集执行委员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当时执行委员有一部分在陆丰县工作，一面促其回来，一面开非正式的会议（谈话会）。

各执行委员的意见很分歧：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年的计划，海丰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但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

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变迁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其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其必胜一也；次则地主没有武装，不可以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不过各区有少数警察而已，此种警察在平日已是怕农会势力如鼠之怕猫，县长王作新虽然地主派的人，但其统率下的游击队不过三四十人耳，亦不怕他；且王作新为维持其地位起见，亦未必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极其量结局农会与地主不过在分庭打一场官司耳，而法庭方面，不过八名法警，从前受我们六千余人请愿的教训以来，亦毫不敢作怪，故减租殊无问题。况且自由减租之方法不能提起农民阶级争斗的怒潮，而失了阶级意义的训练；同时将减租运动这种空气传布东江各县，殊为宣传极好之工具。

第一派复再发表其意见，以为第二派的理论固然不错，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依我们（第一派）的计划，农会无论如何是处于不败的地位，不过所得的利益较少，若依照（第二派）你们的主张好固然是好，但太陷于“危险性”。遂决定一面俟执行委员到齐后提出再议，一方召集各约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在这执行委员未回来，各约代表大会未开以前，数日中的现象：

（一）农民加入会者如风起云涌，日以数百计。中有三数乡系与陈炯明有亲族之关系者，素以依借陈势而自高自大的乡村，平素甚看不起农会，故不加入农会。但是到了这个利害冲突生死关头的时候，陈炯明不但靠不住了，而且反加以势力的压迫——陈姓的地主们因利害关头已把亲族置之不闻不问，而以迫租为急务了。所以这三数个乡村平日依借陈势的农民，乃

大恍然，相率到来农会负荆请罪，请任由农会处罚，惟要求准其加入。农会当时，乃派人对其演说，准其加入，但在纪律上不能不施以薄惩，我们初试以“每人入会非罚金五元不可”，他们也欢然答应。我们乃实以告之，“每人罚银二毫罢了”。于此，可见这个时候农村中只有两条战线，一是地主的，一是农民的。

（二）海丰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所以此时农会尚未决定何种办法，农民仍是依旧法去请地主到田里看稻，或减或分，后来才打算农会也认为可行。为甚么呢？从来习惯，如地主未去看田，农民擅自把稻割起，则地主便说：“如收获不丰，你一定不去割的，一定和我分的，今既割起了则照额还租，一粒不减。”农民甚怕地主这几句话，并且地主如到田中去看了稻之后，可以使其明白失收的惨况。可是，各处的农民来报告谓：“我们一早就去到田主的家里请他看田，等候了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少爷才在床上翻翻身，到等他起来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我，（农民自称以下照称）已经差不多日下西山，少爷见我便说：‘你来做甚么？’我答：‘今年田稻遇风灾……’这句话尚未说完，他叱道：‘不要多说了，回去罢，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我那时只得再求道：‘你可去看罢，可惜还租不起。’‘好了快回去，明日派人去看。’可是到了一日两日三日数日都不见有人去看，你再去催他也是这样的答复，总不派工来睇田中的稻有多少可收成的也出了芽，怎样好办。”

同样的事情，一日都有数件，农会只有指示他们马上割起

来再设办法对付。所以无数农民对于地主异常愤激，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非与地主决一死战不可！

（三）地主方面，知农民此回一定不如昔年一样驯服，可以任意压迫，不敢去乡间收租，也不敢少有何等表示，亦没有哪个敢先来顶农会的头炮，多皆静观待变。官厅绅士商人学生也议论纷纷，没有正确的主张。

（四）调查部的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

这四种现象呈出之后，而陆丰县及其他各地工作之执行委员已到齐了，我们已召集正式开会，并异常秘密。此时我们将前次谈话会所论战的结果报告后，一般从陆丰县工作回来的执行委员，异常严重的驳斥第一派之懦弱的主张，而形成了第三派。

这第三派，说第一派之主张不啻与地主妥协，全然不顾及目前之事实。盖这次实是海丰空前的大灾，从陆丰一带而经过海丰所有禾稻被风打水浸，损失约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农民已达于惨痛之极。说自由还租完全是欺骗农人的好话，不啻猪仔向老虎求情，让农民在惨痛之下，任地主的压迫，使一般农民对于本会之指导者加以怀疑。因为我们向来的口号，也是主张凶年减租，不是主张常年减租，这种口号算是农民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不能指挥农民去奋斗，去给他们一个斗争之训练，是错误之又错误。在我们的意见全部免租。我们（第三派自称）对于第二派的理论及事实，认为确有道理，其中所包含的危险性并不是危险性，乃是

一般的革命性。若要免除此性，只有不主张阶级争斗，不去求革命。进一步说，即使这次免租运动而至于失败，也不要紧，因为失败之后，农民对于农会的观念确定了：“农会是农民利益唯一奋斗的机关。”况且现在农民有了农会之后，异常满意，而且自高自大，此次的免租运动之斗争果使其失败，而将来再张旗鼓，必得更加长足的进步，而农民亦可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故失败不是失败，而是促进成功一个顿挫之方法，只看我们在失败之后做不做耳。简言之，用自由减租的口号去欺骗农民，而农会虽得存在也无用。倒不如与敌人奋斗，仍可保存农会之价值，在这个减租与不减租，都是农民在实际上得不到利益的两路皆难的时机，我们只有一致提出免租的口号，明知免租做不到也好。

这第三派的主张是很激烈的，在第一派听了这些理论之后已无再有意见发表了。惟第二派再有争论之点，这一点一个是“减租运动”，一个是“免租运动”，但是问题已经较易解决，不过是程度之差，及方法之善不善耳。其不同之意见如下：

第二派意见：免租运动在此时的环境未免趋于过激，在自由减租更不成理论，现在只在定出减租的程度——最低限度——减租七成——三成缴纳。口号不至于过激，而不致农民视为妄想，故以三成缴纳。

第三派的意见，以为这种办法亦不妥当，现在罹灾是极普通的事实，三成可以缴纳者是极少，农民自此次损失之后，下半年的口粮已是无着，危险已摆在面前，同时为修葺屋宇补买耕牛及农具，修理田园者将何所出，如果田主以三成照收，我相信其死一也。

议决以减租七成，为最高限度。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

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多数通过。再提出代表大会表决。

七月二十日，开全县各约代表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旁听者千余人，室为之满。

主席彭湃。先由主席报告灾后各区灾况，及农会救灾工作执行委员会对于减租问题之讨论经过，报告完后，此时旁听者咆哮起来，磨拳擦掌，拥护第三派之免租运动。主席制止。在代表大会方面，主张“免租”者不能过半数，主张“至多三成”交纳者率以过半数表决通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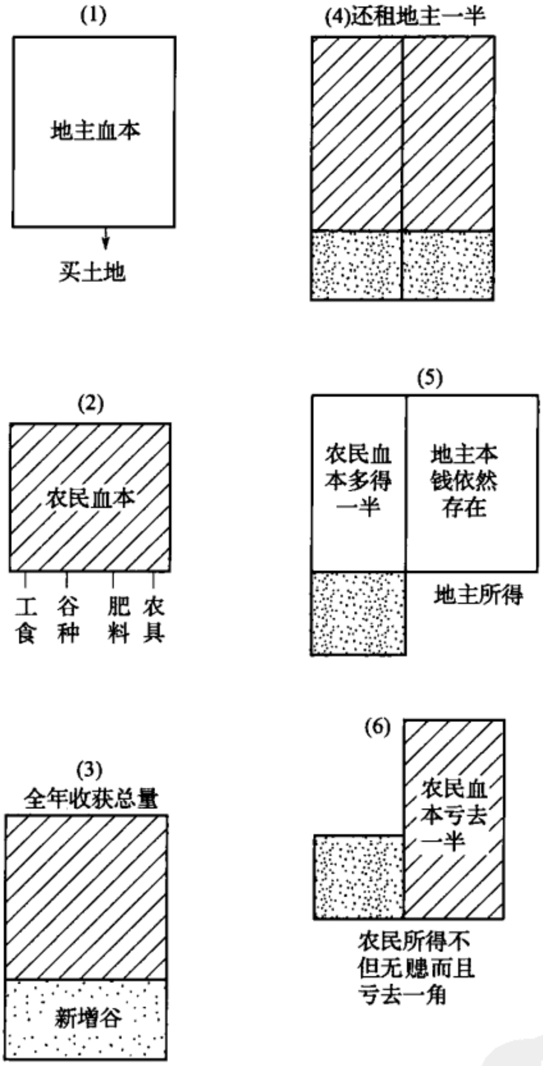
其余对于减租应付方法，悉由执行委员之指挥，乃散会。

“至多三成交纳”这个口号已普通了，全县小孩子都会叫这口号了，执行委员会工作异常紧张。

（一）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当时有篇《为减租而告农民》的书，其大意如下：

农民们呵！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占夺我们的。姑认为是用钱买的，但是他买田的钱一次过投下去，便千千万万年有租可收，有利可获了。农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种子、肥料、牛租、农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今年不幸，遇着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无损伤，我们所下的血本被大风吹了，被大水洗了，我们的血本已无存，地主哪里有利租可收！我们须与残暴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兹并以地主掠夺农民血本图示如下：

在平常年农民被地主所掠夺（如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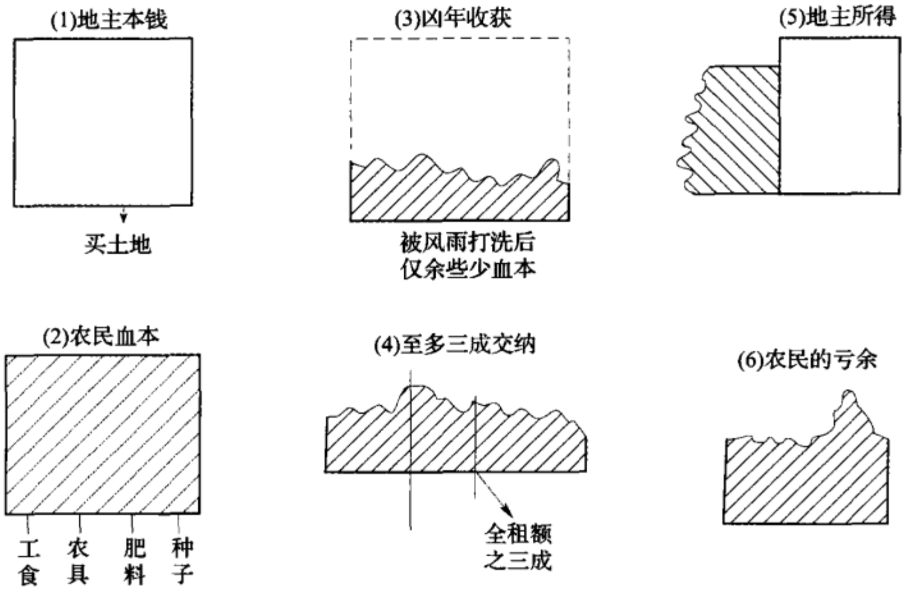


（二）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统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

在今年凶岁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农民之亏损：

（三）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

（四）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地位。



海丰县农会启　　十二年六月　　日

（五）准备召集全县大会。

这时，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商人是守中立，不过恐怕惹起地方扰乱，以为农会好事，一部分并有土地的商人则与地主合作。土豪，烂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的方面。学生——智识分子多出于大地主、小地主、土豪、绅士或地主之戚族的家庭，因减租直接影响其家庭之经济，地主乃利用此点以打动学生，使学生反对农会，即以农民减租学费难筹迫其子弟退学；这些学生，从前说到农会何等好，可是到了此日不但变了前日的口气，而不满于农会，甚者竟到农会为地主作侦探。

在农会方面如马焕新者，本一极肯努力的青年，身任农会的执行委员兼教育部主任，乃因减租之故对于本身利害冲突（马族多地主，其本人亦一小地主），乃数日不到农会办事，质

问之始来请假多日，又再质问之，竟公然否认农会议决案“至多三成交纳”（马初为主张自由减租之一派，后又赞成免租运动之一派，其狡已值得我们注意），不数日即服从其家族之命令，具呈至县公署（县长王作新）否认主张“至多三成交纳”之减租议决，并非难农会的种种过激不对，农会即时将其开除会籍，并宣布其罪状于农民群众。

这时地主阶级之小地主怕事而急于粮食的，则老早遵照农会“至多缴纳三成”之议决而收租，其余的大地主渐渐的反动起来了。此反动地主的反动人物为县长王作新（即粮业维持会之副会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这三个东西暗中联络各地主，恢复粮业维持会之组织，开会于县署，计划非常秘密，莫得其内容。但是反动地主破坏农会口号：（1）农会减租对于锅头户太不良心（注：锅头是指一般不去谋事而在家中坐食的男女，或地主之后裔，只会穿长衣保全门面专靠收租来养活的），（2）实行共产，（3）农会勾结土匪。

在这三个口号之中，第（1）农会则反驳他，谓“饿死几个锅头户有良心呢？饿死数十万锅头佃有良心呢？难道锅头户怕饿死，锅头佃不怕饿死吗?”第（2）农会置之不答，也不必答；（3）也置之不答，因这口号出来，好多怕土匪怕死的地主，更引起一种惊怕农会之心。

某一日马育航之侄马斗辉者，一个小学校教员，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乃往五狮墟乡收租，竟要求十足。农民说：“至多三成交纳。”马不服，乃多方为难，威吓农民。农会闻知消息，乃派纠察队数人前往援助，适马已回家，农会乃警告他，他惊怕起来，到农会道歉，仍依照三成收租了事。

又公平有一个自耕农，因还租五成为纠察队所知，扭解农会受纪律之处分。

六月二十七日，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承商，租约百余担，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初向城西二十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仔乡的去收租，此乡约三十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人虽少而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抬验于分庭，而抬验于县长，县长亦不拒绝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入衙署抬验后，王作新乃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二十余到北笏仔乡围捕，甫入乡即放枪示威，乡人扶老携幼而逃。此时潦水仍未退尽，妇女小孩多跌水中叫救，状极可怜，游击队拘父老要勒脚皮银四五十元，农民不能给他，乃绑缚父老三人到县。县长不加审问，令镣锁投于狱。农会闻报，即派代表与王作新交涉，我们说：“事属民案，何关县长？”王作新说：“租是官租何不可理？”我们驳说：“他不是衙署官吏，而是一批商，既属于商，凶年哪免损失，何得要求十足照收？”王作新不理。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之意如下：“减租一定是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三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体发生，农会应置之，不甚重要，只是一面由农会筹款安慰其家属，并供给狱内之伙食费用，向全县农民大会中（定七月四日）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并先以十数元先慰被押者之家属，并打理狱内事务。”

七月四日到了。

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又派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来县参加大会。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布告也被农民扯了。王作新大惊，乃集中警察三十余名，游击三十余人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署门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了十点钟

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土匪。钟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后王作新力求之，并谓天下大事是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又使用全县绅士名，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丰发生土匪”，钟乃尽其所有的兵百余人派来县城。此时侦探已来报告，我们以为不去请愿，又不要求他放人，这不过彼之大惊小怪，他们见我们开大会不去请愿，当不敢与我们为敌。到了十二时，宣布开会，到会者二万余人，首由彭湃报告后，再由劳工、林甦两同志及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继演说，皆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最后三呼农民万岁，声如雷震，乃宣告散会。这个时候，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继而见无其事，乃再集合。王作新这时也逃走了，地主也吃一大惊，市场也着惊。

晚间有人报告：汕尾派来之兵行至中途，因忽闻报农民攻入县城，该军队乃不敢前进，后闻无其事乃到县城。

我们相信既无请愿与他为难，彼不敢来惹祸的。是晚有黄琴轩者，县议会之正议长，来找彭汉垣，实则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黄见农会开会后人已散了，回报王作新等，王乃即夜召集绅士会议，应如何对付农会。绅士到会者四五十人，有一个叫做陈清照，这个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激烈，欲乘虚攻我们，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乃决定了极秘密的计划。

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有如何危险，不过我们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七月五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勇三百余人，由城内出东门，经龙津桥，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不过三百

米左右，乃分两路，一包农会之后方，一包农会之前门，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有陈梦同志，打开大门用尖串向进入之敌兵一击，正中其身；敌由大门冲入，未及逃脱之职员及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净、陈梦等共二十五人皆被捕，敌兵用枪头将职员乱打一场，惟有杨其珊同志素长拳术，人人都晓，敌兵打了七拳踢了八脚，都不到身，故不敢摩他一下，一切器物，抢掠一空，并复将会所封闭。当农会同志二十五人被捕过街巷时，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打掌称贺。押至衙署时，王作新坐堂审讯。王作新问杨其珊道："你是不是农会的会长？"

杨答："是！"

王问："彭湃利用你们去造反，经我三令五申，你们还敢作怪，你知罪吗？"

杨答："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因为彭湃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至说彭湃造反，我也承认，但是王县长的造反，要比彭湃更加厉害！彭湃帮助穷人救穷人，果是造反，那末你帮大地主资本家在这凶年来压制穷人，岂不是大造其反吗！"

王大拍案道："你真该死！你们胆敢提倡共产公妻，快些照实招来！"

杨答："共产不共产，这是看社会的进化如何，不是我去提倡就会共产，不提倡就不会共产！招不招不大要紧。至提倡公妻一事是有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发财的做官的，你们天天嫖娼宿妓，这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公妻吗？还有一层，好像王县长都有两个老婆，这就是公夫；公妻公夫都是你们提倡

的，都是我们早晚所应该打倒的！”

王气的要命，再拍案的说：“打！打！”

其珊同志被打得体无完肤了。

王喝将犯人下狱加以镣铐，乃退堂。

此时彭湃、林甦、彭汉垣、蓝镜清、莫水夹、林沛妈、安洪垂、李劳工等数十余人逃至大嶂山边之小庵寺，此地形势非常可守，并且四围都是热心农会之农民，又有农民在山顶及山口放步哨。寺中之道士是一个东成王党[1]，民国四年曾举兵攻陈炯明失败，乃化装为道士；这道士与洪垂同志前时是同党，他知我们逃避来此，备极欢迎，并很恳切安慰我们。我们在此就开始讨论应付的计划。彭湃是主张召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赞成此说者多半是农友们。彭汉垣则以为不然，谓杀之是很痛快的，但是杀后他们必杀农民，那末农会是不再做就可以，如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则不应如此，阿湃是激于一时之气如此主张。以我意见还须去老隆，因为陈炯明固然是不赞成农会的人，但是对于这次解散农会拘押农民或者他是不主张的，我们可以用感情的话同他说明此次风灾水祸之时，县政府不但不能体恤，而且加以虐待，传闻出去实于政府名誉大有损失，且他近来曾对人说话间表示很佩服海丰农会，且很佩服阿湃，盖彼久欲利用我们，不过我们没有何等表示，彼也不敢利用。观其三月间陈炯明失败在香港时，他曾对林晋亭说彭湃如何的能干，就拿起笔来要写信请彭湃到香港去面见他，适遇钟秀南来见陈炯明，对他说彭湃现在有了二十余万人拥护，比你还要大，你哪能请得他来！陈炯明就把一封信扯破了，暗叫林晋亭写信邀彭湃到香港。后湃到了香港来，他竟在政治失意的时期捐出百元的港纸——此时百元港纸捐下农会，好像割了他块肉似的，但陈炯明仍可做到，且

他对我曾说过："我（陈自称）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称湃）可努力进行。"他这话虽不是真意，但是可以证明他已对农会降服了。所以我主张湃到老隆去见他，我们应提出的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如他能够办到（一）（二）两条算胜利，（三）条我们可以在秘密中去做，不必挂起招牌，（四）条明知是绝对做不到的，也不妨提出，倘（一）（二）都做不到，那就可暴动了。

林甦同志甚赞成此说，提出汉垣与农友可在后方准备武装，湃兄速行，如果不达目的应予以最后手段出之。众皆赞成，乃决定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赴老隆，即日起行。

老隆距海丰五百余里，一路皆高山，步行要六七天才可以跑得到。林甦同志患足病未久，怎能跑得这样远，但是林甦同志也忘记了这件事，只是顾着赶快出发。甦和湃、陈润都换过了污烂不堪的衣服，如乞丐状，三人共带了十块钱，数十农友都送到村外，齐声叫道："奋斗呵！奋斗呵！"乃日同志拔出手枪，说道："我应送他们过了海丰境才回。"众甚欢喜。是日乃旧历七月六日下午二时也。及晚我们（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跑到了将近惠阳交界之高潭墟，乃日同志也回去了。此时经过东埔寨乡面前，有该乡某农友知道我们是农会同志，乃呼我们到他的家里休息。少顷，他拿出烟茶来了，很恳切的对我们说："此地你大声说话都不要紧，这里通通都是我们会内农友，你们打算到何处去呢？"我们答："要到老隆去。"某农友说："我心内都料你们一定要去老隆的。"湃等就将农会被解散及要到老隆的经过告诉他们，此时男女小孩都走来听，听到农会被解散，连妇女小孩都觉很可愤。少顷，某农友的媳妇来叫我们道："已烧好了水，你们跑路当洗洗身，请从这里来。"我

们洗澡完，复和农友说话，这个时候听见杀鸡之声，我等马上就劝止他不要客气，某农友笑道："你们要到老隆去，这样辛苦，今晚当饮杯酒壮壮气，这里乡村有钱没有东西买的，故养些鸡来款待好兄弟，请你们不要嫌。"

某农友又问："老隆这样远你们怎样行得到呢？"

我们答："为着大家利益无论怎样远都是要行的，我们这次受了农友们的重托，故觉不着甚么辛苦，你可放心。"某农友又说："你们不怕辛苦我是知道，可是你们三人除了陈润兄可以跑得，老彭和老林恐怕走不得六天的远路。"

我等答："笑话了！再加一倍路也是行得。"某农友说："你口讲是讲得，你跑就不跑得。""好了，请请几位阿兄来食饭。"他的媳妇这样叫。

某农友就带我们到厅中去。这厅是很小的，除了安放菩萨及农具等仅可以放一小桌，我们六人团坐一桌是很窄的，桌上有鸡肉鸭肉猪肉咸鱼咸菜酒等，我们素少饮酒，但是在这极亲爱极快活的境地当中，是令我们要大饮特饮的。饭后，某农友说："你安心睡，今晚十二时叫你起身准备起程。"

十二时到了，某农友来叩门请起身，我们起来的时候，厅中的饭菜已经摆好了。饭毕，某农友打起足绑，携着长柄纸雨遮，打一只马灯，叫我们上轿，我们就怪道："为什么备轿呢？"此时旁的农友要来送行的就说："你们不要理，请你坐就坐，我们希望你快些到老隆。轿夫同你到了紫金，当可回来。"我们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把一点钱交给轿夫的家里。"某农友说："通通都是农友，要钱把谁！将来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时你才把钱，我当和你接收！现在，你们已经无钱可用，不要说了！起行！"我们就很不快活的坐上轿去。这轿本不是轿，因这里小乡村是没有轿的，昨晚他就把抬猪的竹杠绑

成小轿，轿夫也不是轿夫而是农友，未曾抬过轿的，我们一面坐一面不过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又兼是晚下雨发风，路更不好跑，又怕为高潭墟驻防军所知，火也吹黑了，个个都不敢作声的跑。凡经过几个神庙佛宫，某农友便放下雨遮走入去烧三支香，拜一拜，说："祝我们到老隆一路平安，农会恢复胜利!"这虽然是一般农友们的迷信，但是他这种表示确实激动了我们的心情，觉得精神上有无限的安慰，使我们当时承当不起！天将光我们到了高潭，又避在姓黄的农友家中，早膳后又行，某农友和姓黄的农友都送到三十余里之远，乃相别回去。这时候，雨愈下而愈大了，所行的路都是山岭，崎而又滑，难行得很。是晚，天将黑，刚跑到三江口，这地有三条水是很急的，过水是无船的，只有杉木绑成一排一排，两岸系以草绳，过渡时用绳拉过去，我们过了二重渡之后，天黑已到不可辨别人面；举头一望，前无人家，后无宿店，焦灼异常。不久，有一个农夫荷着锄头从此经过，他看见我们几个人，以为是丘八，就逃跑了；抬轿的农友乃呼道："唔使怕，我们不是兵。"这地是完全讲客话的，湃等不会说。这位农夫听见声音好像邻乡的人，就停足，但仍不敢进来；抬轿的农友乃近前去向他解释明白，他便向一条小河渡过去。我问抬轿的农友说："今夜怎样办?"他答："不要紧，等下儿，他（农夫）就来，等等罢。"大约过了二小时，那位农夫携着灯米鸡来了，我问鸡做甚用？农夫说"来食"。马上抢过来，主张不杀鸡，因我们临行时，甦兄带有几条菜脯在身，可以送饭。这位农夫带我们行了半里，到一间店，此店因兵灾已不敢做生意有数年了，近更被风灾打坏了一半，我们就住在一间不坏的，马上就烧饭吃了。据这位农夫说："此间受陈炯明兵队骚扰得很凄惨，逢物抢，逢人掠，逢妇女奸淫，现在人人见着兵，连鬼都怕

了；所以我刚才逢着你们，误以为兵，故我快些跑，后闻说是农会的兄弟，才甚欢喜。”我们问：“你们这边有人农会吗?”他答：“有好多人入了，我尚未加入，但是我很欢喜农会的。”彼此谈了几点钟，乃各自睡去了。

次日天将光，就早饭出发，临行时我们送柴米钱一块五角，给这位农夫，他接了钱之后，连同一张纸，等我将行时放在我的袋里；我取起来看，那张纸写着，其大意：“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故特奉还。并祝一路平安!”我们看了这张字即对他说：“我们做农会是应该的，不是救人，是穷人自救，我们不过受了大家命令，是喜欢如此做的，如你不收钱，我们只好永远誓不经此地。”他见我们态度强硬也是难以为情的收起来。

我们起行，他送了很远方回去。是日天气较好，路觉得很爽快。可是山岭重叠，一路总是上山和下山，中间是没有平坦的路可行。我们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被陈炯明的军队所骚扰到十室九空的；有的人烟未绝的村庄，看见我们就关门闭户，我们想找点茶喝都不可得，所过的墟场都成废墟，凄凉满目。我们一路饮小坑的水，或食青菜和生芋来充充饥。当我们过一个山岭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头戴竹笠，挑着一担东西约七八十斤，贸贸然来，望见我们就把竹笠和担子掉去，向后如飞似的跑了。我们乃大声呼：“我们不是军队！你不要骇怕!”我们越呼他跑得越快，我们恐他的东西失落，乃不得已自己挑起来，一面叫一面赶他，他跑到一个距离很远的山尖岭顶，就站着来看我们。我们摇手叫他回来，并将他一担东西放在路上，指着叫道：“东西放在此地交还你，请你不要怕，我们不是贼，也不是兵!”我们就不理而去了。

我们今天跑了一天，都是穿山过岭，我们所接近的都是森

林和岩石，很大的天被山岭遮成杯盆一样。我们通通都不怕，只怕遇着老虎。

我们一路都没平地可以坐坐轿，林甦同志唱唱歌曲和讲讲故事，也不觉何等辛苦。今晚五时，到了龙窝墟，住在一间小客栈的楼上，听闻紫金县长到了龙窝派提军饷，墟中商家很不满意。晚餐后，我们因蚊子多不能睡觉，乃出去外面散步，遇着警察把我们捉着说："你们夜里不穿鞋，也不穿屐，到底是不是盗贼?"我们说："我们是海丰到老隆当兵的，故没有带鞋屐。"警察带我们回客栈，叫我们不好夜里出去。

次早（旧历七月八日）五时饭后，把抬轿的四位农友留一位同行，余三位给以数元作路费，打发他回了去，我们四个人即向紫金城进发。此时身上没有一文钱了，林甦同志说："我身里还有一只镖，到紫金城可以当，不怕无钱。"今日一路所过的景况同昨天差不多，不过少些山岭。是晚到了紫金城，住在西门一个客栈，林甦同志就将金镖取出来去当，不料当铺早已止当了，林甦同志就想把他摆在街上去卖，那店主说："此地人贫，谁要用金镖呢?"林甦同志想押给店主，店主冷笑一笑："要来做什么?"我们觉得失败了，今晚如找钱不到，恐怕要被店主扣留。在这里人地生疏，想来想去一点方法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没有办法不如到街上去走一走，做乞丐也是要干的，留两位在店中坐，林甦和我就出街去。刚刚走到城内，去看了一会，湃就对甦说："喂！家族主义已经给我打死了好久，他的遗骸或可以利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甦同志说："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老隆，家族主义也不怕利用罢!"湃就指着壁上说："呀！你看这一张紫金地方分庭的布告，尾后写着检察彭某哩！这彭某从前曾到过海丰做过官的，和我的祖父是很好的，他时常到我的家里来食饭，我很认

得他，不知他认得我不；若我们入去找他，就可以向他借些钱用了。”甦同志说：“夜将深了，快些进行，免误大事。”乃回去客栈，写了一封信，向彭某借钱五元。彭某乃着人送一名片来，请我们去面商，他很亲切就借五元给我们了。

次早发了店账，就向河源境界之蓝口方面进发，行了四天才到老隆。

我们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陈炯明问：“你们弄出了乱子呢！”

我们：“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我们：“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他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我先问先生，业主和田佃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像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陈道：“这自然！”

我们：“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譬如甲乙两个股东，阿甲不管生意亏本不亏本，总是要取回自己的原额本钱，且要迫阿乙还他的利；阿乙此时本钱既已损失，又要还阿甲的利息，这岂不是不公平到极点吗？”

陈：“这是对的！”

我们：“地主一次过的买一丘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就

年年春春要用许多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所以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耕田必要的东西为本钱，正如股东做生意一样，但是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账，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陈先生所主张的分割，就是把农民残余的血本让一半给地主做利息。况兼海丰此次农民罹灾，为海丰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要主张农民和地主分割，不啻叫农民去死个净尽罢了！所以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妥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他加上二个'至多'的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最骄傲最自恃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点点头，说："是是！"

陈继续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我们："你看在近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来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陈："我拿他们打来的电报给你看！"

（一）钟景棠来电，略说："彭湃在县召集农民土匪和买军器，希图谋乱，殊非总座发祥地（指海丰）之福也，应如何办法，速电祇遵景棠叩。"

（二）海丰县长王作新电，略谓："彭湃、林甦、余创之等，召集农民勾通土匪，私藏军器，约于五日（即阳历八月十六）早暴动，扑攻县城，作新负有地方之责，乃于五日拂晓会

同钟师长部队进攻匪巢，初匪犹开枪顽抗，幸士卒奋勇冲锋，将匪击败，匪首彭湃已逸，当场捕获匪徒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等二十五人，并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除将逃匪彭湃、林甦、余创之等通缉外，特此奉闻，余容续报。王作新叩”。

我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陈：“这我当然是不信的。”

我们：“那末请先生容纳我们几个要求：

（一）释放无辜被捕之农民；

（二）电业主须照农民减租办理；

（三）恢复农会；

（四）赔偿损失。”

陈：“你提出这样多，更易惹起他们反对我，因为我的六叔都参加在内，我是很怕的，不如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做第二条。”

我们：“好！就请你办第一条。”

陈炯明就入去他的房子里，起草电报。

我们和陈炯明的机要课员说话，因他们都是旧同学，有点感情，该员等就取出海丰马育航刚才打来的电报给我们看，大致说：“总座，前电谅达，彭湃兄做事有毅力，后辈中甚有希望，惟造尖刀铁串未免忽略，以育意见，不如送湃兄留俄，异日必能为吾等之助，农会暂缓举办……”

少顷，彭汉垣从海丰来了一电，略说：

“湃转陈总司令鉴，农会被摧残后，王作新派队下乡迫交会员证，每张数元，到处骚扰，又查封农民药房，解散农民学校。粮业维持会下乡迫租，群情激愤，若不设法制止，将必激成祸变，诚非桑梓之福也。”

陈炯明携着电稿来给我看，其大略：

“海丰王县长览，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查邑中最公平者为吕铁槎先生，可请其办理，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炯明。”

我们看后就加上“农会及”三字于尾段，改为“并函知农会及粮会维持会知照办理”。全文最要的就是，“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一句话。余都是空的，这个电打去了，我们也认为满意。

陈炯明留我们午餐，我以为可借此宣传，也不却；在食饭时，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痛苦。

次日我们决定林甦同志留在老隆，因林同志行路过多，每天大便放血甚多，恐在中途发生危险；一面他可常时住在机要课调查他来往的电文（机要课员如遇绅士告农会的电太与农不利的，就删去，如陈电绅士太弱的字面就换强硬的，这也是他机要课员受我们宣传的结果）。湃与陈润等就先回海丰，我们一路行了五天，适五华水灾，舟不能行。过了几天，才到了潮安[2]，就去见李春涛兄，春涛初不知道我是谁人，我就把头上的破竹笠放下来方知道是我，他就问为甚么弄到和乞食一样呢？我就把海丰农民运动受摧残的经过告诉他，他说：“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过的途径，再干吧……”我就请他替海丰农民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寄发各地。我们就从汕头再跑了四五天，才到陆丰。当我离陆丰尚有十余里的时候，适遇着陆丰钱厝乡两位农友，扛着空轿从葵潭回来，与我相遇，他就很欢喜的问我农会交涉的近讯，我一一告诉他；他

就要我坐轿回去，我固辞，他一定要，我以为坐在轿上可以使人看不见我回去，也就坐上轿去了。那两位农民跑得加倍的快，使我真是十分感激。我把轿门遮蔽了，我经过陆丰的大街，忽然有人拉着轿夫的手说："内是谁人？内是谁人?"轿夫总不答他，一味跑。我在轿内初以为是敌人来捕我，后听真，似是李劳工同志的声音，乃伸首一望，果然是劳工同志，一直到钱厝乡去住宿。据劳工同志报告，许军进攻，海丰陈军及居民大为恐慌，县城有很多人搬走了。即夜与劳工同志由陆丰跑回海丰，约七十余里，到天将光始抵彭汉垣处，就互相报告情形。

据汉垣报告：自我们去后，王作新及地主绅士极为横暴：

（一）公平白水湖有农民耕某庵寺和尚的田，农民初尚不知农会被解散，和尚向农民收租，农民坚持"至多三成交纳"，和尚报告公平警察。此时警官以为大可乘机去勒索，乃派六名警兵去拘农民，被该乡农民打得落花流水，跑回来报告区长，区长陈绍昌亦无法，因再无兵可派；乃商之筹饷委员张云卿。张有四名护弁，四支驳壳，张乃派其护弁去捕农民，该护弁到该乡未见着人先开枪乱射，结果打不倒一个人，徒把子弹打了一半，也拉不着一个人，就回来。张云卿气到要死，乃同警察乘该乡农民无备，即捕去四个[3]父老押在警署，打算勒钱。该乡农民无钱可罚，乃送县公署王作新去办。王把他们罚了八十元，此钱是被捕者五人的家裹中，一人去卖子，一人去卖女，一人去卖牛，来缴此罚款的。王作新得了钱就放他三人回去，公平警察署探知此事，再把他三人复禁闭在警署中。他三人问："县长已办妥，为甚么你要捕我呢?"区长说："县长的账算清楚，我的账是未清楚的；无论如何要罚你一百元才肯释放。"

后由近乡父老去担保，罚了四十元了事，此四十元一个月内是要还的，如不还，后再监禁。

（二）监内的农友无饭可食，无钱可用，经我和陈修志云等设法维持，每日有菜有米有钱送人去，送了一个多月，后闻监内一点都没有取到，被游击队长王三益取去了。狱内的同志日中锁着铁链足镣，夜间并加以脚槽酷刑。身上所有东西也当尽了，米也食尽了，秘密到各乡捐题的款也用完了。

（三）陈炯明来了一电，他当时暗使人抄出来寄去海丰《陆安日刊》载，该报主笔陈伯华故意不登。乃该报的排印工人以陈伯华故意不登，他偏要登，为农民作一声援，也就故意排下去。次早，报登出了，陈伯华看见了大发脾气，来骂工人，要打工人，当时这两个工人就被陈伯华开除出去，这可见工人是表同情于农民的好友！

（四）农民医药房本是要封的，因外说农会存有款四千余元在药房，故钟景棠派来之军需委员（冯碧环）要迫药房交银，否则扣留医生及封屋，后适马育航回来，稍为劝解，始中止。

（五）杨其珊的老婆及陈梦之母都曾来坐谈，她非常明白，也倒来安慰我说：其珊陈梦虽被禁，是不要紧的，请大家安心。

（六）农会虽然解散，而实不散，各乡天天都有很多农民和我们接近，其关心农会甚切也。就全县农民观察，亦不因此次摧残而沉寂，反因此而激昂，此为最可乐观的。

（七）陈炯明打来的电，我们以为必能发生效力，结果不然，王作新直置之不理。由此可以看出这回解散农会，陈炯明是暗中有关系的，这电文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

（八）香港陈炯明之手下黄毅（黄系《国华日报》的记者，

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故相识），曾打电给陈炯明马育航等援助农会，主张放人，及恢复农会，并有来书安慰我们，祝我们奋斗，尚属有点眼光，但其用意：（一）是想利用农民；（二）是怕得罪民众。

（九）林树声即林晋亭，此人虽然是陈炯明的党，是陈炯明最信仰的一人，但他对于农会是很赞成的。他的赞成农会也不是激烈，是他与湃有感情的关系，并且他平时很看重湃，因看重湃，故重视湃所主张的农民运动。林亦有函电给陈炯明，请其释人及恢复农会，其主张较好。林另有很多函电去责骂王作新乱捕农民，解散农会之不对。我们观察这种情形，乃决定以下几个办法：

（一）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经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部下，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要希望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只有向外募捐，以维持在狱农友，并安慰其家属。

（二）林树声、黄毅等倘来到，用其推促陈炯明。马育航是表面中立而比较接近的滑头派，也可以利用。

（三）彭汉垣、陈修志云诸同志在海丰暗中去联络各乡农友，但暴动是无益而有害，不主张暴动。

（四）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

我们决定了这几个办法之后，湃与李劳工等即于次日秘密由陆丰赴汕头，再由汕头转渡香港，去找林树声。林对王作新举动极抱不平，对陈炯明则叹其无用，屡次电陈而陈亦不应。劳工和湃在港就住在黄毅办事处。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往，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在

楼下。在香港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识人少；（二）无人表同情。我和劳工同志一天无事，只有到人力车工人里面去宣传。香港人力车工人大多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大半是农会的农友，一见我们非常亲切，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乃发起募捐。当时有王大水君（此人由劳苦而变成香港的小商人）到群众里头去演说，很受他的欢迎。

车夫中捐款最少六仙，至多一元，以二三毫者为最多，大约捐了八十余元，我们非常满足，即寄回海丰去救济了。

此时陈秋霖、陈伯华所办的《香港新闻报》，第二三期攻击海丰的农民运动，我们也做了一篇文章去辩驳他。

我们在香港一个多月中，因海丰工作的关系及消息很灵通，算能指挥其活动。同时老隆方面林苏时有来电报告一切。

后林树声主张我们再向老隆跑一回，或可促陈炯明的注意，我们亦以为在香港久留是无用的，乃与劳工同志两人渡汕向老隆进发。我们跑了一个星期的路，到了老隆，再见陈炯明。

陈炯明很客气的对我把手款茶。

我问："陈先生，海丰农民被捕已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

陈说："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来骂我受你的煽惑，数日前王作新来了一电，说：已判了半年监禁。"

我："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显明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取缔他？"

陈："这完全是我的叔父及王先生（指王作新，王是陈炯明的夫子）所为，我是怕他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因我不日要到汕头去。"

我们："好了，等你回到汕头也可。"

陈："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不负责的，实在是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

我们此次来老隆，见陈炯明的态度更不对，足证明他是毫无能力的，是将近衰败的军阀。

有一次他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私为公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张。"

我们："在中国现在不要说甚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

陈听后就走起身来，叫机要课员打电到惠州及香港海丰，说："广州两杨已独立……应速进攻，大约一星期内可进入广州。"此时总司令部人员欢天喜地，燃炮饮酒，只有我们知道他是造谣惑众。

过了两天，陈炯明回汕头，我们也和他一路走。我们时时向他宣传，有一晚在途中岐岭的地方宿营，陈炯明与劳工同志谈论了一夜，到天将光才睡，劳工同志极力向他宣传。次日陈炯明对机要课员说："李劳工是不是彭湃的党徒？"机要课员说："他既同来当然是。"陈说："这个是伟大的人物！"

到了汕头，我们又去找他，提出解决释放农民问题。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势力，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听说你们从前在海丰召集农民五千余人去司法衙门抢犯人出来，实在使社会上人士对农会发生恶感，并闻杨秉

为说你向他借用驳壳，有无此事！"

我们："借驳壳无其事！"

我们经过这次的经验，更觉以要求陈炯明释放农民是笑话了，所以我们就退了出去了。

次日，陈炯明叫人来请彭湃到总司令部，我以为他是来磋商释放农民的问题，不料他是叫我同他一齐到惠州去帮他的忙，并定明日就要出发，叫我准备一切。我当时只有含含糊糊的答复他，他并嘱军需长处交二十元给我做零用，他就转入房去了。我也回去召集劳工、务农、林甦、陈魁亚诸同志出来磋商这个问题。决议：

"湃同志回海丰既不能，留汕头也无大的作用，不如与陈炯明一齐到惠州，时时催促他，或者海丰绅士官僚知道你与陈炯明一齐去，他怕你将来会做大官，或可对我们让步，甦同志在此设法维持后方。"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湃）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做农民运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还是要从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

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把行李携到总司令部去了。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是因陈老总经过。我们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去沓来与陈送行，我看了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于是我更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此时适劳工同志来，对我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更确定了我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炯明，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我说："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

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去惠州。”我说：“是的。”

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

马上就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我们的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声势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

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4]的先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并向潮梅总指挥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向各机关捐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款，各机关官长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但交实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为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

惠潮梅农会成立后一个月间，陈炯明来一个电约五六百字，里头大意说：“彭湃先生鉴：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

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炯明。”

我们接到这电报，就知道他是要我离开汕头，并指出此时不是人民组织团体带领老百姓革命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复一电给他，大意说：“陈总座鉴，电敬悉，所云甚是，但无论在武装革命或文装革命，应以群众为革命的助力及声援，乃能取得胜利。故在武装革命时期组织人民是有利于革命之进行，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湃本拟即日首途，以此间成立伊始，事务太繁，非理一二星期不能抽身，何日起程赴惠，当再奉闻。彭湃。”

过了一个星期，陈炯明又再来一电，说：“彭湃先生鉴，刻有一重要事件待商，请即日来惠，至盼，炯明。”

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不去惠州见他，敷衍他，恐怕他对于农会及各同志难保无怀疑之处，以致农会进行受阻。并可因陈炯明之请，道经海丰，一班绅士，必能让步，乃决定赴惠。其中并有以下原因：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海丰农友的消息——时常和我们通信，很盼望我们回去恢复农会，其要求之目的有三点：

一、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迫旧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与及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

二、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轻减；农会取消之后，农会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

（注）我们当农民被派军饷的时候，我们去质问官厅说：

“你们派军饷是不是要钱？要军饷是不是要快些得手？你们要军饷是去得罪少数人好或去得罪多数人好？如果是要钱，就请去派富家，不可去派穷民——农民，要军饷快些得手，也是要派富人，因富人怕死，故交钱易而且快，富者少数穷者多数，派富人不过得罪少数人，派穷人得罪多数人。”这几句话海丰农民是说惯了。

三、在有农会的时候，农民间有甚么不能解决时，或发生轇轕时，就有一个农会来排解，免经过绅士官厅的手；农会解散后就感受困难。

我们（湃、劳工）回海丰，惠潮梅农会交林甦、陈魁亚、杜式榜三人维持。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此外还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未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了十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是令人注意不少，而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这两个原因就是使海丰的反动派对我们让步的。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海丰，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们处，说：“钟师长是很拜服你们的人格的，闻你们在汕头成立农会，农会本来是好的，不过一班老头脑不清楚耳。又闻你要去惠州或者有事相拜托……”

很多人以为钟景棠是要骗我们去入他的监狱，但我就不相信，一直去见钟景棠。

钟对我握手谈话，先问汕头的农会如何？你去惠州有何事务？

我："汕头农会有了惠潮梅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之助。总座屡次来电催我赴惠，本当早日首途，只因各处会务太繁，未得抽身。近接老总来电说有革命大计磋商，当必是很重大事件，所以不得不赴惠见见总座。"并出电报示之。

钟："我昨日派老彭去你处，他有去否？"

我："有！"

钟："农会本是好的，我是很赞成的，社会主义我也看过，确是很好的，不过要有步骤，如上楼梯，一级一级上是很安全的，不经楼梯一跳就要到楼上，结果只有失败，故我以为你们做事太热心太急进了，应慢慢地来。至前次解散农会捕农民的事，并不是我主张，不过当时王县长等及全邑绅士来电告急，谓海丰土匪暴动，我是驻防海丰的负有责任，若不派兵，倘有事变，责任在钟某自己担的，若我当时知道只是农会开会，我定不派兵。以后王作新叫我捉你，我还不主张！"

我说："是的！这难怪你，这不但我很明了，即二十余万农民也会原谅你。不过当时如没有你派兵，王作新是不敢作怪的。不过王异常可恶，他自己不做恶人，要恶人送给你做，用你的刀来杀人，以致个个怒你。王作新对人说：解散农会不是他而是你，你是上了他的当……"我的话未完，钟就说："王作新很坏，我是不久要换他的，不过他是老先生，一方面找人做县长是极难，故找不到，我的招牌是给王作新涂乌了！"

原来钟景棠因与王作新争某一笔款之故，致暗中互相冲突甚利害，故他也诋毁王。

我说："被押农民到今半年未放，这是易使农民对你不利

的，因为个个都受了王作新的骗，一切罪恶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去解释，把被押农民放出来，我到惠州也可把这件事去报告老总（指陈逆）。”

并谈几句闲话乃出。

在农民一方面，闻我们回来，欢喜非常，天天到来会面，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听他们的报告，得到几件事：

（一）在农会被解散中，第二区（梅陇）的农民，暗中仍继续组织，主持者为叶子新同志，并一面向地主辞田，用同盟非耕的方法，而使地主受一大打击，卒至使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轻减明年的租额。过后地主乃联合第三区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第三区分会来抵抗农民，然都没有办法，结果地主屈服了，农民得到胜利。

（二）第二区及惠阳方面，在农会解散期间，仍有暗中加入农会的人计三百余人。

（三）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

（四）要求即时恢复农会，并恢复学校、农民医药房。

在这个时候，农民对于恢复农会的空气很高。

间有人问农民说：“你们还敢再做农会，人押在狱里尚未放出，仍敢再试！”

一班农民答他说是：“生为农会人，死作农会鬼，杀头也是要干的！”

我们乃召集各约农会代表会议，到会人数四十余人，由彭湃报告自解散农会到今日经过情形，由代表决议从速恢复农会，并准备欢迎同志出狱。

彭湃报告的要点，略说：“在狱同志不日当可出狱（众听此说喜形于色），但是同志不日可以出，你们相信是谁的力量呢？我们对于这问题不可不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不然，同志出

狱，农会恢复，都没有用处。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并不是受陈炯明的帮助，也不是钟景棠、王作新的好心，更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因为如果个人有本领，早早出狱，不待今日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因为农民若不是靠自己力量，而向别方面去求，是求不到的。这次惠潮梅十余县的农会代表，在汕头成立了惠潮梅农会，虽然内面不是十分好，但亦可以吓得人。所以陈炯明、钟景棠、王作新一辈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一方面固然是用温良政策来利用我们，在他方面确是怕我们农民的大联合！所以陈炯明也要来对我们低个头，说句好话！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原因。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经验，农民运动非扩大他，普遍到全广东不可。单单是海丰一个农会，天样好也是无用的，将来更加把他发达到全国全世界去！”

过了两天，忽然钟景棠着人送一封信来，信面写着：

送呈　　彭总会长湃启

内详

一打开来是钟景棠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此致彭会长。”

钟景棠这封信称彭湃做农会的总会长，已经承认农会的存在了，同时说准放人，这就是我们所料的不错！即时着人保释，并一面召集附近农民，列队欢迎出狱同志。

同志的出狱，更影响于农民恢复农会之决心。

这个时候，我们赴惠之行，一天缓了一天，专想去理会务，准备再起旗鼓，重新奋起。未有到一个星期，惠州来了一个最妙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就是：

“炯光司令病故，总座伤心非常，不日回梓，兄（指湃）

可免来。”

陈炯明最可靠的军队便是其弟陈炯光部，炯光既死，陈更陷于末路。

我们乃乘机天天下乡宣传，及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事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

过了几天，忽然又接到电报，谓陈炯明翌日可抵县城，我们就临时召集办事处职员会议，决议：“农会的恢复应使陈炯明准我们成立，以后比较易于做事，故当他回海丰的时候，我们应去欢迎他，并召集多多人参与，可向他示威。”我们把通告发出了，可是到要去欢迎这一天，到者不过寥寥十数人耳，我们粘了千余枝小旗，却没有人来用，这就是因为农民去欢迎陈炯明是大不高兴的，所以没有人来。此时乃将在附近泥水工人（农民之为工者）用农会之命令抽出三十人，每人给一毫钱，共凑成五十人左右，乃携大小旗跑到离城二十里之一地方，名叫新寮桥，因陈炯明要从此经过的。这个时候以海丰偌大的农会，仅五十人来欢迎，未免笑话。我们乃在附近唱歌演说及燃炮，村中农民听见燃炮声及唱歌声，邻近数乡村男男女女小孩都来听了，大约有五六百人。我们演说了好久，闻陈炯明多半点钟可以到了，乃将带来之小旗子分发听众，并着其排列于路旁，听众要看陈炯明生来怎么样，也愿暂留一留。少顷，陈炯明来了，看见来欢迎的农民甚众，无限欢喜，脱帽向农民点头，刚刚出狱之同志杨其珊向前述欢迎词说：“六百余人是各乡农民的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农民立会。”陈炯明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

陈炯明回海丰葬其弟，数日来都是料理丧事。我们是乘这个机会到各乡去活动。

这个时候是十二年旧历十二月间，我们就决定从底下的各

乡农会先恢复，等到出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

旧历十三年正月间，捷胜约（即现之第七区）农民协会，先由李劳工同志同去恢复。正月初四开恢复大会，到会各乡代表二百余人，参加农民亦有一二千人，并狮子等参加示威巡行。我们宣传的要点："证明农民耕田亏本，农民因亏本之故，迫不得已乃压迫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不孝及痛苦，我们应该设法来救济。农会就是救穷人的会，谁反对，谁就是罪人。"湃五日由捷胜回来，六日去见陈炯明，陈住在私宅叫做博约山房。我去见他的目的，是探探他目前对于农会取甚么态度，我到了博约山房就上二楼，在这个时候，陈炯明坐在左边的窗角，环着坐的人就是陈开庭、王作新、林卓存等二十余人，通通都是反对农会的地主及绅士，正是我们最恨的敌人。当我上楼的时候，陈炯明立起说："坐坐。"一班绅士看陈炯明起立，也就把身动一动。

陈炯明第一句说话："捷胜农会恢复了吗？听闻又唱戏，何必！"

湃："捷胜农会是恢复了，我也有去参加，唱戏是传闻失实！"

王作新："彭君你是个好人，我很拜服你，但是你做事太过激了，如提倡减租、暴动，是很错！"

湃："我是否好人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做事不但觉着无过激，而且觉着太温和了，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何以呢？本年大风大雨，农民损失谁都知道，地主血本在土地，是不会损失的，农民的血本在地面，是被风打去了的，农民既无本钱可收，地主哪有利益可求，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不纳地主的利息，和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到底谁是过激呢？并且农民还有至多三成交纳规定，所以对地主温和到极点

了！你们诬告农民造反，总座也是不信，你们就胆敢不顾民意，把农会解散，又将农民二十余人监禁了半年，这是不是你们过激了尤过激吗！”

陈炯明：“是的，老前辈应该教导后辈，即使后辈是错也不应该用过激烈手段。”

湃仍继续说：“这是不要紧，还有应该为总座告诉的，自农民被捕之后，王作新派队到蓝镜清家勒索二十元，这是马上有证据的。还有其他农民被勒的都列起单子，慢慢可查。又被禁在监里的，被王益三勒去种种人监费也不少，有的确证据。又二十余农民被禁在狱的时候，王益三奉王作新命到被捕者之家族中去恐吓，说要枪毙他们，他们家属天天到王府去哀求，王益三等从中取利，并要农民的猪脚食，如有五六十元的即放他，否则不但不放，并且加以锁链，这是有证据有事实的。又当公平某农民，因还租致与地主冲突，被警察送到区署之后，解过县署，县署罚他罪款数十元，放他回去，行至警署门口，警署又再拘他们去罚他数十元才肯放人。以上种种的事实，三天还说不完。这是不是你的过激和是你的糊涂呢！”

陈炯明：“如果有这样，应该查办！这就是等于贿罪！”

王作新：“农会私造数千尖刀铁串，不是造反是做甚么？”

湃：“至说我们农会私造尖刀尖串更不成问题，尖刀尖串如可以造得反，只可以去欺骗小孩子，农会即有此东西，也只是自卫，并没有去杀人去劫人；如果你说有，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王作新说：“你自己当然说没有。”

林卓存：“我与你（指湃）是师生之份，我是你的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情分本是很好的，为甚么你在报纸上来骂我呢？”

（注）林卓存是保卫团局长。

湃："这是笑话了！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陈展麟："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

（注）陈展麟是个大绅士，又是个风水先生，陈炯明请他来修理祖地研究龙脉。

湃："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负他们，如再欺负他们，只有你们上当！"

此外还有不十分重要的辩论，他们觉得理屈词穷，皆一一下楼去了。陈炯明也去了。座中只有我一人和陈炯明两个护弁，那护弁看没有人，就跑前来向我说："彭先生，你骂真是骂得好！我听了真是火发！这班吃农民的妖怪，非杀他个干净不可！"

湃："你贵姓？是不是农民？"

护弁："我姓陈！我是耕田的，因没有田耕，老总叫我来当兵。"

湃："你愿加入农会否？"

护弁："我愿！我早早想入！不知如何入法？"

湃："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了！请你得空到我处坐。"

湃到了农会，就把这事报告了，大家都说这番的胜利就是得到陈炯明两个护弁的表同情！

我们着着的筹备，定了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举行恢复典礼日期。由大会决定每会员捐铜仙六枚为恢复费，农友们十分踊跃，把六仙交到了。这个时候，城市的铜仙，由每毫银换十二仙短至十一仙，就是铜仙已集中到农会来，农会所收到铜仙一

箩一箩的装着，可以示其多量了。

我们并决定于恢复时，演戏三天。

二月十二日到了，戏台搭好了，戏班也来了，将要开锣鼓，此时陈炯明叫人来叫我过去。原来是：

陈说："你们何必做戏呢？现在王县长因你们做戏之故，以致三天不出来县署了，他以为你们做戏他太无面子，可否请你马上停止？"

湃："做戏是农民代表大会决定的，现在戏请定了，无论如何是不能退辞的。做戏并不是坏事，而民众以为乐的，难道农民终岁勤苦饭已不准他吃得饱，戏也不准他看吗？这种无理的压迫，无论如何要反抗！"

陈："不然，请你搬到乡下去做，好吗？"

湃："谁肯去乡下做？去哪个乡下做呢？"

无结果的退出了。

在农会酝酿恢复的时候，地主与绅士老早去迫陈炯明下令解散，并一方面去包围陈炯明的老母，要求其老母去解散农会。实在他们并不是因为做戏与否而争，是因为农会之恢复与否而争，故当农会酝酿恢复以前，他们已经是宣传农会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去报告陈逆。

陈炯明对他们说：好，你们去解散他，但第一步不必用武力。次日王作新大贴其县署的布告，大意说：

"农会是提倡公妻共产，造谣惑众，前经本县长解散有案，兹复有不法之徒在外招摇，宣传农会，实属不法已极。顷奉总司令面谕，克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仰各乡农民知照……切切此令。县长王作新。"

我们即时召集各乡农民代表会议，报告这次地主绅士及陈炯明要解散农会的阴谋，众代表以为："我们应取消公开的组

织而为秘密的，同时彭湃、劳工诸同志亦须即时离开此地，向外发展联络；暗中组织，此间由志云、汉垣、陈修等负责维持。”计议已定，即将农会所有重要文件及会员名册等藏诸他处。

海丰方面农民，对于此次陈炯明解散农会，异常愤激，说到陈炯明三字，皆咬牙切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彭湃文集》刊印。

注　释

〔1〕东成王党，是会道门的门徒组织起来反对军阀压迫的一个秘密组织，东成王为刘福田，一九一三年为林干材杀害。

〔2〕本文在《中国农民》发表时，潮安写作汕头。

〔3〕这里的四人和下面五人、三人的说法有矛盾，原文如此。

〔4〕原文如此。

中央报告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年以来职工运动确有显巨的发展，这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党缺乏系统的经常指导，所以在一年中职工运动的损失仍是很大。第一，没有运用客观的形势充分发展我们的工会工作；第二，一切工作大都只有外表形式的组织，在基础上观察没有充实可靠的内容；第三，党在职工会中没有相称的发展；第四，全国工厂小组的成绩不好。

所以今后中央职工委员会应该有比较更强健的组织，尤其是关于职工运动宣传的工作，过去几乎没有做，应该努力改正。职工运动委员会对于各党部工会工作同志应有极密切的关系。关于统计分配等技术方面工作亦应大加注意和改善。此外各级党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到处发现与上项相同之现象，中央党部应注意改正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PDG

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国职工运动自发生以来，即完全在中国共产党指挥之下，故中国职工运动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所手创所组织的。在这种发展形式上，能使职工运动缩短了革命的过程，直接走上了革命的正轨，同时使党的本身上，因缺乏历史上的实际经验——党与职工运动实际的关系固不免发生离开党的发展而单纯发展职工运动的错误，“二七”前后的事实，就是我们过去历史上的教训。自第四次大会后，在职工运动中虽注意党的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又发现党对于职工运动不甚密切的关系，因此，常影响到职工运动软弱无力。这种现象在铁路工人运动中发现最甚，上海职工运动在“五卅”时也免不了有此现象。党的组织和发展与职工运动不密切相关，不仅失掉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使职工运动陷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工人阶级的势力，容易为环境所支配而动摇无定。

职工会承认党有思想指导权，并促成党与职工会组织上联络之设立，“党应当是一个中心组织”，这都是列宁说明党与职

* 这个文件是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工会关系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共产党的职工运动，应当发展党的组织，成为工会的中心；党不仅在职工会获得一切的指导权，并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密切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使无产阶级实行历史上的使命。因为我们的职工运动，是为无产阶级谋最后的解放，以至取得政权，这是我们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时刻不要忘记的一点。

中国职工运动，已走上革命的阶段，同时促成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也随之而增长，斗争的形式日趋于严重。中国共产党在这种进程中，要执行他在历史上的责任，不仅努力组织群众，训练群众，并要加紧的在职工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与职工运动的密切关系，以巩固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并利用各阶级间的冲突而使工会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以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然后始能引导工人阶级由国民革命而至社会革命。

因此，我们在职工运动中如何发展党的组织与建立密切关系，以及如何巩固这种关系，却是目前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遂有如下之决定：

（一）职工运动有了组织的地方，党的组织应随着而发展，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同志，他固然努力工会的组织和训练的工作，同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使群众与党渐能发生亲密关系，随时介绍工会中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加入本党，以扩大本党在工会群众中之组织；在未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应努力发展党的组织，这也是他重要工作之一。

（二）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虽不能直接命令工会，然亦

可由工会党团和支部间接在工会组织中而执行和指导；在工会一切政策，不能不经过党的决定。所以每一工会中，须尽力活动，组织党团及支部，成为工会中的中心，使工会行动实际在党的指导之下。

（三）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他的职任固然是决定职工运动的策略，指导职工运动一切的活动，并且每次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之策略，由党部在各工厂支部详细解释，讨论执行的方法，不使致成单调的职工运动。

（四）各级党部对于所属之工厂支部，当然注意组织和训练工作，同时指导该支部一切活动，尤其是注意工会活动的指导，以及督促执行职工委员会及其产业工会最高党团的命令和政策，遂可免去党与职工运动单纯发展之弊。

（五）党团的作用是决定工会一切斗争的政策及工会一切大体方针，支部是教育党员及督率党员的工作，在工会负责人为非同志时，应由相近的同志包围他，使他无形中执行党团决定之政策；但党团决定之大的政策须经上级党部通过认为必要时，再由党部通告有关系之下级党部协同进行。有时工厂之支部同为工会之党团，他一方面受该工会最高党团之命令，同时又属于党部的指导。

（六）各产业工会之下级党团，固直接属于该工会之上级党团，执行一切命令，同时因地方关系，亦应受当地党部之指挥。倘上级党团来命令时，该党团应报当地党部，如此种命令或政策，当地党部认为对该地全部工作有妨害时，即令下级党团停止执行，一面由党部报告上级党部取决，同时该地党团将党部决不能执行理由，呈报上级党团。有时为迅速起见，由党部直接与上级党团商定。至于该地发生临时事故，当地党部有决定政策及直接指挥之权，必不能违反上级党团根本之政策。

（七）全国的或地方的总工会之最高党团，他只能在全部工作上，大的策略上，直接命令所属之下级党团；但为贯彻某种政策及避免各地冲突起见，须呈报中央及区党部或直接通知各地党部，说明某种政策之重要及内容，请其协同督率下级党团及支部执行。有时关于某地之工作，最高党团应派人与该地党部共同商定。

（八）在职工运动中发展 C. P. 时，同时应注意 C. Y. 之发展；在工会中之党团，在必要时，应使 C. Y. 负责同志参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各种产业尚在幼稚时代，但在这一年以内，按照产业而形成最重要的工会，计有铁路、矿山、海员、纺织、码头、印刷、邮电、烟厂、铁厂九种，这九种产业工人，确是我们最近运动之基础，而这九种产业工会，实是革命发展的工具，所以现在之工人运动，当注全力于此。今分述于下：

1. 铁路工会运动。从国民军之势力到了河南以后，铁路总工会遂能乘时发展，从去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代表大会之后，从前被直系军阀所封之各路工会，均先后次第恢复，而新的工会亦成立了不少。但在组织上并未深入群众，这是一大缺点。以后铁路总工会的责任，应如下举：

A. 应切实整顿铁路总工会之本身，使其健全。

B. 应派人切实整顿和发展各路工会之下层组织。

C. 应利用各种机会，参加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对于政治的兴味，使其明了铁路工人在革命中之重要地位。

D. 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各路工会应从速发展党团，为指挥各路工会之运动。

E. 当努力造就工会之干部人才，尤应吸收非同志中之进

* 这个文件是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步分子，使其参加工会之重要工作。

2. 海员工会运动。在香港、上海一带之海员工会，从“五卅”以后，亦能受本党指挥，香港与上海之海员罢工，确能使帝国主义者受一重大之打击，惟天津、汉口、宁波、青岛诸处之海员，尚未有相当之组织，同时关于内河之海员，尚无确实之调查，上海之海员工会，实际上有为上海之大买办阶级及虞洽卿、李征五等篡夺之势，开资本家势力深入工人群众中之恶例，而香港、上海之海员工会并未成为群众之组织，这确为海员运动中之一最大的缺点，我们以后在海员运动中之方法：

A. 在汉口、天津、青岛、宁波四处，应从速设立海员工会，非但在外洋与沿海各轮船上的海员，当切实组织，同时关于内河轮船之水手，亦当组织起来。

B. 在海员工会中，当尽量发展本党的组织，务使海员中之各种运动均能受吾党之指挥。

C. 在海员工会下面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当切实与其联络，作为我们势力伸入海员群众中之导线。

D. 切实整顿海员工会之下层组织。

E. 在上海之海员工会，当根本改组，务使资本家之势力，排除在海员工会以外。

F. 努力消灭各帮同乡观念，使海员工会不起分化之危险。

3. 纺织工人运动。纱厂工会在中国之新式产业中，在数量上看来，确占重要位置之一。最近一年以来，纱厂工人的组织，较之其他的产业工人为有成绩，各种政治运动，均能切实参加。惟全国之纱厂工人，尚无统一的领导机关，在指挥上未免有不能一致行动之弊。以后纱厂工会之工作应注意：

A. 当切实联合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河南、山东各处之纱厂工会，筹备组织全国之纱厂总工会。

B. 在各处之纱厂工会中，应有党团的组织。

C. 纱厂中女工及童工占多数，当努力注意女工及童工运动，培养女工及童工在工会中干部人才。

D. 在无锡、南通等各处纺织区域，应即着手开始组织。

4. 码头工会运动。码头工会以码头工人之分子复杂，且因其工作之性质不固定，工人之工作亦因之常有移动，所以码头工会之工作为各种产业工会工作中最难之一部分，因其分子之复杂及工作之常移动，所以码头工人易为人利用，而形成法西斯蒂。在过去的经验中，上海总工会之利用码头工人，捣毁总商会，而上海总商会复利用码头工人骚扰上海总工会，这均为明显之例。倘我们对于码头工人平时不加以注意，将来在革命运动中，必受其他人指挥，所以我们现在应进行下列之工作：

A. 努力整顿和发展上海、汉口等处已有之码头工会，取得码头工会之群众。

B. 天津、青岛、南京等处，应设法组织码头工会。

C. 联络已有之码头工会，筹备组织全国码头总工会。

D. 码头工人中，青红帮及其秘密结社之分子很多，我们当切实与之联络，利用之以巩固工会。

E. 码头工人大多处于包工之下，而受包头之剥削与压迫，当引导下部工人，打倒包工制（我们当离间各包头之联合战线，分头设法反对局部之包头）。

5. 矿工工会运动。最近一年以来，在山东虽着手进行，但因奉系之压迫，所以无多大的发展。唐山矿工运动，以前无成绩，自国民军之势力伸入直隶后，渐有新机，然为时不多，亦无何种成绩。安源矿工俱乐部，从前确为矿工之模范，惟最近因工会政策太趋于保守致引起外力压迫，全体瓦解，以致影响湖南其他矿山工作。其余湖北、奉天、山西等诸大矿区，亦

均未进行工作，此数十万产业工人中之运动最不佳，我们以后不能随便放弃，应进行下列之工作：

A. 中外合资或外资的矿，要用政治问题引到经济斗争的目的。

B. 应注意附近之农民及铁路工人联合使其拥护工会。

C. 不要太看重客观情形，不引起工人之经济斗争。

D. 应注意上级技术工人以免他们不与工人群众行动一致，同时注意下层苦力工人，平均发展。

E. 包工制应打倒。

F. 矿工中地域帮派之分及青红帮等秘密结社，应用教育宣传之力防止其流弊。

G. 办合作社以防剥削。

H. 防止工头之反动行为。

I. 努力发展党之组织。

J. 注意发展自卫团。

K. 努力提高矿工之文化。

6. 印刷工会运动。印刷工人，较其他各种产业工人的智识为高，各处之印刷工会之已成立者有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天津、杭州等处，我们当进行之事项：

A. 筹备组织全国印刷总工会。

B. 选择并造就普遍工会之干部人才。

C. 努力注意全国各大报馆之工会小组，使全国各报馆之印刷事宜渐渐的为我们所操纵。

7. 邮电工会运动。邮电工人为传达消息上占很重要之位置，我们应进行注意之事项：

A. 在上海已有之邮务公会中，当设法充满下级职员与工人之势力。

B. 我们进行之各处邮务与电报局之工会，应先着手工会小组之组织。

C. 努力在邮电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以作工会运动之基础。

D. 尤其应注意各大城市之电气工人使其完全在我们指挥之下。

8. 烟厂工会运动。在上海、汉口之大英烟厂工会，因受环境压迫，致罢工失败而工会消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又为工贼所占据，各处如天津、奉天之各大烟厂，在组织方面尚未着人进行，以后应注意下列之工作：

A. 在上海、汉口应在可能范围内在各烟厂中设立灰色之团体，同时须秘密吸收各烟厂之活动分子，进行秘密组织，为将来成立工会之准备。

B. 在天津、奉天、上海等处，当开始组织。

9. 铁厂工会运动：

A. 努力发展并整顿全国各地的五金工会。

B. 组织全国五金总工会。

C. 铁厂工人各在包工及工头底下，则努力进行推翻包工制或反对工头之工作，并进行改良学徒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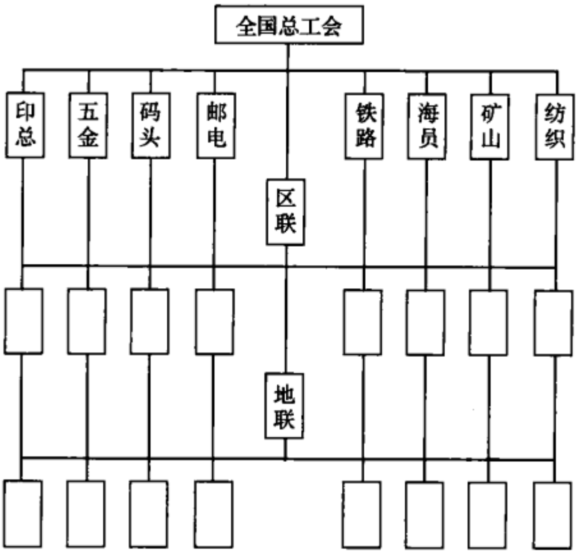
D. 各兵工厂造船厂，虽在军事范围内，进行颇为不易，我们当努力进行灰色团体如俱乐部、学校等，促本党之势力借此潜入其中，作将来运动之地步。

二、产业工会之统一问题。

产业工会之权力应集中，产业工会之指挥应统一，而尤注意各产业工会以及各种产业工会以下之各工会在群众中建筑稳固之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工会有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工会能真正的指挥群众，现在将各产业工会之统一的

系统及其相互的关系与指挥的程序，逐一规定如下：

（一）产业工会之系统表及其指挥相互之关系：



全国总工会实为全国职工联合会之意义，我们应以全国中央职工联合会目之，因为他的组织，是由于全国各产业总工会组织而成为全国职工运动之最高机关，在职权上而言，全国总工会能直接指挥全国之各产业总工会（即各区之职工联合会），如上图所表示者。

各区总工会（即各区之职工联合会）他能直接指挥所管辖之各产业工会，照系统上说，除受各该区总工会之指挥以外，当直接受全国产业总工会之指挥。这两方面指挥之区别，大概以政治及产业之特别发展而分，例如：

1. 关于政治上之事件，各区产业工会应受各该区总工会之指挥。

2. 关于产业上之特殊发展及特殊争斗，工会应受全国产业总工会之指挥，但各产业工会接到了全国总工会之命令后，应报各区总工会，而各区总工会得按照当地情形及该产业之特

殊利益，有命令产业工会暂时停止执行该上级命令之权，但必须用敏捷的方法报告高级总工会复议。

3. 下级工会之指挥问题，可以照此类推。

至各区总工会（即职工联合会）对于全国产业工会之关系，可互相通信商酌关于其所商各产业工会之重要问题，惟全国产业总工会不能直接命令各区总工会（即职工联合会）执行任何种之事务，因为在系统上各区总工会只能直接受全国总工会之命令与指挥。

至于产业工会之互相关系，则全国产业总工会应经过全国职工会（即全国职工联合会）而发生联络关系，各区各产业工会，应经过各区之职工会（即区职工联合会）而发生其联合关系，余类推。

（二）全国之分区。全国应按照产业上地位，而划分为广东、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湖南、青岛七区，在此七区中，在尚未有职工会（区职工联合会）组织之区，应即刻进行着手组织，在已有总工会（区职工联合会）之区应即就行区之职权而指挥在区以下之各外埠的工人运动，务使在最近的将来，各区工人运动之指挥集中起来，在吾党的指挥以下，使本党职工运动之基础更形稳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国职工运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发展已经过了五六年的长时间，但是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成就，直到现在，还是很稚弱的。因此党的发展受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党的决议，屡次明显指出工会工作的方针和策略，说明我们党所要求的工会应该是一种革命群众的斗争组织，而此种组织，首先应合于组织严密与权力集中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职工运动才有真正充实的内容，党的发展，才有着落可靠的基础。

一年以来民族革命的高潮，造成一个极普泛革命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参加这些运动，表现出他已在国民革命中占有积极领导的地位，在这个局面之下，全国职工运动正处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时期，工会组织问题，到此更成为党的中心问题；因为只有严紧工会的组织，增加工会的实力，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负担历史的使命，彻底与敌人争斗。

可是这时候我们指导下面工会的组织，多半失之空疏，组织既然空疏，就说不到能实行彻底的争斗。现在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及一切反动派联合压迫工人阶级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革命的武器——工会——在这个斗争中要克

* 这个文件是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敌制胜，更感觉到他的本身应有严密坚固的组织，如果多数工会仍是过去一般的松懈的情形，那就不能保证将来的胜利，并且保不住这些组织一遇到外力的压迫，能不完全瓦解。

所谓组织的松懈，通常是下列所举的缺点：

一、在多数工会中还没有按照第四次大会工会小组的决议案执行，工会会务完全推在少数负责的办事人身上，下面虽有一部分充当代表的下层领袖，他们的职务也不过是工会与会员间的一个居间人，除代征会费，传递命令，并没有十分注意处理本工作部分工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或做些教育训练工人的工作；这样，大多数工人对于工会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工会的内容，渐渐的空虚起来，久而久之，这等工会便变成了一个空招牌的组织。

二、也有些地方的工会，虽曾实行过工会小组的办法，但是因为负责工作者不能灵活的运用这个方法，实行的成效殊为有限，这些工会组织的形式是改变了，实质上并不见有甚么多大的进步。所谓小组干事会，仍不能实行他固有规定的职权，仍是代表制的变象，工人对工会仍是极散漫的，工会的基础工作，还未奠定；工会各级的组织，未能各尽其用，这些工会仍有待于更大的努力，才能期望有较好的进步。

三、在过去不少的工会斗争中，是很利于做工会组织发展和巩固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同志，在那些斗争中往往有忽略了这一点，失去促进工会组织的机会。

以上所举的缺点构成的原因，自然有些是客观环境的原因。但是各党部（自中央以至支部）缺乏经常的指导，确应负一部分责任；其次便是许多负责工作的同志缺乏对于工会基本组织的认识和努力。为纠正这个错误起见，各级党部对于此点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使各个负责工作的同志增加认识和努

力；为使同志对于工会基本组织问题有明了的观念起见，兹更为下列较详细的规定和解释：

工厂小组的意义和系统

一、工会是领导一切争斗的机关，他的组织应该集中而严密，才能担负阶级争斗的工作。所谓严密，即是要使工人群众在工会中加紧团聚起来；所谓集中，便是工会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万众一心的结合，成功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小组组织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二、小组无论在公开或秘密的地方，均应承认为工会的基本组织，因为在同一工作部分的工人，彼此均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小组的作用，在平时是训练工人的单位，可以使工人变为明白勇敢而能活动的分子，在战时这些经过训练有胆有识的战士，便能与敌人持久的争斗。

三、在工会不能公开的地方，应先从各工作部分中找得觉悟的革命分子组织小组，这个小组是绝对秘密的，可以避免外力的压迫。扩大这些小组，便是成立作坊地方工厂委员会的准备。在工会已经公开的地方，工会下层的组织，也应依照小组办法实行，此种组织对外亦须守秘密。

四、小组从每一个工作部分（或地方和作坊）组织起，在那些工作部分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成立小组。小组人数不定，人数不多时只须设一组长；人数较多不便指挥和开会时，可组织小组干事会，干事会之下，依工作地段或场所得分组队或排以便指挥。小组干事会设置书记一人，负指挥该会工作之责，干事会并应尽量罗致许多活动分子参加干事会工作。

五、在同一产业或职业有两个相连以上之小组，便可以成立作坊地方工厂委员会。

六、联合相邻之二个以上的工厂委员会，便可成立该产业

和职业工会。关于小组及委员会之名称，因历史环境之关系，暂时不必强求一致。

七、工会或工厂作坊委员会及小组即在公开时，其内部组织，亦应对外严守秘密，为防御压迫起见，应常常有特别的秘密组的准备，如秘密办事机关、交通队、候补办事人员等。

小组书记或组长的职任

一、书记或组长对于本会工人应负积极指导训练之责，对于工厂作坊及地方委员会之一切计划，负有切实执行之义务。

二、书记或组长是工人群众与工会委员会间的媒介，一方面要与群众接近，明白工人群众的情形和他们的心理，同时要与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洞悉工人群众的情形，使工人了解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的政策，使工会有一致集中的精神。

三、无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及干事会[1]，每星期一次；有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每月至少一次；小组下之每队每排之全体会至少每星期应举行一次。每次会议中应报告工会工作、时事要闻，讨论执行上级机关命令事项，工厂中作坊中或地方临时发生的问题，或讲演职工运动、政治问题、劳动常识、本产业情形、个人批评等。

四、遇有每个的斗争的机会发生，书记或组长应唤起全体工人热烈的参加，不要放过了一次斗争的机会（书记名称不定，可按照情形改为总干事或干事长）。

工厂委员会的意义

一、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是职工会的中坚组织，在各国及无产阶级柄政的俄国，同样重视此种组织，视为职工会的根本工作。

二、凡一切参加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之积极行为，均为工

厂作坊地方委员会最重要之工作。

三、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应领导工人学习管理生产事业，他应该做本厂产业管理的一切秘密工作，应当洞悉工厂一切技术上、管理上、贸易上的种种内情。此等工作即为打倒资产阶级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

四、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应受上级工会之指挥，不得因各工作部分委员会之分立，而妨碍工会权力集中之原则。

五、工厂作坊地方委员会，应注意严密指导监督各小组的工作，经常派人出席小组会议，敦促工作之进行。

工会目前的责任

工会全盘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同时应注意建设在阶级争斗的关系上面。只有在不断的争斗中，工会的组织和发展以及巩固才有保障。这里我们要注意上次党的扩大会议所指给我们的几点：

一、在工人群众中指明每个阶级争斗，都是政治争斗，必须政治争斗得到一步胜利，才能保障经济争斗得到一步胜利。以前的“二七”运动，及现在的“五卅”运动，都是显例。每个的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不可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我们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

二、工人运动不能离开政治争斗——全国的政治争斗，更不能苟安于保守局部的胜利与安全，作和平的幻想，忽视了全国的政治趋势与阶级争斗。

三、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且要增加争斗深入之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

四、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争斗，所以中国的工人组织，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的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尤其是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永久的存在和发展，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

五、在工人群众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收买工头工贼、组织工会或向工人宣传工会及共产党不利于工人等，这都比军阀压迫工人阶级还要利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PDG

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

（一九二六年一月）

任　弼　时

这一年以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前年曹、吴[1]失败后，孙中山北上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中山之死，五卅惨杀，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广州政府肃清反动势力而形成统一的革命政府，奉张[2]势力之崩坏，都是助长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环境。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正是我们深入群众的极好机会。这种好的机会，几乎是其他各国 C. Y. 所没有的。

在这一年，我们团体工作上自然有不少的进步。团员数量上较第三次全国大会时增加两倍以上，现除贵州、甘肃、黑龙江外，内地各省重要城市，都有了我们的组织。质量上亦有进展，有几处地方的组织向青年工人中发展，青工同志现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工作上颇能领导群众作各种斗争。总之，本团这一年极大的进步，就是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团体，渐形成实际领导群众行动的组织，宣传与组织方面都渐深入群众；但是也有极大的缺点，就是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

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做了不少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但

* 本文原载《中学校刊》一九二六年第二期，原题为《怎样青年群众化》。

是学生运动多偏于政治方面，工人运动则重于普通工会方面的活动。因为没有能注意到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以致使学生群众不能坚固地团结在学生团体之下，反而不满于自己的团体，不觉得学生团体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在工人方面，因为我们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争和宣传，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

过去我们未能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工作，当然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一、因为这一年以来，政治运动很多而党的组织尚小，不能不多协助党的工作之发展；二、还有许多地方尚无党的组织，所以团不能不代替党去指导地方政治活动及工人运动；三、过去学生运动完全由团指导，而学生运动含有极重要的政治作用；四、团员年龄过大，过了二十岁的青年多富于政治趣味；五、缺少青年活动的经验，一般同志还没有明白关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尤其是关于经济斗争工作）与本团发展的关系。以上种种原因，都足以促成我们不能注意本身工作的结果。

上列各种问题，如果不想方法解决，我们的工作当然很难青年群众化。关于第一、二、四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我们必须设法帮助党的组织扩大而强固有力，同时使团员的年龄降低，因此中央曾决定，党团须从严分化，将过了二十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 C. P.，年过二十三岁之团员完全脱离 C. Y.，即使不到二十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须加入 C. P.。这个决议有四种极重要的意义，即：一、使党的组织更加扩大而强固；二、使没有 C. P. 组织而有 C. Y. 组织的地方，发生党的组织，将政治工作交党负责指导；三、使团的组织青年化；四、使团内兼党员的分子增加，从而容易施行内部教育工作。

这种分化的工作对于团的青年群众化，有极重要的关系。

有许多同志甚至是负责的同志，对于分化未能深刻了解，并且不愿意将团的能干分子介绍加入 C.P.，惟恐团的组织因此而松懈涣散，或恐 C.P. 将 C.Y. 负责同志调作党的工作而妨碍团的发展。这种心理，都是因为没有明白党发展的重要而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同时，我们希望 C.P. 方面以后更能帮助团的发展，对于团内负责同志的工作，不要随便调动。

关于第三项学生运动的指导工作，过去由团方面负责，这是过去党与团没有注意群众工作的结果。五卅运动以来，我们看出中国学生运动有极重大的政治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随着民族革命运动而继续扩大，因此对于以后学生运动工作，已决定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我们应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去提高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关于为学生本身利益及求自由的斗争之领导。以后须在学生群众中扩大团的组织，尤须注意在中等学校及高小学生中从事发展。

高小学校过去我们未能注意，这也是未能注意深入青年学生群众的结果。为使本团青年群众化，扩大学生群众斗争的力量，养成青年学生做事能力，以后在各高等小学校须组织学生会，并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进行这种工作的第一步当然免不了有许多困难，但我们须开始着手进行。因为高小学生若能有组织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更可以使民族等等运动的影响扩大而深入民众，于我们工作前途发展有极大裨益。

关于缺少青年活动经验，未认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与团的发展的关系，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

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点。换言之，就是只要实际领导青年学生与工人为他们本身利益而斗争，我们自然会得到活动的经验，明白其中关系之重要。反之，我们将永远不会有这种经验，明白此种工作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们在青年工人中，有两种经常应进行的工作，而且只有在这些工作中，方才能够使我们的势力深入青工群众，表现我们做青年运动的成绩。第一种工作就是召集无党派青年工人的会议。以前我们做青工运动主要的方法，只是开办平民学校、组织俱乐部等。这些方法，固然能够影响一部分青工，但其范围总是很小的。还因为我们缺少开办平民学校及俱乐部的经费，这些方法也未能普遍应用。自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已由退守而转入进攻时期，各地产业工人均公开或秘密地渐次组织起来，并时常发动经济罢工运动。在这工人运动进攻时期，我们一方面应帮助普通工会之组织与发展，以巩固党在工人中的势力，同时也正是我们争取青年工人群众的机会。我们应尽量扩大在青工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实际领导他们为本身利益而斗争。但是现在做青工运动的方法，决非从前仅依平民学校、俱乐部所能收效（这固然也可进行），必须有适合需要的更好方法，方能收得我们工作的实效。这种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在各工人区域，用适当的名义（工会或某种团体）召集各种没有党派的青年工人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以扩大我们的宣传。这种会议的影响，比平民学校、俱乐部和出版物的力量还要大。关于这种工作的重要意义与方法，中央曾有几次通告，但是执行的很少（仅上海、长沙曾举行并有相当的成绩），这证明各地同志对于青工中的宣传工作很少注意。现在在本团提出青年群众化口号之下，各地应详细考虑执行。

第二种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童子团。对于这种工作，本团

过去完全没有注意，所以没有很充分的经验。但是在现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时期中，且我们的势力正相当地打入工人群众，有了接近工人子弟及童工之可能。为了养成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提高对新生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们应开始这种工作。西欧各国 C. Y. 非常注意劳动童子团的组织。俄国有组织的童子团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在各城市与乡村无不有他们的旗帜，对于社会生活有极重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应认为组织劳动童子团是本团重要工作之一部分，在各工业区域中去尽量设法建立这种组织。最初色彩不必太浓，纪律不要过严，且加入条件不必过高，力求其能普及。在各乡村中，亦可进行组织。

关于劳动童子团的组织，中央从前也曾通告各地进行。现在上海有组织之童子团人数在八百以上，且很能接受我们的宣传，表现得极有革命精神。其他如唐山、广东也有同样组织。各地亦应注意开始进行，务使劳动童子团的组织能扩大而普及于全国贫苦儿童群众中。

同志们！青年群众化本来是本团的老口号，但过去因为党的组织尚小，党团工作未能分化，所以我们很少做出青年运动成绩；同时我们因为没有去注意青年本身的工作，所以终久不能使党与团的工作分化。现在党的组织渐扩大而深入群众，我们在党的指挥下，除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外，应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实际工作。能如此，本团方有实现青年群众化口号的时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2〕指张作霖。

PDG

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恽　代　英

我从前听见人家说：产业无产阶级是比任何阶级都富于革命性的，我怀疑这不过是为一种宣传作用的话，实际是不会有这一回事的。产业无产阶级不是一般穷苦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么？他们对于政治经济的学理与各种革命的主义，都不会比别的人容易懂得，他们的道德品行亦不见得比别的人好些，如何能够相信他们比别的阶级的人更富于革命性呢？我有时很怀疑，他们便未必能够比我更富于革命性。

但是我现在懂了！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比我们有更高的学问道德，但他们确实是比任何阶级都富于革命性。有许多比他们有很多很多学问与很好很好品行的人，不都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革命性。

何以见得呢？

请看“二七”时期京汉全路工人是有如何的一致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有甚么地方、哪一种的人可以比得上他们呢？在那一个时候，在汉口、广水、信阳、郑州、卫辉、彰德、石家

---

* 本文原载《黄浦潮》半周刊第三十四期。

PDG

庄、保定、长辛店等地方，都同时有许多工人与军阀的血战，虽然是失败了，有许多领袖被杀戮拘禁了，这一种革命的精神，永远要被纪念于全中国人的脑中。甚么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可以比得上他们呢？

我听见在那时努力于工人运动的同志说，京汉路工人运动不过是前一年做起来的，这种运动由长辛店一个平民学校开始，仅仅八个月便唤醒了全路工人，发生了一次全路大罢工的经济斗争，再经过了半年，便筹备成立全路总工会，为与军阀争集会、结社之自由，遂造成“二七”的大流血。我们要唤醒别的人去进行革命的工作，有这样容易发生效力的么？学生亦许是更有知识更预备为国家兴自由与恶势力奋斗的，然而你便教育了几多年，恐怕还没有这样的成效，更无论是手工人、农民，更无论是商人了。

我因此懂得：所以产业无产阶级特别富于革命性的原故，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或者有道德，只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一般穷光蛋，因为是穷光蛋所以没有甚么挂念，对于革命事业特别勇敢。（第二）他们是直接受军阀（或中外资本家）压迫，因为是直接受压迫，所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敌对的态度很明显。（第三）他们全路工人都是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是一致的，因为所受压迫是一致的，所以容易发生同仇敌忾的观念，一致的与压迫势力相反抗。（第四）他们的工作与居处是集中的，每一个地方，或一段地方，常常有几百几千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集中于一个地方，再为他们传递消息极其便利，所以容易互相宣传煽动，亦容易互相督促约束，没有散漫的民众比得上他们。（第五）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上做工，占交通（或生产）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所居地位重要，他们容易觉悟自己一种

武器有一部分实力，可以与压迫阶级相抵抗。有了这五种原因，产业无产阶级遂成为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遂成为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力量。

我们革命的同志，请想一想这种道理，再看一看“二七”与“五卅”以前以后各种工人运动的事实，我们要注意这一支埋伏的革命军产业无产阶级，我们一定要与产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联合，我们的革命势力才伟大，能够必然的获得胜利。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下卷刊印。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

一九二三年“二七”残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刽子手吴佩孚，现在又破坏全国的反奉战线，转而与全国共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联合，进攻反奉战争的友军国民军了。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此局面若继续下去，则在中国将被一黑暗的大反动统治着，英美日的代办吴佩孚和张作霖将镇压住这几年来，特别是“二七”以后勃发而日益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而造成远东的黑暗局面，危害于日在发展的全世界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把吴佩孚此次联奉反攻国民军这一件事的危险，在全国革命民众面前指示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向是站在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我们于每次政局变动时际，都很明显指示民众以政局的趋向及民众应有的努力。我们在反奉战争初兴时，即指明爱国的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五期。

民众是反奉运动大潮中之主潮，民众应该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到奉系军阀因革命潮流的逼迫而成郭松龄之倒戈，我们亦已指明全国革命的民众应该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结果，因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吴佩孚的暗中破坏反奉的联合战线，以致奉系军阀仍然得保其残喘而与吴佩孚联合起来。这也是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战争中，革命民众未能积极行动之所致。现在的局面更加危险了。全国革命的民众此时正处在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机，若不急起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则任这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受的打击将不堪设想了。

全国的革命民众！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吴佩孚是奉系军阀之最后的拥护者。打倒吴佩孚——这不啻是严重打击奉系军阀的势力，这也即是扫除国际帝国主义压服中国民族一种有力的工具。我们应该一齐起来集中于这一步工作——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国民军此时正在直接抵御吴张反动联合的进攻，民众要肃清反动势力，必须援助这一支军队。而民众自身也应该迅速崛起，向反动的吴佩孚作大规模的示威，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督促国民军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在这状况底下，尤其是武汉的民众和河南的民众更应该特别努力实行驱逐吴佩孚并努力参加反吴的战争。同时，我们即应进行召集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于吴系政客一切护法护宪的主张，自然都是我们所应根本反对的。

全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快起来！

打破吴张的联合！

打倒吴佩孚！

打倒张作霖！

打倒英日等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1. 国民党自从孙中山死后，内部有冯自由、居正、谢持、马素等之反动，继之以戴季陶修改革命的中山主义之宣传，邹鲁、林森、叶楚伧、邵元冲等西山会议之发起与孙文主义学会之组织，莫不挑起党内左派、右派、反动派的重大纠纷，酿成党的严重恐慌，同时影响于革命政府的动摇，如滇唐[1]侵略、刘杨[2]之叛、省港罢工、仲恺[3]之死等，几乎颠覆了广州的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等，莫不欣然预计中山死后国民党必然分裂，广州政府必然崩坏。他们把国民党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国民党，把中国的革命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要求；他们不相信中山死后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存在，更不相信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较中山在日更大发展。他们用尽一切的阴谋援助党中的反动派右派向党捣乱，资助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政府进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们以为是没有开的希望了，即令有可能也一定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不知要闹许多风潮。然而现在事实的证明，他们一切的期待一切的努力都失败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很好的开成。所以我们对于

这次大会的成功，应努力宣传：

A. 这个成功是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是证明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因中山之死、不因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勾结党中右派反动派捣乱而消灭。

B. 这个大会，在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上是极有价值的。

C. 这个大会，是整个的统一的大会，是唯一能代表全党的大会（海内外有组织的各地均派代表与会）。同时证明少数反动派右派捣乱之无能为，证明他们的行为不是什么党的分裂，只是这般人背叛了国民革命被淘汰出去。

D. 这个大会，是真能接受中山的遗嘱真能继承第一次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的大会。

E. 说明在这次大会中经过的好现象，右派反动派并无力捣乱，而左派与共产派的关系非常之好，双方并没有什么意见，仍一致的协作。

F. 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特别是宣言及各种决案。我们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宣传左派的成功，宣传大会的一切材料就是宣传左派的思想和政策。

2. 我们现在对于国民党工作，应该懂得下列几个主要策略：

A. C. P. 与国民党合作政策：仍当继续从前的政策，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同时，又要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 C. P. 为核心的，离开了 C. 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

B. 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战线：为对付目前的反动政局，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勾结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为增强国民会议宣传的势力，我们应建筑一民众团体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在这个

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去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去拉住一部分较好右派首领，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实行这个策略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在现时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当中，没有确定的右派，因为确定的右派一定要成为反动派。现时右派的首领，多是很动摇的，常常徘徊于革命政策与反革命政策之间，尤其是右派下面的群众，性质更不固定。所以我们对于右派的政策，决不能笼统的把他看成与左派敌对的固定的组织，更不能逼他团成一气，把他看成整个的对象来攻击；我们要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好的走到这方面来，坏的驱逐出国民革命战线之外。联合战线的政策便是由此产生。

二、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策略，努力宣传左派；一方面又要讲联合战线，这本是很冲突的事。过偏于前者的宣传，一定是减少行动势力；过偏于后者的联合，一定是破坏革命的行动。因此，必须应用得当：（A）联合战线不是注重形式的联合、机关的联合，而是注重增进行动的势力，不放过一切行动的机会可以取得的一切势力。（B）在思想政策的宣传上绝对不能让步，应努力痛斥右派的错误；在行动上则力求取得其合作（如对于反日出兵之示威运动，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进行等等），以壮大运动的声势。

三、应设法抓住右派中比较左倾的首领，应把他放入各级组织之内，使他在左派势力包围之下，不要让他站在组织以外；因为使他站在组织以外的结果：（A）可以影响一部分群众离开党，激起他们的另自结合；（B）或成为反动派利用号召的工具。

四、在联合上部首领的工作当中，切不要忘记是要借此以打入下部的群众中去，是要借此以引起一切的行动，从行动中证明我们政策的正确，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倘若仅注意上

部的形式的联合，则这种联合是无用的。

3. 参加大会的代表回转本地后，应即依照民校第二次大会议决及本党政策，与该地区委或地委详细订出该地发展民校工作的计划，预备召集全省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应努力多找左派分子参加，并应选出一些左派分子在党部负责工作。

4. 在宣传工作上，除上面所指出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外，尚有应注意者数事：

A. 要有计划的切实管理各地民权的出版物。

B. 赴会代表应努力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也就即是宣传左派的成绩，宣传左派政策的成功。

C. 在解释三民主义中，应根据第一次第二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小册子，说明要用如何的方法如何的力量才可以实现三民主义，指出戴季陶思想之错误，国家主义之反动。

D. 少说抽象的理论，多注重事实的宣传，如大会的经过，广东革命政府现状等，这都是可以实际打消右派、反动派的造谣的。

E. 对于西山会议分子，大会虽已决定分别处罚，各地代表回后，仍可宣传他们的罪恶错误，并可作成决议或宣言，请求中央依照大会决议严格执行，令这般人在两月内有明白悔过的表示，否则请中央开除。

5. 这次大会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我们以后更应努力扩大左派的群众，坚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也就是坚固国民革命的进行。同时，我们在这种扩大左派组织的工作中，须注意下列数事：

A. 发展左派仍当以 C. P. 为核心，同时要扩大巩固 C. P. 的组织，因为离开了 C. P.，一个国民党的左派是不会形成的。

B. 在许多地方，从前只作了利用国民党机关的工作，尚

没有真正形成群众的左派组织，以后须努力充实。

C. 应该在商人中、农人中、学生中、军队中、妇女中、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努力发展左派的区分部。

D. 应该注意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必须特别巩固左派在学生群众中的组织。

E. 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使之了解民族革命不可离开阶级斗争及民族革命的党和阶级的党之不同地方。

F. 从现在到中山死后周年纪念（三月十二日），应该有系统的规划出扩大国民党左派应有的工作，要利用这一短期机会使左派的组织更为巩固。

6. 此次全国大会已规定各地党部的经费按月发给，同时并说明关于经费使用的原则应该是多用于运动上而少用于机关上，倘若某个地方只说起许多机关安置有许多领薪水的人，而实际运动做得很少，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7. 各地须在本月内，将该地发展民党工作计划并现时该地民党状况，作成报告图表，寄给中央，望勿迟延。

钟　英[4]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继尧。

〔2〕指刘振寰、杨希闵。

〔3〕即廖仲恺。

〔4〕中共中央的代号。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二月）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被向来所没有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所恐吓，别方面受帝国主义者假意的亲善所赂买，渐渐的脱离民众的国民运动，以至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工人运动的群众化，不但没有使学生界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也起分裂。——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

中国无产阶级，却还并不因此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及学生界中的一小部分已经得到帝国主义者的真正让步，其实资产阶级的分裂国民运动，离开国民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论，也是太早的。这种分裂的发生，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仅仅因为资产阶级希望出卖群众运动，便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可是资产阶级完全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所得的不过是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的空言应允，和法权会议的骗人把戏，这种客观状况之下，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妥协，暂时还没有可能。所以以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还是不可免的。

然而事实上如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有真正的斗争起来，工人阶级立刻便要陷于孤立隔离的地位，如今已经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方面，只要有小小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民族运动的分裂起分化，一定还要厉害起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正确的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他们亦是需要国民革命有彻底的成功的，如今的政治总象和革命前途，已经使这一问题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农民工人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前次大会及最近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农民问题，并且有了大致的决定。现在我们应当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议决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政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在现

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五卅"的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给反动军阀一个有力的打击，使他们内部崩败冲突，以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失败；可是不久英日帝国主义便建立吴佩孚、张作霖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反攻。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所以英日张吴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当然压迫反对一切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居然战胜，帝国主义者于更进一步的分裂国民运动之后，必定能以造成非常反动的局面，而且更比前要加增多倍的力量来维持他，——因此也就必定是很长期的。同时这种帝国主义反攻的胜利，必然继续进攻而要推翻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以开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解放。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他不但得着奋起斗争的南方几十万工人的助力；并且有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赞助他；他以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做柱石，而能扫清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废除苛税杂捐等等，因而也就得一般人民的同情和赞助。可是如果广州的国民革命势力和潮流不能发展于全国，他必然陷于孤立地位，同时受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的压迫，必致于不得不妥协而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况且他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运动策源地，只

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而后有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意义和成功。

现时中国北方国民军的反对张吴，各地农民自然的骚动，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及斗争的扩大和发展之中，广东国民政府——工农的革命联合——实在是最重要的主力军，而帝国主义方面也在竭力想法扑灭这些势力。我们的党在这些革命势力与英日吴张等帝国主义的联合的直接的间接的斗争里，应当认明现在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机，是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我们的党虽在中央扩大会议之后，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在这革命时机之中，党的政治上的势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时机而发展，对于一般民众的政治指导，不能巩固扩大，那末仅仅是党的组织上的扩大，决不是保证我们能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种种，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央地址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一、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职任。

二、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须顾及北方、上海已得到的民众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中央所在地必须能顾及上面所指工作，才能尽党整个的使命。

三、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A. 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 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 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

四、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

五、中央若在北京，以四同志组织中央局，二同志在粤组临委，上海设交通局。

六、C. Y. 中央与C. P. 中央同住一地。

---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PDG

七、此项意见须征独秀[1]最后意见方始确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PDG

国民党工作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一、以往各地对于民党的工作，都只做了仅仅成立民党机关的工作，而尚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大群的民众，以后应极力注意改正。

二、当努力宣传二次大会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

三、在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醒狮派等更反动的势力斗争中，对于右派采用联合战线的政策，去取得他下面左倾的分子，去分散右派下面的群众，去暴露右派首领的罪恶。

四、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一、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别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常表现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郭[1]军——现时之魏益三部。因此中国 C.P. 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 C.P. 里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 C.P. 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二、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但是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

---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

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三、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 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 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四、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 P. 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并且在北方以往的军事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因此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郭松龄。

PDG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国民党同志们：

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内，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民族革命运动，固然有了突飞的进步，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山先生有灵，应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全世界反赤运动的主人本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指示反赤运动者自然也是他们，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他们所用在中国反赤运动的工具是反动的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魏邦平等）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尤烈、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马素、邓家彦等）；他们所反的赤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甚至于国民军和郭松龄，更甚至于段祺瑞治下之贾[1]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内。这班鼓吹反赤的人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一不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他们所反对的赤化派，大部分都是参加民族运动的，而且除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说得上是什么赤不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六期。

赤，可见他们所谓反赤，实际上乃是用反赤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对抗，为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先觉，他若亲见一班老同志竟参加这种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岂不是一件痛心的事！

至于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中山先生有灵，那更是痛心了。右派对于党内的纠纷，不待第二次大会来解决，竟痛痛快快由西山会议产生了在广州统一的中央党部以外之中央党部，接着又另立和左派分离的各地方党部，在分裂之形式上，我们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分裂是西山会议决定的，右派对于左派分离之理由，在西山会议的议决案可以看出，一是反对共产派，二是反对苏俄，三是反对联共联俄的左派，在分裂之理由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

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当时公然表示反对此政策的便是冯自由一派。列席西山会议的右派领袖们，自以为是中山正统派，又声称不能和反动派合作，可是实际上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议决案，乃是反共反俄，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这是我们所深为惋惜的。或者他们自己不承认是根本上反共反俄，不过对共不赞成党内合作，联俄须以平等待我为条件，即令是如此，已经明明白白将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政策加以修正了。这一修正，不啻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根本推翻，不啻表示冯自由的主张对于孙中山的主张之胜利；因为对他党党外合作是普通的党略，联络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是普通的外交政策，和中山先生联共联俄之特殊的革命政策不同，中山先生看清了国内无产阶级的共产派有党内合作之必要而无危险，看清了国外无产阶级的苏俄必然以平等待我而无所疑虑，才决定联共联俄这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现在右派对此政策而怀疑

而修正，至少也可以说是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政策。

右派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为什么这样怀疑而要加以修正，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小问题，而有很大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说明的。在前，中国民族运动，如洪杨事件，如义和团事件，都只是原始的农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参加运动的主要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之知识者站在领袖地位，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遂进了一步；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来，全国大都市都发生了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运动，并且发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即带着浓厚的民族运动色彩，且直接参加民族运动，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更进了一步。这一个进步，遂反映到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在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其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如章太炎、冯自由等，看轻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地位，不相信中国有继续革命之必要与可能，遂先后脱离国民党而投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其余的革命分子，虽不曾看轻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之力量，而同时看见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力量还是很雄厚，感觉着自己孤立，遂有结合同盟军之企图；这一企图在国民党是必要的，也正因这一企图使国民党起了猛烈的分化：一派企图向左结合无产阶级，一派企图向右结合资产阶级。企图结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工农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的口号，国民党左右派乖离的真因完全在此。

依照中国革命之现状，这两派的主张究竟谁对，这更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在每个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固然应采用适当

的口号与策略，努力获得资产阶级之参加，至少亦要能够使他们中立，万不宜驱之使其站在敌人那边；可是国民党若企图结合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来担任困苦克己的决死斗，不能不说是一个幻想。全民族的经济解放运动，本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应该努力参加的；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大半都是从买办阶级蜕化出来的，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封建军阀，有很复杂的经济关系，未来的抽象的希望，敌不过他们眼前具体的利害打算，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运动走一步退十步的态度，也就是这个缘故。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乃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且他们大部分亲身在外国资本家鞭箠之下，每日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资本帝国主义之凶猛，他们比任何阶级都看得清楚，所以他们在事实上已很猛烈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国际状况上看起来，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发达到最高形式，所以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不明助或默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与压迫的；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的，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苏俄及德国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依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说民党左派企图结合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是对的，因此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也是对的。

可是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苏俄所造的谣言与非难，国民党右派竟据以做怀疑及修正中山先生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这也是我们应该辨正的。他们捏造中国共产党之谣言很多，最重要的是破坏国民党或是想变国民党为共产党。可是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若企图破坏国民党，便成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在事实上，自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国民党党员在

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大有进步，所破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打败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反动分子，这正是反动派所痛心，所以不得不出死力来造谣非难共产党的最大原因。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决不致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之幻想。他们非难苏俄，最重要的有三事：一是蒙古问题，二是中东路问题，三是广东问题。在国际革命运动上说，援助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是苏俄开国的国是，他援助蒙古民族，和援助中国民族是同一的理由，并且同时他不赞成外蒙压迫内蒙，和不赞成中国别的大民族压迫蒙古民族也是同一的理由；在国际交涉上说，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于蒙古关系，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这是要中蒙两民族自己决定的，难道我们愿意承认苏俄对蒙古的关系和法国对安南、日本对台湾一样，要他亲手交还我们吗？中东路的办法，不过是暂时的局面，拉得克和杜洛斯基都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维持这暂时的局面，此理甚明，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若今天交给张作霖，明天便转到日本手里或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共管，苏俄是希望中国的人民政府早日成立，能够接收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并不是企图永远中俄共管的，我们若望苏俄马上交还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表面上虽然是为中国向苏俄争得此路，实际上是为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向苏俄争得此路。关于广东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似乎更是不须辨正，他们硬说广东已经被苏俄统治了，嘉伦将军掌着军政权，鲍顾问掌着民政权，可是嘉伦将军和鲍顾问[2]都已经先后离开广东，试问现在执掌民政权、军政权的又是谁？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族革命进行之故，现在极诚恳的劝告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同志们，你们如果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便

应该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而不站在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地位，便应该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眼前民族革命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倒反赤运动，你们及资产阶级虽然不曾积极的参加这个运动，似乎取了中立态度，这是不够的。他们所谓反赤，俨然和反帝国主义是对抗的口号，明明是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反动的军阀和反动的知识分子，向中国参加民族运动各派反攻的政策；因此，负有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反攻，是不应取中立态度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高声叫出总的口号：

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

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

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贾德耀。

〔2〕指鲍罗廷。

PDG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李　大　钊

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役、日德之役，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挟战胜的余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定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商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由“五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出版的《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PDG

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色彩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考一考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先生的诞生地

是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广州很近，广州是中国开放海禁最早的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门户。西历纪元四世纪时，印度南洋一带，已有闽粤人的足迹。十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是广州的繁盛时代，最初来广州的是亚拉伯人，欧人是西、荷等国人。一七八四年美舰“中国皇后”号到粤。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澳门的季节出张所，外国在那里设立商馆，只准经过行商的手与中国贸易。中国对于居留广州的外人，设有种种的限制。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伊利查别兹女士特许其有对华贸易独占权。到了一八三三年，对华贸易权才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私人商业手里。在这东印度公司有对华贸易独占权的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只是羡忌葡人先占的澳门，只是常常在广州的门户以外徘徊着，想伺一个机会进来占据广州，像葡人占据澳门一样；但是因为广东民众严密的监守，强烈的抵拒，终于没有能够偿了他的愿望。所以一八三〇年以前，中英商业的平准，还是于中国方面有利，银币不断的由印度、英国、美国输入中国。在那个时顷，英棉及一定限度的羊毛亦输入了少许。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像潮水一般的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像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尽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着卖鸦片于华人，同时印人需求英国的制造品，亦全靠在印度的鸦片的出产。那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输出于印度的商品额量日以增高，则其取自印度而须要卖给华人的鸦片额量，亦必随着增高。英国此时需要打破中国门户，不仅是为印度出产的巨额鸦片谋一尾闾，并且是为那在他本国畅旺出产的制造品谋一销售的市场。英人为达此目的，乃于一八四〇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

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人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撒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闽粤一带以及海外的三合会（一名天地会）即是这种反清复明的秘密的团体。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亦曾容纳了三合会的一部。太平党与三合会的宗旨不能尽合的地方，约有二点：（一）太平党信耶教，而三合会信道教与佛教。（二）太平党主张于颠覆清朝以后建立新朝，而三合会则主张恢复明室。故二者未能完全合一。至于反清复

明的民族运动，在满清初入关时，已经与耶教思想有了接触。明室遗族在广东曾与罗马教皇有文书的往来。明皇族及其遗臣，那时已有百数十人加入耶教。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与耶教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看那太平党人的教主“朱九畴”、“洪秀全”的名字，便知他们的教门必与朱明孑遗洪门会党有所渊源。

太平天国的年代，是由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正是英产业发长最猛的年代。这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青年们，身受外来的经济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严厉的禁吸鸦片，便是表示他们对帝国主义者以炮火护送来的毒物非常的厌恶，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看他们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平均性质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农民经济的要求。

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宗教感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

扑灭太平天国的长胜军。

一八五〇年顷，英国产业有猛厉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危机的征象。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的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的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能不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许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观于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成立以后，英公使巡游长江过南京时，以炮艇轰击南京太平军的炮台。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上海时，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的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乱。一八六一年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一八六二年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送兵士及接济军火。英法联军以武力干涉太平军入上海。英海军助清廷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一八六三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所谓长胜军，助平太平天国。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

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

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英法忙于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势力遂压迫到日本，以后各国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帝国主义压迫东方的大势。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唯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〇〇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一九〇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

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

——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各级同学们：

最近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这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是：

1. 仲甫[1]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

2. 现时的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2]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

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皆是急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

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 Y. 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四天，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问题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会前中央及南北负重责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正式开会时反复辩论又经二日，方始作最后的结论。

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暴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经过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打击。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护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占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在“关于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这决案中详细分析：1. “五卅”以后全国各阶级联合反帝运动战线之逐渐分化崩坏，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隔离地位；2. 要引导国民革命

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3. 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4. 现时是英日张吴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进攻倘若得胜，必继续推翻广东政府，所以现时在北方应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抵御这个进攻，才能维持民众运动在北方比较自由的基础，才能为广州北伐的接应；5. 广东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大中国的革命运动，能使自己免于孤立。所以这次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革命势力的往北方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

在这个决案内，特别指出广州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以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然而各地同志在执行这决议案时，须注意勿生出下列之误解：1. 只注意广州工人农民运动工作，而放弃其他工作；2. 以为有了国民党国民军的政权，而后可以发展工农运动。这个决议案的真意义要使同志们对于广州政府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军政权之重要格外深切了解，在党分配他的力量时轻重缓急有所选择，但并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非有全国各地革命宣传的响应，则广东是孤立的；非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之参加革命，则工农联合战线亦是孤立的。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所在之地方，固易发展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有工农运动的发展，更能促进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格外左倾。望各地同志于执行以上之决议案时十分注意。

关于中央地址问题，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方，而于上海设交通处，广州设临委；如北方政局反动，则移粤与否尚须讨论。

此次会议，又决定于“五一”节日在广东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望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未有农协组织之地，亦应从速着手进行，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供党决定农运策略时之参考。

议事日程共有十一项：1. 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2. 中央地址问题；3. 国民党问题；4. 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5. 广东问题；6. 三特区工作问题；7. 河南问题；8. 铁总问题；9. 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10. 设立长期党校问题；11. 反吴宣传问题。

兹择关系比较重要而且普遍之两决议案附录如后：

1. 现时政局与共产党主要职任议决案；
2. 国民党工作问题。

钟　英[3]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注 释

〔1〕即陈独秀。

〔2〕指吴佩孚、张作霖。

〔3〕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祺瑞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自“五卅”以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向中国民众进攻更有组织更有计划更有实力，一方面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并散布反赤的宣传，以分离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一方面尽力援助直奉军阀扑灭接近民众的武力之国民军。

此种进攻到现时更为凶狠，国民军之二、三军已在英日吴张联合进攻之下完全失败，只剩下国民一军孤军作战，既无法得到充分饷械之接济，又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吴佩孚、张作霖方面有帝国主义充分之援助，虽濒于绝境的张作霖亦能赖日本之力起死回生。

所以现时的局面非常险恶，倘若国民军在北方完全失败，则全国将陷于顶反动的局面，广东政府在这样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亦将不免于陷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存亡关头。

此次大沽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日本以四驱逐舰引导奉张军队袭击天津，国民军之制止通行乃是正当防御应取的手段，英日领导的使团，竟援引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于中国政府，限期撤消大沽口一切防御，是无异于解除国民军武装，让反动势力为所欲为，且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上亦并没有

禁止对于入港外轮之检查，可见帝国主义者通牒之凶蛮无理。

北京民众特为此事开市民大会，提出“反驳列强之通牒”、“固大沽之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等口号，向执政府请愿，严驳使团通牒，乃段卫队竟开枪击毙三十人，重伤轻伤不下百人，段祺瑞、章士钊等且预备以煽动群众大会之罪名逮捕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

段祺瑞之敢于出此凶残手段，盖以国民军现时所处地位不得不敷衍妥协，段乃敢于如此。这次屠杀较“五卅”尤为严重，再加上现时政局之反动趋势，我们更应以胜过“五卅”之努力来对付此事。党现在关于此事决定之政策是：

1. 为要援助国民军，为要免中国陷于极反动的局面，使革命进行遭受极大的挫折，我们应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类似俄国一九〇五年冬宫请愿屠杀而起的全俄革命运动。

2. 我们所提出的口号务期更普遍能容纳一切的群众参加。中央决定的总口号为：

讨伐残杀爱国学生的段祺瑞！

反对威吓中国的使团通牒！

取消辛丑条约！

我们要在这个口号之下，集聚一切的群众：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醒狮派，均来参加这个运动。

3. 不能提出过左的口号，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特别是上海的工作更当注意此点。反对张作霖反对吴佩孚的口号先不提出，以后再提，因为上面总口号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吴张的行为。

4. 在我们的宣言传单内尚可补充以下的意见：

A. 追悼被杀爱国同胞。

B. 抵制英日货。

C. 开国民会议惩办媚外军阀。

D. 段祺瑞是屠杀学生的凶手。

E. 辛丑条约是剥削中国主权最甚的条约。

F. 三月十八日又是一次国耻，望同胞勿忘国耻。

5. 对国民一军勿加攻击，他们政策的右倾乃现时所处的危险使然，只严电冯[1]军将领速起讨段。

6. 用各团体名义电方本仁、孙传芳、唐生智、夏斗寅、叶开鑫等促其讨段。

7. 现时只有广州政府能积极起来联合长江方面反吴的势力并造成全国民众的大运动，可以救一军地位之危险与政策之右倾，可以救中国革命之危局。

望各地于接此通告后迅即执行。

钟 英[2]
曾 延[3] 白

三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共青团中央的代号。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陈　独　秀

此次反奉战争之失败，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力助奉直军阀，而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中国的反动军队如奉张[1]，如直吴[2]，如李景林，如张宗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强迫之下统一起来，向国民军进攻，而在反奉方面，国民军与广州国民政府至少在军事方面未能联合作战，国民军内部，一、二、三军又未能切实合作，甚至于长江方面反吴的军事势力也未能联合一致，如此反奉战争安得不失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的军阀——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一八期。

PDG

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们在广东想分裂革命势力，同时在北京、在上海想分裂学生会。右派说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然而事实上两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党部某领袖，即预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试问这是谁的阴谋？这阴谋若继续发展下去，广东的革命势力，必然由分裂而全部倾覆，胜利的只有香港帝国主义者（此时香港及上海的英文各报对广州现在的事变已经表示异常高兴），右派所得恐怕很少，甚至一点也得不着。试想当年进步党是如何拼命为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袁世凯胜利后，进步党所得着的是些什么？

我们鉴于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高声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吴佩孚。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陈 独 秀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它的政纲、它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做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败，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四八期。

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做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

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戴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倒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像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

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它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们：

去年第二次劳动大会后，接着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在此次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上海和香港工人，表现出惊动世界的战斗力，不但使帝国主义及军阀震恐，并且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震恐；香港工人至今尚能支持一年的政治罢工，上海工人也能保持为从来所未有的群众组织，这是使今年的大会比上年的大会，更有新的生命。

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虽然还很幼稚，而在政治争斗上，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已在世界革命影响上收了很大的结果；这是因为工人运动一开始，不但有静的组织，而且有了动的政治争斗——民族革命的争斗，使计算世界革命力量的人，不得不把中国工人的力量列入。

现在反动军阀的势力又布满了北京，使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路工和矿工运动受很大的打击；然而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决不能长期的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工人群众正应在此反动时期中，格外努力积聚我们的力量，即静的组织力量，以备马上将来的动的政治争斗——与军阀决死战的最后争斗。

我们以后积聚我们的组织力量，不应仅仅是产业工人，并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一期。

要普及于一般劳苦群众，以扩大我们在数量上的战斗力；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在争斗的质量上也是会增加的。而且，我们不但要组织一般劳苦的工人群众，并且要和劳苦的农民群众组织亲密的同盟，领导他们参加一切经济的政治的争斗，才免得工人阶级孤军独战之困难，因为现时中国工人的数量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还是很小。

总之，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及巩固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才能够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以至获得我们政治争斗的初步胜利——民族革命的胜利。

本党是代表中国工人及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中，代表中国工人农民利益而争斗。

本党和工人同志们携着手奋斗已经四五年了，现在方开始和农民携手走上战线，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中国劳动运动万岁！

中国工农大团结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全国农民大会代表诸同志们：

中国农民的数量，不但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居最大多数，在全世界各国农民人数比例表中，亦居第一位。可是中国农民所受的困苦，也居第一位。因为中国农民兼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兵匪六种蹂躏，是别国农民所未曾同时苦受的。

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向六种蹂躏者反抗了。

中国农民运动要注意两件事：

（一）中国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宰割之下，非到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革命得着胜利，农民所受六种蹂躏者所给之困苦是不能免除的，因此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

（二）工人是现代革命运动中之最急进的先锋，且城市工人又站在政治上重要地位；因此农民运动有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必要，而且革命的工人阶级有领导这些运动之必要。

本党是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

责，是领导中国农民工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斗争；同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争斗。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农民工人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全国农民大会万岁！

中国农民运动万岁！

中国农工大团结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国民党右派大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陈　独　秀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〇期。

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了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它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

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 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了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此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借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连”，“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另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它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它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

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左：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它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它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

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1]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显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丢掉了。“平均地权”本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

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的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吧！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组织，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很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

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言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陈炯明、林虎、刘振寰、杨希闵。

PDG

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各级同学们：

自从去年“五卅”以来至现在，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各阶级联合战线的政策，着着成功，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地位，所有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能够抵抗这反动势力的进攻，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原则。但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宣传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始有可能。错误之最重要者如：（一）不注意地方问题；（二）宣传口号提得太高；（三）不懂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四）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等。中央特为此刊印一本小册子，总合我们数年来工作的经验，指出这些错误对于工作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名《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工作》[1]。陷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中的我们，只有依着这本小册子所指示的道路走去，方有活路，否则处处都是死路。望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原文未署发文单位，从内容判断，应为中共中央发出。

各区委，各地委，各支部接到此印刷品后，每个同志均发给一本，当令详细读过，其不识字者，支部应负责特别为之解释，必须使各个同志均了然于这小册子上所说的话，并须将本小册子宣传的影响，详细向中局报告。

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五卅运动的高潮，到“三一八”屠杀告了一结束，也就是中国革命运动告了一段落。自“五卅”上海血案到“三一八”北京血案是一时期，北京血案后又是一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固然不是进攻时期，也不能说是退守时期，乃是一集聚有组织的群众革命力量并统一这个力量之时期；有了这个力量，才能够抵抗目前严重的反动势力之进攻，才能够进到比五卅运动更有广大的群众，群众更有组织更革命的一新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可称为五卅运动时期和未来的新时期间之准备时期。

我们已经不是开始工作，我们是继续工作，所以在过去工作中一切苦的经验，即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重的导师，在这准备时期工作中，须要把它一点一滴的都记在心头；这些经验与知识，任何马克思列宁的书中，都未曾为我们具体的预备，是须要我们亲身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的。

落后的中国民族，当然还未能懂得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重要；可是在事实上，五卅运动确是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中各阶级性之存在，当然是另一问题，而且永远是另一问题）向帝国主义进攻。然而帝国主义者却懂

得这一联合战线之可怕，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便采用分离这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军阀政府，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一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罢工，压迫工会，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遂由五卅运动一转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虽然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而未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生空前的大屠杀，反奉运动遂失败。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遂由分离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而组成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奉吴及一切反动派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溃退，反动的奉吴军阀得了胜利，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成功；然而帝国主义者用心周到，他们以为单单组成和军阀反动派的联合战线，把大资产阶级放在外面，恐怕只能一时镇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不能使这一革命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于是聪明的帝国主义者，最近更准备给大资产阶级以若干让步（如速结沪案，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等），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拉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更进而利用大资产阶级，去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用改良手段即欺骗工人的手段，破坏工人革命的组织（如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对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说："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有人鼓动领导有人利用的，我们

何不亦利用之，别用一种方法，使其易于就范。”），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工人及其政党陷于孤立地位，如此，才能够使中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即民族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不致死灰复燃。

帝国主义者太聪明了，我们今后切不可太笨。在过去工作中，我们不会用心对付小资产阶级，迫得他们对我们发生怀疑与恐怖，五卅运动时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之破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聪明的帝国主义者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政策及他们自己联合战线的政策，大部分均着着成功，尤其是最近，如北方的国民一军有参加北京惨杀案之重大嫌疑，如南方的广州事变，分明是敌人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阴谋已达到我们的营垒内部，所有反动的势力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中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任何时期的工作原则。

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不能获得群众，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战线；那末，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的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消沉下去。

在过去我们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除去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也非常严重。我们在各地的宣传及活动都做得十分不好，不但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而且有时故意的离开群众，说他们都是反动派都是反

革命（这种情形在北京、武汉最甚）。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如左各项：

（一）不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而只有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和全国的普泛的政治煽动。北京所出之刊物可用之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湖北所出之刊物亦复相同。群众对于这种宣传感觉空远不能唤起他很深的注意，习久且生厌恶心理摈而不看，这是证明我们的宣传不能深入群众。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

比如在上海的宣传，我们不仅做全国的政治运动，对于本地问题如：卷烟税风潮，闸北市政的纠纷，工部局越界筑路，米价高涨问题……等，均须利用各种方法各种组织形式去参加领导。在其他各地，我们不仅研究全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本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能引导当地民众日常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宣传中可以扩大群众的联合战线，可以巩固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领导这些日常争斗最好的公开组织就是国民党，所以以后各地对于国民党工作当更加紧注意。

就是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也应当利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很详细的解释这些口号，使群众能把他们切身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和这些总的政治要求——如国民会议之召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北伐等——切实的联结起来。以前我们宣传的缺点，遇着中

央有关全国政治运动的口号，各地同志仅仅用各种团体的名义根据这些口号而号召表面的运动，却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央所指示的革命的总过程，因此也就并没有在日常工作里不断的向群众解释这些政策的意义，甚至于用各团体名义号召这些运动时，连这些团体本身的群众，都还没有切实了解这些口号和政策，这便是因平时没有有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之结果。这种缺点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会把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问题连结起来。

（二）第二个大的错误是：但凭主观的理论，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完全不懂斗争的战术，不知详细计算敌人的力量，不知怎样集聚一切反对敌人的力量向敌人进攻。要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若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自己以为很革命，其实破坏了革命，这种左稚的毛病，我们各地的同志做了不少的错误，以后应得十分的注意。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对于一切小军阀，如果能推他向进步的路上走，更不可向他提出过高的口号吓退了他。

（三）第三个错误是不懂得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1)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是群众的，必须努力获得各派（反动派也在内）的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联合是不够的；必须获得各团体之群众，获得各团体机关及职员是不够的，过去我们在各团体中如工会、学生会、农会及其他临时集会等等，每只看到一时工作的便利，只注意占据机关，多占职员，显出一种包办的形式，反因此使一部分群众脱离了这个团体，甚至于使这些团体分裂，分裂后我们即或仍占有大多数，亦属分散了革命的势

力，况且未必能占大多数。所以我们要扩大及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革命的势力不使分裂，我们的同志在任何群众组织中都只是领导（事实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包办，只是努力使群众愿与我们合作并接受我们的主张，而不是占据机关及多占职员。（2）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有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若没有这一共同的要求与口号，组织上的统一终必至于破裂无疑。联合战线这一政策，乃各派相互不提出自己的特有主张而提出各派共同的要求与口号才能够成立的；若我们固执自己的主张而不提出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这便是强要各派都向我们投降，而不是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之意义，不但是要他们让步向我们联合，我们也不得不让步向他们联合。我们向他们让步，自然是一个损失，然而我们如果有革命的计划，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为革命进行而让步，为扩大及巩固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让步，这便是有价值的让步，不算是损失。（3）笼统地指整个的他派群众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而不与之讲联合战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某一时期，我们甚至同右派、醒狮派、工贼下面的群众联合战线都要讲（如此次北京血案）。（4）联合战线不但要行之各阶级间，并且要行之工人阶级之本身，现时已有工人同志站在非同志的工人以外，工会会员站在工人群众以外的危险倾向，所以同志与非同志，工会会员与非会员，都有切实讲求整个的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即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宗教工人群众联合战线之必要，非此不足抵御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及工贼之联合进攻。（5）联合战线有各种形式，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我们不可拘定一种形式。如济难会就是一个很好应用极广大的联合战线之组织，然而往往轻于表示我们的政治态度，过于显露党派的色彩，于这一联合战线之发展上尤有阻碍，也必须即加矫正。

（四）第四个错误，乃是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也给我们党的运动以很坏的影响。态度不好有二种：一是在群众中，外观上表现色彩太浓，有些同志，在各方面几乎要把 C.P. 的招牌挂在脸上，使群众一见便认识，或于非必要时把自己的党籍告诉非同志的朋友；其实 C.P. 的招牌绝不在脸上或口上，而应在实际上活动上，而在每一次演说能痛快的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每一种主张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总之能使自身群众化，能实际领导群众，能获得群众的真实信仰。自然在某种环境或在宣传上有必要时，用不着隐蔽我们的面孔，但在一般场合，尤其是下层实际工作同志，在外表上色彩是愈灰色愈好。二是对社会一般人的态度太严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不客气了，因此社会上每有同情于我们的人，也嫌我们态度不好。我们的党，已经渐渐由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进步到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便不应再保留离开社会之别一世界的状态，而应该改变到打入社会的状态，因此我们每个同志为党之一员，同时亦为社会之一员，我们的社会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社会，我们若以对无产阶级同志的态度对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便是一个错误。我们太严峻了，便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太武断了，便不能使他们了解；我们太特别了，便使他们歧视；我们太操切了，更使他们骇怕。他们对于我们个人怀疑，往往遂至对于我们的党怀疑；反之，他们佩服我们个人，也会至佩服我们的党。在国民党工作中，对于国民党同志，这种个人态度更要特别注意。

此外，在各地宣传工作上，只注意形式而不落实际的毛病，亦须痛改。这种注重形式的毛病，不仅是对外宣传煽动不问群众的需要，只重主观的见解；即对内训练，亦只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不先客观的研究群众的意见，则所注入的理

论，必不能深入群众之意识，使他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打成一片。我们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都要时刻留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领导群众的本领，只有在群众中虚心领受他们的指教才能够学得。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领导群众争斗，才是领导群众争斗而不是下命令叫群众跟随我们争斗。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此处的书名与本文标题上的书名及附件的标题相互都不一致，均按原文刊印。

PDG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陈　独　秀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它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它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一期。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它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意义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

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左表：

（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产业	次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厂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邮务		六〇〇	（未能成）
金银业	一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商务印书馆	一	四〇〇	四〇〇
麻袋	一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袜厂	一	七〇〇	
共计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于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

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的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他不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到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我们的功罪*

——斥醒狮派诸领袖！

（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

李 求 实

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简称青年团），在他们过去每一次的宣言中，都曾经公开地表明：在今天，他们是领导工农乃至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努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因此，对于一切民众运动，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参加指导，对于一切组织并训练民众的工作，他们没有理由不去负责积极进行。

在极短的过去几年中，靠了同志们的负责努力，它们（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工农群众以及一般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中的工作，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他们已经使得群众形成了、认识了并且表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使得帝国主义和军阀在蓬勃的革命的民众运动面前发抖，他们已经引起了他们敌人之猛烈的露骨的反攻——便是迩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反赤”运动。

上面的事实是用不着隐晦而且也没有方法隐晦的。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一九期。

当然，每一个脑筋比较清楚的人，都能了解并且承认：今天的革命，是为的民众的幸福；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努力是为的被压迫的民众，他们没有纯粹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是民众的，失败亦是民众的。他们的努力，应该值得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赞赏，他们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应该值得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拥护。

然而，竟有人拿共产党、青年团的努力，作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罪状而横加攻击与非议，而这种“人”并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反是自命为站在民众方面从事“彻底革命事业”的国家主义派诸领袖，这岂非“咄咄怪事”？

二

共产党和青年团不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他们在几年的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几十年的国际革命斗争中，获得了充分的工作经验。他们认识了中国今天需要的是各阶级合作而工农居于领导地位的国民革命，他们看清了今天的革命工作，是需要一切站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战线上的革命分子之共同的努力来进行的。他们从来没有幻想来包办今天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从来没有投机来把持一切革命的工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没有丝毫幻想与投机的心理存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在历年的工作中，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促使一切革命分子都联肩到革命的战线上去；尤其是在最近年余中，在几次帝国主义与军阀猛烈向民众进攻的时候，他们曾经公开地致信国家主义的醒狮派与孤军派，致信孙文主义学会的同人，邀约他们携手杀贼；因为这两派是自命为革命的，在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多数亦确是极富有革命性。然而共产党与青年团

是失望了，他们获得的回答只是这几派领袖们的冷嘲热骂，意气的感情的攻击与有意或无意的告密——原来这些领袖们只是图的口里和笔下的痛快，遇着真正的革命工作便要向床下马桶里藏去，倘使藏之不及，被人曳住了一只腿，便恼羞成怒，娘的妈的都骂出来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一巡视民族革命的战线，还只看见英勇的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与青年团，携着手在那儿孤军奋斗！而自命为“彻底革命者”的国家主义派诸领袖，却反以此种英勇的奋斗为“把持”、“包办”，向着这支孤军施放冷箭排枪，阻挠革命运动的进展，以遮掩自己不能从事实际工作之耻辱，并求苟容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因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是要食这一队孤军之肉而寝其皮的呵！）于是既享有“革命党”之荣誉而又不受丝毫“革命党”应受的危险，（英界哈同路多安稳呵！）这是何等经济的打算！只是呵！说来真痛心，敌人杀到了我们的头上，却还捏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腰，一个人不是一条死狗般的无知，决不会作出这样丧心病狂的呵！

在五卅运动的继续中，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已经看出民众革命势力因联合而壮大，遂急谋破坏此种联合。他们用的方法是利诱与威迫，结果大资产阶级与小商人相继脱离了革命的战线。殊不料自命为“彻底革命者”的国家主义派诸领袖，亦竟因此绝民众而去，致使素日景仰诸位“贤明”领袖之一部分被压迫的青年革命民众，或误入迷途，或惶惑不知所从！国家主义派诸领袖此种变节卖众之行为，欲不为全国革命民众所唾弃，不可得也！

三

以攻击共产党为“天职”的《醒狮报》，最近又造出了一个极好听的题目，这题目便是“共产党把持的学生会”；该报的七十七、七十八及八十一等期，几乎都是拿这个题目作论文的中心。

我想在此地写出一点意见，指出国家主义派诸领袖的谬妄，以证实前述各节的论旨。（此地我要申明两点：共产党既没有“把持”（?）学生会，所以关于学生会本身的事，我无从说起；其次，我此地所写并不是想同醒狮派诸位大作家作什么辩论，因为他们的木头似的脑筋，向例是不诚恳听异己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的话的，我只想和一般的青年，特别是一部分被这些所谓“领袖”蒙蔽了的可爱的青年学生谈谈。）

醒狮派诸领袖在“共产党把持的学生会”这个题目之下发表的“卓见”，大概可以下面几句话包括之：全国学生总会被共产党把持了，因为它庆祝苏俄革命纪念并督促冯玉祥倒段，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的议决案》（?）里寻出了一段“证据”（?）第三次大会议决案中寻出“又一证据”；今后要肃清赤化的学生运动，纯粹爱国的教师组织起来，成为救国的主力军，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减少引起学生愤激的目标，使学生稍稍退后，多在学问上用点工夫，以作救国的后备军。

现在我们且看他们的谬妄在哪里。

第一，我们应该认清学生在今天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就理论上说，学生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他本身并无经济基础，对于一切的政治观念，极易动摇，他可以革命，亦可以

从事反革命，但是在今天这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学生自然都是趋向革命的。更就事实上来看，五四以前不必说了，俄国、德国的不必说了，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出学生几乎常是站在革命运动的第一道战线上。他们（学生）何曾不想“多在学问上用点工夫”，可是客观的环境如何容许他们这样？醒狮派诸领袖以为教师起来了，便可“使学生稍稍退后”，这种空想，真是令人失笑，不知他们是有意骗人，抑系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伸直过耳朵？除了少数进步的教职员外，我们没有看见过指导学生从事革命工作的教职员，遑论救国的“主力军”（因他们有自己的地位与思想的关系）？而且，中国今天的环境促使一般学生趋于革命，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岂是几句空话所能使之“稍稍退后”的？共产党与青年团并不否认现在全国大多数青年学生群众确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能实际领导大多数）；但是所以致此的，决不是如醒狮派诸领袖所妄拟的什么应用“秘密组织”、“昨夜会议法”等妙法——真抱歉，共产党与青年团并不能像诸位领袖所写的那样会“应用”这些“妙法”！而醒狮派诸领袖既然知道这些“妙法”，自己当然都很好的“应用”过，为什么学生总会竟让共产党“把持”（?）了，自己却只能站在旁边骂街的泼妇似的以恶声相向？实在说吧，共产党在群众中作工是有他的“妙法”的——这个“妙法”，共产党不仅不“秘密”，反而欢迎一切革命的领导者尽情采用——什么“妙法”呢？就是：按照群众当前的需要，指示以正当的出路，且身先为之领导，为群众之利益是视，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与幸福。这样，群众自然会在你的影响与领导之下，比任何“妙法”都更“妙”！今天中国的学生群众是不要、也不能后退的，醒狮派诸领袖想使他们退后么？那便你们将永远不能使群众受你们

的领导，将永远看着共产党“把持”（?）学生运动！

其次，我们既然认清了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同时共产党与青年团又是以领导一般被压迫民众参加革命运动为己任的，那便他们的努力参加学生运动，使一般学生群众都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积极从事于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斗争工作——共产党与青年团之此种努力，实在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自然他们不曾希望什么激赏，另一方面却以为至少可以告无罪于一般被压迫的民众之前！然而国家主义派诸领袖却攻击共产党与青年团之此种努力为“把持”、“包办”，犹如一个挑夫为我们背了几口箱子从火车站送到家里，我们反要骂他“多事”一样，这真是所谓“别具心肝”者也！

复次，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与青年团从来没有幻想过来“把持”、“包办”现在的一切革命工作，尤其是在学生运动中；青年团的“秘密”决议案中写着“学生运动须努力与其他革命青年团体协作”这句话，想来醒狮派诸领袖没有看见。可是“协作”的结果，已如前面所述，只看见了自命为革命的醒狮派诸领袖，因怯懦而逃去革命的战线，因嫉视而反攻革命的队伍，这是何等的耻辱，又是何等痛心的事呵！

最后，我们且来了解一下所谓“肃清赤化的学生运动”。

醒狮派诸领袖以为学生总会庆祝苏俄纪念，并且督促冯玉祥倒段，这是共产党把持学生总会的证据，因而现在的学生运动都“赤化”了，因而要“肃清”，苏俄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苏俄革命纪念应否庆祝，段祺瑞应否打倒，民众应否督促冯玉祥倒段——凡此种种问题，到了今天，稍明时势的人都能有比较正确的了解（本志以前论之纂详，读者可参看）：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已经不是共产党与青年团一家的私言，便是一般进步的文学家（如“创造社”诸君），甚至反动的报

纸（如《国闻周报》等）都是同一论调。这种情形说明什么呢？这是说明现在的环境（或时局）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尽管你否认或排斥这种解答——这种“赤化”的解答，然而它之浸入人心中只有更深沉，更广大，这是无可抵御的！这些“解答”是随着环境的递变而早已存在的，不过共产党能够用它的锐敏的眼光与正确的论据，来最初发现并能率先实行——这便是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因而这亦是一般人不能不受共产党的影响的缘故。了解这个，一般革命的群众便可安心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至少了解这个，我们便不会意气用事，因忌讳“共产党”这个名词而并共产党所提出的正当主张亦一并抹煞了。

“赤化”这个名词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对付革命势力的新武器，从五卅以来，他们用来降服了大资产阶级、小商人乃至一般学者大人，现在醒狮派秉承他们的“上意”又拿来罩在学生顶上，想降服革命的学生群众。可是太不巧了，第一，革命的学生群众是不像一般软骨头的学者先生，他们是威吓不了的；其次，“赤化”这个武器，到了今天已经是子缺弹尽，没有实际作用了，因为一般民众，尤其是学生，都已经了解，“反对赤化”的内容是“飞机掷炸弹”、“强迫使用不兑现的军用票”、“排枪惨杀学生”、“枪毙有名望的新闻记者”、“通缉民众领袖”、“解散学校”……他们都已经了解“赤化”是被压迫民众真正的出路，因而都更倾向“赤化”了！醒狮派诸领袖号召“肃清”赤化的学生运动，真是适足见其坐在家里闭上眼睛说瞎话！

醒狮派诸领袖说共产党“把持”（?）了学生总会，其实这又是把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力量看得过于大了！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力量现在还只能影响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群

众，还说不上能如何实际去领导。他们对于现在的学生运动并不十分乐观。他们看出许多地方的学生运动并没有走上正当的革命的轨道上去；他们一面觉到自己过去的工作没有作到好处，同时深深感觉醒狮派诸领袖对于学生运动之“投井下石”、“借刀杀人”的态度之令人痛心。共产党与青年团认为学生运动今后应有更大的发展，应继续向革命的方向前进：他们——共产党与青年团自然勉励自己更努力更积极地去影响并指导学生群众作工，他们同时更希望一切自命为革命的青年领袖，都取下各自的感情的眼镜，坦白地诚挚地与他们携手作工，不要总是“强迫”他们（共产党与青年团）去“把持”（?）学生总会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

四

末了，我们还有几句指斥《醒狮》记者的话：

第七十八期《醒狮》里面有一篇文武君作的《全国学生总会是谁的?》其中引了一段所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的议决案》（?）证明共产党“把持”（?）了学生总会，并且附带的证明了共产党没有“诚意”（?）与国民党合作；这段“议决案”（?）的原文是：“我们在学生运动中已取得重要地位。全国学生总会中央委员会七人我们同志有四人。此外学生刊物多系我们同志编辑。我们在学生方面的活动既有了基础，我们便不应为国民党服务，替他们找青年同志，尤不应以我们组织好了的青年捧给国民党。”

这段所谓议决案的谬妄，我请指摘如下：

一、青年团的第二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举行的，那时的名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一九二五年春第三次

大会才易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读了青年团的略史的人都知道的。

二、一九二三年时代的全国学生总会的执行机关是“理事会”，初无所谓“中央委员会”，便是今天的全国学生总会亦只是用的“总会执行委员会”的名称。

三、不仅在青年团第二次大会的各项决议案中，寻不出上列的一段“妙文”，便是在青年团历年的一切决议案中，我们亦寻不出与上述意义相仿的文句。

四、青年团的团员几乎全数加入国民党，以及加入后工作之努力与成绩，都足以证明上述所谓“决议案”中所说的之谬妄得可笑！

醒狮派诸领袖曾经造了不少的谣言攻击共产党与青年团，可是最蠢笨的要算这一次了！前年英国保守党要推倒工党内阁，便造了一封第三国际会长季诺埃夫致英国共产党令其发动革命的假信，这封假信的结果，虽然一时结果了工党内阁的性命，可是工党在民众中的地位反因此而增高，民众对于保守党的阴险狡猾更看得清楚了。醒狮派诸领袖显然是效颦鲍尔特温（想来愚公先生曾经又有感而口占一绝：“鲍尔特温是吾师……”），可是此种蠢笨的举动真令人失笑而不得不侪诸公于“鹿豕”之林！我想像这样下去，将来一定还有许多奇妙的“新闻”和“议决案”继续在《醒狮》等爱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如：“共产党徒陈独秀于本月某晚窃入国家主义派首领曾琦先生的尊翁之卧室，窃去白洋布长衫一件……”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大会议决：‘国民党右派近来十分猖獗，这都是由于宋教仁的灵魂作祟，我们应即派同志八人，于最近期内到宋教仁公园毁去其石像与坟墓……’”

我在此地并不是说无意识的笑话，我是很郑重地指斥醒狮

派诸领袖之可耻的蠢笨行为！愿“诸公”三省之！并望一切可敬爱的国家主义派青年积极认清他们的领袖的原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

——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

（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

最近政局发展的情形有如下之分析：

一、当反奉战争初起时，我们即看出结果若为国民军胜利，则民众革命的势力必得到一广大的发展；反之则帝国主义者必指挥直奉反动军阀造成一最黑暗的政治局面，要根本覆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现在不幸因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分裂破坏，这个最反动的局面竟来到了，自国民军退出北京后，马上由北而南全国民众都加紧的受压迫。

二、但是在胜利之敌人的营垒中，为权利的分配，又已开始露出冲突的裂痕，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焦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不利于直之护宪造成直派的内阁，直因在北方军力单弱非从政治上进攻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遂演出现时北京之无政府的现象。

三、不仅吴张之间暗潮甚大即张吴部下亦不统一，张作霖已不能代表整个的奉军，东三省内部有新旧之争，直鲁联军之张宗昌、李景林暗斗极烈；吴佩孚本无多大实力，徒凭纵横捭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校刊》第七期。

阖手段，倚仗汉阳兵工厂的械弹、帝国主义的金钱，以形成今日之势力，但内容非常空虚，部下暗斗亦甚激烈，只要一处失败，便有全盘瓦解之虞，所以胜利后的张吴，将来的纠纷正多。

四、国民军退南口后，实力并未减灭，随时可以威吓北京政府，直吴在北方军事上虽远不及奉张，但随时有联国之可能，遂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所以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虽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致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之见诸实行者，即直鲁联军进攻南口，吴佩孚进攻湖南，企图颠覆广东政府。

五、帝国主义者军阀这个互相妥协分工合作的政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如何呢？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的危机。不过吴欲完全覆灭国民政府，奉欲完全消灭国民军，事实上恐不可能，彼等在南北若得到相当的发展时，其相互关系自必重入危机，此时广州政府若有充分的准备，国民军在北方尚能保有若干实力，则直奉战争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参看向报第一五二期《最近政局之观察》一文）。

自然现时全国的政局，完全陷入于极反动的恐怖状态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处处遭受摧残，但是这种局面，恐难得到一长期的巩固。

第一，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侵略攘夺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本性，他们相互间的冲突虽能弥缝一时，终是不可避免，必然要到来的，国民军刚刚退出北京，而第四次直奉战争已经开始酝酿，军阀间权利地盘的冲突，已经闹得很凶，迟早

终必爆发。

第二，因为这种极端的恐怖政策，不惟不能降低民众革命的热血，反将民众反抗的气焰日愈提高，“三一八”的屠杀，奉军在北方一带的暴行，使得每个极端和平妥协的人，亦不能忍受，甚至如王士珍、熊希龄等亦垂涕而道，这都是只有驱使民众日愈走上革命道上的；山东河南一带不断的发生农民暴动（即红枪会运动），虽因无组织而暂归失败，但他的运动，却只有增高，并没有消灭。

第三，广东的国民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不能消灭，则随时可以威吓反动势力，可以促进军阀内部之分化和崩坏。

根据以上的理由，所以我们敢断定现时最反动的局面，欲得到一长期的巩固，比较困难。但若果我们只计算敌人的弱点而不计算自己的弱点，没有正确的应付策略，则此种长期的反动局面，亦并不是绝对不可能。

我们应该把工农运动、国民党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军，均算入反帝国主义方面的势力，在这许多部分的工作中，均有很大的不足。

第一，是现时的民众运动是分裂的，往往只是工农群众及一部分革命学生孤军作战，没有造成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因此力量自然薄弱，比如“三一八”的屠杀，事实之严重虽远过于“五卅”案，然因联合战线之破裂，反不能激起一个普遍全国的大运动，普通社会对此事仿佛很冷淡，鼓不起他们参加的热心。

第二，是广州政府的基础并未十分巩固，从表面看广东全省固然统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粤开会表示左派在全国的胜利，然而其严重的危机也有为我们所必须知道的：

一、从三月二十日的事变可见左派内部尚有许多误会，几

乎动摇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根本政策，几乎演出太平火并的悲剧！

二、右派反动派在粤仍潜伏着很大势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及最近广州学生会内部的风潮，京沪右派分子之纷纷赴汕头，马超俊公然出面广州市上煽动兵工厂对政府罢工等事，均证明右派反动派活动之可怕。

三、广东的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等，他们的利益常与国民政府冲突，且有相当之武力（民团）与财力，足以抵抗政府，广东的土匪亦极凶悍，乌石山匪巢，举二军全力尚未攻下，东江罗浮之匪因山势太险，更无法消灭，这些反动势力，都可为陈炯明、魏邦平等再起之根据。

四、上部机关自然是革命化了，但下部组织仍充满从前的贪官污吏，既不能推行革命政府的政策，反多丧失革命政府对民众的信用。

五、香港帝国主义者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资助反动势力直接的或间接的袭击广州政府，吴佩孚的挑拨阴谋，已深入我们的内部，而国民政府对于反吴亲己之武力，尚不知设法罗置。

北伐的军力与财政固须设法充实，而以上的危机若不能很小心的消弭，则前途危险正多，国民军的失败，唐生智的失败，国民政府均负有很大责任（吴佩孚攻豫攻湘时国民政府能积极援助决不至于失败），惩前毖后，我们又怎能十分乐观呢？

第三，是国民军虽其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而其现处地位亦有很多可虑地方：

一、十万大军居住塞外贫瘠之地，饷弹难十分充裕，又受直奉联军大同、南口、热河三面袭击，若直奉联军真能协力并攻，则应付须十分小心才能守住。

二、国民军将领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必须有统一的行动策略，切勿再蹈二军覆辙，方能应付四围的敌人。

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们虽知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的内部裂痕正多，新的发展的局面很快又可到来，但是若果我们在民众中的工作，国民政府国民军的工作，应付失当，亦可造成比现在还要更反动的局面，固然革命运动不会因此消灭，帝国主义间、军阀间的冲突不会从此除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确实是受了很大的顿挫，又要多延若干岁月，多经若干痛苦，这是不可否认的。每个忠实的革命党员，试一回想郭松龄倒戈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极胜利的局面落到极反动的局面，总应知道我们的错处是不能统一革命的势力，分裂了革命的战线，才演出今日的恶果：无论在民众运动方面，在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错误。

照现时大局的情形，自然不是一个革命势力积极进攻的时期，敌人内部的冲突固多，反动势力的统治固不十分巩固，然而革命的力量也尚待于整理和集聚，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

我们现时的出路，已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中说得非常明白，“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一切革命的势力，能够救济现时反动的危机，能够作将来新发展的准备。“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1]，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战线，那末，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消沉下去”。

统一革命的势力，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是

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我们要真能应用此原则到事实上去，必须注意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使我们的口号能适合群众的要求，能集聚更广阔的群众，使我们的态度不为群众所畏避或惊奇，而乐与我们接近，使我们的行动不仅注意全国普泛的政治煽动，尤在能引导他们日常生活的要求。

在目前极反动的局面之下，加以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破裂，因此不能产生像"五卅"波动全国的大运动，不能用一种普泛的政治宣传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只有从一切小的斗争、部分的要求、地方的问题去打入民众。利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要求，去说明总的政治要求；要在平时有这种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要在这些工作中才能把群众集聚起来训练起来，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总之，我们现时的工作方法，是要注意地方的问题，零碎的问题，要从零碎的解决汇合到总的解决，要从地方的问题汇合到全国的问题。自然注意零碎的问题，地方的问题，而忘了总的政治的目标，必成为枝枝节节的改良运动。同时若只有总的政治要求，而没有这些部分争斗的工作，则这个大的运动也没有充实的内容，必须使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的运动能连结起来。

按照现时的政治情形，依照上说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同志在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有以下之注意：

一、对于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我们要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问题去领导他们的要求，要利用这每个小的斗争中去取得群众，我们不仅注意工人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并要注意一般市民的要求，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若果客观上是能给帝国主义军阀以打击的（如上海之华董问题，各省之抗税运动），我们亦应赞助他。我们要详细研究地方的政治军

事财政等问题所及于市民生活的关系，要懂得各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会去领导他，使之皆成促进革命的势力。我们不要忽视一般的和平改良运动，在极端反动政局下的改良要求，亦具有革命的性质，若指导得好，更可使群众由改良的要求激进至革命的行动。在一般的宣传，最好是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说，不要只空洞的高呼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等名词，令听者感觉太抽象，并且认为这是 C.P. 派的老论调，不愿意听，宣传的文字及说话总力求通俗，譬如我们宣传奉军之残暴、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之种种事实时，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总要他听去不觉新奇容易接受。

过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行动左稚，并且还未脱研究的小团体的习惯，不能称为政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学会，至多只做到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不能实际领导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不能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现时这种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也不可能了，我们要改变活动的方法，注意小的问题、部分的问题、地方的问题，依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努力促起罢工、抗租、罢市、罢课等实际行动，我们只有在这些实际行动中获得革命的群众，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

二、对于工人运动：我们不要希望现时奉张汉吴严重压迫之下能够有公开的工会活动，万一发现，必定是工贼的或妥协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因为不如此则反动势力决不允其公开活动。所以我们对于各地工会之保持牌子问题，认为不甚必要，而特别注意于发展工会下层组织的秘密基础，建立工会运动中之党的核心，只要我们的职工运动有可靠的群众基础，则工会公开才有作用，否则公开亦是无用的。在现时严重压迫

之下职工运动不能有很大的政治斗争，我们当注重部分的要求，零碎经济的要求，以促进工人的地位，扩大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团结。

三、对于农民运动：取得农民，怎样引导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是本党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军阀连年不息的内乱，生计日窄，捐税日重，使得中国的农民已很快的走到要求武装暴动时期。近来国内的战争，已有农民参加，并显示出他伟大的作用（广东革命军讨平东江的胜利及河南国民二军的失败几乎完全是农民之赞否问题），尤其在自今以后农民对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作用，将愈增大，吴佩孚能利用河南的农民以驱走岳维峻，但并没有使农民的痛苦减轻分毫，反愈加重，则吴佩孚将来亦必为农民所逐，现时豫鲁两省红枪会之暴动，已是使张吴不能安枕了。

在湘粤两省农民运动比较可以公开的地方，我们当特别注意于农民的组织问题，勿使有不必要的暴动，无组织的进行，但在湘粤以外之地，特别是直鲁豫川等省，则当注意于无组织的农民暴动，因为在这些最反动地方的农民运动，当然不能事事照我们有计划有秩序的去进行，无组织的突然暴动事件，一定很多，每一次暴动无论其成败，都能给军阀以若干的打击，暴动刚一开始，我们便应速去指导他，要使此暴动能多得一点好的结果，能从这个无组织的暴动中，发生出组织来。

现时在全国一般的政治宣传，除注意上说之工作方法外，应提出下之口号：

一、制止反赤运动。

二、农民（民众）武装自卫。

三、统一革命势力。

四、巩固广州国民政府。

五、人民，国民政府，国民军，联合起来消灭直奉卖国军阀。

六、召集国民会议。

七、革命民众的政权。

这些全国总的政治要求，必须与地方部分的要求连结，必须从一个地方许多具体的事实来引到这总的政治要求，才能使这总的政治要求有具体的内容，有拥护的群众。

斗争的总目标虽可统一，但在各地的进行上，须视其环境，更具体的分别指出其主要当为之事：

一、在北方的工作：A. 当援助国民军使不为张吴所消灭，则对于将来北方的政变，尚可发生极大的作用。B. 张吴攻打国民军压迫民众运动，皆号曰讨赤，我们当设法广遍的宣传赤与反赤之差别，不必替国民军讳言赤化，而积极的是认赤化，举出具体的赤与反赤事实对照宣传，在开始宣传时，可以不必拿出 K. M. T. 及 C. P. 的名义去说话，尽量利用一切灰色团体或秘密方法去散布并张贴此种印刷品。

二、在广东方面工作：A. 当帮助国民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分子，巩固革命基础，统一革命势力。B. 当使广东以外一切不与帝国主义军阀结缘之武力均结合于广东政府旗帜之下。同时，我们必须在工人中、农民中、革命的学生中，造成党的真实不拔的基础，并且努力获得小商人群众之同情。

三、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工作，须尽力赞助一般市民的要求，如华董问题、闸北自治问题等，虽属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却可利用这些事件把民众组织起来，把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扩大，使工人阶级免去孤立地位。对于华董问题，我们可为这般资产阶级指出一条出路，即扩大华人纳税会的组织，使之造成一与西人纳税会议对抗之实际的市议会，令帝国主义

不得不相当让步。在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宣传行动，均极力注意勿过左倾，总求能集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总之，现时的政局已到了一个极反动的时期，固然这个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内部的裂痕正多，然而民众革命的力量亦很涣散，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内部的误会，忽略全国的政治，不能积极的有所动作；国民军三面受敌，应付不易；所以很难说到利用帝国主义军阀的冲突机会而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除非巩固广州国民政府，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势力，援助国民军守住北方，又能在一般民众的宣传中，扩大和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则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现时的工作原则是：

统一革命的势力。

取得群众，深入群众，扩大及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注意部分的要求、地方的要求，从小的斗争汇合成总的革命势力。

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维持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

注意农民运动。

五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中，此处还有“不能获得群众”一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

A. “五卅”以后的工人与“五卅”以前的工人，有什么不同呢？工人经过五卅运动，似乎浑身都增加了力量。“五卅”上海二十万工人的要求虽未达到，罢工亦未胜利；但是，上海工人奋斗经验的增加和组织力的扩大，已是不小，即阶级意识和自尊心都有长进。香港和沙面工人罢工将近一年，他们已获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工人阶级本身势力与经验之增加和革命根据地因之而巩固。地方铁路工人、城市工人和矿工受摧残最甚，最近张吴反动势力伸张的结果，使北方各工会都不能公开存在而暂时秘密起来，但是地方工人历年奋斗积聚之力，决不因而丧失。总之，“五卅”以来，全国工人牺牲虽大，全国各工会均遭压迫或封禁；但是工人的奋斗力和觉悟，是有加无已的。

B. 全国民众经过“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已有绝大的觉悟。民众之觉醒，使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日渐动摇；张作霖、吴佩孚等的军阀势力暂时虽有伸张，然军阀内部万难统一，必日见崩溃而无疑。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各种社会中都起了新的变化，即新势力与旧势力之冲突。冲突的结果，旧势力必日见消失。五卅运动的影响，并由城市而及乡间，同时

全国工人中已有一部分工人（即广东工人）获得自由，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蹂躏的中国，已产生一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基础日见稳固，必能担负全中国革命的任务。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危而复安，卖国军阀亦尚未根本崩溃，都是用最残忍露骨的手段以维持其最后生命，无异病人之回光返照，而其死亡之日，必不在远。

C. 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在求经济改善与相当之自由，而其责任则在促成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死亡。工人阶级的要求，虽尚在工资的增加、工时的减少与待遇之改良，以及工会之公开存在；然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存在的时候，不但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以枪炮屠杀工人，因此工人之经济改善与自由权利之获得，必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后。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如何团结全国工人一致奋斗？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尽什么责任？是这次劳动大会中最重要问题。

D. 全国工人在屡次奋斗后，只学得一种组织的方式，就是公开的工会组织，而且是比较原始简单的组织形式。我们并不否认公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可是仅有公开的工会组织是决不能够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有好些种，有时还要按照当地情形而定，目的在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工人阶级第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政党在于团结目的一致和最能奋斗之工人，为全工人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工人政党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最厉害的组织，为压迫阶级所最害怕的。因此，压迫阶级总是离间工人群众与工人政党之关系，可是工人群众尤须拥护和运用工人政党以与压迫阶级相抗。第二种形式就是工会。在能公开的地方须有公开的组织，可是在不能公开的地方，必须有秘密的工会；秘密工会的作用，在少数诚实而

勇敢的工人，不拘形式，能指挥工人一致奋斗。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室、饭堂、寄宿舍等等合法的组织，团结工人。总之，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种种形式组织来奋斗，方能达到改良地位的目的和担负历史使命的责任。

E. 工人群众中战斗力最强的，首推大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码头、市政的产业工人。凡工人群众的解放运动，必须此种产业工人为中心，再联络和组织各小工厂工人及广大的手工业工人与商店雇员，共同奋斗，工人运动才能一致而更有力；只有大产业工人，数量上未免太少，小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商店雇员又失之散漫，只有以少数产业工人为中心，而环绕着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小工厂工人和商店雇员运动，才是统一的有力的工人运动。因此，大产业工人必须赞助各种职业工人的经济争斗和组织，而各种职业工人则必须跟着产业工人而为全民族和全阶级之利益而奋斗。

F. 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但是农民是散处在乡间的，很难得成一个整个政治势力。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而产业工人却在大城市中占重要地位。因是工农群众的整个解放运动，亦必发动大城市的产业工人，但是工人群众要得到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因此，工人与农民之关系，不但是同盟而已，而且工人群众随时要提携着农民一致奋斗，这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不可忘记的。

G.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阶级固应立在最前线，然亦应与各阶级革命民众（特别是学生小商人），建立联合战线，则民族革命势力乃愈见壮大，更易促其成功。

H.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了工人群众在国民革命运动

中的责任，今年的大会可以更说得具体些，全国工人阶级必然拥护为负担国民革命的党和为全国民众利益奋斗的国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国民政府之下，已获得相当之自由。工人阶级为保持他们已获得之自由，就必须巩固国民政府，而且全国工人都必须赞助国民政府北伐，虽是为国民革命实现于全中国，同时也为全国工人自由普遍实现。但是中国有组织的工人要能在国民革命中尽最大的力量，就必须一面组织占大多数手工业工人及雇员，一面提携着农民整个的参加国民革命。“五卅”以来，全国产业工人已表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已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团结手工业者及在国民革命的阵线上奋斗，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及解放自己的不二法门，这也是有组织的工人目前的唯一责任。

I. 工人阶级要完成他的责任，目前应注意的问题：（一）工人群众虽然经过五卅运动，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没有基础，所以工人群众目前就用种种组织形式团结工人，巩固工人阶级势力的基础；（二）利用许多小的斗争（如部分的经济斗争），扩大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三）要求工会组织的自由和劳动法，我们知道在现在反动局面之下，工人自由和劳动法是说不上的，可是这也是团结工人攻击敌人的一法；（四）号召全国工人及民众拥护香港罢工，务必使香港罢工得到适当之解决，因为这是与全国工人运动的盛衰都很有关系的；（五）立即与农民代表大会商定密切联合一致奋斗的方法，并决定各地有组织工人如何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的种种问题；（六）敌人破坏我们之又一方法，就是利用工贼，我们必须随时尽力以铲除工贼。

J. 工人阶级在奋斗过程中，又须注意下列二点：（一）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由全国以至于各地方，都必须如此。因此，

大会认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人唯一的指挥机关，各地指挥之统一，亦必设法促进之。（二）工人阶级每次的奋斗，必须审时机与自己的战斗力，畏缩退后固不可，轻举妄动亦不可，因此两者都是取败之道。

K. 中国工人的奋斗要跟随着赤色职工国际及与世界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五卅运动中，外国工人不但反对他本国政府压迫我们，而且给罢工工人许多物质上援助。尤其是东方各国工人，我们要与之联络；不但打倒帝国主义需要如此，就是要使我们的罢工能胜利，不致为外国工人破坏亦须如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全体人民都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之下，尤以劳苦群众受压迫最甚，受剥削亦最深。帝国主义一面摧毁中国的手工业，一面又阻止中国实业的发展；换句话说，既把中国的手工业工人从小作铺内赶出来，又断绝他们到大工厂里去做工的生路。一部分尚能苟存的手工业与新生的极少数中国工厂，因为要和舶来品竞争，就不得不减轻成本，而减轻成本，又须加紧的压迫和剥削工人群众。因此，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非先打倒帝国主义不可。而且国内拥有多数工人的工厂，多为租界内外国资本家所有。工人每次的小小经济要求，不是与外国资本家直接冲突，便为租界帝国主义者的政权摧残。如五四运动的起因，即由于日本厂主自由杀害中国工人。中国现在仍旧是一个农业国，主要的生产是农产品，工业生产实在微乎其微。现在农民所受的剥削，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百分之六十的剥削，就是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革命派所赖以生存的资料。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所争夺的，土匪所抢掠的，官僚政客地主买办所图谋的，目的都在享有剥削农民之权。中国农民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至少亦须减少被剥

削的成分，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都以维持及逐渐增加剥削农民的成分为目的。因此中国农民最低限度的改善生活，亦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奋斗，中国工农群众的解放，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们解放的道路必先经过国民革命的一段行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群众利益的党。拥护中国工农的利益，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那末，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农群众努力于国民革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国民革命，是他目前的根本立场，而决计不能有其他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国民革命是完全诚意的，因为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必须如此。

中国共产党并且认为中国商人与智识分子能否解除痛苦，也有赖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帝国主义者阻止中国实业的发展，并剥削工农群众，中国工农因之贫困。工农贫困的结果，购买力亦随之低降，商业即日益衰落。如果要商业兴盛，定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使实业有发展的机会；并推翻军阀，除去酝酿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这样，农民与工人的生活程度始能提高，购买力因之增加，实业商业发达。因此商人为自身利益计，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既因穷苦而不能享受教育，加之财政纷乱，教育经费无着，教育事业遂无从发展，因之智识分子也没有服务教育事业的机会。这是第一件事实。工业不发达，专门人才一概置废，天然富源也没有资本去开发，即已开发者，亦系外国资本，这是第二事实。因为有这两件事实，除了少数为外人服务的智识分子以外，大多数都不能为中国民族的实业教育而努力。因此智识分子的境遇能否改善，亦须视国民革命能否成功为转移。

中国共产党虽然特别重视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亦为中国

全体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奋斗，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民革命是完全诚意，并认定国民革命是他目前的根本责任。中国共产党认定国民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领导的党，中国国民党在改组以前，未能集中革命势力，而成为一个领导群众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为国民革命成功起见，因向中山先生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致进行革命，并屡次解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目的，在于帮助国民党成为一个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伟大的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内的革命领袖们，鉴于集中革命势力之必要，遂毅然决然欢迎共产分子加入，并丝毫不存歧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渐能促进国民党的改组，改组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及其他新加入的革命分子，又在中山先生及其真正信徒领导之下，努力工作。如是国民党始有今日之发展情况。国民党现已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国民党在过去一年中肃清了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建立了革命的基础。

国民党的影响不仅及于革命的民众，并已及于冯玉祥等军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曾因国民党势力的发展而愈高涨。普遍全国的五卅运动与北方国民军的反奉战争，已使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惊恐异常。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居然能与最老的帝国主义——大英帝国奋斗到底，更使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坐卧不安。因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百般阴谋，企图破坏革命势力，尤以国民党为其破坏之主要目的物。

他们破坏的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勾结张吴[1]及广东等处反动势力，在军事上进行扑灭北方国民军及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一方面收买反革命的政客及报纸，布散谣言，离间挑拨，以图酿成革命势力之内部分裂。帝国主义者第二种方法，最能摇动革命队伍，算是最险毒的阴谋。因为革命势力的内

部，往往亦有困难之点，加之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造谣挑拨的结果，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许多疑虑，疑虑一生，队伍即形涣散。革命队伍如果涣散起来，革命前途将不堪设想，凡是革命党都不能坐视此种现象发展下去。共产党员认为敌人进逼之时，革命势力的团结格外重要，巩固革命基础，固须革命势力的团结，完成国民革命，尤须革命势力的长期团结。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时，一部分的利益，亦当准备牺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如果这样议决不是以之开反革命进攻的道路。共产党员在此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中的态度，即证明共产党员十分忠心于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认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十分爱护，而不使其受损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决不为主观感情所影响，而不顾及全部革命利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敢敬谨宣言：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以全革命利益为前提的！永远主张统一革命势力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整理党务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二十日）

一

吾人为求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完成，深信有与国内各阶级革命分子联合进行之必要。同时在此一二年中依事实之教训，合作之经验，深知同一进程之中，一切合作的个体间，苟无互信的规约，互助的保障，以道德的基念，公忠的精神，为合作信约，共同遵守，必牵制时起，误会滋生。初则因内部不安，减少革命能力，继则因能力相消，同为敌人所摧残。吾人痛念总理当日主张合作之初衷，决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为革命集团，中国国民党亦为革命集团。共产党员认国民革命为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于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许其加入。持此光明正大之心理以合作，本无牵制误会之可言。乃两年以来，实际之表示竟不如此，此非合作之咎，乃不善合作之咎也。吾人须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特提出整理党事案，如左：

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

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

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

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以上四事，吾人认为合作之理论基点，为实现此基点之意

义，解除本党内部之纠纷计，特提议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其组织大纲，别定之。总期两党党员不再有违背规约之行为，而后革命集团之合作，得臻于圆满焉。

二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三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革命进行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

（二）常务委员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

（三）常务委员会主席职权如下：（甲）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乙）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丙）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进行。

（四）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设置，应否继续，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下次开会时决定之。

四

全部党员依以下之规定从新登记：

（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从新登纪。

（二）登记机关指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定为三个月，但海外党部登记时间，由海外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宣言及议决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者，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附二：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训令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党遵循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负荷领导全国被压迫各阶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在此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益鸱张之环境之险恶，实足以使本党每一同志，均懔然于革命势力团结之急要，知非全党之意志精神，完全归于一致，必不能应付此严重之时局，以为我被压迫民众，谋解放之道。乃本党自总理主张改组以来，虽一方因同志之奋斗努力，颇有益于全国民众之革命化；然同时以四志之中，亦未能尽免幼稚与落后之弊，亦惹起甚多无谓之纠纷，以致反妨碍本党各种正当工作，有时且摇动及于本党革命之基础。此我全体同志所宜一致觉悔而改正者也。

本党之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为总理所特许，其时同志有因疑惑而起纠纷者，屡经总理剀切晓谕，说明本党所以容纳共产党员之故。十三年八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共产党加入问题，曾有极明了之决议，其要点：第一说明本党为代表各阶级，共同于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第二说明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收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若其行动违反党纲章程，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第三说明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乃

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故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同一部，吾人即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减，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本党之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十四年五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宣言接受总理遗嘱以后，又发布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引正上述之三要点，而加结论。谓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嘱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盖两年以来，因共产党加入本党，而引起之疑虑与纠纷，始终不绝，而本党之所以训勉各同志者，一以总理之意志为依归，一方求全国革命分子之集中，一方求本党最原则之确定，亦始终不懈也。至本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第八项，为下列之规定：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凡有此类争议，须在党部指导与监督之下，用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务使一切误解，得到合理与满意之解决，惟不容有感情攻讦的行为，致危及革命势力集中根本政策。我全体同志，能依此进行，本不难在国民革命事业中，收同力合作之效。乃数月以来，党员间之纠纷，仍未尽释，疑虑亦未尽释，而环境之险恶，则更甚于前。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未有具体之办法，足以消释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极郑重之讨论，成立整

理党务案凡四。

此次议决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一切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机关，尤皆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我全体同志，应知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为解放全国民众之唯一方法，非以最坚决之信心，为最奋勉之努力，无由达其历史之任务，而中国之国民革命，尤为世界的革命民众之互助提携，则联合各阶级之革命分子，致为国民革命努力宁非必要。我全体同志，于接受此整理党务备案之际，必以最亲爱互信之精神，确定各阶级共同奋斗之基础，永绝党内之纷争，以应付目前最严重之时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深切感受我同志之能否改善精进，实本党存亡与国民革命成败所关，深不愿于整理党务有具体办法之后，而犹有执持私见，以梗阻国民革命之进行者。不幸而竟有之，则亦惟执纪律以绳其后，愿我全体同志共勉之。

附三：中国国民党对于整理党务案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规定本党与他党合作办法之决议案，帝国主义与反动者，或将庆其挑拨之成功。此仅足表示帝国主义与反动者之愚蠢，对于此种决议案之革命的意义，茫无所知也。

帝国主义者常希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崩坏，如已往历史所恒见，不由于外部军队炮舰之袭击，而由自己内部之冲突与纷争。此内部之冲突与纷争，实国民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也。

国民革命之成功，须恃真正革命势力之严密团结。此本党夙昔之主张，今尤深信不渝。以世界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及反动派之强暴势力，非以真正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吾人实无以战胜之。必革命势力严密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而后可扫荡中国之三敌——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势力。

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毅然改组本党，以与一切革命势力合作者以此。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全国革命分子，奔集于本党，努力革命工作者亦以此。改组以前，组织既未完成，政纲亦未大备，虽有总理教率于上，而党势之散漫，党员之凌杂断不足与图成。以此之故，总理于精密考虑国民革命运动前途之后，毅然决定改组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基本，而确定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反动势力决战之政纲；同时又决定与国内外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此在国民革命运动之领袖，实为最大睿智之行动，证以后来之事实，而可信其不诬也。

总理所采此有历史价值之决定，其结果究奚似乎？自此以后，本党日益取得广大群众之同情，不但在中国为然，且推及于全世界。本党今已为中国最大之政治势力，此势力且将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之目的。群众之爱护本党日甚，同时敌人之仇视本党日深，本党盖日益引起人民之希望与反动者之恐惶。本党势力之增长，尤于此可见矣。

其在广东，革命之敌人逐一倾覆，彼等虽亦有反动势力响应于内，帝国主义援助于外，然终无以救彼等之死亡，革命军人与革命政党之联合势力，卒一一将其击碎。故国民政府成立未久，而人民之讴歌拥护随之。革命基础之植于广东者，既非常稳固，其能力遂足与世界最强之帝国主义国相持至于一年之久，声闻所及，遍于他省。广东之在中国，已不仅得革命群众

之同情，凡愿见其祖国自由独立之爱国者；咸一致爱护之，甚至不愿为革命担负何种工作之人民，亦宣称中国之救主将来自广东矣。

本党改组以前，惟少数革命党人与少数知识分子与有同情。改组以后，则已为数百万群众所传诵，而愿受其指导。总理改组本党之识力，与其所定政策之效果，至远且大，无物足以磨灭之也。

帝国主义者、军阀、反动派，自辛亥革命以后，其藐视中国已久。今因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猛烈发展，遂惹起其在革命史上未有之恐怖。今仅广东一省，已足抵御军阀反动派及最大帝国主义之进攻；若中国各省皆成为广东，则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命运，显然将断。彼敌人见其如此，又安能束手以待国民党之置其死命，于最益出其暴力诡计，以进攻国民革命运动，其所采以攻击国民革命运动最毒之武器，厥为散布谣诼，以引起吾人内部之纠纷。彼等为欲达到此阴谋之目的，乃宣称国民党为共产主义之集团。盖国民党中大多数，非共产党员，敌人冀利用之，以构成多数党员对内之疑虑。疑虑既生，消释非易。而此次疑云若任其散播，则总理所定之革命势力合作之原则，将受甚大之危害；即国民革命运动之全部，亦必受同样之影响。彼时反动派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乃可引为庆幸，使中国今后之十五年，仍名为共和，而实则为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鱼肉也。总理所改组之革命的政党，能坐视国民革命运动之消沉而不疾呼往救乎？吾人于革命遭遇危难之时，能缄默不，以重负总理之付托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之最高机关，凡为党员，皆须服从其决议，惟全国代表大会，始对于其决议有可否之权。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对于本党党员，及全国人民，而须明示本党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

利用反共产之口号，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以消减对于合作原则之真正目的之怀疑。此实足表示其对于国民革命之忠诚，亦即以此摧折敌人进攻国民革命最有力之武器也。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凡有利于中国国民革命，能使国民革命运动更形强固，不为敌人所利用，以制造更多之疑虑者，国民党无不乐为之也。

若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反动派，对于此规定合作原则之整理党务案；遽引为庆幸则实为大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此次决议案，决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世界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革命分子之团结愈坚固，即国民革命之力量愈增进也。

总理之一切革命势力合作原则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之阴谋！

国民革命万岁！

根据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出版的
《政治周报》第十四期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吴佩孚。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

赵　世　炎

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当此全国反动势力压迫民众，革命问题十分紧张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此会议，在事前殊引起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与盼望，因为在形式上国民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大党，自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甚为民众所属望。所以在此次会议中，民众至少所盼望的是国民党最高干部对于目前政局，是如何的意见，有如何的分析，具如何的策略，提出如何的口号，使民众如何的奋斗。这并没有一点苛责或奢望，只是一种常识，民众对于一个政党，当然只有如此认识：譬如每当政变之时，连辛亥俱乐部、新社会民主党、上海总商会还有些意见发表，何况国民党？所以在开会以前，广州的平民群众也如此属望的。

但是等到开会那天，广州城内忽然满城风雨的："共产"谣言，甚至于有阴谋反革命分子去运动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挤兑起来，当时各种各式奇怪的谣言发生，或者说五月十五日民党中央将宣布共产，或者说会后将没收商人财产；运动罢市的人便说非胡汉民当权不能保财产田宅，煽惑挤兑中央银行的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七期。

人便说非杀尽共产党，蒋介石始终受包围，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这种谣言，街头巷口时常可以听见。三月二十日之役后，反动派的阴谋未告成功，香港帝国主义者，也高兴了很少的时间。民党右派分子仍旧有些郁郁不快；五月十五之前便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是民党本无左右派，完全是共产党挑拨，这次会议左派既占多数，共派想必又要利用他们打击右派，实行赤化国民党。这种谣言和议论风传后，广州忽然宣布戒严，空气紧张到万分，银行挤兑，军警梭巡，于是社会上对于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感想，便弄得恍惚模糊，莫明其妙：也不知道这次会议究竟是共产党讨论实行共产呢，还是反革命预备杀共产党？

等到该会宣布开会，政治报告之后，关于现时革命策略、北伐问题等，固然没有讨论，关于实行共产，更是一字也没有提起，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但是殷殷属望的民众，等待正确明显详尽的革命方针的议决案，对于颜[1]内阁的态度，关于护宪问题的表示……等，待到该会开完，还是没有！一般广州民众，明白的革命的一般人民，都明知道中国现时没有什么实行共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同样的明了：现时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吴张[2]之反革命；他们并且要求知道广州的革命力量究竟怎样，革命势力内部的纠纷，是否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而毁灭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民党中央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亦许只有对于最后一问题的，即广州革命力量的情形。

是的！民党中央这次会议，表示了些该党内部的各派实力的关系。民党之中向来有许多派别，民元以来国会中许多小政团，自称为民党者甚多，确系民党分化出来，堕落下去的也不少，就广东护法以来的历次政府之中，也有好几派民党。第一

次改组大会之后，许多十分腐败堕落的分子固然大半刷除了，但是余留下来的这种成分也还有些；同时第一次大会之前，已有共产主义者加入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第一次大会之后，共产派当然因民党政纲之明确规定而更加增多。第一次大会后政纲既确定，又受民众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动，新生的和旧有的左派日益团结巩固起来。民党中之有派别，在中国各阶级联合革命的过程里，当然是无足怪的很自然的现象。第一次大会明白确定赞助工农，并且更加明确的恢复了民元以来为妥协派（黄、宋[3]）所抹杀为一般党员所遗忘的平均地权主张，再加之以新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代表买办土豪阶级之冯自由派，便首先发难，反对国民党的赤化，以一切“罪名”，如反帝国主义等，加之于共产派，要求开除。嗣后谢持等又从而附和之。第一届中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便讨论这一反共的纠纷问题。当时正是商团（买办阶级）反革命暴动之时，买办阶级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气焰受一次挫折，冯自由也就被开除，而谢持等反共运动，便亦暂告停顿。民党内这种反动派从北京政变之后，历次受大大打击而消沉，尤其是廖案之后。“五卅”以还，中国无产阶级势力大增，国民党左派得其政治上的赞助，而得形成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便因恐惧而退缩，国民党中也有所谓戴季陶主义发现。随后帝国主义由守而攻，联合主张实行反革命战争，自然而然，民党中买办土豪阶级的反动派及机会主义的右派应命而联合于假借戴季陶主义名义下，召集西山会议，开除汪精卫及共产派。随后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现充分的左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共产派虽减少，而左派势力大增。西山会议派，亦召集自己的大会于上海。不过，在这时候北京三月十八日屠杀，国民军败，民众革命运动亦受摧残；广州又有三月二十日反动派之阴谋捣乱，

诬谄共产派之事；并且汪精卫也因“病”离粤。——因此，机会主义派中便有些不公开的参加上海大会，这是五月十五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之内部纠纷的情形，亦就是民党革命力量之消长分合的情形。

这次民党中央会议之前既有党内各派斗争这种历史关系，又有开会前反动派的捣乱造谣威胁，于是这次会议不期然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党务整理案”。开会之前，西山会议派之预留回粤地步者，纷纷都到了广州，甚至于曾经出席于西山会议又出席上海大会被选为右派中央委员之邵元冲等亦去活动。……会外空气之紧张和会后运筹帷幄之努力，都使主持民党中央者专注意于“党务”。这次会议便全被“整理党务案”所占据。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围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进展。其中颇有愤愤不平的，有说：“向来反对共派党团作用的人，如今却自己在背后执行党团作用了！向来以捣乱秩序诬陷共派的人，如今更自己指挥造谣捣乱！难道因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整理党务案究竟是什么呢？蒋介石对于三月二十日事件自请处分（中央议决免议），同时，提出其整理党务案。其中重要之点，即限制共派在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派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籍报告；推举代表邀请共党设联席会议，请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民党主席保存。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这些议决在前两天的原提案还要复杂些，字句还要严重些，提案后经历次修改才改到现在公布的条文。可是此地报纸不得中央委员会许可，早已将草案原文公布，此等底稿，究系何人取出公布，现尚未调查明白。

这一议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用不着多所解释；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可是，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

此次会议中，亦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可以一述。右派在国民党中仍然存在，是一件事实，本不是可以否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左派之胜利，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勇于团结的好现象，此时右派无地自容，所以又有右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全中国的国民，都知道这个右派，右派的行动和消息，京沪各地的报纸，都大书右派，加以分别，这并不是别人可以捏造的。但在这次会议中，偏有一位孙科要提出一个议决案，要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结果遭了否决。孙科在会议中且用口头说明，提出本报独秀[4]的论文，指为有意挑拨；而实际独秀那一篇《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分析，是根据于事实，是十分正确的。所以左派与共产派俱在会议中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共产派除从理论上解释左右派的原因外，并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加以说明；左派则痛责俱乐部的组织与另立一党的右派行为之荒谬。此案之结果虽被否决，但在事实上又一次证明反动派之行为的表现。

至于左派，当然受四围种种束缚，如共产谣言、军事暴动的谣言等，可是，左派与共产派的联盟很巩固，一般民众，如最近农工学商联合会议，都赞助左派政策。可见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最近（二十六日）民党中央已有对时局宣言发表，大半只是偏重于该党内部解释纠纷意义的说明，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议决案，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所以虽然整理党务案本文之中，

很明显的有机会主义之渗入，而民党革命力量之前途，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不革命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之胜负，至少在南方很和民党中央里左派及机会主义派势力之消长有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派是否能对于打击反动派的事不多所牵掣呢？

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议决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on），在开会时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如委员人数分配及担任部务之义务等，毫没有什么争执；并且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亦有宣言发表，说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及与民党合作之意义。至于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

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当然他们留给会后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变更的问题，乃是民党中央是否决然打击反动派，巩固革命战线，以实行不幸现在竟不能实行的国民党的天职——做中国民众的先锋，反抗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战争和统治，集中全国一切革命力量以达到召集国民会议，打倒贿选国会系统的北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民族的经济政治于帝国主义之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颜惠庆。
〔2〕指吴佩孚、张作霖。
〔3〕指黄兴、宋教仁。
〔4〕即陈独秀。

PDG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全国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民众们！

在帝国主义者所称“赤色的五月”，尤其是赤色的“五卅”，无论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怎样诅咒我们，恐吓我们，如果我们中国人，心还是赤的，血还是热的，便不能不拿出一百二十分热诚，来纪念去年今日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运动，即赤色的五卅运动，并继续这一运动，一直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完全解放，才算是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

去年今日的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帝国主义者知道这一联合战线的运动，足以使他们的在华既得权利根本动摇，并且民权将因此伸张，拥护他们权利的中国军事独裁政府，也要根本动摇。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帝国主义马上便采用分离这一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北京政府，使它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五期。

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大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赤化过激等头衔，恐吓知识分子及小商人，使他离开这一联合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老实不客气的压迫由奉天到上海之一切民众运动，并破坏其组织——工会、学生会、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等，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致低落下去。

五卅运动中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由五卅运动一转而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尤其是郭松龄反戈时，直系军阀至于急急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联和；然而卒以没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发生了空前的“三一八”大屠杀，反奉运动失败，反动政局遂自此开始。

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已经由破坏我们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建立他们所需要的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反赤联合战线，由英日帝国主义者，结合奉直两系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向一切所谓赤的势力进攻。由郭松龄败亡，到北京“三一八”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反赤联合战线运动之开始成功。

并且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全部企图及其成功，还不止此，现在已经可见的是：（一）以反赤口号结合了奉直两派军阀，又以实力援助他们将所谓赤的国民军驱逐到长城外，他们的烧杀、强奸、抢掠、强用军用票、增加苛税杂捐、枪毙记者、搜查学校、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经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实行起来；（二）集中了奉直两派军阀势力，统治了中国北部及中部，并想组织直奉两派的联立政府——比段祺瑞时代

更反赤的更巩固的军阀独裁政府，来大借卖国外债，来有组织的压迫民众；（三）嗾使直系军阀由湖南、江西、福建向赤色的广州国民政府包围进攻；（四）更准备一点小小恩惠（如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上海租界公园开放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停止越界筑路可以商量等），引诱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加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五）收买一班失意政客、高等流氓及所谓老民党，做普遍的反赤宣传，一直影响到赤的营垒内部，使赤之自身也有意的或无意的发生了反赤的倾向，若国民军主张整顿学风及放任段氏之“三一八”大屠杀，若国民党左派竟接受了右派西山会议的理论及主张修正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如三月二十日事变及五月十五日会议的精神所表现。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之成功，现在已经可观了，由去年“五卅”至今年“五卅”这一年中，已经使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变成全中国的反赤运动，已经使中国革命的高潮，变成了反革命的高潮；并且将来他们必然还要继续干下去。总之，帝国主义者为他们自己在华既得权利之保障及继续发展，其势必然要尽量利用一切反赤势力之联合，以铲除中国所有赤的势力，好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不致死灰复燃，这才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及其成功。

可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虽然很强大，而他们当中利害冲突也很大，他们自己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发展，更是他们的致命伤；直奉两派军阀虽然比民众有强大的武装，而他们当中有旧的历史仇怨和新的利害冲突，决无长期合作之可能；至于一班反动派的反赤宣传，已经由反赤军在北方之行动，渐渐使一般社会感觉得反赤比赤实际可怕，因为赤的行动与宣传，并未曾实行或主张没收人民的财产，而反赤军却以派捐派公债

军用票等名义，没收了北京及直鲁豫各省人民的无数财产，因此他们的反赤宣传已渐渐失了效力了。以上是反赤战线这一边的形势。

赤的战线这一边的形势又是怎样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实一天不消灭，中国革命的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天不会停止，即最和平稳健的大商资产阶级，以实际利害关系，也不致无条件的变成不复燃的死灰，况且现在这灰还未死；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虽然有了一些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终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及破坏军阀势力的力量，他们若能得着赤俄及全世界赤党赤色工会更有力的援助，他们是能够为各阶级革命的民众扩张地盘的。

由这两条战线的形势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能否得到最后成功，当然是个疑问。不过依我们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这一年中的经验，赤的战线即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要想不为帝国主义的反赤战线所破坏而获得最后胜利，第一要紧的是充实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大家都要认清自己的战线和敌人的战线，认清哪些是自己战线内的友军，哪些是敌人战线内的敌军；并且要认清敌人战线内的敌人终是敌人，不可因其笑脸甘言，遂以为可与合作；更要认清自己战线内的朋友终是朋友，不可因细故而分裂战线，为敌所乘，不可宽待敌人而苛待朋友。

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赤与反赤这两条战线，都分明列在我们面前，赤的战线之胜利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失败的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反赤战线之胜利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失败的是中国民众；最近北方反赤战争之结果，已明白告诉我们是这样，已不由我们再犹豫再思索了！

全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的革命民众

呵！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只有实现真正代表民众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才能够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这两件事都不是结托帝国主义而存在的军阀政府与代表军阀的国会所能够办到的。我们今年“五卅”纪念的口号是：

赤的“五卅”烈士精神复活起来！

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复活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

打倒直奉联合的反赤！

实现国民会议！

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五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任　弼　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已有六年的历史了。在它初成立的时候，不过是一部分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洗涤后倾向于革命一派的青年的结合，那时没有很显明的纲领和精密的组织，并且没有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而是叫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团员的数量很少，质量也很不整齐，对于社会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当局也未曾严加禁阻和压迫。后来经过长期的整顿与振刷，有了比较明显的纲领和精密的组织，并能相当领导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作反对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基督教以及各种反动思想——如东方文化的争斗。这时已经被它所反对的敌人认作洪水猛兽一般似的大加压迫；及去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更是为一切反动势力所注目而横加摧残了！正因如此，所以它在一班被压迫青年中的影响更加扩大。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到于今，它的组织已遍满了全国，除贵州、新疆、西藏、甘肃以外，其余各行省及特别区域以内的重要城市，无不有它的踪迹。

稍微注意研究现代革命运动的人们，都知道共产主义青年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一二期。

团是一国际的组织，它是按着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共产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去进行社会革命的青年组织。但是有些一知半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以为只要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必定总要立时直接取得政权，实行共产主义的。因为如此，所以广东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他们便诬蔑广东政府实行共产，北方的党与团在民众中号召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便说共产党捣乱，人民赤化，并且把一切求解放的运动都认为是共产运动而横加摧残。其实，许多明白的人却懂得，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是一个不按实际需要的空想家。我们都了解——并且十分深彻的了解，中国民众还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而急待解放的时期，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国民革命，何致有就要直接取得政权实行共产的想念！当此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未消灭前，如果它有这种想念和企图，它便是违反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而倒行逆施，便是革命的罪人了！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不是像那班帝国主义军阀及其走狗所宣传的那样凶恶如洪水猛兽一般的可畏——这些反动势力之所以要这样宣传，为的是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民众势力的团结，求得自己地位稳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目前的职任，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领导本国民众，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来作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而已。所以它的一切行动都是站在中国民众利益的立脚点上出发的，决不致有违反民众利益的行动。它有这样理论的根据也决不会受任何人的利用，像那些有意地或无意地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利用的人们所说的那些诬枉可笑的事实。我们明白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略历及其使命，再看它在这一年中——中国求解放的革命运动最发展的一年中，做了些什么成绩。并从此可以估量它

的工作是否是违反了革命民众的需要。

当然，五卅运动这种短兵相接的流血惨剧，是帝国主义历年压迫中国民众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决不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所能造成的（帝国主义与军阀偏要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说，自“五卅”日上海南京路群众游行示威起，一直经过惨杀而引起全国各地反帝运动与流血——汉口、沙面……——继以因五卅运动所激成的反奉、反吴[1]、反段、反日出兵，北京首都革命，反大沽口八国通牒，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及各地非基运动、学生运动、工农运动——乃至一切市民游行示威等，每一次都有青年团的分子积极参加作工。“五卅”之役，被帝国主义最初亲手枪杀的五人中，青年团团员便有二人——何秉彝为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主任，尹景伊亦为上海团员之一。随后汉口、沙面惨案死难者，亦有不少青年团的分子，最后帝国主义指使段祺瑞用“以华制华”手段所酿成之北京“三一八”惨案中殉身者，有八人为青年团团员。其他如安源被难之黄静源，青岛张宗昌枪毙之李慰农，上海孙传芳受帝国主义指使暗杀之刘华，都是共产党党员兼青年团团员之中坚分子。各地因领导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被捕，现在出狱和未出狱的，总数在二百人以上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从“五卅”惨案爆发后对于中国所发生重大问题，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都曾合并或单独发过无数的宣言与主张（最近向导周报社印行之《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均汇集登载）想已为注意政治问题和读本刊诸君所目睹。由它那些宣言主张，便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革命的青年组织，它所努力的是，领导中国被压迫青年去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军阀政治以建立独立自由的人民政府而奋

斗，反抗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企求青年生活之改善而取得一切应有的自由。再证之以各地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基督教的实际斗争，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及青年团的摧残与压迫，便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

它这一年内所参加和指导的实际斗争，在此篇幅很短的文字中当然不胜指屈，概括言之，即为一般的政治运动，如组织各地之群众集合游行示威；经济斗争，如各地之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罢税；学生运动，如各地反对学校当局及政府一切压迫学生的学潮；非基运动，如各教会学校之学潮及圣诞节非基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其他如妇女运动、儿童运动、军队中活动以及一切民众组织的工作，如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及青年社团等，总之在一切被压迫民众为争解放与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无论属于地方性质或全国性质的，青年团均曾动员努力参加与指导。全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口号之能普遍与深入群众，各地工农学生非基运动之能发展，不能不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有相当的力量。这并不是夸大虚饰之词，这是事实，这亦是它本身所负使命中做应作的工作。

青年团在中国虽有六年的历史，但它在五卅运动以前，并没有很广大的组织，它的影响也未能深入群众。及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便是它取得群众领导斗争的绝好时机，它的组织也因此而扩大了三倍以上，在上海、天津、广东和其他工业区域的产业工人中，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一带农民中，都已浸入了它的势力。现在在各重要城市都会里的重要工厂、作坊、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内，都有它的支部组织。

这一年来，它不独由小团体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并且质量

上也有极大的进步，第一，就是它的团员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最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和农人，并新加了不少的女团员；第二，就是在这一年继续不断的奋斗中得了不少实际斗争的经验；第三，就是增高了一般团员的工作能力与政治觉悟，并使团员更深一层的认识团体。

这许多进步的现象不独国内各种青年团体所不能及，就是国外其他各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鲜有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的进步。

但是它过去工作是否有何缺点？凡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当然免不了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何况处在社会经济最复杂的中国里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过真正革命的团体，就是要从许多斗争中的错误里去求得经验，正是要在行动中去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知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缺点，就是工作尚不青年化，这就是说过去所做的政治运动多，而关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的领导和一般文化运动的参加，尚欠注意，但是我们可以原谅它这种缺点，这是有客观原因所致的，就是，这一年国内政治运动特别的多，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它是不可忽略一切政治斗争的领导，因为政治斗争与谋青年本身利益和发展文化运动，是有极密切关系的。现在它已经极力注意改变这种缺点，使工作青年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将依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扩大它的组织与力量，我们相信中国革命运动还是向前发展而深入民众（这次奉吴在北方所加于民众的政治经济压迫，只是促成民众更加革命化），所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途，必有更光荣的历史。

全国被压迫青年们！现在真正有组织和有群众的青年团体就是：帝国主义御用以侵略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代表被压

迫民众利益奋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一个客观上被帝国主义利用而无群众的国家主义青年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不独不是革命的组织，而且是帝国主义愚弄中国青年的工具，我们应当反对的；国家主义青年组织里的极少数青年，本来是趋向于革命的，不过他们一时迷于反动的思想，而他们的领袖分子，若不从思想上根本改变其错误，则显然将流于反革命之一途，变成西欧的法西斯蒂党。实际上真能代表民众利益，肯牺牲而有群众的青年组织，目前还只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应该积极的加入这个团体去领导革命，我们应该拥护它的主张，我们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都应该如此！便是不能十分了解它的，也应提防着被反动势力利用，不要盲目的跟着帝国主义军阀和其走狗以及一切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横加攻击！而应该平心静气，对于它加一番研究考虑，观其工作成绩，再加批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

PDG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一九二六年五月）

刘　少　奇

（一）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其是“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各地惨杀案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二）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与摧残，尤其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可以证明必须打倒军阀，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

（三）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

*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三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受大会主席团委托，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这是报告的第五部分，原载这次大会会刊第十一期。

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四）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五）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阶级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

（六）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比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但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

（七）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

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争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八）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固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但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九）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的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来文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来华联络者，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更亲密之联合，促进世界革命。

（十）中国职工运动迅速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各处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应有自卫的组织。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信

——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

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万分；中国社会中一切革命分子正须建立强有力的联合战线。本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久已认定处此世界社会革命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平民之唯一职任，即为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巨大之打击，一方面解放中国民族，别方面即为完成世界革命。本党之此种政策实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之阶段及世界政治之趋势，乃一整个的历史时期中之根本功作，决非临时应付或利用之手段也。

贵党于中国历史上有革命之伟大功绩，辛亥失败以后，仍能继续为被压迫人民奋斗；本党认为此种奋斗之目的，在于完成辛亥革命，彻底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下，此不仅为贵党现时之历史使命，抑且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本党之职任。

故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政策早经明白确定，盖此即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唯是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之于贵党总理孙中山

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自此以后吾两党革命之联盟已于三年来引导中国民众，努力奋斗，五卅运动之蹶起，国民政府之成立，以及军阀之崩败，国民军之形成，皆使革命势力得极广大之发展；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恐惧战栗于吾人联合战线之下，然彼等既利于国民革命战线之破裂，以减杀中国民众之革命力量，乃日施其造谣离间挑拨反赤之伎俩。五卅运动至于今日，帝国主义既已利用反动军阀征服国民军而攫取中国政权，对于民众施以严重的压迫及屠杀，且已从湖南着手，开始四方围攻贵党执政之广州国民政府，以为彻底消灭革命势力之计。自然更在阴谋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勾结革命政府所在地之内奸，从内部摧毁贵党；彼等意欲以卑劣手段，利用反动分子攫取广州政权，如此外攻内应，以摧残中国之革命。因此现时中国之革命势力，实在危殆至于极点。故吾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当此英日吴张[1]战胜而形成反动统治并在日谋力讨所谓北赤南赤之时，吾人尤当集中全力于反抗其压迫革命势力及民众之斗争，且领导一般党外的民众，使集合于国民革命之战线。今贵党于本年五月十五日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亦尝报告及此，然因党内纠纷，不无特别侧重于“党务整理”问题之处。帝国主义者见之或且疑为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因而私心欣幸，俟机欲动。然贵党之出此，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

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与压迫乎？若果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果若此，则吾两党联盟之根本精神，不因反动派之分裂政策而稍减，帝国主义之欣幸，适足以自暴其奸而愚矣。

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党务整理案”中，关于以后两党合作方式之问题，则吾两党本为革命联盟中之友军，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总之当此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征服中国，压迫民众之际，革命势力遇此，正在酝酿磅礴之时，吾人双方俱负有历史上重大艰巨之使命与责任，愿贵党于“整理党务”之后，更加努力奋斗，肃清反动，巩固内部，与吾人及一般民众结合伟大广泛之革命的联合战线，有明确之政策，积极之行动，勿为帝国主义者所乘，则中国革命之幸也。专此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印）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张作霖。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五七期。

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1]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

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2]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像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

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 C. 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 C. P. 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 C. 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致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

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致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致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

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3]。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4]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

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哪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

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陈　独　秀

六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张作霖。
〔2〕即周恩来。
〔3〕黄带子，清朝宗室的别称。
〔4〕即戴季陶。

PDG

农村教育*

（一九二六年六月）

毛 泽 东

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所以作这种运动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的。现分述于下：

（一）农村文化问题略述

古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诗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后人看待读书人那么样敬重，就是因为受了这位诗人的同化了。幼学云："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这也是同上边那首诗一同的意思。总之，以上的现象，是贵族式教育的影响。至于一般贫苦的工农等人，终日不得闲，没有饭吃，所以受教育的机会过少，演成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农村中有两个阶级很显明的，就是剥削阶级及被剥削阶级。前者田地多，财产富，因为他们有饭吃，有受教育的机会。后者没田地，没财产，因为没饭吃，所以一点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此后愈演愈形悬殊，有产者尽有受教育的机会，以致终身埋形书中，最后充一教授，生活非常畅舒。无产者，终无受教育的机会，只得流落他途，受无限的困苦，永无生活畅舒之一日。以致形成今日贵族式的教育。

为什么他阶级有余钱、余时，而农民无余钱、余时？因为

---

* 这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冯文江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农民是被剥削阶级，他上边有剥削阶级时常剥削他们，所以他们至于无余钱、余时。

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现在的乡村中，这种教育是很盛行的。什么是封建，就是古来三代以上以下的时代，为君的封某一臣至某处，这地方的人民、土地粮税，都归他管着的，所谓牧民政策。古有采邑之制，他若死了，他的儿子就承袭着。于是孙而子，子而孙的相传下去。时间久了，恐人民起而造反，遂施以教育。但是人民有了知识，更容易造反了。于是设法施以忠孝的教育，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族制度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所以从前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非农民的教育，所以于农民丝毫没有的。

孔子之道与农民间文化的关系：

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

中国自古为农业国。自秦汉以来，又多重农业，故至今特别普及乡村中，又以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尊以为法。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多趋于农业方面。而农业时代，以家为单位的，不是如欧洲各国，以个人为单位的。

（二）现在之学校与农民

（1）现在之学校教育乃资本主义的。

新经济、新思想、民族思想等等，都是中国人从前没有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又多出自私塾中，受过老学究的荼毒

的。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多为贵族式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者。中国从前的学者，如王阳明等人，都是代表农业思想的人。学校本来是为资本主义而设的。但是中国的资本不发达，而学校之设，也非资本主义的。

（2）资本主义教育与封建制度之冲突——地主阶级反对新学。

现在一般的青年，到乡间多不能相容，如儿子反对父亲，他的父母给他订婚，他常反对的。然他的儿子由学校回来了，他是反对的。因为他的儿子不迷信的，他是"安土重迁"，"出必告，反必面"。故处处是站在反对地位的。从前唐朝时，有诗人作别赋云："默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可见当时的离别，是很难的。至于现在，就不然了，不特由北京各省来粤的人没有吟诗的，就是出洋赴欧美的人，也没有赋诗的。这是因为从前不如现在交通便利的缘故。乡间的地主，是反对新学的，如有些老人及僻乡的人，现在还有留辫的，你叫他们削了，是办不到的。又如初设学校，不幸乡人的儿子死了，他说这都由于设学校的，不然，我的儿子怎能死呢？现在世界上的主义有两派：1. 唯心（主观）2. 唯物（客观）。唯心派代表资产阶级的，他不须要谋生活，而希望休息成佛的。如德国康德，就是这派的代表了。唯物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无产者握政权的。德国的马克斯，就是这派的代表了。唯心派的人，都是抱悲观的，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唯物派是乐观的，凡事失败，是明白原因的，无悲观的，如现在的革命派人都是的。

（3）资本主义教育与小农经济冲突——农民反对新学。

中国现时各处的农民，是反对新学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资本教育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的内容，都是资本

家的护身符，于农民没丝毫关系的。如“马有四足”、“龟兔竞走”、“弟弟快来啊，咱们唱个歌”等等，举不胜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农民根本反对。

（4）私塾制度乃封建的农村经济之产品——故农民拥护私塾。

私塾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他的用费非常简单，不照资本家所设的学校，一切设备用器，均取减少。如一桌上可坐四五个人，一凳上可坐三四人等等，都是资本家榨取的表现了。又有许多的农民问题，私塾中教师可以答复的。而学校中的教员，往往不能答复的。因为教师日常多接近农民，教员与之适相反。

（5）新学的弊病与农民的要求。

现在的农民，已到了革命时期，所以用不着新式的资本教育。他所需要的教育是经济上的要求——经济的解放。从前的教科书中，多含地理、历史等知识；而现在的教科书，是居在上海租界上的先生们编的，适合资本家的需要，与一般农民是毫无利益的。本县的地理、历史、政治上的组织，与农民真没大关系的。而现在的小学教员，多不给农民教以这种知识，故不能供农民之需求。再关于文字方面的，看申纸、告状、田契、佃约、牛契、嗣单、继承单、关书、庚书、讣文、挽联等等，都是农民最密切的要求，教师大部分可写的，而小学教员多不能写，此为不能供农民之需要二也。又如祭祀、祈祷、祭文、迎喜神文、疏等等，也是一般农民的急需品，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乡间的无雨、坐道等事，科学者本可以答复的，不过中国现时科学尚未发达，不可一时即欲破坏迷信，致引起反感，那就不好了。这都由于新学不适合农民需要的原故的。

（三）以后的农村教育

（1）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即适合于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

“养成健全之人格，发扬共和之精神”，这是近数年来，教育部定的教育方针。这些话，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可以懂的；工人、农民是不懂的，他们只知切身的利益，即经济的解放。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如天旱不是玉皇大帝的指示，乃是无森林等原因。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先使他们晓得农民与工人、商人、学生之关系。农民是不能独立的。他的出产物，必须有他阶级人来买。他的需用品，也必需他阶级供给的。革命之意义、形势及方法等。农民要解放，必须来革命，再没别的法子。要革命，必须团结起来。这种教育，应该使农民能够看佃约及其他一切与农民生活有关系之文字——文言的及白话的。因为乡村中通用的，都是文言的，若果只令他们学白话文，有时见了文言文，岂不发生困难吗？能写浅近的信，能记录浅近的事，如普通求人的物或借人的钱。又如日用的事情很多的，有时都要能记录的，能写账，能算数。

（2）这种教育之实施应该是农民学校——幼年的及成年的，而不是什么国民学校。这种学校，是农民协会办的。国民学校，是祠堂庙宇中一般资产者所办的。

（3）举办这种教育，只能是农民自己的团结，即农民协会。没有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农民学校。犹之没有工会，便没有工人教育——工人学校。靠他人举办农民教育，永无此事。如现在乡村中的国民学校，名为给农民设的，实际与农民利益是互相冲突的。

（4）普遍的农民教育，须农民在经济上能够舒一口气，方能够举办。这就是说地主阶级必须向农民退让一步，减租、减捐、减息，方能举办农民教育。正如工人阶级必须资本家有所让步——如加工钱、减时间，然后才能有工人教育。舍此都是空话。乡村中的国民学校，作农民运动时，可以利用他们的。

（5）原有之乡村小学校及小学教师，于开始做农民运动时，颇有用处。小学教师之地位，与农民有合作之可能。穷苦的小学教师，应该是农民的领导者。

乡村小学教师之分析：现时充小学教师最多者，高小毕业的学生（十分之六、七）及短期单级师范毕业者（十分之二）。又有长期师范及中学肄业或毕业者（十分之一）。除此而外，有老学究（十分之一）。乡村中的小学教员，大部分是有革命性的。若在乡间作农民运动稍有成功者，这一大部分的人，是可以拉入国民党来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恽　代　英

一、何谓文化侵略

我们说的文化侵略是指的帝国主义者一种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文化政策。

帝国主义者施行这种文化政策的方法，是（一）设立教会，宣传宗教；（二）设立教会学校推行宗教教育；（三）招收留学生，使受帝国主义的教育；（四）办理中西文报纸、通信社、传播谣言，或曲解事实的新闻；（五）设讲演所或露天学校使听众受他们的宣传。

这种文化政策的内容包含下列四件事情：

（一）宣传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切身的痛苦，而希冀修身行道，以求将来的幸福于虚无缥缈之中。

（二）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而掩藏他们实际上社会各罪恶，使弱小民族炫耀迷惑于其说，甘自暴弃，而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为文物上邦。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广东青年》第四期。

（三）宣传片面的和平博爱的学说，对于帝国主义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罪恶，则不能而且不敢加以指摘反对。因此，他们的所谓和平博爱，实际只是帮助帝国主义者，使弱小民族不反抗他们的压迫蹂躏而已。

（四）鼓吹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之德意，对帝国主义者在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事，则一语不提，却择一二件表面上比较似于弱小民族有利之事，大为宣传，使弱小民族发生感激之心，以自甘为永不反叛的臣民。

二、帝国主义何故必要实行文化侵略

帝国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经济的利益必须向国外寻觅殖民地，以推广商品销路，采买原料，移植资本，故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是施行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要达到他们的经济侵略的目的，是不容易的。弱小民族多畏憎与外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且弱小民族中工人、农民更多为实际生计问题所逼迫，自然要起来抗拒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者于是不能不以武力压迫弱小民族，而是不能不以各种政治上的势力（条约、法令……），束缚统治弱小民族。武力压迫是很残酷的，政治势力的束缚统治是很不自然的。这种强横霸道的对付弱小民族，永远不能使弱小民族忘记反抗复仇的心理。只有文化侵略可以有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妙用，使弱小民族以受大国“怀”“柔”之统治为莫大的光荣，帝国主义者，因此乃能巩固他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地位。

三、中国所受文化侵略的影响

中国自鸦片战役以后，帝国主义者以武力与政治势力逐渐推行其经济侵略，如开辟通商口岸，限制海关税则，发达入口商业，攫取路矿权利之类；他们一方面这样做，一方面便同时进行他们的文化侵略的阴谋。现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我们看见英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成效，可以使我们了解反对文化侵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现在传教外人在全中国约八千人，遍布于各省会都市县城。他们在各地设立教会，用种种方法招收教徒，全国耶稣教会领圣餐的三十余万人，选员六十余万人，天主教徒约二百万人。

全国各都市有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处以上，会员约八千人。

教会设立大小学校共二千余所，共有学生约十万人。

以上再加各国利用庚子赔款津贴收买的留学生，及服役于外人商店、工厂、学校，及外人掌理之海关、邮局下的中国人，总共当有四百万人以上，皆受帝国主义直接间接之所豢养与蒙蔽，每不知或不敢反抗帝国主义。故此四百万以上之中国人，无异为帝国主义者的文化政策所收买，而失掉了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侵略之结果真是可怕啊！

我们试看他们这种文化侵略的成效：

大英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中国政治经济上攫取的利益，比任何帝国主义者为多。然而因为有了一般教士与留学生为他们歌颂文明宣扬德泽，居然使中国人怀德畏威，不但不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失败为耻辱，关税主权之丧失、租界领事裁判权之设立为愧恨，且公然承认大英帝国是文明先

进之友邦。

美国帝国主义在近年来勾结英国挟制日本，谋在中国发展其势力。此等野心，乃顺于他本国产业发达所有的自然趋势，稍知世事者自当了然。就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

因为英美文化侵略的这种成效已经引起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热心，他们正尽力扩大教会事业，并利用退还庚子赔款为文化侵略之经费，但是中国民族的精神根本消灭民族运动[1]；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他，比反对经济、政治与武力的侵略更加倍努力才好！

四、反对文化侵略运动应注意之点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欧美的文化，我们并不是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决不是盲目的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国粹论与东方文化论者之所为。我们认定欧美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的文化，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为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的经济状况是比中国的经济状况为进步的原故。但这正是说，中国经济文化因为比较落后，所以为欧美帝国主义者所宰割蹂躏，中国民族必须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之解放；决不是说，中国经济文化既然比较落后，便应当甘心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者

的宰割蹂躏，亦不是说中国一定要保守这种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不求经济文化的进步——这种奴性或保守性的见解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阴谋，我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在帝国主义软化驯服手段之下的中国民众，如一般教徒、教会学校学生、留学生等。我们相信这些人中间，除了极少数完全受帝国主义者的收买豢养的人以外，多半是受他们欺骗而不自知觉的，中间不少真诚爱国的人，不过因为他们所受反动教育的欺蔽，所以有时不知反抗帝国主义，且或误会以为反抗帝国主义即是侮辱了他们自己；我们应极力使他们知道中国民族的衰弱，军阀的扰乱，与人民生活的日益堕落贫困，他们与一般中国民众是一样受损失的。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间，他们应当认清少数被帝国主义者收买豢养的无耻，决心站在反对文化侵略的一方面。我们决不希望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的一方面，固定的与民族解放运动作仇雠。我们最希望他们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巢穴里打出来，与外面反对文化侵略的人相呼应，只有他们能起来反对文化侵略，才能掘倒文化侵略的根基，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虽然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科学的世界中间绝对不能存在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并不要将基督教的地位一概抹杀。若是基督教可以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我们亦未尝不可看他与佛道、回教同等，用不着特别的排斥他。所以我们在反文化侵略运动中，对于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自然最好是劝他脱教，如不能脱教，亦可劝他努力谋教会的自立。我们对于教会的自立运动，与其说是反对，毋宁说是提倡赞助，因站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能使中国基督教徒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亦是我们很

大的成功。我们是不将反对宗教迷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视为一谈的。如佛、道、回教没有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决不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反对他。我们恳切希望基督教至少进步到佛、道、回教的地步，不要自安于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

我们反对文化侵略，决不因此有藐视任何文化侵略政策欺骗迷惑的人的心理，我们决不谩骂教士、教会学生与一般留学生。我们要谨防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使我们不能亲近这些教士、教会学生与一般留学生；帝国主义者常常要利用我们一处态度一处言语之失当，而指我们是以教士、教会学生与留学生全部为敌人，他们因此更好蛊惑玩弄这般人，使永不加入反对文化侵略的团体。我们要特别亲近，而且专重他们，使他们了解我们，不但是为中国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反对文化侵略的。我们相信在他们了解我们以后，一定不肯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当，他们多数人一定要站在我们的一方面，不会站在帝国主义一方面的。我们对他们宣传的时候，应当原谅他们以前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所以他们的知识思想当然要视一般人比较落后，我们决不因他们的比较落后而鄙笑歧视他们，我们正因为这样认定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下的牺牲品，他们是我们的不幸的兄弟，是我们所应当特别注意帮助的人。

五、我们的口号！

一切反抗文化侵略政策的同志们联合起来！
基督教会与教会学校应当即刻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
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营的任何文化事业！

基督教徒、教会学生们起来，共同参加反文化侵略运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下卷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PDG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陈 独 秀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一期。

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湖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

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1]，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2]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江西邓如琢、福建周荫人。

〔2〕指陈炯明、林虎。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新的转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之代表，既觉到现时的中国，确是到了民族解放运动之重大时机，故必须将我们对于时局的根本观察及职任布告于全国民众之前。

自从北方的国民军败退之后，奉直两派军阀压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老民党中之卖国分子，以扑灭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各界人民，深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及本国军阀的虐政和连年战祸，尤其是最近两年，不但农民破产，就是中等商人，甚至于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职业者，也都不免破产困穷，流离失所，更用不着说最窘迫的工人了。

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预征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三期。

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致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对进口货出口货都不能采用保护税制，国内制品不能与外货竞争，又加以国内战争，运输阻滞，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不但未能自由发展，且日在破产愁烦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国共产党之目前的职任，正是要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照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凡是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应该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利

益，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争斗，不单是代表工农利益向资产阶级及地主争斗。因为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为自求解放计，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

中国的工农及一切受苦受难的民众所以这样穷，这样苦，这样受压迫，不用说乃是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之赐。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驻扎海陆军，把持中国的海关，强迫中国的关税要遵从他们的协定，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价超过于出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和外债本息之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及银行纸币所吸收去大批款项，更不计其数，如此中国安得不穷！

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把整个的中国都弄穷了，复用政治的侵略手段，各自勾结中国一派军阀，使之对他派军阀战争，或对接近人民的军队战争，以巩固其在中国既得之权利，并继续增高其经济侵略，如是赣宁战争、洪宪战争、直皖战争、三次奉直战争，以至最近反国民军战争，遂充满了民国十五年之历史。被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原有手工业、农业经济日渐破坏之整个的穷中国，又加以十余年继续不断的战争，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等一切民众的苦痛，都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

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

现时国民运动中的右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与帝国主义爪牙纯粹的买办阶级稍有不同，他们虽然也赞成“国民的联合战线”，可是他们以为大家既然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军阀，工人农民便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放弃阶级争斗，以免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其实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第一，他们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争斗，不但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并且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当随工人的阶级争斗的战斗力而增加；因为工人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实际表现出来。他们主张工人放弃阶级争斗，便不啻主张削弱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斗中的主要军力。第二，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争斗，不是他们的出路。第三，他们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阶级，是不肯妥协的，是要为全民族利益奋斗，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到底的，香港工人牺牲职业，艰难困苦的支持一年余的罢工，便是一例；不像资产阶级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他们只要于自己利益有损，便马上主张停止民族运动，如五卅运动中工部局一停止电力供给，中国厂家即时主张停止罢工，便是一例；他们只要敌人对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有点让步，便马上抛弃全民族利益的争斗而与敌人妥协，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运动给资产阶级一点小小让步（关税会议、汉口上海租界增加华董、部分的交还上海会审公堂），一部分资产阶级便急急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条件，解决日厂

英厂罢工，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高唱“中外合作”、“中日亲善”，这也是一例；主张抑制工人阶级争斗的他们，这样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这样不顾民族的利益，这样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试问他们能比卖国卖民的买办阶级高明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军阀及买办阶级之次，就要算到这班一面反对阶级争斗一面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了。谁要“国民的联合战线”，谁便应当脱离这班破坏联合战线而妥协卖国的右派！现在的根本问题，正是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因妥协卖国脱离“国民的联合战线”，——而不是工人农民的阶级争斗破坏联合战线。

农民反对军阀土豪大地主的争斗，也同样能够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因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脱离少数特权阶级的压制束缚，自由团结起来，去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广东农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国民政府讨平英国走狗陈炯明，便是一例。

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战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

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斗争”、“反赤”等口号，帮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

在过去的经验，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即以上海总商会只顾自己阶级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过激”、“赤化”这类口号离散民众而失败了。这一联合战

线失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指挥奉系军阀，封禁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压迫总罢工，摧残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众运动；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英日帝国主义者，不但离散了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还进而团结了奉直两系军阀成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国民军进攻，号为反赤战争。此次反赤战争的意义：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以联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断绝中国民众运动得到武力援助的机会；一面强迫奉直两系军阀结合起来，以巩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之地位。因为自从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国，又加以北方国民军之发展，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

反赤军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援助，在北方得了胜利，杀人、纵火、奸淫、抢劫、勒捐、强用军票、搜查学校、封闭报馆、枪杀记者、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遍行于北京及直鲁豫诸省，将来或更推行于南方。反赤军入北京后，其内部英日间、吴张间都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的焦点乃是内阁问题：一方面是英吴，一方面是日张，都想组织己派势力占优势的内阁，并想有一个在己派势力支配之下的国会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时又不易决裂，因为他们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达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讨灭南北二赤（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吴张之共同目的是攫得关税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们不得不暂时勉强合作。在他们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无论是哪一派稍占优势，无论是颜[1]内阁、杜[2]内阁、孙[3]内阁或陆[4]内阁，他的大政方针，终不能抹杀现行的反赤政纲，并且还要加一条更重要的反赤政纲——卖国借款。帝国主义者始终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来替他们宰制中国人民，拥护他

们在中国之特权与权利。

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便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召集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国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即已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尤其特别指出吴佩孚得势，“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即改正协定关税制等十一条）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

民国十二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又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

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明“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吴张对于国会之争执，并不真是因为护宪问题，乃是各自争得北京政权，以便进行卖国大借款；吴佩孚要叫直系的贿选议员占住国会，张作霖则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组国会，以便借“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大买卖。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

有许多人对于国民会议，还有三种怀疑：一是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然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及政党之支配；三

是以为国民会议之议决，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

其实这三种怀疑都似是而非，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限于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速成；我们固然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制度迅速实现，我们更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运动尽量扩大；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争斗，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之组织，即现时已有的团体至少已经可以实现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于此可见对国民会议第一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者的关系始终不断，不像国会议员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复选，选举者和被选者始终没有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减少军阀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于受政党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于此可见第二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决无在军阀政府之下实现的道理；于此又可见第三种怀疑之错误。

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

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

在这些困苦争斗期间，各阶级的民众，必须有一共同政纲，为这一联合战线之共同争斗的目标；这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亦须如左：

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

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

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

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

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

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

十、停止预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

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

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

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农会法、商会法；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

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十七、禁止勒种鸦片；

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5]；

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

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

二十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

二十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

二十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一个政纲恰恰和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吴佩孚、王怀庆等此时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纲相反，他们或者要说这一个政纲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此时勾结为患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势力，还是很强大，除了全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不断的给他们以痛击巨创，使他们溃败，他们决不会因人民的要求而让步，给人民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而消极退却，如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然后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才不致中敌人始而离间终而各个击破之计而获得最后胜利。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此外涣散与孤立，也是我们的力量表现之障碍。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至于商人、学生早已有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经有组织的参加革命运动。兵士是有组织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仍旧是涣散的吗？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运动，因为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之同情与援助，帝国主义者遂不敢把我们当做义和团看待，并不得不给点小小让步，如关税会议、司法调查、租界增加华董等。“五卅”以来各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里夫及叙利亚之对法战争，如埃及之排英运动，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罢工表同情于叙利亚，如土耳其联结苏俄反抗英国侵夺其莫塞尔，以及最近朝鲜对日之大示威，这些运动都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至如苏俄援助一切弱小

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英国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罢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显著的进步，而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无法救治的隐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我们已经不是涣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颜惠庆。

〔2〕指杜锡珪。

〔3〕指孙宝琦。

〔4〕指陆征祥。

〔5〕《六大以前》收人的版本中，这一条为：“豁免灾区的钱粮及欠租，限制重利盘剥。”

PDG

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去岁扩大会议至现时政治状况的变迁与我党在各时期的策略

自去岁十月扩大会议至现在九个月间的政治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我们均有不同的策略。这三个时期的分划是：自直奉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

第一时期是军阀政权动摇时期。在此时期中，奉系军阀已经溃败，皖系军阀已经没有实力，直系军阀犹未再起，帝国主义者一时亦失去驭制各派军阀之能力，表现非常恐慌；段[1]政府极力勾结国民军，吴佩孚亦向国民政府示好，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

在此时期中，本党的策略是：自孙传芳反奉军事发动，即

---

* 这个文件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提出扩大此次战争性质之口号，说明反奉战争应该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于反奉旗帜之下，这个宣传在民众中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深入军阀的队伍中去，于是有郭松龄之反戈。本党同时又提出反对直系护宪运动及防止奉直联合之口号，盖已预见直系得势必然护宪，奉系若败必力求与直系妥协，企图巩固军阀的统治政权。

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想消灭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吴张军事上的反赤联合战线，一方面在民间造起广大的反赤宣传，将此革命胜利打消下去。

在此期中，我们的策略是要分裂反赤的联合战线，所以主张在北京暂时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纳皖直两系参加，专门对奉。但此政策终未实行，而吴佩孚已在汉口实行联奉，开始向国民军进攻，此时我们遂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以救国民军之危。然结果此政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力量还不强大，故虽有好的政策，仍不能影响国民党国民军充分实现。

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方面英吴日张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

英日吴张间的冲突虽很严重，但因国民军之实力仍然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只是暗潮，而未进于明显的破裂。

在此期中，我们的政策，在北方是国民军和奉反直，在南方是国民政府援湘御吴。北方的反赤军（奉直晋三方），若能一致合作的进攻国民军，则国民军很难存在；但三方合作，均无十分诚意，各有私图，故国民军似不至于失败；然在奉直间无大变化时，国民军亦只能自保而难于冲出。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

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

总之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是在英日吴张勉强合作中，得到很短时期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是英日两国，现时他们共同的目的，是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其不同的意见是：日本偏重北方以扶助张作霖为唯一政策，对于南方之反对吴佩孚，不但不甚注意，且视为奉张统治中国北部之机会；英国则一意扶助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不但要他们镇压中部的民族运动，并且需要吴佩孚替他们向南征服广东，向北和奉张争得一部分政权。

除英日帝国主义之外，在中国影响较重要的，要算美国帝国主义了。美国的政策和英日不同，他并且公然宣传中国人应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可怕的侵略，只有美国能以资本帮助中国的实业发展与和平，他的政策是撇开军阀，而抓住中国的资产阶级，用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统治中国。法国帝国主义方集其全力经营东欧及近东，又加以英国政治的压迫和美国经济的压迫，对于中国问题，他已无力顾及。

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自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他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

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

（三）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应知道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势力，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这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都公然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号召反革命。军阀的势力已日就崩溃，皖系军阀已等于消灭，直系在表面上好像复兴起来，实际已成强弩之末，最有力的还是奉系军阀；军阀之致命伤要算是内部分化，最显著的如冯玉祥及郭松龄之倒戈，此外如方振武、唐生智均已归到革命旗帜之下，甚至于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者接近苏俄之倾向。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买办阶级据有全国商会及银行业，他的势力还很雄厚，然而他是中国资本主义之开创者，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买办阶级中也起了分化，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官僚完全是军阀之附庸。新的士绅是大学教授、外国博士等，乃是买办阶级的爪牙，或直接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

第二种是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半封建势力对抗。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尚需要普遍的发展，在思想上尚不脱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

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犹豫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固然不容易脱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之统治，而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压迫，他们的政治思想终比大资产阶级浪漫一点，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常站在大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

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他正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他与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是：一为无条件的合作，一为有条件的合作。换言之，即是资产阶级想用改良方法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判权、收回租界等。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方可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对于军阀的苛税、勒捐、破坏铁路运输尤其是战争，一致深恶痛绝。广东上海一部分急进的分子，渐表同情于革命，且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到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要求，非经过革命实难得到，所以他们未得到这些要求以前，在客观上是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

在以上四种势力中，我们将用何种力量来革命呢？当然的只有第二种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种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之压迫，苛捐杂税之剥削，只有感觉革命之必要，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该拉拢他们，才能免自己陷于孤立。第四种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

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特别在上海，加之军阀内部分化之结果，新生的军事势力，在他们的思想上行动上，无一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

（四）国民党内之分化和我们的态度

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势力。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我们对于国民

党的态度应该与对全国各种社会势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若幻想代表多阶级的国民党能够成为整个的，或希图国民党为单纯的左派所垄断，不与其余他派合作，这更和戴季陶左右并排的观念是同样的错误。

（五）民族运动之前途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由第一条道路之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或者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折，均不免要由第二条道路的运命。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够一面尽量扩大工农群众的组织，一面结合国民党左派以抓住小资产阶级，领导此革命到底。

说到我们党的现状，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

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

（六）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

党的发展在九个月以来，从好的方面看：一、党员数量是增加了三倍；二、我们虽未能在组织上影响小资产阶级，但能够模糊的领导全国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在京沪粤湘等地；三、在全国的政治鼓动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事变所发出的口号及政策均能影响民众；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职工运动均较前有基础，特别是上海的职工运动，已渐充实起来，唐山、天津虽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根基尚未完全破坏；五、广东、湖南的农民均有了群众的组织。

从上面看固然我们的党是发展了，但在发展中也包含不少的缺点：

一是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可从几方面看出：

（甲）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

（乙）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

（丙）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二是各级党部自中央以至支部，指导训练的力量均不充分。

三是支部只有名义而无工作。

四是理论的宣传非常缺乏，鼓动工作亦多不切实际，不能

深入群众。

五是职工运动多只是机关运动，没有群众充实这一机关。

六是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黄埔军校六月七日又提出的处置共产派问题——凡此一切，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广东方面，现时攫得政权者是武装的中派，而全国则有右派的反赤运动，他们都向共产党进攻。这种进攻之所以可能，固然是因为客观政治形势大有变动（国民军败退，北方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胜利，吴佩孚重登政治舞台与英国勾结，日本又扶起张作霖，并借中东路事件反对苏联等等），然而我们的党，自身亦做了些错误。因此我们一方面从中央直到支部，应当宣传解释此次右派及一部分中派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的反赤运动相呼应的，实质上确是反革命的行动；但是别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右派、中派之所以容易利用最近政治形势向我们进攻的原因，并且要设法消灭这些原因。

二、国民党右派，以至于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前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实际上简直使左派自己不参与党务及反对右派的斗争；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而使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实质上是左右派之争的性质隐蔽起来。同时我们既不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当然国民党的发展便因此遇见妨碍，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是右派及中派却正利用机会而在这些分子之中发生影响。我们既没有实行去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我们自己各地党部更加独立行动及结合左派与右派实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我们因此也就没有能充分的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更没有能在北方政治形势恶化之后，以民众革命化的势力，反对右派及武装的中派之进攻。

三、去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是：（一）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帮助他们发展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二）我们自己的党政治上更加独立起来。这种决议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看国民党的性质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等工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及小商人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并且仍旧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及我们参加国民党的指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之一。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

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夺取国民运动的指导。

如果有些同志，仍旧认为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那么，这已经有广东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亦是错误的。因为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形式和他的社会基础本不适当，再加之以我们的占领，自然因过分的集权而实际上变成狭隘的小团体，反使大多数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因散乱游离而消失其力量。

这两种观点，虽然恰恰相反，然而却有同样的政策上的错误，对于中国解放运动有同样的危险；最终的结果，是使共产党及无产阶级与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隔离，实际上是将这些群众的指导交给大资产阶级。

四、我们党里，现时所以有这些错误的倾向，因为最近形成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之复杂。一年来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双方的“自我形成”，必然直接反映于国民党——这就是共产派与右派互争对于中派及左派的影响。我们的党所以现时应当格外对于国民革命发展的远景有明显的观察，对于国民党有确定的策略。必须使中央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相互关系的观点，真正能为党员群众所了解而造成相当的正确的观念。

本次（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认为：解决我们和国民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虽然是下次大会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必须有下列的决定：

1. 实行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议决——我们各地及广东党部的独立行动。

2. 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同时改正以前束缚左派及实际上不使左派管理党务参与反对右派斗争之策略上的错误。

3. 积极发展左派的党外群众的组织，尤其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中（政治的俱乐部等），以这些社会团体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4. 我们应当使国民党左派明了，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极大的群众的党。

5. 我们应当和左派共同进行更实际的反对右派的经常斗争，暴露他们的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派与右派隔离。

五、我们对于现时的国民党的目前紧迫的职任，尤其以实行反右斗争为最重要。我们在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反对广东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虽然他们在中派指导之下，当然还要竭力赞助他们；我们同时应当有拥护劳动民众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以这一政策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党的发展经验和缺点

一、自从上次扩大会议以后，本党组织在数量上又发展了三倍以上。最近八个月来，虽在五卅运动潮流已经逐渐低落之后，而本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仍能于各种形式之下，领导民众运动。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看来，本党确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从各地群众运动的实质看来，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

二、在过去的组织工作中，我们有了下列的经验：

（甲）经过各种的运动，我们得以接近于广大的民众，得到民众组织的发达和党自身的发展。

（乙）因为注重发展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在几处革命潮流较高民众运动较发达的区域，取得了群众，并从群众中建筑了基础的组织。

（丙）因为开始注重支部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有了较好的社会成分，吸收了进步的分子，深入在无产阶级群众里，于秘密工作形式下种下了初步的基础。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三、这些经验从实际工作得来，是几件好的结果。但是本党在组织上仍是非常幼稚，有许多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之最大者有四：第一是各级党部尚不认识组织工作的意义，多以为组织工作只是技术的，而不了解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第二是支部工作尚未真正建立，过去的支部都仅有其形式，各级党部尚不明了支部的意义，亦尚不知支部工作的方法。第三是党团的工作太不好。第四是党的机关不健全。

组织工作的意义

四、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

五、本党在组织上，正当发展，但有一种危险，时时有发生之可能，这种危险便是指导力之薄弱，主观的力量不能适合客观的需要，以致失掉了许多活动之机会。尤其是群众的政治行动若遇指导力薄弱时，其损失甚大，这是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客观的革命运动之进程，是逐日发展的。本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指挥一切，这不仅是中央组织部的责任，亦是各级党部组织部的责任。因此扩大会议决定：以后中央对于各区，各区对于各地方，最好能常派遣特派员，考查并执行

此种任务；在某地发生特殊事变时，此种派遣更不可少。

六、什么是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呢？那就是对于发展组织的怀疑心理。在目前暂时的军事反动政局之下，革命运动就进行不已。依反动政局而革命化之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在此时的问题就是：这些群众若不接近于无产阶级党的势力，便会走入买办资产阶级的圈套。自“五卅”以迄现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便是联合战线之最多数群众属于何种势力之问题。这个意义便是说，假使本党若不能扩大与领导群众，便会使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势力日益增加。因此扩大会议特别提起严重的注意，重新提出扩大本党的口号，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七、对于无党群众及无组织的群众之工作，也是本党在组织上的责任之一。在各种工作形式下造成许多同情于本党的组织和群众，是自前最需要的工作。如济难会工作已有相当的成效，惜各地党的机关未能加以充分注意。此后如济难会，游艺或体育之团体及教育文化性质之团体都应加以注意与活动。

支部的意义与工作方法

八、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但本党现有的支部大半失去这个意义，只是在各种社会组织或区域里，征集了革命的分子，而成立党的分部，给以党的训练，而并未做到支部自身在此社会组织或区域里的核心作用。党的支部若没有这样作用，决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应当要立刻改正。

九、改正此缺点以建立真正支部的方法有五：（一）现在我们党的基础仍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党的活动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如职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分配书报，介绍同志，报告消息，交通传达等，……按照各支部的情形，其人数与环境的需要而定）。大的支部，在秘密时代，因人数过多不便常开支部党员大会，又为收取党费传达命令等事务，支部内可按工作部门分编小组；但我们必须认清小组是在上述情形之下而存在，不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基本组织，只是每个工厂、每个矿山、每个学校等整个的支部。（二）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以领导本支部的工作，如大支部内又分小组时，除支部干事会应扩大外，且需按期召集组长会议；支部干事会须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训令[1]。（三）改造支部的性质，只许有两种性质之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即按住居地址而分划）；这种确定支部性质的作用，一为必如此始能建立支部的工作，一为避免与党团的作用相混杂。（四）在大的工业区域中（如上海、香港、武汉、天津）及大的农村中，如组织发展、支部加多时，应于区委或地委下，添设部委，按区域分划几“部”，联合若干邻近之支部，组织“部委员会”，管理本区域内的各支部工作。（五）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是党的本身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关系要非常密切；在组织工作上，从群众的支部或

小组起，要严格执行：（甲）政治行动，（乙）发展工作，（丙）推销书报，（丁）缴纳党费诸种工作。

十、党在发展状况中之时，组织工作的懈怠与不精密，便会使党没有行动。各种性质的会议，无论在怎样情形之下，务须要设法举行；只要各个分子在会前有预备，便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会议亦是有益且有效的。支部或小组的会更不可间断，在开会前预备自己的报告和意见，是每个同志的责任；召集开会，综合各种报告作结论，执行决议和训令，是每个组长与支部书记或干事的责任。各区委各地委或部委下的“活动分子大会”或“负责工作同志大会”，应尽可能的多多召集。

党 团 工 作

十一、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种社会团体里，和党的支部组织及作用均不同。党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从中央至支部干事会，有各级的各种性质的党团。党团的性质且多临时的，常为变动的，由各级党部规定其存在，人数过多时指定其组织干事会。

十二、党团的工作，便是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贯彻党的政策，其中没有各分子的单独意见。党的机关对党团有决议时，就必须执行，党团中的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党团中大多数的决议，除必须通知受指挥的党机关外，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在一定范围以内，党团的工作是须由自己讨论的。党团的意见与党的机关（如某厂工会的党团与同厂的支部干事会）意见有不同时，便须立刻提出于上级

党的机关去解决。

十三、过去党团工作之缺点甚多，甚至未明了党团的意义，有成为党的第二组织之倾向。这些缺点是应竭力改正的。各级党的组织尤须不要忽视，党团中的同志，在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不能脱离的。

党的机关

十四、政党是不能没有机关的，共产党自然也须有其机关。我们的党的机关，便是列宁所说的“职业之革命者”之组织。党的机关的作用，就在推进党的组织，执行党的政治的与技术的职任。尤其是在发展状况中的我们的党，不能没有很好的机关——无产阶级科学的组织。

十五、党的机关之健全，其必须条件有二：（一）组织的完善与合乎需要；（二）工作人力之充分与负责。过去的组织，往往仅具有其形式，或甚至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实际的工作。如各部的组织，各种委员会的组织，都有这种毛病。这些毛病之来源虽有由于人力之不足者，但亦有时是不合乎需要。欲求纠正这些毛病，一方面是要从组织构造上检查以求整顿，另一方面也须从人力的补充和适宜的分配上着手，使负责工作者增多并充实起来。据中央组织部此次的报告，统计全国工作人才，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一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而实际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一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

十六、上次扩大会议曾经决定：中央各部要有确定的组

织，中央及区书记应当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这些决议只有一部分已实行，大部分尚未做到，如中央组织部至今尚无专人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同志时常派往他处临时工作，农民运动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自此次扩大会后都必须逐渐实行，力求改正过去在工作上的缺点，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同样的要整顿起来；必使党的组织都健全以后，才能推进群众的革命运动。自中央以至各支部，各级机关间，必须建立互相密切的关系；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各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都须有定期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六大以前》收入的版本中，此句之后还有“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

PDG

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扩大会议看了中央宣传部报告之后，认为今后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宜即采取下列的具体办法。

一　出版物问题

（甲）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应当更加加增鼓动的性质，使能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不可太重于分析的论述。再则，一、应再多加宣传各地工农运动的意义；二、各地政治通信都须整顿，务使每一地方重大事件都不空放过。

（乙）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因此，党内理论力量既然很少，必须把他们暂时集中于《新青年》（如《向导》上过于偏重理论分析的论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历史的理论的文章，都可以登载于《新青年》）。再则《新青年》上须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的历史的理论的论述。《新青年》上还应增加 C. Y. 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使他成为 C. P. 及 C. Y. 中央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的共同出版物。

（丙）中央通俗的机关报——《劳农》（或《工农》），亟须添设，先办月刊，以后设法改为周刊。这一机关报应当给工农群众读者以政治的指导，须能搜集全国工农状况及其政治经济斗争的消息，登载各地方的工农通信。这种机关报的目的是使工农群众能明了全国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并充分表现实际的工农生活及其斗争。

（丁）《党报》——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

（戊）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审查，为使我们所主持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的机关报能与党有密切的关系并能适当的运用策略，为使中央对于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起见，必须设立一编辑委员会，由《向导》、《新青年》、《劳农》、《党报》、《中国青年》（C. Y.）、《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妇女》（妇女联合会机关报）等之主任编辑组织之；这委员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报告中央及各地党的、工会的……机关报之状况，加以审查。

二　部务问题

中央宣传部在今年四月底以前简直并未执行部务，现在应以现时所有力量积极整顿起来，务须实行下列的最小限度的工作。

（甲）设立消息课——将现有中外报纸杂志，每星期及每月编成言论及消息汇录，交给中央各部各机关报编辑处。

（乙）设立图书馆——将重要的中西书籍分类按期编成目录，并收集中央及各地一切刊物（党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

会、妇女会的及其他机关报，以及北京、广州、汉口、上海之有力的重要的刊物与书籍）。这等图书目录办到相当时间，并应分寄我们各级机关，规定借书办法。

（丙）日常部务——（一）随时根据中局决议之宣传动员及时局解释，拟定政局宣传大纲；（二）时常发出关于各地宣传部部务的通告；（三）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四）依据编辑委员会决议，每月对于各地一切刊物，加以总的批评（当然仍须随时写信指导各地地方的刊物）；（五）最近期间先调查各地思想言论界得一大概后，以后每月须调查一次：我们实行了几次全国的“宣传动员”，各界各派对于我们这种宣传的态度如何，对于各地地方的“宣传动员”亦是如此；（六）最近期间先调查一次各地经常的教育工作（支部中之理论及党务训练工作）之情形和方法及特别的教育工作（训练班等类的工作）之状况；以后每月须审查一次这种工作的成绩。

中央宣传部应将全国的A鼓动，B宣传，C调查，D中央地方各种刊物的期数及其对于重要事件的论解，E编译成绩诸项，做一书面报告于中央局。

三　编译工作问题

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

（甲）理论的译著，应先定一最小限度的计划，大致应当编译可以继续共产主义ABC的书籍。

（乙）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

（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

（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如支部之意义及党团之运用等）。

（c）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

（丙）鼓动的小册子——解释第五次时局主张的极通俗的各种小册子。

（丁）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汇录（如列宁，李卢[1]，“二七”，“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济难日，少年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双十纪念，反基周，反帝周，职工追悼周，孙中山廖仲恺纪念等），并附参考材料。

四　地方报告问题

每月各区委及地委必须按期报告，并具备下列各项（如某项无工作，亦须说明理由，报告准备开始这种工作的计划）：

（甲）每月鼓动成绩（中央性质的和地方性质的宣传动员之结果及其传单——我们的反对派的——虽然应当随时迅速零寄，但每月应作一综合的报告和结论）。

（乙）每月宣传成绩（俱乐部研究会等理论宣传工作——广州已经可以有，其他地方则至少应利用中央理论刊物为材料，使同志在党外吸引非同志对于我们的理论注意，使他们用通信和我们讨论，地方刊物上应注意与当地各派辩论。此等工作成绩均须每月报告）。

（丙）每月综合报告地方所出各种刊物期数及当时的中心口号。——地方政治刊物应当根本上注重当地的政治鼓动和地方

问题（各地党的、工会的、学生会的、妇女的……各种刊物，应按期快邮递寄中央宣传部——其相应分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部、C. Y. ……者，与宣传部无关，不可以为已寄数份，便不专函寄送宣传部）。

（丁）每月报告思想舆论的调查。

（戊）每月教育成绩（支部中每月一次理论上的讨论，以试验同志在主义上了解的结果；时局讨论上每月总论党员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程度；纪律上每月总论同志间的意见或组织问题中所发现的原则中的某种倾向）。

（己）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

（庚）每月综合报告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各地同志或非同志对于中央刊物的批评或思想政策上指导的需要）。

（辛）每月综合报告当地同志对中央刊物（《向导》、《新青年》、《劳农》上的）政治的、理论的、工农的通信共有几篇及其目录（不论是谁做的，各地宣传部都应当报告）。

五　工农通信问题

我们的党要能知道审查群众的情绪而与以指导，必须在宣传工作上亟亟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组织工农通信员的方法，大约可以有四种：

（甲）宣传部在工人中挑选能够写普通信的人，使他们随意写自己的生活情形、工作条件以及家庭状况，说出自己的感想和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等等；

（乙）宣传部挑送几个学生同志派到工人区或农村中去，笔录工人农民的谈话；

（丙）宣传部委托工委农委在群众工农区域的负责人，请他们用种种方法找这种工农通信；

（丁）罢工、抗租、抗税等事件起来之后，宣传部特别派人到工农区域去，或委托工委农委负责人，用上述方法去找群众对于当时事件的意见感想之通信。各地宣传部应时时注意编制工农通信的问题单子，使工人农民通信员能按照这些问题答复。

中央宣传部及各地宣传部为执行这些工作起见，必须自身先整顿起来；中央及各级委员会里对于宣传部的关系，也须格外严整慎重，如人才之分配，办事手续之完备等等。

扩大会议认为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同时，那一宣传问题议决案当然仍旧适当，此次扩大会议认为只须规定很具体的办法，以求实行；所以对于宣传部的工作有上列的具体规定，责成中央及各地宣传部切实执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德国工人运动领袖。

PDG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五卅运动以来已经证明工人阶级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主要的势力，并且在这一个革命的怒潮中，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和民族自觉及初步的组织能力，都有很广泛的增进。虽经帝国主义与军阀历次的屠杀和摧残，然工人阶级仍继续不断的反抗。同时在广东历次肃清反动军阀的争斗中和北方反奉战争中，工人阶级都能有组织的参加奋斗，也证明工人阶级已有进一步的觉悟。

最近因军阀搜刮及战祸天灾和输出品之漫无限制，发生普遍全国的经济危机，如纸币跌价，强发军用票，米价奇涨，百物昂贵，欠薪等……工人阶级在这危机中，实际工资日见降落而受巨大痛苦，因此经济罢工风潮遂普及于各处，虽尚无组织的丝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不断的罢工，这种罢工风潮，且将随着经济危机而日益继长增高，工人阶级的境遇既然如此，只有日趋革命化。同时这种组织力薄弱的罢工，亦易于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中外资本家所压服，我们为抵抗敌人的压迫起见，应加紧努力，不要失掉一个指导的机会，务使经济罢工运动的结果足以强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势力。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PDG

二、中国职工运动自始迄今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尤其是在“五卅”沪港工人罢工中表现最为明显，所以本党对于职工运动不是党与工会关系密切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本党各级组织经过工会的形式去指导和训练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问题。

（甲）本党指导工人运动不在于包办工会机关，而在于能够不断的提出切合工人阶级实际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与党员之确能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乙）是经过本党的工厂支部去影响广大的工人群众。因为党的工厂支部是最接近群众的组织，所以无论工厂里面发生何项与工人利益有关的事件，本党各工厂支部都应该立即起来活动，为全体工人奋斗（但须经过工会这一形式），一面借此组织和训练工人，一面善用这些具体的日常的争斗，促进工人群众阶级的觉悟，引导群众去参加工会的工作，工会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所以我们更应该用工会的工作和日常的斗争去教育工人群众。如此方能将过去用党团包办工会机关的工作转而为党员群众影响工人群众的职工运动。

三、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职任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工会与其他阶级民众团体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行动的联合战线，就是实现这一职任的唯一策略。所以工会须时常发布有关各阶级民众共同利益的主张，并且要领导工人群众实际参加这种行动。我们运用这一个政策往往易于发生毛病，不是因恐怕联合战线的分裂，易于忽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阶级斗争口号与要求过高，易于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我们要知道，必须工人阶级团结愈坚固，然后联合战线的势力才更充足。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又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渐次发展，所以轻视阶级的利益，不但是有使工人阶级离开我们的危险，而且足以根本动摇联合战线的势力。同时阶级争斗的口号与要求过

高，易使资产阶级利用这种要求与口号，为隔离工人阶级之宣传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还有第三个毛病，就是应用这一个策略时，只是发表一些空洞抽象的全国的总的政治口号与要求，而不能运用到实际的日常的斗争上去，这个毛病差不多是很普遍的，这就是除“五卅”时的上海及现在的广东外，完全不能把这一个策略发生实际的行动的总原因。要使这一个策略能够实现，必须从群众的日常的切身的问题做起，就是许多地方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苛捐杂税问题、米价问题、纸票问题、参加城市选举问题及军队的骚扰问题等。实行这一策略不但是由工会发表几篇宣言就够了，并且要以工人阶级做中心，起来号召各阶级的民众作实际反抗的行动，然后这个联合战线才能深入群众，渐次巩固起来。

四、本党中央的或地方的出版品，须切实登载关于职工运动的消息和论文（此事虽屡经决定，但未切实执行）；过去本党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艰深，就是凭空发议论，不切事实，很少登载工人的投稿，最近虽然有些进步，但是还未能普遍的群众化。根据过去经验，只有画报最能影响工人群众，各级党部以后应注意发刊工人画报的工作，而各种刊物亦须注意插画一栏。

五、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此一年之内，全总在广东工会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尤其是在省港罢工工人中间。可是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全总尚无何等影响，今年“五一”举行的第三次劳动大会，虽然没有在全国工人群众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可是有点教育和宣传的意义。最好的现状是全国所有有群众的工会（除广州少数工会外）都加入了全总，而全总的领导机关还算健全。因此在最近期内，应注意全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第一，要在组织上与全国各地工会

发生密切关系；第二，要在上海发行一个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定期刊物；第三，建立巡行员的制度，实地指挥各地工人的争斗。党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应注意指导和运用全总这一机关。

六、我们有了许多工会的高级统一机关，固然是很好的，同时我们的职工运动却发生了一机关化的危机，此时我们要注意工会组织的群众化，就是要注意工会的低级组织。在过去我们对于工会组织问题有两点错误：一偏重机关组织的形式，二虽曾注意工会基本组织，但未能正确的运用这一基本组织。在工会组织不能公开的地方，不必拘于工会的名称和形式上的组织，要想出种种形式的组织和名称来组织工人（如学校、俱乐部、饭堂、医院、音乐会、体育会、合作店、技击会均可）；这种组织只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群众的虽少亦可；二、是要阶级的。关于工会基本组织（工厂内的各部门的支部或小组）的运用，过去的缺点，不是太偏于形式，就太偏于严格或近于机械，其实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是工人群众活动的单位，基本组织不在于形式上的一律，而在这个基本组织真能为群众的核心，渐次吸收工人群众和构成工会的一个活动单位。如果过于严格成为死板机械的东西，也就失掉了工会支部或小组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一个工厂里某个工作部门共有一百个工人，其中加入工会的有二十个工人，无论厂主或监工虐待这一百个工人中任何一个，这二十人的工会会员所组织的基本组织，应立即召集这全间一百工人开会讨论和解决一种适当的行动，反对这件虐待的事实。就是在不能开会的地方，亦须在厂内或厂外分头进行宣传和煽动的工作，务使这工作部门的全体工作都同情于工会组织而加入工会，并使工人群众学得日常争斗的方法，这就是工会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同时我们要注

意下级工会委员会和工厂工人代表会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些委员和代表多半是工厂中的中坚分子，必须他们受了相当的训练才能适当的运用工厂支部或小组这一组织。这是建立工会组织比较切实的办法。

七、因为中国政治情形的纷乱和经济情形的复杂，全国工人的要求很难得到一致。除广东外，工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可真是全国工人一致的要求，至于改良待遇等，当按各地各种工人的实际境遇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一时不能达到目的，也要开始宣传；关于工作时间，我们应立即宣传至多不得过十小时，及每星期休息一日的制度。中央及地方都应提出全国的及地方的工人要求的大纲，向工人群众及一般社会广为宣传。

八、在轻工业工厂中，如纱厂、烟厂、丝厂等，青年工人和女工数量上都占很重要的成分，因此青年工人和女工参加工会运动、罢工运动以及一切群众运动均能积极行动。为提倡他们更加努力的参加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及训练工人阶级战斗的人才起见，我们应当注意引导他们奋斗，施与他们以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在各种经济罢工中，应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条件，在有青年工人和女工的工会内，必须选择他们的能干分子，当选为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在各工会党团中亦必须有 C. Y. 的代表参加，以便 C. Y. 组织在工人群众中能为一致之活动。

九、按照各地职工运动实际运动状况和各地工人的最低限度要求，各地区委和地委，都应拟定目前职工运动的实际计划，报告中央批准，并督促党的工厂支部和工会的党团切实执行。全国职工运动中最重要的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等，最重要的地方为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这些地方的交通及搬运尤为重要。

（甲）北方铁路工会除京绥路工会外，都被压迫而不能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存在，过去铁路工会尚未能获得群众的基础，党在铁路上的支部也不发达。加之铁路工人中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差别甚大，客观的组织上也有许多困难之点。今后应该用不拘形式不拘名称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方式，以及秘密的方法[1]，组织各大站铁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路棚工人搬运夫等铁路工人，一面应用方法反对卖国军阀，一面应以日常最感痛苦的事实团结自身，并与沿铁路的他种工人和农民发生密切关系。为达到上项目的起见，应将这些工作责任，由铁总特派员手中移交到本党各路的党团各站的支部手中，以免从前铁总遥制之弊。各路各站的工作，由各当地的党部就近负责进行，不但各当地的党部比铁总就容易于督促，而且工作由党部负责，比从前专责成铁总遥制之特派员个人，实际上是增加了铁总工作的人力。这个计划实施之后，各级党部必须认定铁路工会的工作是该地党部职工运动中第一重要的工作。今后铁总除派遣巡行员指导和考察各地铁路工作外，并不派遣驻在各路各站之经常特派员，而发展各路各站铁路工会的工作，当完全由当地党部负担，铁总只与各路各站工会发生正式关系；而经由各地党部发展之各路各站铁路工会，亦须注意与铁总关系之密切，以巩固铁路工会之统一，并须注意将工作情形由各路各站工会报告铁总，以便铁总发行定期刊物，指导各铁路工人运动。

（乙）过去海员工会，除在一部分航海轮船上有相当基础外，内河轮船上的海员加入工会者尚少；粤港罢工后，一部分最革命的海员又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海员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应在航海轮船上进行秘密工作，并设法使内河轮船的海员加入工会，海员工会的组织亦应推广到各大口岸，自然党的组织

亦应随着工会的发展而努力发展。以后各当地党部对于海员运动更应十分注意。

（丙）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摧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州、博山、焦作、大冶、水口山、锡矿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一面应继续进行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一面又应派人进行抚顺、井陉、临城、自流井等地矿工运动。

（丁）上海总工会虽为上海全体工人所拥护，然其基础尚在一部分纱厂和印刷工人上面，以后组织海员、铁路、邮电、码头、街道、交通工人等工作最为重要。上海工人因生活痛苦或阶级自觉心较甚之故，最易发生无组织的罢工与暴动，须本党工厂支部和低级工会强大起来，方能使上海工人的动作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动作，同时应极力争得上海工会的公开存在，并普遍宣传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上海党部尤须指导上海工人参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运动，上海工人方能积集他们革命经验和夺得他们的社会地位。

（戊）广东职工运动有两个缺点：（一）一部分产业工人尚在少数反动领袖影响之下，（二）工会中旧行会的积习甚深。本党的广东职工运动在最近的将来，一面应注重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获得兵工厂、铁路、邮电、自来水等工人群众，一面要注重建立摆脱旧行会积习的少数模范工会，不能专注重所谓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应急谋解决，尤以今后香港职工运动的恢复为粤区主要工作之一。本党工厂支部的发展，应注重吸收工人群众，对于工会职员之加入本党者，须严加选择。

（己）天津、汉口、青岛、大连等处，都在严重压迫之下，多数工人尚无组织，今后应极力发展这些地方的工人组织，同时须避免机械式的和太严格的应用工会支部或小组这一毛病。须注意应用日常争斗事实，以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方式组织工人

团体和工会基本组织，尤其要注重党的工厂支部的发展，目的在于获得工人群众中的中坚分子以为发展各种争斗的准备。

（庚）在内地很少近世产业各城市中，各小工厂工人、商店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亦须特别注意，因为他们是这些地方大产业工人的代理者，即是国民运动中有力的群众。这些职工的组织虽然不能十分严紧，可是第一步须使这些职工团体成为阶级组织，不使资产阶级分子混杂其中，这是最要注意的。

十、过去一年中，全国工人阶级都在热烈斗争的状况中，因此本党即忙于指挥这些热烈争斗，因此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常被调遣，而未能经常的担负责任，因此对于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未能为有计划的进行。以后中央须指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经常负责人，根据上项决定计划的实际方法，由中央随时指导各地党部切实执行。

十一、现在职工运动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才。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才。并须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六大以前》收入的版本中，此句之后还有“注意下层群众”。

农民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农民运动的趋势

自近年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加紧剥削和压迫以及军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以致形成现时弥漫全国的农民暴动，如新近河南、山东的红枪会暴动，四川、陕西、直隶的减租抗捐运动，广东、湖南的农民协会运动，并且在这些运动中表现一些共同的倾向：反对苛捐杂税、预征钱粮，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民团之压迫，反对战争之扰害；同时且表现积极的要求，要求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不扰民的政府，在农民运动较进步的广东，更要求取得一部分地方政权（县长民选等）。总之，现在的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换言之，便是农民已经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战线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国民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因此扩大会有以下的决定。

（二）经济的与政治的要求

广东的农民运动，已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政纲，从全国来说，则尚早一点，尚不能即订出一有组织的政纲。在这个决议案不是要有系统的说明农民之要求，而只是找出全国最急切需要的那几项是马上就要行动的。至于整个的农民政纲之提出须待至第五次大会时方能议及。

属于经济的

（甲）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

（乙）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

（丙）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

（丁）要求免除陋规，一切征收按市价计算；

（戊）统一度量衡；

（己）禁止囤积居奇，提倡农村消费合作运动。

属于政治的

（甲）农民集会结社自由；

（乙）县长民选；

（丙）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开大会选举；

（丁）地方财政公开；

（戊）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

（己）剔除诉讼积弊，禁止差役需索。

（三）组织问题

（甲）农民的组织不能太严格，太拘泥于农民协会之形式，如果各乡镇已有联庄会、守望社……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之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一个县农民协会。

（乙）我们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因此，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的组织），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只能比较概括的指出以下之两种人，不准加入农民协会：

一、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

二、重利盘剥者。

（丙）对旧农会政策，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机关——压迫农民。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四）宣传问题

（甲）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

（乙）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

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

（丙）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

（丁）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

（五）对地主民团及地方政府政策

（甲）对地主政策：我们的政策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事实上打倒大地主。

（乙）对民团政策：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用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手上，而不为农民运动之障碍。

（丙）对地方政府问题应分别来说：

一、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应不断的反抗，或分裂削弱其统治以达到要求；

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地方，应以民众要求的形式取得权利。

（六）农村联合战线

此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农民自身为生活所迫，亦有急起暴动取得一部分政权而不可遏抑之势，尤其是广东。这种暴动也会使农民受很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不在遏抑此暴动，而在农民暴动中善于运用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就是联合农村中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者，共同行动，以免农民孤立。即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亦应采用农村联合战线如下列几种形式：

（甲）在平时可取工农商学联合大会形式或各界代表大会形式；

（乙）在国民会议高潮时可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城乡分会；

（丙）在地方有事时可组织人民保安委员会。

至关于农民运动对各方面所取的政策与态度，已包含于本议决案各条之内。

（七）对教会所取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一方面替帝国主义作侦探察中国内地情形——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究竟是个什么的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着和平博爱等，说着好听的名词，甚至用一些金钱出来收买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

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揽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

（八）对土匪政策

对于压迫农民的土匪，当然要尽力反对，就是不压迫农民的土匪亦不可让他加入农会，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只可使他在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时，站在中立地位，不为土豪劣绅所利用，因为若让土匪混入农会，是易使农民组织腐化，而且给外间攻击的口实。

（九）武 装 自 卫

（甲）农民现时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但须注意两点：

一、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

二、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

（乙）自卫军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误会和嫉视。

（丙）自卫团之组织，不要过于复杂，务取其简单容易行动。

（丁）自卫团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

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

（十）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关系

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不必用政党名义去做（工会名义可以用），如果已有国民党农民运动工作的地方，我们当与国民党合作，惟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关系，在组织上应是独立的，不可成为党的附属品。

（十一）农村中我们党的发展

（甲）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

（乙）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是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争斗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

（十二）工 作 方 法

我们的农民运动，工作时期还不很长，除广东外，差不多方才开始，虽然做了不少的错误，却学会了不少的经验，在以后工作方法上，特指出以下几个可注意之点。

（甲）一般的注意

一、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

二、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

可能行动的限度，才能引导农民去斗争，要会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才能使农民不陷于孤立而失败。

（乙）在未有工作的地方

一、应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或本乡同志城市中的本乡工人，假期回乡里的学生等，去发起组织，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

二、利用各种重要事件下乡宣传时（如“五卅”宣传、北伐宣传等），乘机组织农民协会或类似的组织。

三、设法办农村补习学校、农村俱乐部或组织游行讲演团、消费合作社……等，以深入农村发起组织。

四、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方法。

五、须注意从许多无组织农民暴动中，去使他从暴动中发生组织。

（丙）在已有工作的地方

一、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村或乡农民协会是农民组织的基础，村或乡农民代表大会要做到能定期开会，会前须有充分的准备，开会时须尽量引起农民发表意见，避免机械式的讲演式的宣传。

二、时时调查农民疾苦及与农民有关的各种方面的现象，能够不断的找出农民要求，而引导其有方法的行动与取得农民利益，才能维系农民对于组织之信仰与拥护。

三、对农民要求，当设法知道，设法提出，有时客观环境不能提出时，亦当详为解释，并慰勉他不要丧气，切忌简单的将其压下。

四、必须使党在农民中的发展，能成为一切农民运动发展的核心，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

五、不可贪图工作便利，倚靠政治势力，应处处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组织的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虽然这种组织在发展以后，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参加在内，或是有些地方他的指导权落在土豪劣绅手上，然而绝不能说他纯是土匪的组织。过去及现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运动，他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他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

（二）红枪会不仅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在红枪会最发达的河南、山东、直隶数省，农民运动与红枪会运动，尚不能十分划清楚，惟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

（三）红枪会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量必须与别的革命力量联合，且受别的革命力量之影响，始能减轻其失败成分与反动性质（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

（四）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这个组织方法和行动政纲，应该是极简单明了十分易懂的。

关于组织方法，第一步我们先宣传他们联合各地方红枪会，组织一秘密交通机关，为各方面互通声气接洽互助之所。这个通信处由我们红枪会同志负责来做，最初只是一通讯调查机关，渐渐的使他有力的造成一指导机关。

交通机关设立后，第二步便想方设法召集各地方红枪会、黑枪会等领袖，开一代表会议，形成一简单的组织，议定一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共同行动的政纲，不外下列几项：

一、抵抗土匪；

二、抵抗无纪律军队之骚扰；

三、抵抗苛捐杂税；

四、抵抗拉夫拉差；

五、拒绝行使军用票，或要求以政府所出纸币纳税；

六、保护地方秩序（即参加地方自治工作）；

七、监督地方财政公开；

八、反抗贪官污吏。

这些口号，必须换成当地民众所最易懂得的话句。

红枪会现时的行动，只能在上列口号范围以内，只是自卫的组织，可以要求参加地方自治，万不可纯以这部分势力企图拿住整个的地方政权。

（五）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他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

（六）在河南山东现时的特殊情形，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均是反对张宗昌和吴佩孚的。我们自然要使他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须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

（七）红枪会的指挥权，是常常容易落在土豪手中，变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又常常成为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群众，战斗力亦以他们为最强，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如不能把他们结合在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旗帜下时，须先取得其群众，第一步使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不受其虚声恐吓，能够壮胆的独立存在，第二步努力使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不为土豪所利用，反而站在农民方面去攻击土豪。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商人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国商人在民族运动中有三个倾向：最反动的是洋行买办银行钱业大的百货公司等洋货商，这是纯粹买办阶级，他们差不多已没有民族观念了。其次就是由大商买办进步到新兴的企业家，纱业、丝业、航业等，他们因为企业扩张，需要政治的扶助，有了点政治觉悟，也有了一点民族观念；然而他们未尽脱离买办阶级的意识，希望以改良手段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得到一点利益，尚不敢公然与民众接近。中小商人则多倾向革命，至少不反对革命；他们和帝国主义者无直接经济的关系，他们受军阀的苛税杂捐和大商排挤两重压迫，而时有破产的恐惧，他们又没有工厂，不怕工人罢工，因此他们能够和革命的工人学生群众接近，并且他们自身就是很广大的群众。

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分，城市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工人学生孤立，乡村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农民孤立。

我们商人运动之方法，乃是用商民协会等类形式，组织中小商人群众，以图改造现有的商会，而不是仅仅联络现有的商会。因为现有的商会这种机关，尤其是大都市的商会，不但为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大商买办所盘踞，不能代表中小商人，并且空洞没有群众。

我们商人运动之重要目的，是组织中小商人，尤其是宣传中小商人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妥协卖国行动，同时也要反对中小商人出资给保护大商买办阶级的商团保商队，中小商人应该提议组织一般市民的保卫团。

商民协会，应该是个纯粹中小商人的组织，不加入大商，同时在资本化的大都市，不宜加入下级店员，因为这些地方的下级店员应该归到商业职工的组织，他们和其他商人有特殊地位及利害冲突。

在政党的关系上，革命的中小商人，应该是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尽量集合这些群众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派的力量。如果该地国民党左派在商人群众中已有势力，则可经过国民党指导商人的组织及行动。商民协会中如果有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党团工作亦不可放弃，以图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学生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学生算是一种重要的成分，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可以看出。因为他们在客观上大部分是濒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在主观上学校生活中有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知识与机会。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不过学生要在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有力量，必须自身要有学生的联合战线，以集中学生群众的势力。

过去，我们在学生运动中，也曾注意到学生的联合战线政策，即统一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在上海，都收了相当的效果，在他处或未采用此项政策或表面上采用此政策，而无适当的方法应用此政策收得效果。

今后当依左列原则，决定适合各地实际情形之策略，以巩固并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

一、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努力宣传“学生运动统一”的口号，不分主义、党派、宗教的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

二、所谓学生的联合战线，所谓学生运动统一，决不是说要各派学生都联合统一在我们的主义、主张口号之下，而是由我们向学生群众提出各派学生之大多数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PDG

革命口号与主张，以统一学生运动。

三、所谓主张统一，乃是行动上的主张之统一，而不是思想上的主张之统一。因此在一切实际运动中，我们固然只能提出大多数学生能够接受的口号与主张，以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以统一学生运动；而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仍应尽可能的列举各种具体事实宣传我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之必要，在思想上影响学生群众，以取得我们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四、我们固然要与国民党左派学生亲密的合作，在一切对外的政治争斗和学生自身利益的争斗，都必须十分恳切的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的学生合作，以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使其群众左倾。

五、我们的力量应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学生联合会职员，我们只须联合左派占过半数已足，切不可取包办形式。

六、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丝毫不能让步；惟所谓不让步，乃指事实分析与理论辩驳而言，不可轻以反革命反动派等恶声相加，在私人关系上，尤不可失了友谊的态度，致惹起无党派的学生不快之感。

七、我们对教会学校的态度，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

八、我们在各校的同志，宜努力学校功课及注意学生生活（如学生俱乐部讲演会等），尽可能的不脱离本校学生群众，然后才能够建立我们在学生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
刊印。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年的奋斗中，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且渐能接近青年工人群众，吸收了一部分革命的青年工人。工作上颇能尽力领导学生工人及一般青年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这是扩大会认为满意的。

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领导青年作本身利益斗争和一般文化运动及在党指导下作政治斗争的青年革命组织。过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是没有尽到本身的使命，未能青年群众化，这是以后应当注意改正的。

自去年五卅运动后，中国工农和一般国民革命运动均有极大的发展，因阶级分化所发生的反动思想和组织，日渐扩大，甚影响于青年群众。这时团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获得更广大的青年工人农人和学生群众，领导他们在党的指挥下去参加目前的革命斗争。为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独要继续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多吸收革命的工人、农人、学生和其他被压迫的青年分子，使团的组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织深入下层青年群众，而且要力求工作青年化，因为没有关于青年切身的工作，团的组织是不会深入青年群众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应有的政治活动。

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革命作用仍将继续扩大，学生运动若能在我们指导下而发展，这对于党以后的农民组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必有很大的帮助，今后党应与团切实指导，但团切不可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指导转交于党而减少其积极活动的成分，反而影响于学生运动的发展。

党与团虽然经过一次年龄的分化，但仍有许多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另有许多新的地方宜于先发生团的组织。在这许多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帮助党发生党的组织，在党没有组织之前且须执行党的各种决议。同时在有党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应帮助团发生团的组织。

团既应注意组织与工作青年群众化，在这工作进行中，党应更加多量的指导与帮助，党在工人运动中，应注意青工、童工特殊经济利益的拥护。党对团的指导与帮助须注意保持团的独立精神，不可处处干涉团的行动，反而阻碍其工作的发展。各地须注意整顿下层党与团的组织关系，不宜任意调用团内负责同志，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同时团应注意从工作中培养积极活动分子，以充实下层指导力量。

总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的工作，应注意求其青年群众化；同时党应视团的工作即党指导下的一部分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指导与帮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军事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

乡间有许多贫苦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意义的武装暴动，如河南、山东红枪会之种种行动，就是一例。

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南北铁路工人都渐能于内战中，表现他们的作用。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

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和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

二、过去半年的工作，只形成了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关系，对于收集材料和工人自卫团的进行，获得相当成绩。除在进步的军队中做了相当的政治宣传工作外，对于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多半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未能与下级官佐和兵士群众发生关系，对于武装农民团体（如红枪会等）尚未开始有计划的工作。

三、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同时应用全力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并组织支部，务使反动军阀不能利用这些武器。对于农民武装团体，应首先注重训练他们的下级领袖，特别是政治训练；至于工人自卫团的进行，不在人数的扩充，而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工人自卫团的中坚分子。

四、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他们的行动须完全依照当地党部的指示。

五、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妇女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看了中央妇女部的报告，妇女运动在各地都有相当的成绩，妇女运动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同时又发现出许多缺点，如只有机关活动而少深入群众（广东、北京），不注意党的发展，出版物太单调太政治化等。因此今后我们的妇女运动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注意群众　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占据这些机关；遇到某种运动发生时便借这些机关的名义去发宣言传单打电报等，因此愈使群众怀疑而畏惧，而我们便愈离开了群众，我们便愈加孤立，这是我们很大的错误。今后我们的工作，固然不能不利用民校、妇女部、妇女协会……等机关去号召群众，但我们根本的责任是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

二、联合战线　现时在妇女群众中也因阶级分化的影响发生了派别，尤其是在广东。因此在妇女运动中对于各种派别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妇女间之联合战线问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对于这点未免太主观了，我们往往只顾自己行动，只提出自己的口号，而很少注意到各阶级妇女群众的利益和各派妇女团体的主张，结果我们成了很单调的孤立的活动，而丧失多数群众的同情，这也是过去的错误之一。因此我们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各阶级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要建立这条联合战线，我们便须注意：（一）多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二）遇各种运动时须相当的尊重其他妇女团体的主张；（三）避免包办的形式及各种不必要的冲突。

三、劳动妇女和女学生 应该怎样注意劳动妇女和女学生，我们在第四次大会及去年的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上曾经说过。可是各地至今还很少有成绩，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少注意（如北京、广东、湖北等），这是很坏的现象。我们须知劳动妇女运动固然是我们妇女运动中的骨干，同时女学生运动亦极重要，因为女学生在现时一方面是女工运动之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在一般妇女运动上，又是打破宗法社会的思想习惯之唯一动力。

四、农妇运动 农妇运动现时还只是开始，但当农民运动正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往前发展的时候，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此时虽不能有怎样具体的计划，但我们至少要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开始准备作农妇运动的人才，尤其是广东和湖南须特别注意。

五、妇女出版物的妇女群众化 最近在各地妇女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加多，这不能不说是种进步的现象。可是这些出版物内容，不是千篇一律，便是太政治化或太笼统的理论化，而很少能真正代表妇女本身说话，表现妇女的真正痛苦和实际要求。因此以后各地我们自己的及在我们指导之下的妇女刊物均

须力谋改良，切戒空洞的政论和其他空洞的理论，多描写妇女的切身痛苦和实际要求，务使每个妇女看到都感觉为她自己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对于一般麻木妇女宣传和鼓动的效果。

六、整理各地妇女部及妇女运动委员会　各地现时虽有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但多很不健全，故都不能指挥各种的妇女运动。我们今后要想加紧进行妇女运动的工作，整顿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是一个先决问题，各级党部须特别注意此点。

七、发展党员和养成妇女运动人才　自上次扩大会议后，女党员虽增了不少，但是比较起男党员的数量来，还是差得多。并且只限于上海湖南一二区域，其他如广东、湖北、北京等地女党员的数量简直发展非常之慢，这是很不对的，以后各地须特别注意女党员的发展。至于妇女运动的工作人才更是缺乏，以致各地妇女运动的工作都感觉进行困难。因此养成妇女运动的人才（尤其关于女工农妇运动的人才）也是目前各地党部最重要的责任。各地党部在可能范围可开办妇女运动训练班或妇女运动特别讨论会，召集负责及可造就之女同志与以经常的训练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

济难运动为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工具，此种运动直接可以联合各阶级各党派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暴行，间接可以引起大群民众参加或同情于革命运动，各级党部应重视此项工作，并切实执行以下数事：

一、各级党部应在各方面帮助济难会之组织，使各该所在地方成立正式分会，其分会已经成立应设法促进其发展。

二、督促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可能范围内担任济难会的各种工作。

三、凡在本党指挥下之团体，应引导之使加入济难会为团体会员，并使其分子完全加入济难会为个人会员。

四、各级党部须在委员会中（或党员中）指定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担任各该区域内之济难运动。

五、各支部须在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及各市区中指定相当同志（至少一人）为负责人，担任各该学校、机关、工厂或市区内济难会会务。

六、在各大城市及各大工业区域中须在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之下，设各种群众组织委员会以分担各种群众中之济难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会之组织（如工学农商妇女儿童等）。此项委员会，应使之与党的各种运动发生密切关系，其负责者遇必要时应当参加各该种运动负责同志之会议。

七、各级党部应会同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制定各该地方济难运动详细计划并经济预算，呈报中央核准。此项计划之制定及负责人之指派，须于今年八月间寄到，至迟不得过八月底。

八、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在政策上须完全受党的指挥。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对于各地担任济难运动工作同志的指导，应经过各地区委或地委，如果是没有党部的地方，则暂由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直接指挥（济难会全国总会对于各地方分会公开的指导，当然不经过党部）。

九、党部应定期召集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使之了解党的活动之全部，以为济难运动之参考。一切济难运动政策之规定，重大问题之解决，以及用人之指派，党部须交济难运动特派员或委员会拟议而决定之。

十、党员担任济难会工作时，均须用公开名义并受公开机关之委任，最好为大会当选之职员。

十一、同志应在各公开的济难会中，担任实际工作之职务，而不必取过高的位置。此项较高位置，应以非党员之左倾分子充任之。

十二、济难会各地公开机关之职员、同志及左倾分子须占大多数，但同志不得过三分之一。

十三、同志之在济难会工作者，应切实与非党员分子合作，不得包办一切，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将工作情形公开报告。

十四、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应将其活动情形，按月报告党

部转呈中央。

十五、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关于济难会之宣传，其态度应灰色，文字应通俗，更应注重地方问题。

十六、各地如有反动的压迫，应用济难会的名义，召集各界各团体作坚决的反抗，同时应将该项事件发生之真相连同照片报告济难会全国总会，以便作广大的宣传。

十七、济难会全国之总宣传机关（《光明》半月刊及《济难》画报），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应设法为之征集材料，济难会总会之临时的新闻、宣言、通电等应设法在当地报纸发表。

十八、各地之被难者，不论其党派阶级宗教之别，同志皆应详细调查报告济难会及其上级机关，请求适当的救济。

十九、各地工作同志，应绝对遵守公开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不得任意变更，以引起反对者之借口。

二十、各级党部应该视济难会为一种社会团体，不得视为党的附属机关，任意以命令支配之；更不得不顾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任意要求救济经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李　大　钊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策。第一，他与英帝国主义结成联合阵线，撮合张、吴[1]间的讨赤联盟；勾结国民党右派，组织工农党，使与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及第二国际发生关系，以破坏中国的以工农阶级作主力军的国民革命运动；勾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以图共同对抗中国的劳动运动并缓和中国的民族运动；勾结黄攻素、彭绍贤、林可彝一流的反动分子，与谢米诺夫等发起亚细亚民族同盟，欺骗亚东的弱小民族，一面对亚洲民族自雄，一面对白种民族示威，在骨子里头，更深深的布置了一个反俄的阴谋，破坏世界革命运动中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联合阵线。第二，他急愿离开英美的关系，要单独的和中国订立一种条约，至少在满蒙境内，实行取得那二十一条件里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以树立他那所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基础。

关于第一项方策的进行，我们所得的证据如下：

甲、当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等在京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七十九期。

谋占据北京执行部的时候，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氏曾设法与邹、林等接洽。

乙、最近东京方面传来秘密消息，日本政府曾训令其驻中国重要都市的外交官，设法与当地国民党右派勾结，进行破坏国民党的工作。

丙、日本驻北京的外交机关报告日政府，谓在北京仅得一资望地位较浅的右派分子。但如资以经济助力，使他能够赴上海活动，亦可收相当的效果。

丁、在得到此项消息的同时，在京的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即大书特书的登出赴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总代表巫启圣的相片。

戊、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发行的和文日刊《新支那》上，有下列一段的记载："国民党右倾派劳动先觉者马超俊氏，得孙传芳氏等的谅解，有在全国组织农民劳动党的计划，举出十二名起草委员，纲领起意书正在制作中，设本部于上海，派遣组织员于全国二十二省，设支部于各省，与日本农民劳动党谋提携，并在香港与第二国际及美利坚劳动会谋联络。"

己、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晨报》载，电通社上海电讯："国民党工人部长马超俊，刻在该党右派及留沪日侨后援之下，从事工农运动，以反抗共产派之劳动运动。"

庚、上海商人虞治卿等游日本的时候，日本朝野有组织两国实业家混合委员会的提议。东京《日日新闻》希望此委员会对于关税会议、中日互惠条约一类的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诉之两国舆论，进而各促动其政府，努力以求其实现。大阪《每日新闻》谓，去年夏间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时候，曾依上海总商会的斡旋，将以解决，足征上海的华商团体是有指导的力量，因之对于中日关系委员会的活动，抱有厚望。

辛、据日本在华的英字机关《华北正报》所载，所谓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现在长崎召集开会的事，实由于日本议员今崎氏两次来与黄攻素等磋商的结果。北京《晨报》预测此会议的结果，中国代表不为日人所利用，即失望而回。其实彭绍贤、林可彝等所抱的目的，即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苏俄，本已甘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互相利用，更何有于失望！

关于第二项方策的进行，我们所得的证据如下：

A. 二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闻》曾发表一篇社论，大意是说日本在满蒙方面的发展，在普兹茅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内，已经是到了尽头。日本若想在满蒙为进一步的发展，非重新和中国订立一种新条约不可，在这种新条约里，我们（日本）鉴于中国国民运动气势的昂盛，顾念日支亲善的大局，除大连、旅顺外，可以把日本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热心于收回法权的运动，自应发一大宏愿，下一大决心，使动乱不侵入于满洲。自然，张作霖一系的军阀，亦当专心致力于东三省境内的保境安民的工作，山海关以外的事不宜多所过问。这个报的主张，足以代表日本资产阶级的心理。真聪明啊！日本的资产阶级，他们为要给他们的资本主义谋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要给他们的正在进攻中国的帝国主义换一个新方式，所以要牺牲那于日本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换取一个目下于日本为莫大的权利而有极切的必要的土地所有权。表面上说，我许你以撤去领事裁判权，你许我以内地杂居，这是最公允最便宜的交易；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程度，已经到了那不需要领事裁判权而需要内地杂居以容纳大规模的殖民的阶段。随着内地杂居，自然需要日本人在中国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他们因为急切的要求此权利，故提出满洲土地商租问题，而谋一个更明确更坚固的解决。所谓商租，所谓会

办，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攘夺中国土地的变相的名辞。

B. 日本资产阶级那样一个聪明伶俐的方案，还不易为一般帝国主义者所赞许，乃有日人久间作了一篇《满蒙土地商租问题》的长文，在一个和文日刊叫作《京津日日新闻》报纸上于六月十日顷亘数日间连续的发表。他在那文的后段里说："关于这满蒙商租问题与支那的治外法权问题，如大阪《朝日新闻》于二月十八日揭载社论说，倡言顾念日支亲善的大局，除旅顺、大连外，宜将我租借地的全部返还于支那，以解决多年的悬案。由吾人看来，这未免过于极端了。溯及条约上的既得权，而较易的主张放弃租借地，这难称为慎重的大新闻的态度。我关东州及铁路附属地，与列国在支那的租界地异，而有历史的因缘。……欧战以后，此因为国际协调主义所倡导，而于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国民主义的实行，亦系极明了的事实。国际联盟的进行中，法国占领鲁尔，厥后义大利又占领菲麦及哥尔府，美国占领桑多曼哥，乃至英国之在埃及，不是各自都发挥伟大的国家主义吗？……"看这一段话，可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满蒙进攻的步骤，第一步是要取得土地所有权，第二步是大规模的移殖，第三步就是占领满蒙，同法国占领鲁尔、义大利占领菲麦一样。

C. 七月十五日北京《晨报》伦敦特讯，《满切斯达导报》北京通讯员云：中国近时所发生之排英举动，日本宣传员应负其责任……日人之宣传目的，即在掩饰其乘中国做乱，不欲实行华府会议决议之意。日本对于将来在华之经济，深怀恐惧之念，对直系首领重起主持大政，大抱惊骇之感，故不惜出此破坏关会之伎俩。……日本在关会之战略，一方欲坚持华会原案，同时并欲推行其政治家之建设政策。所谓建设政策者，即中日另行缔结条约，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而日本即以允许取

消治外法权为交换条件。这里所谓“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即指承认日本人在华得以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言。

D. 据奉天长春方面的通讯：最近日本人及朝鲜人移住满蒙者，纷至沓来。日本人则多携妻带子，赴北满一带屯垦。其朝鲜人的来满，关系因大批日本人来到朝鲜，强占土地，逼朝鲜人不得不弃井离乡，流散于中国境内。以日本人侵占朝鲜人的土地，而以朝鲜人挤入中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妙策。

E. 七月八日《民立晚报》载东京专电：日本政府现定加重关东司令官军队召集权。如在满常备兵不能维持在满侨民之生命财产及国防第一线时，该司令官可不待政府训令，召集在满预备兵，直接供其指挥，并在满设兵器弹药被服库，以利供应。现日本外务省正与各关系方面商酌，一俟商妥，即于八月一日实行。

综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凶猛。目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州儿玉长官会见，亦颇含有重大的意义。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

PDG

中央通告第一号*

——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目前政局的形势

帝国主义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在军事上宣传上所造成的反赤胜利局面现已开始动摇了，具体的事实如：

1. 英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日渐增加，关税会议的破产即可证明，同时影响于借款无着，财政没有办法。

2. 现时中央政府——杜[1]内阁亦因内部的冲突已陷于难维持地位。

3. 吴佩孚自田维勤部下发生反戈之事实后，已证明其完全不能向国民军作战（田部下反戈的军队已成为国民军的第一道防线，但田维勤军队与国民军直接对抗时部下尚不肯作战，何况现在对于反戈的田维勤军队。最近田维勤军队中又有新的反戈的事实发生，并闻田部下逼田反吴的消息）。

4. 直鲁联军及奉军因田军实际上没有作战及谎报军情的结果，在南口战争中遭了很大的损失，加之毕庶澄在青岛又有

* 本文标题下注有："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一切通告都重新编号，此为第一号。"

不稳消息，所以一方面痛恨吴佩孚，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军停止作战。

5. 山西战事国民军已得到相当胜利，晋阎已与国民军议和（由李烈钧在太原直接与阎锡山订互相不侵犯的条约，雁门关以北之十三县划归国民军，以南归晋阎）。

6. 刘镇华在陕西始终攻西安不下。

7. 河南樊钟秀势力渐次扩大。

8. 东三省灾荒及奉票之跌落，财政困难，无法救济，加以自郭松龄变后，实力大减，不易充实，已有对国民军妥协消息。

9. 孙传芳已通电吴张主和，此不啻请吴下野之表示。

10. 唐生智已占长沙，迫岳州；江西之方本仁旧部，川黔之袁祖铭部队，均输诚国民政府；北伐军大有长驱而下湘赣进窥武汉形势。

11. 反赤宣传在民众中已渐生出反感，甚至如守旧报纸及醒狮报等均明白攻击反赤军之暴行而不愿与为伍。

以上这些事实不仅表现英日张吴间的冲突没有妥协，而且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势力已渐次崩坏，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孙传芳已准备代吴佩孚为新直系之领袖，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张作霖，一方面虽欲乘吴之败而伸张自己势力，造成清一色的奉系内阁；一方面亦预见到难免有一个冯蒋[2]孙之三角联盟请其出关，不能不对于津浦、京奉沿线特别布防。北伐军之胜利，已唤起了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小军阀均有输诚革命政府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北伐的意义

北伐既成为现时全国革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究竟北伐在民族革命中占着什么位置，我们对于北伐应取什么态度呢?

在一六一期向报上我们已经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北伐之军事行动只是更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的局面，若果我们对北伐希望过高亦是错误。

现时一般民众对于北伐的确是存着许多幻想，存着许多等待倚望的心理，便是我们同志亦多有对北伐存过分的希望，把北伐看作革命的唯一出路者，这对于革命的前途是要发生不好影响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 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 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 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所以当具体指出现时广东政府出兵的性质，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

广东政府之出兵，第一步是为防御吴佩孚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右派、陈炯明及赵恒惕、叶开鑫等图谋覆灭广东政府；第

二步是因吴佩孚地位之动摇，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故北伐的出兵就是反吴战争，就是制止反赤运动的战争，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

三、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已在一六三期向报上出一专号，指出现时人民所受的痛苦，指出解放的出路，指出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并各阶级民众共同争斗的政纲。原文说："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

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决人民自己的痛苦。”

反吴战争中，本党应提出的政治口号，即是根据此次所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使之变成全国民众的政治主张，并在各地方具体的实现起来。总括起来说，就是引导民众做推倒军阀政治由民众管理政权的运动。在这运动中我们的工作是：

1. 我们一方面应努力宣传扩大反吴战争的范围，同时应积极的提出广东政府之北伐或反吴战争之扩大是拥护“国民会议”之实现，不应空洞的模糊的宣传北伐，令民众发生坐待北伐之幻想。

2. 指出人民不能仅仅希图由北伐之拥护而得到自身之解放，得到国民会议之成功；必须各阶级民众首先在各地方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且联合起来，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以简单明了的口号：“反对军阀专政，人民团体参政”，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

3. 我们对于现时反吴战争的北伐及反吴战争范围之扩大，不能梦想他马上便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完全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们知道，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但是我们现在便应当努力宣传

和组织群众，领导一般群众的政治行动，我们才能在此次北伐军事进展中只希望得到以下的结果：

A. 利用反吴及北伐的宣传，在各乡各县各省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在这个争斗中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如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国民会议等），并找到共同奋斗的政纲，使民众在民族革命争斗中更前进一步。

B. 如果武汉为北伐军占领后，我们可以先由各地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这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目前应即开始进行。

4. 在各地方当努力造成各阶级民众联合的组织。这种组织或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或用各团体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为共同行动的机关，有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一定是要能代表当地各种被压迫民众的要求的。这种各界联合团体，应当做成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渡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

总之，北伐军事的前途，我们尚不能预言，可以为蒋冯孙的联盟支配全国的政局，使吴佩孚下野，使张作霖出关，造成比较进步的局面；亦可以是奉系与新直系（孙传芳）妥协而抗住北伐军不能下武汉，国民军不能出南口。我们只有更努力促进各地方民众积极起来做民众管理政权的争斗，可以威胁新直系左倾，可以使革命的前途更有希望。

四、在各地方我们具体不同的工作

在现时反吴战争中，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自然是要求“国民会议”，要求民众管理政权，并且这个宣传已经不是如以前仅是空洞的鼓动，而是要各地民众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

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逐渐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议定共同行动的政纲，由一地方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民众的势力。民族革命的成功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奋斗的，我们要从现在的斗争，更深厚革命的势力。惟这个工作在各地方实行时，因客观情形的不同，其进行步骤自然不是一律，特具体指明如下：

1. 在广东，一方面应鼓动民众赞助北伐，同时应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与利益。揭出香港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地主、陈炯明、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等勾结捣乱的阴谋。广东政府只有在他能不牺牲工农的利益，可以保证北伐的胜利，可以巩固北伐的后防。广东区委现时应该利用已组织之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更引导他做地方政治，要求由工农商学代表大会而过渡到省民会议，虽不能说即由省民会议接收政权，然在第一步的宣传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同时自然要注意充实各界团体。

2. 在北伐军已经占领的地方，如湖南应迅速扩大民众运动，要求人民的自由权利。我们的党当发表一湖南人民的总要求，组织各界人民团体的联席会议或委员会，对于省政府提出政治要求及主张，事实上要做到代议机关，执行革命的工作，指导湖南各阶级民众依此去斗争；当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的运动，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

3. 在北伐军战事区域内，如湖北、江西，应引导当地民众做切实的地方政治争斗，应有地方政纲，号召各阶级联合的组织（省民会议、县民会议或各团体代表大会等），要求政权的民权主义化，很具体的反对一切苛税杂捐。这一运动的意义，一方面破坏当地的军阀政治，同时给北伐军做一种准备

（在准备中甚至可与反吴的小军阀接洽，分裂军阀统治，惟此是秘密工作）。

4. 在孙传芳统治下的地方，我们的宣传不仅逼孙与吴脱离关系，更当逼之向祸国殃民的奉张进攻，指斥他的和平运动是延长奉张在北方的统治，加重北方人民的痛苦。

5. 在北方各地，当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惟不可造成等待北伐军解放的宣传。北方的民众要得到解放仍须自己积极的起来，从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

张 万 和[3]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杜锡珪。
〔2〕指冯玉祥、蒋介石。
〔3〕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央通告第二号

——关于省港罢工的通告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省港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屠杀革命民众的罢工，是中国革命运动进程中有名的政治罢工，是“五卅”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全国中之坚持最久使帝国主义受绝大的打击的罢工。

省港罢工坚持有了一年之久，在积极方面，统一了广东，建设了广州国民政府，巩固了南方革命的根据地，扫除了广东内部的最反动的军阀力量；在消极方面，减轻了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至使香港政府受了很大很大的实际经济的损失。

省港罢工尽了许多任务，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早已到了结束的时期了。勇敢而进步的省港罢工工友们，也很明了到省港罢工是政治的罢工，政治的罢工与经济的罢工性质不同，故在去年十一月间，已能够接受我们的政策，愿意牺牲政治的条件和经济的一部分而取得胜利的解决罢工。但是，香港政府宁可忍受经济上绝大的损失——每天一百八十万，这是香港政府自己说的，其实还不止此数——而千方百计想恢复大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坠之威信；宁可帮助陈炯明和培植国民党右派孙科、伍朝枢等的政治势力，推翻左派的国民政府，造成大英帝

国主义所支配的反动政府，拿政治的武力的方式以破坏罢工，而不愿意和国民政府交涉，尤不屑与省港罢工代表直接谈判解决罢工。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广州国民政府是左派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府，尚知道省港罢工而为全民族而奋斗的，故一面极力帮助省港罢工，一面想与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决罢工。农工商学各界尤一致拥护罢工胜利，二月初间曾热烈的举行过一次援助罢工周，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无理，愿意私人凑足三百万补助罢工工人，解决罢工。香港政府因慑于民众拥护罢工之热烈不得不派人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凑资补助罢工工人。这是过去一年中解决罢工最有利的时期。

香港政府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始终想保持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始终想扶起陈炯明、邓本殷、林虎等小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取得广东政权以破坏罢工。在省港罢工刚开始发动时期，香港政府即嗾使杨希闵、刘震寰等与陈炯明结合，谋叛国民政府；继而收买国民党右派，收买凶手，刺死帮助罢工最力的廖仲恺；继而运动许崇智部下梁鸿楷、莫雄、张国贞等想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继而又以金钱枪械资助陈炯明、林虎等第二次占据东江。邓本殷、魏邦平等在南路起事，熊克武在北江响应，从东江北江南路合兵包围广州。幸而这种计划都失败了，广州政府的危机，都安然过去了，而省港罢工得以勉强维持。可是，以前各段的危机虽然过去，而三月二十的事变，又突然暴发。三月二十的事变是国民党中派、右派联合向左派与我们进攻的表现，结果左派政权转移到中派手里，且当事变中间，也曾派有武装军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工人行动。

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自然，广东全个政治局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武装中派专政，右派乘机向革命势力进攻，香港政府又得了一个破坏罢工的最好机会。香港政府此时撤退派遣往广州谈判解决罢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筹资补助罢工工人的行动，同时以一千万元贿赂及一万万元借款收买国民党右派，且帮助他们攘夺广东政权，依然复用从前破坏罢工的手段而更加厉害，更加猛进。这是从三月二十至五月十五中间的过程，这是省港罢工最危险的时期。

五月十五国民党全体委员会议，我们采用了必要的退让政策。固然，在采用这个退让政策中间，有许多的理由和原因，然维持省港罢工，使之得到有利的解决，是许多理由和原因中之最重大的理由和原因。我们退让的结果，中派和右派分离了，右派攘夺政权的空想打破了，香港政府的阴谋又不能实现了，这又到解决罢工有利的时期了。所以我们为罢工工人的利益设想，为使历史上有名的省港罢工不致被香港政府破坏，就是使省港罢工不致失败，香港政府得不到胜利。我们在这个时期，极力主张胜利的解决罢工，就是在不牺牲工人的经济利益之下，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的解决罢工。

罢工工人也明了有利的解决罢工的时期又到了。国民政府也相当容纳我们的提议了，于是撤换外交部长，追走胡汉民而以陈友仁继任，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样的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解决罢工，这已是我们一个让步。香港政府始终虽没有解决罢工的诚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务司，一是华民政务司，一是驻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

双方正式代表在七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了，香港政府代表想离开罢工问题而提出交涉排斥英货问题之解决。他们说：罢

工已成为过去的事件，目前只是解决排货问题。这足以证明香港政府确无解决罢工诚意的表现。他们何以离开罢工问题而专谈排货问题？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对于排货问题一定不敢接受的，他们又想利用国民政府现在出师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钱收买或商量借款，幸而当时右派已受了打击，否则就会成为事实了。在我们方面，一面坚持罢工并未成为过去事件，一面表示愿意接受谈判排货问题。香港政府狡赖不过，故得继续谈判，而双方意见相差太远，谈判破裂自是不可避免之事。

总结起来，香港政府一直到现在，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他始终想利用反动势力以破坏罢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这是省港罢工延迟至一年之久而尚不得有相当的解决的一个总原因。但是香港政府除了施用上面所用的手段和阴谋去破坏罢工之外，为什么尚没有更进一步采用更剧烈的武装力量直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要说明的。香港政府不采用这种手段，不是相信国民政府有抵抗香港政府的能力，也不是以香港的力量敌不过广东，尤不是国际间的道德和什么人道主义。就是因为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假使采用更剧烈的手段，虽然或者可以一时破坏省港罢工和压服广东的革命运动，而反会促起全国民众的共奋，将会引起全国排英的大运动。在狡猾阴诈的英国外交家，不会采用这种愚笨的政策。

省港罢工至今尚不得到有利的解决，由于香港政府无诚意，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国民政府始终不肯负责解决罢工，也是一个原因。省港罢工在广东建立许多伟大的功绩，就是国民政府差不多也是省港罢工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在理，国民政府如果真有诚意拥护省港罢工，和有决心为罢工工人设想，肯牺牲一点作有利的解决罢工，那不问香港政府有无诚意和能否接受要求条件，都应该以政府的力量，筹备款项补助罢

工工人和兴办各种企业以安插工人。这样办法不独使香港政府受了绝大的打击，而且在国民政府也可以日趋于稳固，这是国民政府应有的责任，可是国民政府始终没有这样的决心，而且简直没有这样的计划。

在现在南方的政局来观察，国民党内右派一时的慑伏，广东内部尚不致有十分动摇，而且北伐军的进行有相当的进展，长沙攻下，这都是解决罢工比较我方有利的条件。这个时机，再不可错过了。而且广东政局底下，尚有许多危机潜伏，中派动摇不定，本是可左可右的，又时常挟持省港罢工以迫我们让步；右派时常与香港政府勾结，借解决罢工以取得政权，当然更不用说的。就是一般民众对于省港罢工的援助已不像从前的热烈了。其中中小商人又因罢工期间太久，受了些损失，因而有怨望罢工的了，这都是香港政府破坏罢工的后备机会，时时可以利用的。现在的情形是：香港已经雇到了十分之七的工人补充罢工工人的缺，实际上他所怕的是封锁及排货。但是封锁对于中国商人也感困难而不满了，所以香港并不急于要解决，我们知道延长封锁——罢工——既不能使香港屈服，又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因此我们对外的口号应当是：一方面从速结束罢工安顿罢工工人，别方面加紧香港封锁，排斥英货，迫使即日解决沙基惨杀案问题。

我们现在要有决心和有很好的政策去结束罢工了，但我们的目的要工人得到有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

我们欲达到我们的目的，除督促粤区努力于联合各界一致拥护罢工并设法催促国民政府负责为有利的解决罢工外，我们各地党部应极力进行下项工作：

（一）联合各地工农商学各界一致举行排英大运动，并宣

布香港政府破坏省港罢工及延宕罢工解决的阴谋。

（二）通电鼓励省港罢工工人，并责备广州国民政府应该对于省港罢工为有利的解决——就是假使香港政府不愿意解决罢工，也应当由国民政府筹备巨款补助罢工工人并安置他。

以上两项具体的办法，在运动中间，尤当注意解决。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使此次省港罢工而失败，则大英帝国主义的气焰，更加高涨，对于各地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众将更受摧残和屠杀而益肆无忌惮了。

张　万　和〔1〕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

周　恩　来

国民革命军——我们要讲国民革命军，不得不回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讲到历史上的军队，要晓得从前社会的情形。一百年前，中国完全是农业社会，在这几千年农业社会里，不是封建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在封建时期，诸侯军队是抽收农家的壮丁（征兵制）；郡县制度下的军队，是招募无业游民（募兵制）。所以，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治乱，不在君主的贤愚，概以经济的变迁为转移。每一朝代更替，时局扰攘，多由于社会上的失业游民太多，所以兵匪也多。八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潮流的震荡，工业上、经济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社会上有经济不安的现象，因此发生了民族运动，如太平革命、义和团、同盟革命运动等。

近世中国军阀的起源，由于曾国藩、李鸿章，曾之湘军、李之淮军完全是湖南、安徽两省的人。他们俩以封建制度的地方军队满足他们士大夫的欲望。袁世凯、段祺瑞等以北洋军队的名目造成今日军阀割据之局面。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曾、李、袁、段等军阀是一个系统。

封建制度的军阀，是依附农业社会而生存的，所以军阀必

* 这是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

设法保持农业社会。但是，现今的社会受物质变动的影响，总不能永久保持其旧有的农业社会的状态。所以，社会上经济益觉不安，民族运动也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以来，民众益有很明显的彻底觉悟，革命潮流日益增加。

本来民众运动与军阀军队都是由经济不安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可是，近年民众已渐有觉悟，都趋于革命方面，所以发生了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都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下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都是由于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崩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济不安的民众，都集收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他们走入军阀军队中。

军事政治工作——讲到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

第一，军队中为什么要有政治工作。现在的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里崩溃来的，他们一方面走入北洋军队，一方面走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里最近政治工作的目的。我们担任政治教育的人员一定要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

第三，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军队中政治工作范围极广，本是包括全军队的，但是在最近政治工作上要有如下的目的：（1）党化。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

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2）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现在士兵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的里面崩溃出来的。(3）要使官长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革命都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不安的环境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当现在社会经济不安的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

第四，革命军人的本身。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

第五，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设计。冯玉祥的军队有宗教运动，因此，他的军队格外地团结、朴实、耐苦、廉洁、守纪律。这是宗教运动的效果。可是，他的目的是错误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也有政治工作，广大的宣传目的是对的，可是它方法不对，所以结果形成了拿破仑第一帝制。最近，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我们革命军里政治组织就是效法红军。

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就工作方面说，宣传队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训育士兵，得连长许可，可公开演讲；还不能公开演讲的时候，可觅士兵们作

私人谈话。民众宣传要利用本地同志协助，方生奇效。

我们宣传员不独要守总政治部规定的统一的口号、统一的标语、一致的宣传传单、一致的小册子，就是宣传员个人的言语，也要受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以上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发生及军事政治工作的一个解释。希望同志们研究研究，以作将来宣传的材料。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不过因为我党指导机关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

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

八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

——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各区、各地转农委：

自扩大会后中农委已有负责专人，担任指导各地农运，望各地尚未成立农委者亦须急速成立，以便进行当地农运工作。以后各地对于农运要特别注意。且在这样荒灾兵祸的客观条件下，农民生活已陷于绝境，农村中已起了极不安的现象了，而张吴[1]二军阀在北方又大肆搜刮和屠杀，使农民更深一层痛恶军阀，欲找寻新出路的心理益坚决，如河南、山东、陕西红枪会的暴动便是明证。我们在这当中，应尽量利用各个地方的事实，扩大宣传和组织，深入农民群众，领导农民有组织的加入国民革命战线，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在农民中充实起来，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工作，因此各区各地应加倍督促同志努力于农运工作。同时各区各地对于农运情形和进行概况要与中农委发生密切关系，使中农委明了各地工作发展的趋势，好予以指导和纠正。因现在除了广东外，各地农运都在开始时期，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其应付的策略，稍不审慎则容易走入错误，甚至发生绝大影响，阻碍全部工作进行。以前各

区除广东、湖南略有报告外，各地往往不做农运专门报告，都是随随便便在总报告中带一二句，纵专做报告亦不按期，或间几个月或半年，才如著书般的做一报告来，或笼笼统统说一大套空话，很少切切实实的报告。这种情形对于中农委的指导工作感觉非常不便，以致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于农运前途将要发生绝大危险。中农委曾再三通告，而各区仍不能按照报告，如此玩忽，影响于农运工作异常重大。今特严重通告，以后各区各地，每月至少应将农运工作情形专门报告于中农委一次，其临时发生之斗争亦应随时报告！万不得有误！

龙　沛　然〔2〕

八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吴佩孚。

〔2〕中共中央农民部（农委）的代号。

PDG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瞿　秋　白

一、北京屠杀[1]后，反动潮流随英、日、吴、张之战胜[2]而日益高涨：京津鲁、奉军的蹂躏；国民军之困守南口；吴佩孚的利用红枪会夺取河南，压榨湖北人民，进窥长沙（叶开鑫）；孙传芳之利用傅筱庵，稳定上海买办阶级之统治……；帝国主义的法权会议和关税会议停顿；指使颜惠庆内阁实行大卖国计划虽未成功（现时杜[3]阁内部冲突），然而假仁假义的让步政策已经用不着了。

二、但是，反动势力内部早已开始裂痕，英日之间争夺北京政权的滑稽剧开幕已久；奉系军阀之下张宗昌、杨宇霆之间的争执也很显露；直系军阀的崩溃尤其明显，孙传芳及所谓新直系的暗抗吴佩孚，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孙传芳的犹豫等待，仿佛是可注意的事。孙传芳想等吴佩孚（叶开鑫）与唐生智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可以渔翁得利；而且他深恐张宗昌的暗袭南京，所以现时不积极助吴攻粤；再则，赣方方本仁、唐福生等对于孙传芳也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根据反动势力内部的崩溃，来决定革命策略是决不够的。有些革命党人

---

*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在上海的一次谈话记录，后收入作者的自编论文集。

日夜希望田维勤、叶开鑫、唐福生的倒戈，显然是一种机会主义。如今叶开鑫的反动已完全明了，田维勤又有多大作用！现时对于孙传芳的政策亦是如此。革命党人决不可犹豫等待孙传芳的“左倾”，对于孙传芳应即施以崩败其内部的攻击。

三、“五卅”以后，中国的政治愈益不是纯粹军事阴谋的时期了。“五卅”上海屠杀至“三一八”北京屠杀后，反动势力虽能暂时结合而取胜，然其内部既已开始崩败，而民众间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也非常猛烈，为从来所未有。五卅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了，北京屠杀又压迫下来，民间的回答是：“从此誓不和平请愿，到黄埔去从军罢。”所以革命战争是“五卅”以来抵货、罢工、示威……之直接继续。五卅运动中买办阶级之统治动摇，他们“自卫”的方法，是先让几步，而这些让步（连吴佩孚之反奉亦包含在内）实际就是反动进攻的准备。只有一直进攻到扑灭全国革命势力，镇压湘粤，颠覆国民政府而后止——只有这才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之唯一出路。所以吴佩孚之反对关税会议，反奉战争，继又联奉讨伐国民军，进兵攻略湖南，以覆灭广州国民政府为目的，是一贯的反革命策略。革命方面，也只有反抗北京屠杀以来的反动潮流，号召革命战争，以反守为攻为目的，猛力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攻袭，为唯一的一贯的革命策略。因此，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

四、此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广东以外都还处于反对买办阶级的地位。然而，此等稚弱之中国资产阶级，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他们只顾已得的地方利益，只顾以妥协手段利用工农而限制买办的“王权”。他们的这种黄色的民族改良主义是革命营垒里的敌人。所以可以预料，现时足以牵

制孙传芳等军阀的“自治运动”，虽暂时有几分革命作用，不久便可以为反动派如研究系等所利用。他们不过暂时不反对革命战争罢了。

况且，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自从经过三月二十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戴季陶主义的威权正甚）。虽然广东新式右派之政权，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也不满意，然而中国稚弱的资产阶级，现在既然还留在革命营垒之中，始终需要军力来代表他。新右派暂时和帝国主义妥协之可能较少；他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杀后在全国范围内之革命联合战线之中，自然还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竟还保持着部分的领导权。于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联合战线反抗买办阶级统治的战争。

五、小资产阶级呢？“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显然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各地小商人反对买办士绅包办的商会法团之运动，层出不穷。可是，这种运动大半都还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尤其是北京屠杀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买办资产阶级还处于对抗的地位，妥协之可能还少。不过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他的阶级利益在这群众革命潮流伏流昂进的时机，不能容许他很稳固的做国民运动的领袖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现在渴望着革命的巨潮，来拯救他们于反动高压之下。他们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虽然他们大半是消极的等待，然而这种革命需要的深切，已经迫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不得不实行革命战争，否则，他所已得领导权，就会立刻丧失，或是简直完全投降买办阶级。总之，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遽，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六、农民在“五卅”以后的奋起：如广东农民与地主肉搏的阶级斗争，如湖北、湖南农民协会的发展，如直隶等处农民运动的发轫，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处红枪会、大刀会、硬肚会、协作社等运动的爆发，不必详说了。北京屠杀后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为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

七、无产阶级呢？自然更不用说了。他是五卅运动的先锋军，他开始了“五卅”的国民革命，他应当为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的解放；他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责任是：“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在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同时即应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中之于国民革命的组织，这样去和一切革命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妥协派的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八、北伐是北京屠杀后，革命之反守为攻的战争。一方面，革命平民利用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内部之自相冲突崩溃，而要推翻买办阶级的独裁制，并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而从事于广义的革命战争。别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却想以

北伐的大帽子，抑制平民政治势力之开展，同时却抱着发展自己的军力，以取得将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之资格为目的，而从事于狭义的革命战争，妄想由此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制。

所以革命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之参加、赞助革命战争，其倾向必然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平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于是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的呼声便发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应当建立各地人民团体的委员会（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以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至于反动政权之下的革命平民，他们从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夺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积极斗争中，努力赞助北伐的革命战争，不妥协的猛进，当然是无可疑义的。当然亦要指出人民争取政权的目的。

九、北京屠杀后，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第一个新阶段。革命战争之中，正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统治崩溃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以现今的形势及国际的一般关系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权之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责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的赞助并主动的参加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瞿秋白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

〔2〕指吴佩孚、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打败国民军，完全占据京津等地。

〔3〕指杜锡珪。

PDG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罢工工友诸君：

你们的奋斗，已经支持一年零两个月了。你们是为全民族的生存奋斗，为全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五卅”以来，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武力摧残而暂时归于消沉，惟有粤港罢工一直支持到现在，而获得很大的成绩。

粤港罢工系继上海罢工之后而发生，最能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并指示工人阶级是反帝国主义最有力量和最有组织的群众。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可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见加厚。这些成绩虽然是罢工工人受了很大的牺牲换来的，可是很值得的。

香港帝国主义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对头，而且是广东全省人民以至全中华民族的仇敌。香港本来是中国的土地，因为鸦片战争而割让于英，是历史上有名的贩卖鸦片的口岸。一直到现在，香港还是贩卖鸦片军火和人口的港口，土匪海盗的巢穴，反革命派的营寨。总之，危害中国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发源地，就是香港。香港人口共计六十万人，外人仅占二万，其余

都是中国同胞，其中除少数走狗、买办、土匪、海盗、反革命派以外，都是操工商业的善良人民。可是这五十几万同胞，在政治上受少数外人的统治，经济上供养这少数外人，简直受尽亡国奴的痛苦。罢工工人之抵制香港，即是为全国人民报仇雪耻。

香港既然是中国南部的经济枢纽和交通咽喉，帝国主义者又根据这优越地位，制造种种谣言，以图淆乱听闻。他们最厉害的谣言之一种，就是说工商业的种种损失，都是罢工的结果。这样挑拨中国人反对中国人。其实中国南部人民历年来生命财产的损失，都应由香港负责。这次因罢工而发生之工商业损失，亦由于香港之无诚意解决罢工。罢工工人只是忍受极大痛苦为全民族争得政治上和经济上许多权利。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奴隶中国人民，养我国民的独立精神，同时培植本国工业和国货在广东市场的发展。香港不肯从早解决罢工，足见香港政府丝毫不顾香港商人的损失，反而想因破坏罢工的结果，维持他鱼肉中国人民的地位。稍微有点良心的爱国人民，都应十二分的赞助罢工工人，反对香港帝国主义。罢工工人在此长期奋斗中，都是受了不少的牺牲。冬天没有衣服被褥御寒，夏天居住又不足免病，每日罢工工人只能自己有饭吃，妻子儿女都饱受饥饿之苦。一般反革命派民贼奸细之流，不是包人落港，就是包运米粮和仇货，以图破坏罢工，甚至少数国民党右派领袖，还想摧残罢工，拍卖广东，以图换得香港的贿赂。这种人不但是罢工工人的仇敌，且是全民族的败类。

本党是为工人阶级及全体贫苦民众利益奋斗的党，在粤港罢工中间，始终与罢工工人手握着手的一致奋斗，并始终以罢工工人的利益为前提。

亲爱的罢工工友！罢工已早到了解决的时期了。罢工工人

屡次表示愿意牺牲政治条件和一部分经济条件要求解决罢工，而香港置之不理，最近国民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谈判中，英代表又谓罢工已成过去，对于沙基案和粤港罢工都不肯让步，因使会议停顿。罢工工人和全国民众处此情势之下，一面应由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募集巨款救济罢工工人，本党亦自当本此目的为罢工工人奋斗到底。总之全国民众和罢工工人应注意的有二：一，须使罢工工人不至为全国民众而感受经济上极大痛苦；二，中英谈判须得相当的胜利。亲爱的罢工工友！为达到上项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固我们的团结，振发我们的精神才行！谨祝

粤港全体罢工工人万岁！

罢工工人的最后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李　大　钊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北方直接遭受兵祸最厉的省份，如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处的农民，以不堪兵匪的骚扰，乃自然的有武装自卫的组织——就是红枪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山东、河南、陕西尤为普遍。

在山东有红枪会、白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所用新式武器，如机关枪、迫击炮、来复枪等，故名，至如红沙、黄沙、五煞等名目，则带有阴阳、五行、沙语、符咒一类迷信的色彩，行动颇有类似义和团的地方。

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

红枪会名称的由来，乃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系长矛，在长矛上系以红缨，其起源实发于山东，而渐流衍于豫、陕。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其蔓

延的猛迅，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红枪会的运动，既这样普遍，其间自然的亦要发生分化，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因为土豪要想以农民为牺牲，以达其升官劫财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设法使红枪会匪化。这种匪化的红枪会，自然要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河南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全家十一口惨遭屠杀，即是这匪化的红枪会徒所为。可是概括的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河南通许县知事下乡劝告绅民勿勾结红会，绅民向知事质问道："要叫我们不信红会很容易，只要地方不见土匪，军队不扰乱，官府不派苛捐杂税，完粮纳税收用纸币，便可不奉红会。"这都是可以证明大多数的红枪会，是农民自卫结合。通许绅士答知事的话，更可反映出来红枪会是代表农民利益为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的事实。

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而且同样的红枪会分子当其在洛阳列入民众队伍的时候，则可以战胜国民二军，可以抗拒其他的军队，而一为刘镇华所改编，带入陕西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陕西红枪会所困败；反之陕西农民编入国民二军在河南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河南红枪会所困败，而那留在陕西组织农民自卫团的农民，则可以使刘镇华、麻振武一班军阀的军队屈服。这可以证明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

崩溃军阀的军队，尤可以证明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离开他的阶级，则将与军阀同趋于灭亡的运命。

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看那河南军队中助本省兵士不助国民军，和那山东兵士不愿在张宗昌军队中当兵而愿回到他的家乡，投入红枪会，反抗张宗昌，便可以证明兵士们与其本阶级——农民阶级尚未全然断绝关系。

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还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

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反洋人，（二）要真主，（三）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

红枪会反对洋人，便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

红枪会要求“真主”便是农民要求政治的安定的表现，他们以为政治上的扰乱与他们的生活上以莫大的痛苦，如果有“真主”那样一种东西出来把中国政治弄好，把那洋人和奸臣

们镇压下去，才有日子好过，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不能够认识民众政治的实现可以结束中国政治的纷乱，故只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真主”。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

至于迷信一端，亦是客观的事实自然的反映。自从现代的武器随着兵匪的扰乱入了农村，一般农民便不得不起来谋自卫。可是农民要想自卫，自然需要武器，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外是些竹竿、木棍、刀、枪、剑、戟，乃至锹、叉、锄、镰等，他们也感觉着这些还不够，于是那些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术士拳师，便来教他们打拳练气用工夫，好补刀、剑、棍、棒的不足。这些还不够，他们便把农村生活中所有的家当，如那学房牌位上的孔子，庙中偶像的关帝、观音，以及道士口中的太上老君，土地庙中的土地爷爷，《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赵云，《西游传》里的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等等都搬出来，以为这回该可以吓退他们的敌人了。一边是些符咒拳术，一边是些机关枪、大炮，自然是敌不过，自然在事实上与以很痛楚的教训。加以农村中有些农民曾经入过军阀的队伍，知道怎样的运用那些机关枪、大炮等利器，于是使他们有极猛的进步，毅然弃却那些妖魔鬼怪的迷信，采用现代的武器。他们有了机关枪、大炮，便用不着孙悟空、猪八戒了，便用不着画符念咒了，现代的武器入了他们的手中，五行八卦的迷信，便渐渐的失了效力。

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

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一个表征。

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山东的白戟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河南洛阳红枪会城内派与城外派的冲突，陕州一带白枪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沘源一带黄枪会与绿枪会的冲突，吴佩孚唆动河南红枪会与樊钟秀冲突，乃至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这一部分的红枪会杀戮陕西另一部分的红枪会，都是极鲜明的事例。这个事例是目下武装农民运动中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联络的关系，否则一有冲突，必有一方为官府或土豪所利用，以蹂躏另一方的农民结合。

军阀改编红枪会，是一个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因为把红枪会改编成他的军队，便可以使他们离开乡土，一面可以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调往他处去残杀他处的人民。本地土豪以及土匪首领，最喜为军阀牵线，把本地的红枪会出卖给军阀，农民变成了猪仔，土豪作了大官。结果武装农民每以离开自己的阶级而终于自蹈灭亡。这一类的土豪，是出卖农民的贩子，是农民运动的仇敌。河南红枪会多被改编，便是吃了这一班人的亏，洛阳的刘镇华、张治公便是这一班人的代表者。应该使农民们深切的了解红枪会改编军队的害处。吴佩孚、刘镇华等诱骗农民牺牲农民的种种

事实，应该可以使他们知所醒悟了。要知道乡村是他们的营垒，他们应该守着自己的营垒而固着于乡村，严防为兵匪一类离开乡土的运动所浮动，须知军阀们土豪们骗他们去当兵或是当匪，便是骗他们出自己的营垒去送死。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对于上述的危险更多，故宜多加提防。因为有枪有人更易为军阀土豪所居为奇货，我们的口号，是武装农民自卫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流氓、土匪所驱使而离开农村化为兵匪的。

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蓬蓬勃勃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覆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真正的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刊印。

中央通告第十二号

——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今日（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各报皆载有孙传芳致蒋介石书，兹剪上一份以作参考。其主要意旨是劝蒋排除俄国人与过激派，“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又谓：“如易帜而来，必尽东道之谊，否则将以讨赤御外相周旋。”

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

1. 联俄联共政策是先总理生前决定，国民党大会通过，并非蒋介石所创。反对此政策即是反对先总理，反对国民党。

2. 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军阀政治，必须结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内革命的党派才能增厚革命的势力，所以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对的，是革命的政策，且并不因此而失却国民党之独立，正足以表现国民党之革命；孙而反对此政策，则孙亦在被革命之列。

在我校的机关报上宣传，则当用很犀利尖刻的文字来反对右派及孙传芳，借此给右派一很大打击。要点是：

1. 右派平日高唱反共、反俄、反对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

现在孙传芳可与他们作同志（据我们所得消息，右派确与孙勾结，孙之此信亦为右派分子手笔）。

2. 孙传芳劝蒋勿用外人，但广东政府所用之外人，决不会效法上海外人之指挥孙者指挥蒋，决不会叫蒋效孙奉外人之命而杀刘华。

3. 孙谓如去外人除过激派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可保证一切问题均可得中正适当解决。我们当抬出孙之丑史，劝孙勿说此大话，当新直系运动失败时，孙对吴[1]恐慌万分，几十列车的军械运送保定，百万巨款效纳军前，放还盐税收入，派兵出发江西，战战兢兢，惟恐吴之议其罪，今乃高视大言，谓自己能力可以解决一切，实太不自量。

李　承　宣[2]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

〔2〕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共中央给重庆的信

——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三号来书收到。川中现实局面非常复杂，前者玉兄[1]过沪时曾细谈及。彼时所得结论：

1. 川中虽有种种派别，如速成系、保定系（以学派分）、大邑系（以地域分）、骨肉系（如刘湘与刘文辉之叔侄关系）等，但此种派别均为一时势利之结合，可以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

2. 每个将领均企图扩张个人势力，部下同样效尤，故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

3. 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失坠之时，一定有大群的投机军人跑向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也打着革命的旗号。

4. 虽然他们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的，然只要他们这样做，是可以分裂军阀的势力，可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我们自然不当拒绝而当接受。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

5. 因此，我们不能对这般人希望过高，不能过于相信他们，我们只在借此机会：

A. 可以扩大民众的运动（因为他表面总要允许相当的一

点自由权利），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B. 可以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可以有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的机会。

6. 倘若我们把这般人看得太高明了，过于责望他，过于信赖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

A. 过于责望他只有使他远离我们，感觉我们不能合作，便跑向右派反动方面去。

B. 过于信赖他则不免为其所卖而失望，且白丧失我们许多工作能力不能用在自己的基础工作上。

从你们这次来信中说刘湘之忽然宣传北伐军的胜利，派代表向民党输诚，取消玉等的通缉令；刘文辉之拟请玉长成大，翻印三民主义等书散发军中，向民校要人作政治工作；黄隐之在合州试办黄埔式的军校，暗派人赴粤；赖[2]部袁旅之特别倾向民校；杨森对于向时俊过于接近我们之不满；何光烈态度之突然变坏。这些消息，仿佛是很可诧异的。何以反动的刘湘、刘文辉全倾向国民党？何以我们已有接洽认为比较左倾有望的何光烈、杨森竟又改变态度？其实这并无什么可异，这正表现这般人的投机性。成都同学对于刘文辉工作之失败，就是把他看得太高明，责望过高，反转一无所得。你们对于何光烈之失望，也是因过去过于信赖他真革命，自然惊异他今日之特别反动。我们能认清这般人的投机性质，自然能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方针进行，不会随着他们态度之转变而受影响。总之：

1. 我们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政治。

2. 我们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

3. 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

因此，对于反动的刘湘，他来接洽亦可以不拒绝；对于口

上言论非常革命的何光烈、杨森也不要过于信赖。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吴玉章。
〔2〕指赖心辉。

PDG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一九二六年八月）

瞿　秋　白

凡是一种政治势力必定有他的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原则。军阀是现在中国的一种政治势力；为使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能够得到成功，不致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我们必需要看清楚了军阀的经济地位。在各个繁盛口岸可以看到很多的买办、洋商，他们为外国商人作介绍者。这就是说：大商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媒介物。帝国主义要握有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杀权，因此造成买办阶级也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势力。买办阶级当然也有他们的经济地位，就是帝国主义者透过这一个阶级在中国据有的经济地位；为使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能够得到成功，不致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我们也就要看清楚买办阶级的政治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现在是非常幼稚，大资本家可说没有，工业资本是很单薄，生产的物品在中国尚不够销售。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如此的，生产的物品是很丰富，在本国是销纳不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必定发生两个相反的阶级，一个占人数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及农民，他们是没有

---

* 这是瞿秋白在广州的演讲，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四期，后收入作者的自编论文集。

力量充分的购买生产品。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将他的货物销售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产业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安南、朝鲜、台湾……等，他们的侵略中国也便是为了这个目的。

外国的资产阶级要将货物输入中国，由外国人的手里卖到中国人的手里，他们必需要有买办阶级做他们的中间人。他们不找到中国人做他们的买办，将无从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销售货物，什么地方不能销售货物，什么地方要这种货物，什么地方要的是哪一种货物。他们不但要销售货物，并且要吸收原料。要能知道哪一种原料产在哪一个地方，也必需要有买办。资本帝国主义便透过这买办阶级统治了中国的经济事业：工、商、银行业等；买办阶级是直接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便是间接的统治者。

在上海、汉口、北京、天津等大都市中，买办阶级的权力非常之大，大银行、大公司……都在他们手上。上海的银行公会可以操纵全国的金融，他们的举动足以影响全国银价的高低，金融上的一切事宜，出入、折扣等等都由他们规定。买办阶级的地位实足以统治一切。

这些买办阶级都是由地主蜕化出来的。

每一个人在国内各处地方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人物——绅士，他有很大的威权，在一个地方内的一切事情都得依照他的话办理。在各地城市或乡村中常有著名的某大先生、某二先生、某大老爷、某二老爷等先生老爷之流，他们讲的话总是比较有力量、有效验；平民或乡人、农民等小百姓讲的话是不会发生效力的，这是因为绅士们握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权。（例如，沈玄庐先生在他家乡浙江萧山县，农民等大家称他做“三老爷”；我的家乡江苏武进县以前有个所谓“恽八老爷”，大家都

称他做“恽老八”，武进地方的一切事务，这恽老八总可以包揽一半，知县都常常要请示于他。）我们这里所讲的绅士就是地主；在乡村或城市中固然也有没有土地的绅士，但是没有一个地主不是绅士的，就是没有土地的绅士，也必定是代表地主的利益的“乡村政客”。绅士们为要保存他们的势力，他们反对减租，保护旧文化。

绅士（地主）们与买办阶级在表面上是很少关系的，其实不然。

中国对外贸易繁盛的发展，地主由贩卖原料或经营农村商业，慢慢的与城市商人发生关系，或变为商人，与洋商发生联系，最后地主便成为买办阶级的经纪人，或是自己成为买办（丝、茶、米等是最明显的例）。这一个关系，帝国主义扩大市场和搜寻原料，造成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密切的联系。地主和买办在这样的关联之中，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两只手。

帝国主义者为要收买原料（这种原料因为中国自己的工业不发达，没有人能够使用，如其中国的工业发达，原料在本国有人吸收，那末现在这些买办未必会发生），帝国主义者便不得不雇佣买办，设立洋行公司于通都大邑，分行或办事处于中小口岸。买办他又必定要自己或使小商人到原料的出产地乡村中去搜罗，与原料的所有者地主接洽。地主们见到这种赚钱的交易，他们自然要集中更多量的农产品，以待善价而沽。地主们为集中农产品起见，遂想种种方法增加租率，无限制的从农民的手中掠夺他们的血汗。因此种种的关联，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实是农民。农民生活的苦痛实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所赐，帝国主义者的两位帮手——买办和地主的剥削掠夺所赐。

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

在各地县治或是农村，地主大半是兼为官僚，绅董或乡董要大地主才有资格做，县长面前也只有大地主才有讲话的机会。中国许多官僚，他们做过一任什么官之后，便刮了一层地皮去，回到家乡购置田产，这里证明了地主本来便是官僚。中国旧时的统治阶级就是他们——地主。

中国的农民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农民到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时候，只有二个办法：一是借贷，因此受绅士地主的重利盘剥，往往会因债务的日积月累，结果成为债主的奴隶；二是典当，凡是押铺及当店也都是地主绅士等开的，同样是被地主剥削。在乡村及城市中，讲起某人如何富有（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绅士），终是描写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几家钱庄，几家当铺，几家漕坊（酱园、酒坊等），几家米店，这些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地主绅士们有了这些权利，便在各处握住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中国以前，地主绅士从农民那里剥削得来的钱财，除了供给自己享乐，间或做一些“慈善事业”之外，多余的金钱只能藏在地窖里，吃不了卖不完的米谷屯积在仓库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地主们剥削掠夺得来的财富，除供给自己享乐外，并可以拿出来经营商业，以前屯积贮藏起的东西都可以卖给帝国主义者，不论是米、葛、麻、丝、茶叶……帝国主义者是没有一样不要的。譬如在苏常、无锡一带的茧行，从前一共只有二百余家，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千余家了。地主绅士等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利益，农民却因此更加痛苦，因为地主想从帝国主

义者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中国的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如果中国的农民永远受着这样重的压迫，中国的工业一定不会发展，因为大多数的农民非常的穷苦，没有钱购买货物，工业品无从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社会进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会的崩溃，跟着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现象如何？一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却又日益破产，农民都失业破产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来，又没有这许多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这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问题。

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他必定勾结地主、大商人来尽量的销售货物，并且经营工业。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几个资本家，可说是有了一些工业，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等处的纱厂等等，以及南洋、旧金山的侨商，可以说是中国工业或是中国的资本家，但是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幼稚的工业遂处处受着限制、剥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贵，这样，如何能与帝国主义者进步的大机器生产，成品低廉又占着协定税则的便宜的货物竞争呢？如何能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呢？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坏，建立了“帝国主义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无从建立。所以中国社会进化过程：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建立，稍稍有一点工业的时期，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是工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

中国的革命势力——小商人、工人、农民，要推翻地主、

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必需要明白这一个经济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我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说要能够知道更具体的打倒他们的办法，要晓得他们如何能在中国生存。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是不能使他们受打击的。所以国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不仅只打倒袁世凯，打倒吴佩孚等几个人，要看清楚了现在军阀在中国所以有政治势力的根源，然后才能给他们重大的打击。

中国的军队与外国的军队同样是武装的组织，可是他们的作用不尽相同。外国的军事领袖无论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会成为中国式的“军阀”。中国的军事领袖却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权，成为特权阶级——军阀了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必定要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军事领袖是如此，他们代表什么阶级。

在中国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在事实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独立的，因为经济上没有更广大关系的需要，如像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经济关系。因此也用不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庞大的军备，和统一的指挥。所以历代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皇帝，实质上是并不统一。在太平天国以前，各省的军队不满六千人，只有北京的御林军的人数才有一万以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如此的经济力量，不能养活许多兵，并且是无须乎这样。到现在不同了，因为农业的破产，很多困苦的农民，客观上的革命势力，成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于是必需要有武力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强盛的军队由此就渐渐的发生了。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政府，因为中

国的大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压制不能强大起来，还不能掌握政权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于军人，于是政权便落于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制度却又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堕落了他的声威，破坏了他的道德，没有什么君臣之礼了，独一无二的军人遂能操纵一切成为军阀。因为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他实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护地主买办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往往听见军阀士绅也常常乱叫“维持安宁秩序”，这所谓安宁便是帝国主义买办地主的安宁。

在“五卅”之后，国民军倾向于一般民众（小商人，工农阶级）的一方面来，帝国主义者固然是惊骇相告，要张、吴[1]攻打国民军，买办、地主也是同样的明里暗里帮助张、吴打国民军，说是因为国民军赤化了的缘故。实际上他们是向民众进攻，向大多数的农民进攻，保护他们自己（地主阶级，及脱胎于地主的买办阶级）的利益。讨赤战争时期的北方农民的苦痛：无限耕地的荒芜，千百万难民流离的那种现象，是很明显的例证，证明了这种战争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武力向农民的进攻。这种灾难，地主们是受不到什么损害的，他们可以跑到天津或别地的租界里去，很逍遥自在的过他们的生活；大商人、买办阶级是更积极的帮助张、吴，如北京总商会帮助张宗昌发行军用票。在平时，军阀也是在各处与当地商会领袖、买办阶级，或是教育会领袖、绅士等勾结的。军阀要商会捐款等，并没有要商会的领袖们自己腰包里的钱，都是摊派给各小商人的。大商人与地主虽然不自己掌握着政权，但是军阀掌握着，照样是保护他们的，虽然也有时对他们有些微的威迫，这不过是如同大家庭中的仵仆一样无关紧要的，因为仵仆无论如何的不好，他终是要依靠着主人才能生存，他们——地主与买

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

我们还有例可以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许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还乡后，他们时常在他们家中私刑拷打农民，没有人能够干涉，在广东或者不同，是用民团来压迫农民。许多小县份中，绅士、商会会长等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民治主义的国家是无论什么人都没有随便逮捕他人的权力，可是中国各处绅士、商会会长的一张名片便可以捉人，农民更是随时随地可由他们逮捕、拷打、囚禁。现在没有什么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绅士都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买办也同样是帮助地主压迫农民的。在长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来农民可以用很少的代价向官署领到这些土地，现在都被大地主仗着他的威权，以他的金钱侵占了这几千万亩的沙田。这件事证明了政权被地主们掌握着；另一方面表现将渐渐进入大农业生产，慢慢的展开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就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准备夺取资本主义时候的政权。最明显的例就是南通的张謇，他开办工厂，工厂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内的市场也完全是他包办；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设施都得受他的节制，就是游艺都要干涉。他是地主、大资本家、官僚，他是中国统治阶级本身形态的写真。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是地主，完全没有脱离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聂云台等，他们都是兼为大地主的。在各县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性质，掌握政权的便是地主。在事实上地主阶级是军阀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经济上可以见到帝国主义及军阀在中国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这些反动阶级做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命脉，我们的结论因此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打倒地主与买办阶级。打倒陈炯明之后的广东农民仍旧感觉许多苦痛，

就是因为没有很决断地割断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命脉，严厉地压制地主与买办。现在广东农村中许多问题，也便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乃至完成中国的革命，必需要是很决断、很彻底、不稍姑息地解决这一个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生存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之后，即刻建立一个人民的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必要给农民以参加政权的自由。

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迟缓，在历史的过程中因为人口增加而发生问题，每一个时期都是如此，而有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

每次的农民革命成功之后，政权都落到别人手里，农民自己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是因为有下列的缺点：

（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

（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

（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

现在的农民就不尽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无产阶级

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与工人联合奋斗，农民得到这支生力军的辅助，形势当然不同，不像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农民也已经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必需要有团结与组织，并且知道要得胜利必定要与工人联合。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工人、农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这一个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战线，是一方面为工、农、小商人，一方面为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在这样形势的战阵中，革命的队伍里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阶级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与工人、农民大不相同。工农及小商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于：群众的团结，一切自由、一切权利的获得，在政府里有各界的代表，他们这些目的是很正确，如能依照这目标去做，国民革命才有真正的胜利可以得到。资产阶级不然，他们恐怕工农的力量大了，他们将因此受害，不能尽其所欲地来剥削工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终有些疑惧。买办与大商人更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可以表示些倾向改良政策的论调；到反动时机到来时，他立刻会压迫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也能在势所必然的强迫之下发出罢市的命令，也能够提出十三条要求，虽然是修改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团体（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到了末后反动局面开始后，上海总商会即刻改变其态度，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以至于秘密枪决刘华。可是从这买办阶级里，在经济上可以稍稍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

在政治上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

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并不怕资本主义的强大，资产阶级却在怕工人势力的增高，这是必然的；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工人也参加，但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同时，这所谓“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国民革命真正胜利之后，他必须加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盟，即与苏联联合反抗世界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世界社会革命的时期，是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从事于中国革命的，不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都应为着创立民权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着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种种方法——减租、免税、改良种子、兴办水利等等达到这个目的，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其收获之百分之八十。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农民然后能安居乐业，实业才能发展，工业品才能在农村中找到销路。减少农民的剥削就是减少地主的收入。这一层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是很难了解的。他们所以至多只能结合少数富农，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在事实上，谁能代表工农利益，谁能给工、农、小商人以政权，那末，谁就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必需要压迫地主使其减租，打倒地主势力，才能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

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

最具体的办法是：

（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

PDG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毛 泽 东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

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

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

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第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

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

各级同学们：

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现在被北伐革命军困在武汉，已陷于快要覆灭的境遇。吴佩孚之失败，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统治权的失败。不仅最近的将来的北京政府完全落在日人指挥的奉张之下英国无法参与，就是英国根深蒂固的长江势力也要受着打击，所以他要用尽方法来援助吴佩孚。

1. 包围苏孙[1]出兵援吴，每天路透社电总是伪造战报，淆乱社会观听。

2. 香港政府援助陈炯明及右派反动派密谋在粤捣乱。

3. 派遣多数舰队驶赴汉口，希图防害北伐军的进攻。

据九月三日《大陆报》载，驻汉的英舰竟向北伐军射击。又据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各地同学应速起来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革命军”的口号，发表宣言，极力在民众中造起

反英运动，以遏阻英帝国主义之阴谋。

李　承　宣[2]

九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孙传芳。
〔2〕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直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

各级同学们：

第十五号通告已指出吴佩孚之失败影响于英国在华政治势力之低落，经济利益之危险，英国必用尽方法以求挽回此失败的局面，现时正假口反赤关系极力运动列强对华取共同干涉行动。然日、美正利用英之失败彼等得乘机分取英之利益，故英之运动一时显难得到完满结果。情急势绌，遂显出其最后凶残面目，除尽量帮助孙传芳及一切反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外，并直接动作以谋颠覆国民政府。具体的事实：

1. 九月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是直接明目张胆的庇护吴军向北伐军进攻。

2. 九月五日香港政府突派英舰两艘，驶泊广州省港轮船码头，水兵登岸驱除罢工纠察队，并捕去七人，阻止华人出入码头，干涉江面小船往来，粤政府抗议无效。此种举动显然是意在牵制北伐军之后方，希图以武力倾覆国民政府。

3. 八月二十九日英舰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不受检查，欲

以武力出口。杨森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因将后到之英舰万县、万通二号扣留，要求赔偿。乃英领事竟调炮舰四艘，载兵赴万县硬索二舰，用大炮向万县城轰击，城中房屋大半为大炮所毁，死伤人民不可胜计。

今日报载英国巡洋舰开里斯福号、开斯托号、韦特芳资号，不日又将载兵来华，并许海军官长以便宜行事之权，其向我中国民众进攻的事实已昭然若揭。

各地同学于接到这个通告后，应更加紧和扩大反英的宣传，并提出排斥英货的口号，造成全国反英的空气。此项排货行为在沪、汉等地因有种种的顾虑，虽不能有力的执行，然不可无广大的宣传；在内地则冲突不甚直接，英之干涉力较难达到，可以大做。务望迅速执行为要！

李　承　宣〔1〕

九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

各级同学们：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下，因为中派政权犹豫不定，所以工农商学各界之中左派空气日益高涨，而在全北伐范围内蒋亦渐渐不能做政治中心。恢复左派在党及政府之指导权实有历史的必要。所以十月一日国民党所召集之中央扩大会议[1]，如在全国革命势力发展之情势中，其结果国民党左派必然要迎汪[2]。我们的政策是赞助左派在广东在全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所以应当实行下列的具体办法：

1. 各省市党部务必使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十月一日的会议，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

2. 我们同志在民党中，应向左派宣传“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便是必须汪蒋合作，使汪能主持国民党，若反汪并同时反对坚定的左派政策，不但是使北伐消失革命意义，而且可危及广东的根据地。

3. 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

4. 此次大会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为左派行动的标准，逼中派承认此政纲施政。至于汪可以由此次大会拥护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的内外形势稳定与否，蒋介石能不因此离开北伐战线或反动否来定夺。若有以上危险是不宜急进的，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

5. 扩大会开会时所在地之工农商学团体，可以做示威请愿运动，其他各地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发电去函表示对K. M. T. 大会的要求和希望，以群众力量使大会左倾。

6. 左派国民党部应当宣传革命军的胜利，在于坚决实行中山北伐之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自然在北伐军克服地方，应使人民团体所组织之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等参加政治，然后全国人民才能认北伐的胜利是真正的民权的胜利。

总之，各地民党左派党部，应努力与民众接近，宣传中山北上宣言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政纲。如此扩大左派的政治势力，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十月一日的会议上左派的势力才有政治的社会的基础。

李　承　宣[3]

九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召开，实际开会时间是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2〕指汪精卫。

〔3〕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1]的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虽如此，但就目前国民政府内外的形势说，是不是容许这个运动之实现而不发生危险呢？蒋介石是不是能不反对这个运动呢？我们对付这个问题究应采取什么态度？实为当前应决的问题。本月十六日中局与远东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有以下的结论：

一、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劣绅土豪民团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反动工贼，袒护反动右派学生，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一切民众的自由，因此使得广东的民众已不相信国民政府是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甚至敌视国民政府。他们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我们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为切身利害所迫终是拉不住的；我们违反群众利益的这样做，不仅在群众中失去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四期。

信仰，甚至为群众暴动所牺牲。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愈发展民众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为救广东，使我们不能不决定对于中派政权的态度，不能不决定因群众对于现状不满而提起的迎汪反蒋口号的态度。这个决定是不能游移的。

二、我们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在选择这三个办法中我们有二事须注意的，即：(1) 对于把 K. M. T. 看成只能有一纯粹左派政权的观念，应根本打消。所谓恢复左派的指导权，并不是纯用左派的人，是有左派的政纲，指导权在左派手中，可以容许中派甚至右派参加工作。(2) 所谓左派，不是单看人的回题，是要有一对工农政策实施的左派政纲。

三、这三个办法，第一办法太危险。因为：(1) 是在现时北伐的内外形势中，一旦去蒋将使国民政府发生极坏影响；(2) 是军事上继蒋而起之李济深、唐生智亦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蒋去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因为蒋在前方不能自理后方事，若不去掉张静江、叶楚伧等一般中派分子，则虽有左派政策亦不能行，因为所谓左派政纲，就是打击这般人的行动的。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汪蒋合作）。不过蒋现时是绝对反对汪出不肯与汪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汪出来后将为一般小军阀所拥戴以打他，分散了革命势力。实际上是与汪争首领问题。然而除这三个办法之外，我们又再找不出其他办法。

四、我们现时仍是希望实现第二办法。我们可以向蒋表示，汪出并不是要倒蒋，并提出保证条件：（一）决不报仇；（二）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但若蒋始终坚持不允，我们坚持要做，可以生出以下的影响：（一）逼起蒋纯走到反动方面去。在目前帝国主义者军阀右派群以反俄反共耸动蒋介石时，也许他会糊涂的受他们的影响，作出更蠢的事以打击左派；（二）或者是蒋离开了北伐战线。现时汪蒋分裂未免太早，所以我们须找一退步，便是采第三办法，由蒋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领袖。若采第三办法，我们对于现时民众拥汪的空气，汪蒋合作口号的宣传仍当不废，才足以胁蒋左倾，并须极力在民众中宣传左派政纲，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万一蒋不能执行左派政纲，逼起我们为救广东而不能不倒蒋时，因先有了左派政纲的宣传，去蒋亦较容易。

五、左派群众以至李济深等，对于十月一日 K. M. T. 将召集的扩大会议，拥汪出来呼声极高。我们当宣传汪蒋合作，至于此次大会就把汪拥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内外的情势如何定夺。如国民政府形势尚在动摇，则汪出来引起的纠纷愈增加动摇分量，便不宜即出，必须局面较稳定后方可出来。我们并预备下第二办法走不通时的退步，采第三办法，此次扩大会议主要是希望通过一个左派的政纲为国民政府以后施政的标准，我们现时应预备这个政纲并宣传这个政纲（此政纲特委已拟就）。

六、根据以上的结论，中局决定训令粤区注意以下工作：

1. 在十月一日的扩大会前，对于迎汪复职问题，当一面切实进行宣传汪蒋合作；一面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

2. 对于此次扩大会议，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

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

3. 这个左派政纲在扩大会前应立刻向民众宣传。一方是对中派示威，一方是暂时安慰民众，给民众一点希望。在扩大会开会时，粤省工会、农会、商人、学生均可以做请愿示威等工作；外省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去函电表示民众对于 K. M. T. 大会的希望和要求，以群众力量迫大会左倾。

扩大会各省出席代表，我们亦当通知各省本校组织，尽量选用最靠得住的左派分子出席，不得已时才用 C. P. 分子。

*　　*　　*

除对于汪蒋问题外，中局对于粤区工作尚请注意以下数事：

1. 应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农民运动上，去做反对土豪劣绅工作。

2. 政治上要求召集省民会议，民选政权，反对贪官污吏。

3. 须加紧与左派合作。若粤区同志说没有左派，当速造成一个左派。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

PDG

对于国民党扩大会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广东的国民党左派及工农商学群众，甚至黄埔学生，均不满于中派把持政权下的现状而想有所改变。积极的办法就是迎汪[1]回来，左派正准备在第三次大会上或即在最近召集一临时代表大会实现此计划。乃中派忽宣布十月一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部联席会议的决议。此次大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据公布者为：

1. 省政府之组织问题；
2. 中央政府迁移问题；
3. 请汪复职问题；
4. 催开国民大会问题。

中派召集此次大会的用意，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2]欲迁移中央政府，抬高党的威权（照现时党、军、政三权集中于总司令手的局面，此种办法即是所以抬高蒋之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中派为欲使此计划之进行上不生阻碍可以包办，所以决定开会日期非常迫促（九月十号左右决定，距开会日期只二十日），远地代表通知且来不及，遑言赴会。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四期。原文未署发文单位，从内容判断，应为中共中央发出。

我们除一面通知各地迅速选派代表前往外，一面并电请展期至双十节开会。各地代表都尽可能的全选左派去参加。

我们对于 K. M. T. 此次扩大会的意见认为：

1. 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表面上我们可以说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若武昌修水战事未了我们更可说："此问题须待军事结束后才能讨论。"

2. 应产生一左派政纲为左派行动的标准，为左派与我们合作的条件，逼中派照此施政。

3. 迎汪回来，表面上宣传汪蒋合作，但汪之就出与否须斟酌当时内外情势决定。

4. 改造广东省政府，可以组一个汪李（济深）孙（科）合作的政府，去掉古应芬，肃清贪官污吏派。此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所以赞成汪回，就是为要救广东这块革命的基础，汪除任国民政府职外，事实上须拿到广东政府实权。

5. 当极力主张：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各省组织自治政府，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因为所谓绝对的集中统一，在目前全国的交通上，小军阀的变化过程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自治政府可以容许民众参加政治，可以减少军事独裁倾向。

左派顾孟余、何香凝等对于此次大会十分注意，顾自任运动北方左派代表出席，派吴玉章来沪运动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并决定两项宣传原则：

1. 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相。

2. 口号是：（一）巩固本党左派与 C. P. 谅解合作；（二）恢复党权，拥汪复职。

我们以为第一项太利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相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浑一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
〔2〕指蒋介石。

PDG

中央通告第十八号

——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各级同学们：

目前本党应集中全力进行下列各项工作。望各级党部于收到后即切实计划执行：

1. 帮助北伐军保住其既得之胜利。

2. 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迫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

3. 充实国民党左派的实力，恢复左派在广东的政权，实施左派的政纲。

4. 本年内，湖南湖北或其他北伐军国民军占领的省份，都必须召集全省农民大会，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

5. 武汉各业工会须于本年内组织起来，以充实固有之工联。

6. 在最近期内，北方各铁路之各大站及开滦五矿，都须有秘密工会的组织及我党的支部。

7. 最近期内湖北湖南都须召集全省工人大会，最好和全省农民大会同时召集。全国总工会即须在汉口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全国工人经济上政治上要求的纲领；并须召请湖北

湖南工联多派代表出席此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8. 进行奉系军队中之秘密组织及破坏工作。

9. 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工作。

10. 发展我们党独立的政治宣传（最紧要的是 2、11 两项），力求普遍，更其是在广东湖南湖北。

11. 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

12. 全党各支部都开始工作、活动起来。

13. 各地党部，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运动中，在一切政治的宣传争斗中，都须善于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使本党日渐群众化政治化，尤其是沪粤湘鄂四区，务必去尽研究小团体的习惯。

14. 北方区要开始地方（直隶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政治宣传与争斗。

15. 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才。

16. 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以上十六项工作，限本年内须一一办到，明年正月中央应派人巡行各地方，即按照此工作计划，检验成绩。

李　承　宣[1]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共中央给广东的信*

——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对于汪蒋问题，在九月十七日给粤委信已分析得很详细，并指出中局对于此问题所取的政策。

蒋介石曾派胡公冕同志来上海见仲甫[1]同志，请C.P.勿赞成汪回，其措辞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仲甫同志是这样的回答他：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第二，是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详细说明我们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回：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又请吴廷康同志赴鄂，盖自知地位之危险，仍望我们能援助他。吴同志已决定日内动身前往。在昨晚中局与吴同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五期。

志会议，更具体的决定汪蒋之间、蒋唐[2]之间权力应如何分配，才能避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给他们各一出路：

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将党权交与汪精卫。

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

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的争斗，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

照以上的办法，既适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汪蒋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更能受这宣传的影响左倾一点。前函所云第三办法暂时不可提起，且亦事实所难能。吴同志及特立[3]同志均订日内赴汉口。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指唐生智。
〔3〕即张国焘。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各级同学们：

中局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与党的关系，有以下之新决定，望即依照执行：

1. 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员会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俾知全党生活。

2. 军事特派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且应用他种名义（如组织部员）参加党主席团会议。

3. 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

4. 军队中同志的组织，应为纯粹按照军事系统的组织，如特派员干部小组等，直接归军委或中央军部管辖。

5. 凡在军事范围内介绍入党的同志，除十分秘密只能在中央登记外，应向该地党组织部登记。即中央直接派往各地做军事工作的人员，亦须在所在地党部登记。关于工作则只对当地书记发生密切关系，而不应公开对党部报告。

6. 决定同志做军事工作，应由党决定，并移交军委管理，然后再由军委分配其工作。

7. 军队同志关于党纪律事件，由军事负责人员提出党部执行。

8. 训练工作，应照准各地实在情形，本着党部每周训练大纲的精神，由军事负责人酌量在军队同志中进行。

9. 离开或撤换军事工作的同志，应由军事负责人移交党部调遣。

10. 以后在军队中活动去组织群众，在组织上可以支队为单位，依次递升；在名义上，可用民军、革命军、人民自卫军等。

李　承　宣[1]

九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陈　独　秀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的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左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军阀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官僚	国民军

洋行买办
大学教授
地主土豪
交通系
安福系
研究系
联治派
国家主义派
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
老民党
各种宗教徒

农民
工人
学生
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
中小商人
共产党
共产主义青年团
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劢，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1]那边，拼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劢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2]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

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吧？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它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的毫不游移的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认。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争斗中，有没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前一问题，大半是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政策的人之怀疑，或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

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与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有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

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民、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民、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

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七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2〕指孙传芳。

PDG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恽 代 英

广东青年很少怕共产党的，除了几个被人蒙蔽欺骗的人以外，亦很少人反对共产党。但是他们有时还免不了将共产党看做一件神秘的东西，有时又认为共产党员是一个好听的名词，想加入共产党。

中国能够有很多共产党员，自然是好的。不过不容易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不愿意有一个不合于下列标准的人来做他的党员的。

做共产党员要合于甚么标准呢？

第一，要能够确实有决心谋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打倒一切寄生的压迫阶级——地主、资本家。共产党不只是讲国民革命的，亦不只是为了要农工帮助国民革命所以才帮助农工，他硬是要为农工自己的利益，彻底解决土地农有，工厂由工人管理的问题。一个国民革命的左派不一定能够做共产党员；假如他自己只知注意国民革命，他决不能为共产党最后的主张而奋斗！

第二，要能够明确了解农工阶级的解放，不是少数人理想的要求所能达到目的的，必须有大多数实际受压迫的农工觉悟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少年先锋》第一卷第四期。

组织起来，而且必须有居住与生活上最易组织的人（如产业工人）为他们的中坚与领导者，才能很有把握打倒一切压迫阶级。共产党员决不迷信任何个人的力量，亦不迷信他自己的能力；凡相信离开了群众的力量，仍旧可以解放甚么人的，一定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第三，要能够到各种有群众的机关中间去组织一个核心，注意本机关中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宣传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奋斗，而且自己站在前线上面领导他们奋斗！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漠视本机关群众的利益，或畏怯不敢领导群众上前奋斗。共产党员不但要领导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且应当特别注意考察群众自己与敌人的实际力量，随时规定出进攻或退守的合当策略，而且要能用各种方法使群众接受我们的策略。这样才不是跟着群众的尾巴跑的，才能使群众不至于走入幼稚的错路上，被敌人打败。

第四，要能够很忠实的接受党的训练，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要能扫除一切在封建社会或买办阶级文化的社会中所养成的错误思想，养成功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切实负责将党的意见散布到各种群众中去。共产党员是党的一个细胞，共产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是很健全而富于活动力的细胞。要固执错误的思想，不受党的训练，对于党的意思怠工，不肯传布到群众中去的人，根本不合于做共产党员，应当将他们踢到共产党的门外去。

第五，要能够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去，一面很谨慎的为党守严格的秘密，而一面又能很诚意的与各种可以在今天此地建立联合战线的人结成亲密合作的关系。亦许有些人在将来对于共产党是有危险的，亦许有些人在现在便可以与共产党发生许多的麻烦，但是共产党员不应当回

避这种危险与麻烦，要勇敢的上前去，迎着这种危险麻烦，在这中间得着群众，以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

要做共产党员的人或是已做共产党员的人，且自己想想，够得上做一个共产党员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下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

汪精卫回粤固然非常重要，而实现时期必须万分谨慎。此时前敌情形殊未能乐观，民中开会时前敌如无胜利，确信蒋又不同意，尚不能决定迎汪，此问题只好推到第三次全国大会；倘蒋同意汪回则当然不成问题，蒋意如何，日内吴廷康同志必有电到粤也。蒋个人此时确日向左倾，前敌战况又不佳，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且汪回第一要义是救济广东，如能实去古应芬势力，改造一汪派为中心的省政府，再要求蒋严饬其党徒不妨碍左派在广东的政策，则汪虽缓回，似亦无大碍。"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这可算是前述三个办法外之第四办法，不得已时或只可走此道路。总之，民中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至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六期。

PDG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

（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

今日××、×××同志由广东来，谈及广东情形，有三个重要问题，急应通知粤区注意的：

第一，是对于左派的政策。

×同志言左派对于C.P.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仍很怀疑C.P.，觉得C.P.可怕（所谓可怕：(1）是指C.P.政策老练深沉；(2）是指C.P.有群众），觉得他们太没有根据；因此在合作之中，仍时刻防闲C.P.。据湖南区委的来信，亦说到民校左派均感觉C.P.太行，一切群众均在C.P.手内。

同志们！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倘若我们不预先见到，不预先注意，则未来再发生一个“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很可能的。这并非我们故作耸听之词。左派既自己感觉没有根据，没有群众；同时怀疑我们，畏惧我们，防闲我们，便给右派以挑拨联络的机会。加以现时左派分子均尚少政党政策的训练，易为感情所冲动，更易受右派之煽动。我们必须使左派也自己感觉自己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在与我们合作中去掉怀疑、防闲的心理，始能防止右派之构陷。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六期。

要使左派有群众、有力量，去掉怀疑、畏惧、防闲的心理，这个责任全在我们。同志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总觉国民党不行，处处非我们包办不可，不给与 K. M. T. 左派以负责任的机会，不给与 K. M. T. 左派以接近群众的机会，使得左派遂完全不能独立起来，有力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影响又不能普及全部的群众。我们不让左派来参加争斗，便多给予右派和反动派更广大的活动领域。自然，左派现时还很稚弱，但他并不是始终稚弱不能有力的独立起来；如果我们与左派的合作不是包办而是扶助他们自负责任，则左派不难有力的独立起来。现时脱去我们包办的黄埔军校左派势力之形成，便是很明显的例证。

国民党左派之有力的独立起来，对于我们只有好处而无一点坏处。在现时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这些群众绝不是 C. P. 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倘使我们不扶助国民党左派有力的独立起来工作起来，便是等于背叛革命的利益。

过去我们包办 K. M. T. 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使党及革命的前途均受着许多坏的打击，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更广阔的发展，一方面是使斗争性质不扩大成为左右派之争而变成右派与 C. P. 之争，这个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现在左派对于我们的怀疑、畏惧、防闲，又有重演旧文的倾向，粤区须严重的注意此事。免除左派的怀疑、畏惧、防闲及避免右派的挑拨构陷的唯一方法，就只是：我们不包办一切，赞助左派起来自负责任，尽量的让他们也到工人中农人中去活动，让他们自觉也有群众，也有力量能独立。

第二，是粤区干预各地党务之错误。

闻粤区对于此次入赣军队中同志抽出数人组织一党团，此

党团并非对付军事工作，乃是付以计划发展江西党的工作之责任。在粤区之意，或者以为江西尚无我们组织，即有亦未必健全，故遂不嫌越俎代庖，然在组织的原则上实属错误。且决定后又不向中央报告，是使我们的党实际上形成两个指导，更不应该。粤区对于各地党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进行，都必须经过中央，不好自由行动。这不仅组织的原则上应该如此，就是为熟悉各地方情形，粤区也赶不上中央，望切实改正。

第三，是让同志了解党的政策。

自广州来的同志，都觉着粤区在应付一切问题的政策上似带有一点神秘性，同志都不了解。自然，有些政策是应绝对秘密。然而大部分总是宜使同志明白，然后同志方能行动，不好勉强同志简单的服从；这并不能保持党的统一的力量，只有减少党的行动的力量。若说同志幼稚，许多事告诉了他们，应用不好反出乱子；然而工作的大的趋向总应使他们明白，否则更要出乱子。活动分子大会宜常召集，详细解释我们的各种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中惨杀上海、汉口、广州等处的爱国同胞的空前惨案，还未了结，现在又陡起杀心，在万县大屠杀而特屠杀，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啊！

英国帝国主义这次在万县既利用不平等条约任意航行内河，不按航规，横冲直撞，致撞沉民船数次，沉毙人命数十，地方官提出抗议一味横蛮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大炮野战炮硫磺弹尽量施行轰击，伤毙人民至五千之众，焚毁房屋至数千间，损失财产至千余万，整个的万县城差不多成了腥血涂染的断瓦残垣；这不仅比“五卅”时的屠杀情形更凶恶惨酷十倍，简直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闻（除向敌人正式宣战外，没有如此用大炮肆行轰击者）。这种野蛮毒辣的行为，在帝国主义对于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遽施，今英国帝国主义竟一再施之于中国，他简直视中国为屠场，视中国人为非人类，不过是他任意屠杀的对象罢了！

这次屠杀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船撞沉官船，与杨森冲突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

的结果，其实英国帝国主义早就在准备一个大屠杀，故屡次挑衅乘机待发。当北伐军兴师之初，英兵便在梧州上岸捕人，这是挑衅的第一次；当北伐军到武汉，英舰公然援助吴军炮击北伐军，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在广州英舰派兵上岸，占领码头，逮捕工人纠察队，截获民船，强行驾驶货船进口，这是第三次；在万县便是第四次。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时虽然屠杀了数百中国人，却引起了全中国民众空前的反英运动，英国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受了严重的打击，尤其在广东，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几成了荒岛，现在北伐军又攻入武汉，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伸入了长江流域，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吴佩孚根本毁坏，英国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将根本摇动，因此，他便不顾一切，横行无忌尽量地使用他的炮舰政策来施行大屠杀了。

英国帝国主义现在不但用各种方法扰害北伐军的后方，拼命帮助败亡之吴佩孚，并且正在援助孙传芳，助孙军费一千万元，子弹二千万，公然加害于北伐军，希图延长北洋军阀的统治，延长中国的内乱，以遂其在中国任意侵略之野心。

现在英国帝国主义一面援助孙传芳加害北伐军，一面在国际间提倡共同干涉中国，同时，复调兵遣舰，地中海之舰队近已来华，准备更大更凶毒之屠杀。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你们应该起来注意呀，我们今天不知明天英国帝国主义要轰击那一个城市，不知谁又是英国帝国主义枪口里的炮灰，真是死的恐怖充满了全中国人的周围啊！但是我们要指出，万县这样的屠杀惨案，靠什么政府交涉，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为现时的北方政府以至四川地方政府，都是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工具，段祺瑞政府对于五卅惨案交涉之失败便是显例。现在只有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

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国帝国主义，便是只有更广大运用五卅运动的经验，再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英的五卅运动，以民众的力量与英国实行经济绝交，根本铲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之经济命脉，同时一致拥护北伐军的胜利。只有如此，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愿以全力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此种凶横残酷的强盗行为。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起来！

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之炮舰政策！

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延长中国内乱！

全中国人民起来排斥英货！

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

撤废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为万县五千死难同胞复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

——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们：

我们现在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我们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这一原理；我们更须懂得质量上的增加，大部分是靠在群众的实际活动中学习与训练，不是单靠书本上和党校中可以收效的。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并且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之增加，正是使党革命化，正是增加质量之一种方法，一种重要的方法。

尤其是北伐军和国民军所到的地方，一般民众的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然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

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 Y. 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我并且以为在事实上各地党员发展到左列数目（新旧党员全数），或者不是空想：

地域	党员数目	社会成分
江浙区	七、〇〇〇	工人及知识者
粤区（两广）	一〇、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湘区	七、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鄂区	四、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北方区（直晋三特区）	三、〇〇〇	工人农民及知识者
山东	一、〇〇〇	工人农民
河南	一、〇〇〇	农民工人
陕甘	二、〇〇〇	农民及知识者
四川	二、五〇〇	农民及手工工人
江西	二、〇〇〇	农民及手工工人
安徽	五〇〇	知识者及农民
福建	五〇〇	农民及知识者
东三省	五〇〇	工人农民
云贵	二〇〇	知识者及农民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河南矿工及各省路工外，别处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淡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请接受革命的敬礼！

十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李　大　钊

一、在三特别区[1]工作方面

（a）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

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在党的工作方面，虽有相当的发展，但党的基础极不巩固。同时，内部负责同志又不能互相了解，共同努力工作，使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同志只听党中个人指挥，不接受党的组织指导。如张家口京绥路工人同志只听仲一[2]同志命令，支部会非仲一同志去召集，即不能开会，在南口也有这种现象。总之，一切工作只有同志个人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的指导，因此，有许多负责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为极为浪漫。另一方面，张家口地委工作既如此，其他各特支亦甚不好。职工运动方面，从前虽能公开的召集，在此次战争中亦能实际的帮助国民军，但尚不能达到成为党的指导下的群众组织。三区工作最糟者，为国民党工作。三区国民党在我们手中，可惜过去的指导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太不得力，所有一切民校工作，全由麟符[3]一人包办，名义上虽有多少党部、组织、党员、机关，事实上不过花了很多钱，养了一班不作工作的同志。过去负责三区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如张良翰、×××等，不但是不作工作，而且抽大烟，逛窑子，因此，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对于三区国民党负责人极不满意。不但是国民党在三区不能发展，而且影响于我们的党在三区的工作。在三区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国民党是好的，但在三特别区的国民党却不好。绥远市党部（在山东派手中的）曾借此向民校中央控告绥远省党部。现在民中已派路友于来京查办此事。

（b）奉军占领张家口以后

现在三特别区有党的组织的地方，为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五原。南口、康庄等地，党部组织尚未恢复。在以上有组织的地方，以张家口地方为较好，绥次之。大同方面尚未能正式开会，只能作个人谈话。包头方面，同志不多，五原虽有很多的同志，但该方党部尚未组织起来。职工运动及国民党工作都是在复兴的时期中。农民运动还是在开始进行状况中。

（c）目前的计划

1. 从前张家口各特支均改为区的特支，直接受区委的指导。如大同、绥远、包头均应调一得力同志去主持一切工作。

2. 民校工作应完全重新换人去做，并应受该地党部（我们的）的指导。

3. 在农民运动方面，现正派由粤农校归来之十余同志去各县工作。

4. 在职工运动方面，除从事调查与救济散去之得力分子外，须在工人群众中建设新的基础。

5. 关于工作者分配问题：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或×××。

二、在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西北军现在不但组织上渐次统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4]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在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及与民校关系，我们很同意于和森[5]的意见。至于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重在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现在第一军中军友团的同志约有九十余人（该团乃西北军干部学校改组的，共约三百人），该团现正分配给各军中充下级军官或参谋。第三军中同志约四十余人，此外，在陕西井岳秀军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组织方面都非常之涣散。现在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在该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过去我们在这些军中的同志，工作极不好，急待重新整顿，并且在该方非建立得力指导机关不可。现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6]及一飞[7]同志去西北军中工作外，北方区现正指定同志，受短时间特别训练，准备去该方工作。

北方区因感觉过去三特别区工作之糟及现在西北军中工作之重要，特派××[8]同志去西北一行，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9]接头，考察该方实住情形及目前一切纠纷的问

题（在军队中同志的）。至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具体详细计划，须俟××同志归来时才能规定，因这样比较切实些。

根据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的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三特别区，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
〔2〕即王仲一。
〔3〕即韩麟符。
〔4〕指冯玉祥。
〔5〕即蔡和森。
〔6〕即谭平山。
〔7〕即王一飞。
〔8〕指陈乔年。
〔9〕即刘伯坚。

PDG

粤区来信*

——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三号及四号来信都收到了。汪精卫回粤问题，我们决定要在这一次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没有讨论党务及政务以前，临时动议要求请汪精卫立即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已于本月十八日实现了这个决定。中央对于这件事情的指示我们是完全遵照去做的，并且粤区及鲍[1]同志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同。在没有接到中央来信以前，老蒋[2]已经有电报给张、谭[3]，表示赞成汪回来。这当然不是蒋的怎样愿意，而是为现在他所处的环境所逼迫的，或者也不是我们的影响使他这样做，而是他已自觉其智穷力绌，这是很清楚明白的，用不着多说。

中央已经知道，三月二十日以后中派掌握政权，国民党领袖对于工农运动的态度变坏了。就是所谓左派的领袖也是如此。他们不明白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民众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有了变动，无论大小事件，只要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以为这是民众故意与他们为难，换言之，即是C. P. 故意与他们为难。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领导工农运动，都是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左派，同时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我们也要为民众利益奋斗。我们没有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国民党让步的原故，就袒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民众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的积极的批评他。我们现在特别的指出对于陈森的案件，我们在工人代表会中同国民党左派及无政府派是合作的，不过这个左派不是甘乃光，不是顾孟余一班士大夫，而是手工业工人群众，而是手工业工会的领袖；他们没有怀疑我们，没有怕我们，没有防闲我们。陈树人接任中央工人部长后，我们曾经提议组织一职工运动宣传委员会，这个提议的用意就是帮助左派使之到群众中间去作工作，不要站在群众以外，说工人要求太高，说工人太懒，说工人手段太辣，说工人不革命，不要站在群众以外，怀疑C. P.，害怕C. P.，防闲C. P.。

在花县惨案中，虽然甘乃光没有在政治会议中为花县农民说一句话，虽然甘乃光没有指示半点办法，我们仍然拉他一块儿做，并且当组织委员会与军队同到花县查办时，我们坚持一定要国民党左派同志——甘乃光亲信的人代表中央农民部，并且推他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份帮助左派。但是也有例外，现在南路的农民运动，差不多是C.P. 包办，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个地方的国民党，那个地方的农会都是土豪劣绅的了。因此还要为着革命的利益作苦力，依照中央上次的指示“如果没有左派我们就要造左派”的原则去工作。

在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新进的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的工作，很努力使他们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作应该从下层做起。听说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销售了五万本了，并且在省党部宣传部每天早晨八点钟以前，召集他所领导的一般左派青年，开会讨论他的理论。他用国民党中央农民

部的名义，创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造就一班青年，准备派到广东各县主持农工运动。现在他又预备向此次大会提议组织一宣传委员会，由他的左派团体加一、二人进去，以造成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中心。他现在进行在大会未闭会以前要将各省的左派组织好，在大会闭会后并继续开秘密会议，规定各省工作的计划。对于甘的各种活动，如果事实上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当然尽力帮助他。对于其他的左派以及左倾的领袖，如徐谦、陈树人、顾孟余甚至于现在左倾的戴季陶，也是如此。

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的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我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依照这个原则，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来决定实际工作的方法。并且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现在左派还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要帮助的左派是怎么样的一个左派。此地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现在我们说帮助左派问题，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而在我们 C. P. 与左派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央的指示已经说得很明白："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当然手工业的群众也在内），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 C. P. 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这些左派的群众，我们 C. P. 不但不能包办他们的组织，并且他们也不能够接受 C. P. 的政纲。因此目前唯一紧急的工作，就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要在广东各县、起首在重要的县份创造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左派国民党党部，他的党员应当是在左派纲领之下团结起来的。这个党部的委员会应当是纯粹左派分子组织的，没有跨党的分子。并要在广东各县创造一个有力量的各界人民联

合会，他的群众是在本地人民目前最低限度具体要求的政纲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这样我们C.P.与左派群众间才能有一正确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这样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推进革命。像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对的，希望中央给我们以指导。

在出发江西的军队中，此地决定一个军事的党团，并没有叫这个党团来干涉一切地方的事情，并且规定了关于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当受该地党部的指导（关于军队中间特别的组织，粤区曾经决定一个组织大纲，由上次云臻[4]同志带上）。如果中央查有该党团干涉该地方党务实情，应当立即执行党的纪律，给该党团以严重处罚。

粤区党的政策过去都尽可能的召集同志开会，或讨论或在决定之后向他们报告及解释。不过因为广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同志们所知道的还是太少了。有时又因为事情紧急，决定后马上就要执行，来不及开会报告讨论，但事后不必要的当然也没有再提，重要的还是向同志作报告。只有关于军事的秘密，不但是同志不能普遍的知道，就是区委委员也有不知道的。同志对于此点不满意，如中央来信所说的大概以外省同志居多数，而他们所想知道的大概都是关于军事的问题，粤区很抱歉，对于这些同志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粤区在过去比较的不能够“德谟克拉西”，现在已经稍稍改变一点，一方面印行粤区自己的党报，一方面每星期都举行活动分子的周会，报告党的政策及一切民众运动，如果仍有缺点，随时发现当随时依照中央此次的指导改正我们的缺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鲍罗廷。

〔2〕指蒋介石。

〔3〕指张静江、谭延闿。

〔4〕即聂荣臻。

PDG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关于 K. M. T. 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 C. P. 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 C. P. 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问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 C. P. 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

---

* 这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原题为《C 同志关于 K. M. T. 问题报告》。

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 M. T. 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 K. M. T. 再造一个 K. M. 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 K. M. T. 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 K. M. T. 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

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K. M. T. 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K. M. 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 C. P. 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 K. M. T. 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 K. M. T. 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

照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 M. T. 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 M. T. 的内容是怎样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 K. M. T. 改组，现时这部分右派已出了 K. M. 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

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K. M. 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 K. M. T. 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 K. M. T. 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 K. M. T.，怀疑 K. M. T. 能不能革命？K. M. T. 是否站得住？我党对 K. M. T. 的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K. M. T. 不革命了，还是要 C. P. 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 C. P. 意见，C. P. 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 M. T. 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 C. P. 包办，C. P. 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 C. P. 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 C. P. 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 C. P. 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K. M. T. 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 C. P. 比K. M. T. 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 M. T. 工作，无论左派

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1]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 M. T. 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 P. 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 P. 分子不得不出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 C. P. 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 C. P. 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 M. T. 不行了，革命还是C. P.；谭延闿及其部下说 K. M. T. 没有力量，还是 C. P. 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 K. M. T. 已无用而须 C. P. 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 P. 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 K. M. 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K. M. T. 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K. M. T. 中和 K. M. T. 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2]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

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 K. M. T. 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 C. P. 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 M. T. 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 K. M. T. 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 K. M. T. 有左

派，那末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3]及C.P.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K.M.T.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M.T.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M.T.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K.M.T.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C.P.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K.M.T.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K.M.T.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C.P.无甚分别。K.M.T.左派和右派及C.P.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P.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P.的观点视K.M.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P.存在，同时K.M.T.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

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

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 K. M. T. 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 K. M. T. 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 K. M. T. 左派，使此联盟不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

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 K. M. T. 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 K. M. T. 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 K. M. T. 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李大钊。
〔2〕指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改称中山大学。
〔3〕指鲍罗廷。

中国共产党
关于农民政纲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

一、正在发展的中国民众革命斗争，不仅是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求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要求建立完全民主制国家的斗争，即是说要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军阀土豪）的政权，并在平民民主政权上统一全中国。

二、解放的斗争已到了这一阶段，即有许多新的行省已来受国民党的影响，巩固国民党的军事胜利问题和扩张国民党影响以为创立民主政权基础问题，已提出于议事日程。此时适应于这一革命阶段的农民政纲问题，对于本党是有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政纲不仅在农民过渡的要求的意义上面，而且在整个农民运动的最近的任务和目的的意义上面。

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

---

* 这个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起草的，准备提交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审查和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他方面，范围日大一日的农民运动再向前发展下去，将推动国民党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去反对那剥削农民奴役农民的一切封建强盗的形式，这个便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成功的保证。

三、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于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四、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实现城市中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应用在乡村来，应该在这种意义之下，即联合小农、中农、大农和佃户以对抗地主劣绅。引导这些农民分子到斗争中来，不仅不妨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益，而且是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础。自然，在乡村反对军阀、地主、劣绅的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冲突，不仅不能因国民政府的农业改良政策而消灭，而且全国军阀政权推翻以后，这种冲突必然更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

国民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各种社会成分各省籍的军事领袖指导下的革命军。革命军的胜利促成革命的发展，但其自身亦是全国发展的解放斗争的结果。这种胜利必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使群众独立参加斗争的决心和准备软弱下去。在农村中，因许多历史条件的关系，劣绅阶级（地主包含在内）乃是事实上的政权，农民阶级改善其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的斗争，就变成反对劣绅政权的斗争。他方面，农民群

众要求革命军和国民党改善其地位的希望所以不能实现，不仅因为国民党没有决心和革命，不愿站在农民方面，而且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于劣绅地主时常表现软弱。这种情形使农民不得不直接为夺取乡村政权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任务于农民协会——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只有依靠在乡村的农民政权之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其地位，并展开反对中国民众敌人的斗争。

五、根据上面所说以及本党中央过去二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本党中央特提出如下之政纲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至五日，远东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准备赴共产国际扩大会的联席会议所拟的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

（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

（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

（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

（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

（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合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课额。

（六）禁止一切欺压迫的契约，包农转租契约[1]亦包含在内。

（七）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

（八）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

（九）国家经过农村革命政权机关之手以帮助农民和农村经济。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包农制又称二路地主，即用许多资本组织公司，先由公司向田主方面包承田地，再由公司将田地转批给佃农；或者佃农已先向田主方面批得田地，公司又硬将佃农已批得的田地夺去归公司手上转批。这种转批田地的契约，叫包农转租契约。

PDG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局与
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

一、北伐军东下问题

1. 首先，我们从全国的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张[1]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广东太红了，若果在这两者中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得着一部分人的，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更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较为迅速，故原则我们是不能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一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伐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2]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反动一点，更腐败一点，战斗能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以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

北伐军纵让奉军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一、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亦不敢南进到浙，若北伐军不能速取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二、为免除北伐军内部的地盘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

2. 上面既已从政治上说明北伐军必须前进，孙传芳必须消灭的理由，现在再从客观的力量上估计一下，北伐军是否有这样可能。

第一是孙传芳的力量。现在他的嫡系军队谢鸿勋师杨震东旅早已溃散，卢香亭师在德安、吴城已无退却之路。此外有战斗力的只有杨赓和旅（原为杨化昭部）也在南昌九江间不易退却，可望退走的只有郑俊彦师（原为卢永祥部），亦未始终为孙力战，其余军队即能退亦无甚战斗力了。此时孙氏可靠军队只有孟昭月一旅、冯绍闵一旅，这绝不能守住江苏。其闽、赣残部即能集中浙江，非以让江苏为条件结合鲁张，已无力和北伐军一战。

第二是奉系内部现有种种的困难。如：（一）奉、鲁的冲突；（二）奉、日间为奉票的纠纷；（三）经济的恐慌；（四）

西北军的再起。凡此均足以阻其放胆南下而无所顾忌。鲁张兵力至多能拿到江苏，不能再更前进。

第三是北伐军方面。据我们所知，东下的实力有：唐生智一五，〇〇〇；一军约三，〇〇〇；二军约四，〇〇〇；三军约四，〇〇〇；四军约六，〇〇〇；六军约二，〇〇〇；七军约四，〇〇〇；贺军约三，〇〇〇；补充师约二，〇〇〇□□□□□□□□以上，足以消灭孙传芳残敌之众。而且这许多军队和许多将领，仅仅得一江西，亦患僧多粥少，其势非再前进不可。倘使国民政府对于非孙嫡系军队如陈仪、陈调元、周凤岐、王普、白宝山、李宝章等（兵数至少有四万）关系弄得好，是可完全扑灭孙之势力，或者还可以拒绝奉军南下。即退一步，蒋介石以浙人关系，对于浙军更易结合，至少可想法拿住浙江。唐生智军若乘胜东下，占住安徽之南部及中部也是可能的。

第四再看帝国主义方面的态度。有关系的只有英日二国，日本一方面不主张奉张冒险向南发展，一方面极力运动南方承认奉张在北方的统治权；英国既忌南方胜利，复虑南方势力终不能推翻，不得不转取联络政策。近自北方顾[3]内阁废比约，帝国主义者并不感觉南赤格外可怕。

3. 根据以上的分析，从主观方面，我们应该完全消灭孙的势力；从客观方面，北伐军亦有消灭孙的力量的可能。我们应该改变从前江西下后不再东下的政策，更应抛弃和平解决孙传芳的政策而为前进政策；所以可得以下的结论：

一、从全国政治情形上看，应完全消灭孙的努力。

二、北伐军肃清江西后仍应前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

三、关于我们主观政治上的见解，电征莫斯科意见再作最后确定；至于军事行动，当由加伦同志斟酌实际情形决定。

二、关于湖北政权问题

1. 湖北设立政治委员分会问题。从前伍[4]同志曾提议以顾孟余、徐谦、邓演达三人组织非正式的政委分会，特立[5]同志来信主张加入唐生智、董必武二人。若只上三人的正式委员会，顾好弄小手段，必难容于唐；徐是无用的老好人，邓现在与鄂各方关系不好，这三人的委员会决不能指导湖北政治。但若加入唐，蒋又不愿意，此问题很难解决。我们以为，湖北省政府与党的关系，尚未能实现这次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第二形式，即由民中特务委员助该地省党部管理省政府的形式，还只能是省党部与省政府合作，因此我们主张湖北政治委员会分会可不设立。若徐谦到鄂，只能是以中央委员资格去指导省党部党的工作，我们还须尽力使徐、唐之间不生误会与冲突。

2. 湖北省政府委员名单。特立同志来信提出十一人，我们以为九人已足，可除去徐谦、陈公博。其余九人如下：

唐生智　邓演达　刘佐龙　王法勤　陈铭枢
蒋作宾　詹大悲　李汉俊　邓寿荃

倘必须十一人，亦宜另择二湖北人，因原来名单十一人中湖北只四人，太少不妥当。

3. 湖北省政府设七厅，其名单亦应改正如下：

主席兼军事唐生智；财政刘文岛（最好能换一人）；民政蒋作宾（特立同志原提的是王法勤，我们觉得民政需要一个湖北人）；司法张国恩；教育李汉俊；建设王法勤（特立同志原提邓演达，我们以为邓在鄂难以占脚，蒋如另有发展，邓仍以

去蒋处为宜）；商务詹大悲。

以上数事，均望粤中根据中央意见对外提出。

三、江西政权问题

1，若蒋不离开江西，则江西政权当然归蒋；但须加入二、六两军的人，因二、六两军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特大，他们的思想也左倾些。

2. 蒋若赴江、浙，则江西当交给二、六军，非此不能令老谭[6]安心。

3. 报上颇宣传李烈钧有得江西地盘消息，这不仅引起二、六军的反感，而且李之思想太右，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应该极力反对，使其不能成为事实。

四、汪精卫复职问题

中央前日已有信致粤方，谓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迎汪复职，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7]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此次会议，对于这个意见也是同意的。

又近日上海报载：广州接受蒋之提议，将政府及中央党部

均迁移至武昌，此亦系蒋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政府及中央党部若迁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张宗昌。
〔3〕指顾维钧。
〔4〕指伍廷康（维经斯基）。
〔5〕即张国焘。
〔6〕指谭延闿。
〔7〕指张静江。

PDG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关于汪回复职问题

×××同志回来报告此次民中扩大会经过，我们觉得此次大会一切的决议都好，只是对于汪回问题没有得着结果，汪不回则左派无中心，虽有很好的左派政策，而无应用这政策的能力，成效甚微。

大会通过汪回复职而汪不能回的原因，据×同志说是因汪在时无主席制度。张静江在议案起草委员会中，极力反对动摇蒋之主席位置，汪前任之政治委员会主席，亦以政治委员会已改为政治会议名目而无形取消，故汪回无职可复。粤区本拟由左派在大会提出一取消主席回复从前制度议案，张若在大会反对竟至不能通过，则群众皆明白汪之不能回全是张等之反对，更愤恶张等。但是这个议案左派分子竟恐惧于张之横蛮态度，恐惧蒋三月二十日之余威，不敢提出，甚至这样说，若真正提出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所以决定不提出。粤区同志意见亦认为现时仍不宜与蒋有冲突，这个问题只有听其自然下去待第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三次大会时再说。

照×同志的报告，我们应该承认，这次大会左派空气虽极浓厚，但主要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是中派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以后有利的反攻基础。蒋这次发电迎汪，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迫他不能不如此。据加伦同志报告，关于迎汪问题，初与谈未遂，后又谈三小时蒋一言不发，听加说而已。第二日蒋发电亦未交加过目，自此以后蒋态度更不好，表现要自动，不愿听人被动。二十六日曾不顾一切的乱下总攻击令，加知之力阻始罢。从这些事实皆可证明蒋对汪回之真正态度，他是满心不乐意汪回，迫不得已始发出那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上又弄了些花头，令绝不能出国门一步的李石曾、张静江往迎。如今汪若因无职可复而不回，则蒋在最近将来将更进一步的向左进攻，他可以这样宣传说："汪先生全不顾党国，我这样欢迎他，大会群众这样欢迎他，而他还在闹闲气，不肯出来，未免辜负人望。"这种说话一出，汪所受打击更大，再难出来。

现时我们及左派对于此事不能听其自然下去，若听其自然的结果是让左派政权不易建立起来，是让前敌唐生智等自然以武力去蒋，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更坏。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一补救的方法。

第一，汪现在应该趁大会通过，民众热烈的欢呼中立刻回来，大会举出迎汪的代表应促令即刻前往。

第二，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除党的主席是五月十五大会新产生的属于老蒋者外，尚有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等虽将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但溯厥历史系统，不能阻汪仍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军总党代表等

要职。老谭[1]现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可仍交给汪的，仅仅一个党的主席为蒋所据（事实上是张静江代理），作用甚小。我们还可更进一步的说，汪回来纵无一点职务，而事实上他也要自成为左派中心、政治中心、实力中心，张静江非滚蛋不可。何况还有这许多大权在握呢！

第三，从上之分析，我们应该不踌躇的要汪回来，此时与蒋的关系只能有暗潮绝不会有明争，蒋绝不能有用军事行动反汪的可能。其实所谓汪、蒋合作这只是表面的宣传语，内部是仍有斗争的，而且是永久继续的。左派要与中派合作，必须左派先握住了政治的领导权才有可能。

第四，粤区同志或者以为中央前曾有信指示关于汪回之意见："认为须以得蒋同意和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不可鲁莽从事"，因而不敢积极的进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充分，姑无论蒋迎汪电是真意是假意，只要他在事实上有此表示，我们便可据以进行。现时是不怕蒋生什么问题的，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说，汪回只有更多好处。

第五，若汪不回，则未来的结果，是蒋更得了反汪宣传的材料，左派政权更难建立，同时前敌自然发生军事逐蒋趋向。我们粤区同志所取听其自然政策是错的，在应付这个问题中，我们感觉粤区同志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又表现太右。从恐惧蒋二月二十日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又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而后回来说，又似表现太左。至于说到积极进行汪回或打击蒋、张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更是万分错误的观念，当于下文说明。

二、对于唐生智态度

据×同志说，粤中空气对唐十分坏，认唐为将来最不可靠（比蒋更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因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皆处处防闲他，疏远他，抑制他；我们同志亦有一部分深具此种观念，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1. 本来一个人并无什么固定的好坏，除非是如李福林、杨希闵等绝对不可救药者外，其余怀抱野心英雄主义的军人，只要我们的策略应付得好，均可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多发生些作用。譬如现在粤中的军事领袖，在以前谁不是很糊涂的？然而现在却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尤其是蒋介石，他在未任黄埔校长以前直至到苏俄时，思想行动，还是非常反动，他后来口头上是进步了，也曾做了些革命的事。为什么我们就单怀疑唐生智不能革命，而不怀疑蒋介石及其他的人呢？若说唐生智为人阴险投机，则蒋介石不又比唐更阴险狠毒吗？三月二十日事变他竟可以做得出来！说到投机，又有几个军事领袖不带点投机色彩呢？问题只在我们能否引导他，范围他这种投机倾向是向革命道上走。

2. 我们唯物主义者是只看事实不问心理。说蒋比唐更革命些的证据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湘区的报告，蒋最近因军事的失利，表面表示很左倾，但我们没有听着他远离孙会分子的事实，而且处处还发现他对左派及我们的防闲捣鬼。至于唐呢，在一切的民众运动中，他的态度都表现得很好，并没有积极压迫民众的事实。所以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是比蒋更表现得好些。我们自然不是就梦想唐已经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建筑在他身上，而是照唐此种态度，我们更容易发展民

众，民众的力量增大，同时更可促进唐的左倾而不惧唐的反动（因为我们并不以唐为工作主体而是以民众为工作主体）。所以倘使我们现时说唐的态度是假的，不对唐作工，又幻想蒋比唐要好一点，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3.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现时所取之冷淡防闲态度，是要使唐愈对党及政府生恶感，倘使他将来真正反动，应该说完全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逼起他反动，因为逼得他没有办法只有找反动的出路。好在唐现时不满意蒋，不满意国民政府，还是向左的反对，正有可以引他为善的机会，我们不能再忽视。

我们倘使要责备唐对国民政府过于轻视，说他把持湘、鄂的政权，则我们先就要责备蒋介石。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总司令权力在国民政府之上，蒋在 K. M. T. 这样久的历史尚且如此，唐在党的历史甚浅当然不足深责。

4. 唐对蒋及 K. M. T.，国民政府的轻视态度，我们先须研究他的见解是否有一点是对的：

唐说："蒋介石就是 K. M. T.，K. M. T. 就是蒋介石"；

唐说："国民党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影指老蒋留下邓演达、陈公博等在鄂和他争权及不让八军到江西等事）；

唐说："K. M. T. 没有力量要找 C. P."；

唐说："当我初向粤方接洽时，许多人多不信任我，只有汪先生主张允许，所以公谊私情我均赞成汪先生回，惟不好明表示，恐蒋疑我拥汪倒他。"

以上唐的见解不能说他没有理由。现在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党及政府都是他用来统治别人的法宝，他的手段又太不高明，这怎能叫唐生智尊重党及政府呢？

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我们便没有理由说唐现时对蒋，对政府的态度

是如何不好，必须改变了现状才能有理由去责他。

5. 所谓“扶蒋抑唐”的政策，许多同志表面虽已不说而观念尚有此倾向，甚至还没有完全打破以蒋为中心，以蒋为唯一独尊者的观念。这自然不是就粤区全体同志说，不过粤区负责同志更为注意纠正此种倾向之发生。

6. 总之，我们现时对于唐之态度应该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取抑制的办法。我们要用：（1）个人的亲密接触；（2）民众的组织势力；（3）俄国同志的影响，以使他左倾。我们在军中工作当绝对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

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唐应该承认他的势力（你不承认他还是存在的），万不可再照老蒋的小孩子办法，留下邓演达、陈公博和他争权。事实上又绝对不能发生影响，只令他讨厌。政治委员会不要唐参加，则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便等于废纸。

唐现在是要想在政府及党中占一地位，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应当能满足他这种希望。

将来 K. M. T. 在汉口有几个有力的中央委员设一政治委员会，自能多影响唐一点（惟此组织唐须加入）。同时，蒋专制之局面必须改变。汪能回来主席国民政府，自能使唐对党及政府的关系更好一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谭延闿。

李大钊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冯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二）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军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工作，以下几点皆须明白的：

1. 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础。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 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代，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 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认为我们蛊惑冯如此做）。

（三）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

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的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

（五）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的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刊印。

目前农运计划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议决）

（一）农运进行应依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

1. 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

2. 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

3. 沿铁路沿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

4. 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

（二）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三）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

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

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

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

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

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

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

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

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

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

浙江——注重宁波、绍兴二属。

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

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

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

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为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

（四）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五）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

（六）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中共中央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关于军事方面：

江西为国民政府占领，孙传芳退保江、浙后，奉系军阀野心更为提高。惟奉张[1]与鲁张[2]之见解不同，鲁张一意南下，而奉张则甚注意西北军之再起，反不甚注意北伐军之前进。盖奉张知道北伐军久战而疲，一时不能与奉引起冲突，同时北伐军得江西后亦足以自保，不易反攻。而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不消灭，则随时可以破坏奉张之一切大野心企图，故彼有从张家口及河南进攻西北军之意。因此 C. P. 对于目前的时局，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的政策，应视奉系对冯的态度而决定。如果奉张要立即消灭国民军，则北伐军须用种种的方法以解除国民军之困难，如下的策略：

1. 当力图与晋阎[3]联合，保证阎在山西之地盘不受动摇；
2. 不反对鲁张得江苏；
3. 速进兵浙江消灭孙传芳所有势力；
4. 冯玉祥不可以其主力军队调到南方，应集合其主力部队于包头，一面防御奉张进攻，一面威骇奉军不敢长驱南下；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

PDG

5. 如北伐军入豫，则已经入陕一军之一部当入河南，但国民二军决不能入河南。北伐军不入豫则一军不可入豫（河南是要的，惟此时还不能有行动，须看与晋阎、鲁张谈判的程度决定步骤）。

二、关于政治方面的：

现时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外交，较九江未下时更为重要：

1. 当继续与日本派来之代表交涉（青浦代表及佐分利），并派代表赴日；

2. 对于英国，当坚持与英保守党政府争斗的态度，不可有示弱表示。对于英国社会人士及工人群众，则应得其谅解，应由社会团体派遣代表团赴英宣传中国国民革命的要求，此项代表团在未出发前须与 K. M. T. 及国民政府接洽好；

3. 对于国内军阀的外交政策，最主要是要用各种的方法，切实进行奉天势力的工作。

三、关于民众运动方面：

现在民众运动的力量并不及军事势力发展之快，可以使军事政治容易腐化右倾。因此，我们为要保护北伐已得的胜利，为要巩固党及政府的基础，须集合所有力量去从事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并警告国民政府注意此事，要能如此才可以保证已得的胜利，且作未来发展之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张宗昌。
〔3〕指阎锡山。

革命与武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陈 独 秀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哪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

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

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軍”，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

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向导》第一七九期刊印。

中共中央复粤区的信

——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十月二十一日来信有关于 K. M. T. 工作几点，兹答复于左：

来信所谓："我们没有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 K. M. T. 让步的原故，就袒护 K. M. T. 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革命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的积极的批评他。"这几句话非常之对，因为 C. P. 可以对整个的 K. M. T. 让步，而不能使民众对他让步；并且若是我们使民众对他让步，便是帮助了右派，削弱了左派。不过粤区执行此政策并不充分，尤其是过去，因为老鲍[1]很害怕因此 C、国发生冲突。

来信所称"须帮助左派使之到群众中间去作工作，但也有例外，南路的农运差不多是 C. P. 包办。"无左派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去做工作，惟不可存包办的心理，更不可于工作时不注意造左派，更万不可有左派的地方我们不让他们工作，怕他们夺去群众。我们知道粤区同志嘴里已经说：我们要和左派合作，我们可以让左派去工作，我们要造左派；可是实际上怕左派夺取群众之心理仍旧存在着，此心理不除去，永远是左派发展的障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左派若没有群众，我们留在 K. M. T. 做什么？我们也无须过虑 K. M. T. 左派夺去

群众便会使我们失了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走到右派去。并且我们最要当心的，K. M. T. 左派若不能成为大的群众党，所谓左派政权还是一个幻想，其结果会有使右派对我们发生李济深的“三月二十”之可能。

来函所称在各县发展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如此帮助左派，使 C. P. 与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的关系，以推进革命运动，这样的办法非常之好。惟若过于忽略了左派领袖问题，也是一个错误。此理由详见中局和远东局联席会议关于 K. M. T. 问题的报告，兹不赘及。

在这封信里面有两个观念是必须矫正的：一是说：“我们依照这个原则，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来决定实际工作的方法。”一是说：“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份帮助左派。”

在第一点，我们应该说：根据每个时期的实际状况，在可能范围内，依照原则改造环境，这才是马克斯的革命主义。若离开原则，跟着环境走，这便是机会主义。一面说依照原则，一面说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两个“依照”放在一块，前一“依照”便成了一句空话，遂至无原则的跟着环境走，前后政策刚柔绝异（其实即前后环境亦未必相差如此之甚），实际上是无政策，这是老鲍及粤区同志对 K. M. T. 态度之根本的错误。

在第二点，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到 K. M. T. 作工，决不是什么为 K. M. T. 当“苦力”。阶级争斗的过程本来很长，不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运动是阶级争斗，不但一切国家里各种要求的罢工是阶级争斗，即殖民地半殖民地为无产阶级组织出版罢工之自由而参加国民革命工作，也是阶级争斗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我们对于此项工作，不能很简单的看做为他阶级当“苦力”。老鲍的“苦力观”，在

我们党中会发生两个危险倾向：一是左倾同志会因此愤懑，不愿为别人当苦力而怠工；一是右倾同志会因此当真 K. M. T. 化，变成单纯的 K. M. T. 苦力，而不是立脚在阶级观点上去作工。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为阻止老鲍的“苦力说”在党内流行而奋斗！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鲍罗廷。

中共中央局给江西地方的信*

——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

一、参加江西政府组织问题

此政府中有我们同志四人。据孟冰同志报告：其委员资格是以各军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而不是个人取得；兼之现时江西政府组织还在混乱时代，稍一退让右派即乘机而入。故你们的意见是暂不退出，观望形势，以后再决定态度。

我们认为，委员资格既系因政治部主任地位相因而及，政府之组织又未确定，则一时不退出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白的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需换人。同时我们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

二、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

从孟冰同志的报告，我们看出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王环心、涂振农以该县支部书记而去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

任县长；师古隆之任九江县长且为九江地委所决定；负民校工作者均想跑到政府机关去活动。比较好的愿意做群众工作的人，亦是专门想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工作。他们幻想北伐军的胜利与国民革命的关得[1]太高，仿佛政府是人民的了，人民是自由了，更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试问我们得到了这一小部分的政权，能占据二、三个县长位置，可以实现我们党的政策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能的，这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失去说话的地位，失去群众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蠢事呢？不从教育宣传去组织群众，而只图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工作，则这个工作也是没有基础的，经不得斗争的，不会为我们所有的。

赣地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

三、对 K. M. T. 工作

过去我们江西的同志拼命占据 K. M. T. 的位置（省党部九人我们竟占了八人），并不想占着这些位置能否做点工作，能否就可抵制别人的进攻。最近工作的经验江西同志应该明白了，工作做不起走[2]，且无力抵制别人的进攻。一方面 K. M. T. 工作不能发展，是 K. M. T. 的损失；一方面尽倾我党的全力去从事 K. M. T. 工作，既不讨好又失了自己。

本来省党部是照理可以指导省政府的，至少亦要能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影响省政府。然而江西的省党部，在当权者的眼中看去，既无群众又是一群小孩子在闹，怎能在政治上有点地位

呢？这个局面是再不能敷衍了，我们现在应取的政策是：

1. 放出改选空气，迅速办完登记，预备改选。

2. 极力包围右派中好的分子如王恒、许苏中等，拉在我们方面来，勿使为右派拿去做工具。

3. 下届的选举绝对不让一个右派加入（王许在江西不能算是右派，只要我们的包围工作做得好），尤其是不要让段锡朋加入（且须遇事打击他），尽量选左派分子进去。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如果没有这许多左派分子，当找有社会地位的正派老先生加入，虽然他老成无用，但占住位置抵制右派加入也是很好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

PDG

中共中央给粤区的信*

——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

目前上海几个日报载有苏兆征等五人被总司令部逮捕消息，这两天没有继续说此事，我们以为是或者一个谣言。然而我们并不因为这是一个谣言而减轻我们对于粤局严重的感觉。日前特立[1]同志来信说李济深有电致蒋[2]，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屡次接粤区委报告李济深和农民关系之恶化，尤其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政治报告，更可见粤局日趋严重了。

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如云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也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我们认为这是鲍的意见而不是粤区的意见。因为粤区政治报告中明明指出国民政府迁移后广东新时期的危险随之到来），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他从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我们退出 K. M. 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

鲍的大错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多说也无益。现在的问题是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

赶快怎样救济国民政府迁移后粤局之危险。

粤区政治报告中对于救济此危险的政策，有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也是由于鲍的政治指导之错误而来。从前鲍估量左派力量高到应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现在估量左派力量低到等于零。其前后错误矛盾一至于此，粤区委竟盲从他的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又说“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所以 C. P. 今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亦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 C. P. 与国民党的冲突。”分明是我们和李济深的冲突，至多是和右派冲突，而定说是整个的和政府和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预先把自己划定在孤立地位，是何等错误而危险的见解?!这种错误而危险的见解，是由于鲍否认左派存在的观念而来。若当真左派的存在是中央的幻想，那末我们还留在 K. M. T. 做什么?!照鲍的见解之结论只有退出，其错误与危险和苏联 C. P. 中反对派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主张退出英俄委员会是同样理论的来源——杜洛斯基主义（杜氏曾主张中国 C. P. 退出民校，为苏联 C. P. 中央否认）。他们这种见解好像很左，其实非常之右，因为他们这样左的政策正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欢迎的。所以布哈林说在主张退出黄色工会、退出英俄委员会之外，或者又有第三个错误主张，即是中国 C. P. 退出 K. M. T. 。

我们对于鲍的这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若不加以痛切的纠正，其所生的恶影响将至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央见了

前次粤区批评左派领袖的信和民中会议的党团报告中关于左派的讨论，我们已见到鲍的错误见解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拟在汉口会议中有以纠正，通告全国各级党部，不料这个恶影响已经在粤区发现出来了。

据于树德同志所报告甘乃光的情形，不完全和粤区所见相通。此外还有陈树人、何香凝、宋子文，何以能够武断他们必定与李济深一致?！并且还有左派的军事势力与民众势力，怎样可以说是整个的 C. P. 与 K. M. T. 的冲突?！

中央现在坚决的要粤区立刻抛弃鲍的错误见解，并执行左列各项策略，以应付广东新的变局。

一、切实与左派领袖合作，给他们以群众，要求和他们开一极秘密的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新变局之具体方法。

二、即速进行联络省城各种左倾的军事势力，准备必不得已时的冲突，惟冲突时必须用左派出面。

三、加紧李济深军中的工作——公开的及秘密的。

四、由各方面尽可能的谋为李济深联络以减其右倾之速度。

五、尽力设计使前军将领影响李济深。

六、巩固工、农、商、学的联合组织。

七、设法让李济深与商人冲突。

八、目前在工农运动中避免小的冲突（工人纠察队直接封闭商店的举动须极力制止），准备到绝对不可避免时一个有组织的大冲突。

九、加紧党的秘密组织，加增党的机关及交通的秘密性。

十、准备必要时简单的解决方法。

此外，中央自然也要通告各省党部，用民众团体名义向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向 K. M. T. 中央和广东省党部表示：

国民政府迁移后，省政府理应遵照最近政纲，严饬军队及地方官保护工农运动，而不得借故摧残以动摇革命根据地。

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要粤区同志绝对抛弃盲从鲍否认左派之错误的见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必须与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深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深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国焘。

〔2〕指蒋介石。

PDG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李　大　钊

国民二军前在河南时，大部分均是土匪编成、扩充，人数虽多，然战斗力十分薄弱，经不住吴佩孚少数军队之袭击，便要全军瓦解。听说现在陕西二军，仍与从前一样，每个将领均各怀野心，乱事招募土匪壮己声势。此种军队，在平时，徒耗费饷弹，加重人民负担，在战时，又一无能为。我们应忠告于[1]先生及明白的二军将领，劝他们勿再蹈前此的覆辙。当注重质量的加好，而勿徒事数量的扩充，尤其是我们要做爱民的革命军队，不该多招土匪，苛捐扰民。

过去，二军和一军关系不甚好，双方均各存着许多疑虑。一军不满二军之土匪行为，二军又忌恨一军之把持械源，甚至疑惧一军解决他们。最近于、冯的关系，听说也不大好，三军、六军对于一军也有同样感觉，我们认为这是极危险的现象。我们应知，现时国民军的处境十分危险，奉张[2]认为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最急需消火的敌人，不是北伐军而是国民军，若不先消灭国民军，则他所有的一切野心皆无法实现，因此，他现时是正在处心积虑的勾结晋阎，图消灭国民军。国民各军此时必须诚意合作，始能免于灭亡，否则十分危险。我们试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

想，国民二军若无一军之助，能够肃清陕西么？能够守住陕西么？当然是不可能的。

现时一、二、三、五各军，必须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因为指挥不统一，决不能作战。

我们还要明白，现时 K. M. T. 中有部分人，如张静江等，正利用冯、于之冲突，想法使二、三、五军另成一个系统与冯对抗，使冯遇事不能顺利进行，同时使整个的国民军亦不易发展。我们须用种种方法，勿使右派阴谋得以实现，须使于先生能看到革命的全局，与冯玉祥维持很好的关系。

整个的国民军，现时方当极大的残破之后，还不能取进攻形势，只要能使现时的力量可以维持、存在，不致消灭，且逐渐的恢复、充实起来，已经是很大的胜利。目前，国民军的力量不能维持对奉作战，他要抵抗奉军之进攻，必须同阎锡山的关系弄好，勿使晋阎助奉张，才有办法。

当说于先生及二军明白将领，勿压抑陕西的农民运动，并加以提倡，在军队中唱出兵士与农民合作的口号。必如此，然后这个政府才是有民众基础的，为民众所拥护的政府，否则，我们今日虽逐走了刘镇华等，并不能使此政府巩固。

一定有许多将领在得了西安后，又对河南发生野心。我们须注意，从前二军与镇嵩军在豫陕之骚扰，已使两省人民结下很深的仇恨，若果二军再占河南，又要驱使河南民众尽倒向奉张方面去。二军必须避免这个冲突。现时大局的情形，自然不容我们取河南，万一将来机会到来时，亦当让一军、五军或北伐军的兵进去，二军不必出兵河南。

对于二军将领，我们不可从他的言语上去相信他左倾革命。要从实际行动上去看他是否左倾。不可简单的只灌输他以许多不能真正懂得的革命理论，而要有方法的领导他切实做点

革命有利的事。

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力既十分的少，则分配工作时，便不可过于分散，须选择最有希望的几部分，集中力量去作工，庶工作更易做好。

冯玉祥自游莫回来后，他的思想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很左倾。这个人不是一个机械狡猾的人，而是一个中古时代勤俭、爱民想做点好事的英雄。我们陕西的同志，或许也蒙蔽于偏见而站在乡土观念上（二军关系上）反对冯的，须注意改正。

根据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的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于右任。

〔2〕指张作霖。

PDG

中共中央复加同志的信*

——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

中央看见你给张[1]同志的信，认为你所说对唐生智政策非常之错。第一，现时时局仍是严重，内部不可发生问题。第二，北伐军内容一、二、三、四、六、七、八军都相差不远，不能那一个是革命的，那一个不是革命的，不能帮助那一个制裁那一个。这不但实际不可能，而且在我们的立场也不应该如此做。第三，各军本应该受政府及党的制裁，而此时除蒋总司令外并没有什么政府什么党，我们不应该再助蒋这样横行了。

你全把唐生智看做敌人，蒋或者可以如此，我们的同志万不应如此。你说唐生智独立行动，我们请问你，蒋介石是服从政府及党而不是独立行动吗？“三月二十日”之事蒋是不是独立行动？你说唐生智狡滑，你说唐生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蒋不狡滑吗？蒋比唐更革命吗？至少唐还未做出“三月二十日”那样的事。你说唐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对我们的政策就要改变，试问哪个军事领袖不是这样？尤其是蒋介石我们更有经验了。你说“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

---

* 本文及附件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加同志，指加仑。

量”，我们以为，只是对抗政府还算很好，蒋介石从“三月二十”到现在他眼中还有政府吗？他岂止和汪精卫对着吗？唐固然是想利用我们反抗蒋以巩固其地位，而蒋又何尝不是利用你削弱唐以达其专政之目的呢？你应特别注意，唐生智还不像蒋一派人有中国革命只许一党存在的成见！

总之，你在蒋处工作久了，已经为环境所蒙蔽，完全是站在蒋方面说，好像是蒋自己说话。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革命全局上打算，勿专为蒋打算。你切勿幻想中国的革命军事势力可以集中统一，并且如果军事势力愈集中统一在任何人手中，都必然去民主政治愈远，屠戮民众及我们愈快愈利害，你要快快改变你的根本见解。

我们已知道北伐军此时无力东下，并且在政治上也不宜东下。目前东南只宜自治运动，并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自治运动已渐渐有点力量。钮惕生[2]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赞助自治运动而不公开的参加。望劝蒋介石信任钮为东南的总代表，并且速与以经济的援助。

附一：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3]同志信）

……你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之意见，我不能完全赞同。我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威权会减少，我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解决北方问题将更容易些。关于唐生智则我以为不会与之冲突。唐生智的地位，自从孙传芳九江失败之后就已改变了。孙失败之后唐的未来的同盟者就消失，若冲突发生则没有

帮手了。现在他的形势变了，更趋于恶劣了。他的东南是国民革命军，西北是冯玉祥的军队，在广东是谭延闿，在赣西是程潜（?），在北方是奉军，不能与之联合；在武昌城内又有第四军，你只要在中国地图上一看便可以知道。唐已不能像从前那样的独立行动了，即许他与日本结合，在这情形之下他违反国民政府，他亦难免崩倒。蒋介石尚未看出这种形势，我们也不对他说。至于唐，他是一个狡滑的人，你看我上面的话就可以明白。在这里你可以明白唐来与我们耍把戏的原因，也就解释他为什么含混表示要取消前敌总指挥名义的原因。同一原因也可以说明他到九江来即刻就去找贺耀祖并与贺谈了二天亲密的话。同一原因我们也可知道他将不会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我以为他或许与总司令部共同迁移武汉，他给我的电报请我速派一顾问去，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意思。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革命的冲动来与左派要好。唐是狡滑的人，真正的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看见已经到了变更策略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寻求同盟者的时候了——他的同盟者到处都可以找到的，从左派直到日本。

唐是狡滑的，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他不是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我相信现在他将常常与你们往来，但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他对你们的策略就要改变的；如果蒋介石做了一次大错误使唐的同盟者增多起来，就会到这个地步。这是说我们要消灭唐氏吗？自然不是，这将是绝大的错误。唐是需要的，尤其在现在我们需要他来压抑蒋介石；他须执住在蒋的手里，他在军委内、在北伐军内、在国民政府内部应站在这样的地位。为这原故，他应当有必需的力量，但须注意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这便是我们对唐策略的准绳。

你信里说，总司令部成了湖北皇帝，其代表邓演达成了宰相。照我看来这是不的确的[4]。唐在两湖的权力还是很大，你们未曾看出，但这是实在的。你们所指为皇帝的人他至今还不明白，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使他不能知道这个。

我们客观上限制唐的权限这里头是否有错误呢？我以为没有错误的；如有需要，我准备向中央解释。为什么没有错误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种局势，迫得提出统一财政于国民政府底下的问题，迫得创立了统一的饷源以做到军队的统一。这是必要的，尤其与奉军作战之时。但统一军队，统一饷源，统一财政，即等于收回权力在国民政府手里。因此我特别提议不要立即分离湖北财政为政府的和地方的二种预算。我这样提议因为这个问题须慎重考虑。

你的信中说，“唐的话很对，他说湖北人中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目的是要钱。”我以为唐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

附二：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

唐生智最近的言论十分左倾，因其人甚聪明，故所说之话亦至透澈。他能认识自身是初上政治舞台的人，能认识他四周的环境，能说出军队是一把刀，这把刀的刀把是政治的立场，是党，是群众；我现在要革命就寻找这刀把。他希望 C.P. 不要看他作短时期的革命工具。他批评蒋介石想作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议论均极警辟。自然我们绝不在言语上去相信一个革命家，大概在革命的高潮中每个首领均喜说左的话，因为于己更

为有利。蒋介石最近在南昌对外的谈话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唐最近言论特别左倾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高潮所激荡，一方面也由于自身地位之难艰。有以促成唐现时处境的艰难可于下之事实见之：

一、江西下后，蒋之声威增高，实力亦强过于唐，合一、二、三、六与四军之一部共有二万五千人能战之兵，而唐不过一万五千人。

二、蒋又扶起贺耀祖等反唐势力。

三、湖北财厅陈公博走后又易李涤生，仍是蒋方的人，使唐在财政上感困难，伤兵曾闹饷数次。

四、八军扩充甚速而战斗力并不如外传之强。

五、唐请回湘一行，蒋不许。唐虑蒋将动其巢穴。因现时湘政府内部发生政潮，周鳌山、刘岳峙辞职，反对邓寿荃。唐不能解决，自己又没有人，虑蒋介石假中央名义乘机改组也。

六、国民政府移汉增其疑惧。

七、唐已公开的向蒋表示过：政府移汉须汪回后，湖北财务委员我不能干，因我不能供人傀儡。蒋不要过于疑我逼我，不要我干我可以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八、蒋还可以得到党及一部分群众之助而唐无之（他的历史甚短）。

在以上情形之下，遂使唐自然想接近 C. P. 以增高自己势力。我们不因唐言论之左而遂对之存过分的希望，也不使他走到反革命路上去。在现时革命军三个重要的领袖中，蒋介石是明白的言行不符，冯玉祥是言行相符，唐生智还看不定。不过即令唐一时真正左倾，而其英雄的习气，腐败的部下，亦易使其发生反覆。所以我们不当简单的灌输些他还不能真正了解的理论，而要引他在事实上做一些革命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向

他这样表示：

一、C.P. 及苏联同志对唐政策自始即认唐是一革命者而尽力赞助，始终没有变更。

二、望唐仍站在 K.M.T. 内与左派合作，与蒋合作；一面我们也劝蒋让步，合作对奉。

三、为革命须不反对农民运动，对湖南农运能够赞助。

四、军事注意质量的提高，加紧训练，既免专从数量发展所来的猜忌，又可减轻饷费，须设训练的学校。

五、财政问题，我们所处的地位不能直接相助，只能间接的从两方面相助：

1. 研究增加收入的方法；

2. 主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

六、……

七、唐要我们在他军中进行秘密组织，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在唐军中我们不做秘密组织工作，因为这是要使军队发生分化的；我们只助唐作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国焘。
〔2〕即钮永建。
〔3〕指张国焘。
〔4〕原文如此。

PDG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周 恩 来

一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七期。

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分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

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

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

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

PDG

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陈　独　秀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1]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

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2]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

（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

□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胜利，民众势方都握在 C. P. 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 C. P. 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深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3]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

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 C.P. 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 C.P. 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 C.P. 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 C.P. 和 K.M.T. 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4]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

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

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 C. P. 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 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出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

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哪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吴佩孚。
〔2〕指靳云鹗。
〔3〕即柏文蔚。
〔4〕指鲍罗廷。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仲甫[1]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都是事实。中央会议并感觉这些危险倾向对于革命前途非常严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仲甫同志在报告中所述各项挽救的策略，大致是对的。内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重新提出“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口号，督促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一方面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

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此次中央会议后，各地方党部马上便须召集各种形式的党员会议，酌加各地实际情形详细解释此次中央会议所决定的各项策略，并议定其实行方法，这乃是目前刻不容缓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PDG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我们党内对于国民党左派有三种意见：（一）中央以为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区别。有许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绅土豪等封建势力的利益与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想者，仍然徘徊于买办、地主与工农群众的利益之间，有时还偏向前者，他们对于民族运动固然调子唱得还高，他们始终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主张军事独裁而不赞成民众政权，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这般人也只能属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义上代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思想而反对封建势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为国民党中这两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在广东的同志多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们又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将来或形成左派，现在没有左派。"他们以为现在既然没有真正左派，我们若因为帮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当的事。（三）十月民中联席会议党团的意见，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粤区同志的中间，他们否认现在的国民党有真正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

左派，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可是同时他们却承认有所谓“准左派”，他们说：“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十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种左派，而他们刚一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斗争，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在主张上与右派一致，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的站在民众方面。”他们这些见解，确有点与粤区同志不同。但他所说：“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一类的话，又完全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而却未曾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他们这些错误观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现在不能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因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导农民从这些要求的实际争斗到研究室中的土地问题，便是停止争斗；若希望马上就有一个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比希望现在的左派能够实际赞助农民目前争斗更为幻想。我们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现有分子中那些比较左倾些，而不是一个固定标准，高悬在空中的未来派。若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会的左派和国民党的左派之区别，更为可笑。

我们要记得从兴中会到现在的国民党，他们的进化是有时间性的，所谓左右乃比较之词，并没有固定的界说，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问题

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不必像黄麻子、张小泉、陆瑞荐[1]一样严格的去分别什么真正左派与准左派。

为什么说他们不算真正左派呢？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纲么？十月联席会议后已经有了。因为他们还未形成有确定政策的一派吗？那末根本批评起来，整个的国民党还未形成一个有确定政策的政党。因为他们时常摇动不一致么？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永远是动摇不能一致的。因为他们没有中心领袖么？汪精卫还未死。因为他们没有武力么？（据毛润之同志报告，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更是笑话。而且实际情形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吗，不是他们没有群众，只是群众和领袖离着。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团体吗？他们也和右派一样有领袖有群众，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的群众，汪精卫一回便会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团体。因为左派现有的政纲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左派的政纲，正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因为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左倾，在行动上不能动起来贯彻主张么？这固然是现有左派的弱点，然而也不能说他们始终没有左倾的行动，即令仅仅是言论上的思想上的左倾，已经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上，在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关系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实，并且是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关键。我们当然不可迷信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固负责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

派压迫工农群众；一是由我们领导群众直接和右派冲突，既然没有左右派的分别，我们和右派冲突时，便表现出来是 C. P. 和整个的国民党冲突。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愿意我们走这两条路。粤区同志现时所走的就是这第二条路，他们否认左派之存在，恐怕因为特别帮助他们得罪右派而上当，自然不必特别和他们亲密合作，他们感觉得我们走开了，也恐怕上了我们的当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边去来对付我们，这是客观上必然的结果。这种否认左派的谬误理论，已在广东收了恶结果，粤区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别的地方党部若不即早防闲，会酿成莫可挽救的极大损失。

因此中央会议坚决的反对同志中否认国民党现在的左派之谬见；坚决的主张国民党中确有左派存在，虽然他们软弱动摇不一致；坚决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

至于怎样帮助他们，应有上中下三层的帮助方法。第一，对于帮助他们的上层领袖，是断断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若只有左派群众而无领袖，则仍然是 C. P. 的群众，而不是国民党的群众，群众和右派冲突的时候将仍然形成 C. P. 和国民党的冲突，而不能明白表现出来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我们帮助左派领袖和他们合作的条件，他们固然须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须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尤其是在农工运动的实际争斗中，不可幻想他们能够和我们取同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让步，毕竟比对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们有

力量，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冲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左派领袖必须有了群众在手中，他们自身才有力量站起来和右派对抗，才能够减轻他们觉得 C. P. 马上就会夺他们的江山的忌妒与疑惧。并且有了左派群众，尤其是党内的左派群众，才能够推动左派领袖左倾，减少其软弱与摇动。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即是帮助左派设立党校、宣传员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以养成他们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领袖与群众的隔离。我们对于左派这上中下三层帮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将来的左派必然比现在更有力量，和我们联合抵抗右派。

至于怎样帮助左派结合，我们应取下列方针：（一）我们不赞成左派的结合有独立的政纲与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没有显然冲突的地方或右派没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数比较可靠的左派领袖之结合，我们帮助这些领袖抓住整个的党部，在中央左派领袖领导之下执行左派政策，不必进行左派党员群众的结合。（三）在左右派冲突的地方，则宜用学校、讲习所、新闻社、学会、研究会、俱乐部等形式，结合左派党员群众的许多小团体于左派领袖指导之下，不宜有整个的结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组织；惟可由左派领袖时常召集这些小团体的代表开联席会议，C. P. 亦可正式派代表参加此联席会议，C. P. 分子不必公开的加入这些小团体。

现在左派的结合已经有了几种组织，一种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联席会议后结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省代

表，散会后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员，他们有了联共联俄，反对西山会议派，拥护孙中山、廖仲恺的工农政策，拥护汪精卫为领袖，这四条政纲，而尚没有组织的名称和章程。又有一种是黄埔学生发起的“左社”，他们有独立的章程，对于社员以外的人须守秘密，而没有独立的政纲，十月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最近政纲，即是他们的政纲。这个“左社”已在湖南湖北开始发展，加入了许多不得志的政客，带了浓厚的地方性，在湖南的“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们不能承认这个“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结合，我们对于各地方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应警告他们不便有独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个的组织，不必乱拉非左派分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对于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应联合未加入“左社”的左派分子加以打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王麻子、张小泉是北京和杭州的老字号剪刀铺，陆稿荐是苏州有名的肉食店字号。后来人们为了招揽顾客，就出现了许多诸如黄麻子、陆瑞荐等冒充老字号的店铺。

PDG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A. 乡村政权问题

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这种政治运动，在实际运用上，我们重在实际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而不必叫出农民政权的口号，以免除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恐慌。

B. 乡村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如自动的组织起来，我们当然不宜加以阻止，只能拿农民协会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其未组织者则不应促成之，尽可能的将他们的分子吸收在农民协会中，使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

C. 乡村中宗法社会思想问题

破除宗法社会思想（尤其是族长把持族租和阻止妇女加入农协）是非常必要的，惟我们可用国民党党部去做宣传，不必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

PDG

由农协去做，以免发生农协内部的冲突。

D. 农民武装问题

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这是应当注意的原则。实施的方法，如团防局长民选，或由乡民会议接收地主的武器，或由农协自备武器，或由农民群众夺取民团的武装，应按照实际可能情况行之。

E. 农民协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入，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F. 乡村中食粮问题

只可强制大地主存留一部分米粮，作为荒月平粜之用，而不可无限制的禁阻米粮出口，致阻滞农村经济之自然流通，且引起农民间有余谷者与无谷者之冲突。

G

湖南农运议决案中，应除去调民团集中县城的提议，应改生产合作社的口号为贩卖合作社，应增加反抗贪官污吏苛税苛捐的说明，农民教育的取材过高应改正。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

H

江西方面应注意战区灾民救济工作，以引起南浔一带之农民运动。应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急于应用的农运人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A. 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致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

B. 在三省范围内 C. P. 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C. 切实调查“左社”之内容而监视其行动。

D. 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

E. 武汉民众团体的领袖宜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发生亲密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

关系，尤其是徐谦与邓演达。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A. 宣 传 问 题

（a）独立宣传问题。独立宣传不是只使民众空喊几声共产党万岁，而是要使民众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目前在武汉方面工潮盛行，他人误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作煽动的宣传，应作解释的宣传。独立宣传常易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宣传时须得特别小心。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应取积极的建议态度。不可取消极的攻击论调。

（b）对内宣传问题。目前三省新的党员骤然增加（尤其是湖北），设使我们不给以好的宣传、训练，结果必使新党员对党失信仰而离开党。对内训练的方法：于各地开办低级训练班，常用党员大会作政治报告，以后随时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在工作中训练工作的同志。

（c）出版物问题。在国民政府范围内，我们党的刊物应带政治性而不宜多带鼓动性。凡主持非党的出版物者，应时常站在他本身的地位上说话，不可站在C.P.地位上立论。至于最近江西同志拼命宣传鲍顾问甚至宣传第三国际如何帮助中国革命，更是非常错误。各省之出版物应多带地方性，大的政治问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

题文章不宜多做。

（d）党的刊物发行问题。在好的环境下我们应尽量设法推销我们的刊物。

（e）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

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B. 组 织 问 题

（a）此时我们党的组织问题，固然要努力数量上的发展，更要整顿支部，使各支部都能够自动的工作起来，活动起来。尤其在武汉必须使各工会各工厂都有我们的强大的支部，必须训练这些支部成为各工会各工厂一切工作运动的中心。武汉的街道支部亦急须建立并发展起来。

（b）三省的工作同志及中坚分子之数量的质量的统计表，应即速造成报告中央。

（c）湖南女党员太少急须努力增加。

（d）湖北区委应兼汉口地委：书记特立[1]，组织泽楷、德龙[2]，宣传以忱、潭秋[3]，职工立三[4]，农运陆沉，民运必武[5]，军事云臻[6]，秘书慰真[7]。

（e）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富春[8]，组织峻山[9]，职工贺果，农运邱倜，编辑汪群，军事傅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国焘。
〔2〕即江泽楷、项英。
〔3〕即蔡以忱、陈潭秋。
〔4〕即李立三。
〔5〕即董必武。
〔6〕即聂荣臻。
〔7〕即周慰真。
〔8〕即李富春。
〔9〕即刘峻山。

PDG

政治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
吴廷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

目前民主革命运动，会有一个危机到来。因为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和国民党内渐增冲突，另一方面，革命化的城乡民众和国民政府国民党亦渐增冲突。

尚未消除之反革命派（如总商会银行公会内大部分买办分子，尤其是湖北的将军团）还有很大的经济势力于革命军占领地；帝国主义之新政策，企图讨好得胜者，并谋中国分裂成二个政府。这些倾向均能使国民政府之发展及国民党之指导向着右走。同时工人运动及城市一般劳动者的运动正在增长，乡间农民运动亦自然发展，这些运动均有日渐膨胀之趋势。

中国共产党看清了这个严重的时期，以为现时民主革命之发展，决不能使国民政府及执政之国民党和城乡劳动群众脱离！故应：

（一）很坚决的反对国民政府反对领导它的国民党之右倾。换言之，即不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站在土豪劣绅地主大商买办阶级方面去。中国共产党将努力改进对国民党整个的关系，庶几能推动国民政府左倾。

（二）很坚决的认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提出左派首领，使左派获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

（三）我们党独立的宣传和鼓动，此时比以前更重要，惟须指出我们同志的观点之错误及其危险！他们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各地方都多少有此倾向，在广东最甚），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至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

（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增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应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最近国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之上，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即日益发展及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争斗之中心，而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五）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工作，使我们在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地位稳固。目下应整理城市阶级斗争的阵线，特别注意非工业的劳动者或手工业工人向中小资产阶级斗争发展之对于一般民主革命运动的危险。

（六）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目下特别须反英）同时必须扩大“统一中国”、“社会制度民主化”的运动。“国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应成为普遍的口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周　恩　来

一

独秀[1]同志说："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这句话很可表示现时广东政治斗争的唯一目的。

国民党改组以来的广东，原是本着这个政治斗争的目的前进的；经过三年的斗争，在消极方面已扫除了革命的障碍，由战争稳定了革命的基础。这在革命的历史上实含有重大意义。因为半封建势力依靠着帝国主义的强援，在中国极其猖獗，要不是广东两三年的奋斗，革命军的势力现在何能远及长江流域，直动摇了军阀在全国的基础?

只是，这些争斗虽是助长了革命势力在全国的发展，但在广东对于半封建势力的打倒，我们还不能认为满足。

因为商团之役，虽曾对买办阶级利用商团以抢夺广东政权的野心给了重大打击，但香港政府利用买办阶级为祸广东的企图，至今并未停止。故陈廉伯还是在香港奔走于陈（炯明）魏（邦平）之间，高唱他"不合拢来不能讨赤"的主张。

经过第一次东征以至广东统一，革命战争的确扫平了全广东盘踞在城市的军阀，但是陈炯明、魏邦平在香港对于勾结内

地逆党乘机捣乱的企图，亦未尝一日死心。并且各地民团，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土豪劣绅手中。他们利用此武装势力压迫农民，抽收苛捐杂税自肥中饱，简直是乡村军阀。说好一点，便为地主的武装。普通点，没有不勾结土匪鱼肉乡里的。所以城市的军阀虽除，乡村的军阀尚遍地皆是。

香港政府的接济不断，希望广东的土匪完全肃清原是一种空想。但现在的土匪，多与逆党有关。魏邦平便显然是广南七邑的匪首。假使剿匪不取联络于曾因参加革命战争而发展的农民自卫军，转而以为民团是乡村肃清匪患的力量，则匪患与团祸恐怕更要联成一气，会被逆党利用去做扰乱广东的工具。证诸事实：海陆丰因为农军与防军合作，陈炯明勾结的匪党遂不能在他的老巢起事。惠属剿匪因为有农军为助，曾扑灭了几处匪巢。反过来，我们还没有听见民团帮助政府剿匪的事实，而只知道连阳一带民团自抽捐税县长须托庇于他；花县团匪合抗政府的军队；惠属团匪不但联合而且多为陈党。

广东统一近一年了，行政上尚到处见贪官污吏的足迹。普通点，剥削人民以自肥；甚焉者，与土匪逆党勾结，转而做危害革命政府的事件。惠属警察区长竟有为香港政府陈炯明做侦探的。至于办捐税的官吏更是贪污居多。

且因为革命，农民才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但是大地主眼看着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显然是违背“祖制”，多少要与他利益冲突。故大地主没有不勾结贪官污吏，利用民团势力与农民为敌的。广东一向农民和地主的斗争，真是数不胜数。

总之，这些买办、大地主、逆党、土豪、民团、土匪、贪官污吏没有一种不是旧社会遗存的半封建势力，没有一种势力不是与革命为敌的。他们分开来斗争，已足使广东革命势力疲于奔命，而他们还时常联合一起，又加以帝国主义为之牵线，

为其强援，故他们在广东的势力，仍然是不可轻侮。

现时我们确实不可过分乐观。虽说我们已经过两年多的苦战，然当前的这些半封建势力仍然是我们的劲敌，仍然是革命途程中的荆棘；而且正因为四周围的军阀都已打倒，我们才更应加紧而内向半封建势力争斗。如此，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才能巩固，民主政治的实施才能稳定。

二

不过打倒半封建势力还是消极方面的事。积极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两年来的广东的确扶助了不少民众的组织，尤其是农工团体的发展。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也的确得到许多。然而这还不够。因为现时的广东应是“由战争到政治”。过去打倒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是几处集合战，故国民革命军的练成乃成为重要条件。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切迫的工作。

就组织上说，国民党省政府与革命民众，在乡村当图实现农民的乡村自治，在城市当早日开成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及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农民协会当谋其更大的发展。商会、工会更须尽全力促成其统一。教育会当图根本上的整顿。学生会首须助其团结。

就武装上说，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为除暴安良计，为保护交通河道计，政府军队以至省防军必有需于农民武装之相助。为乡村自卫计，为保护工会安全防止工贼捣乱计，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党政府及民众的努力，可从其战斗力的发展上予以积极的

援助和指导，固不必取消极之防闲办法，因为革命民众的武装力量是用以拥护革命政府向半封建势力斗争的。

至民主政治的实施，自要靠党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实施的限度，当不外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政纲。不过我们所当注意的，尚不仅在实施这个政纲，而更应在怎样实施这个政纲。譬如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一案，省政府已明令公布，但实行时如何防止大地主之反抗，如何使行政官吏了解此政策之用意，如何引导农民为有条理的实行，更如何避免乡村因此惹起的重大纠纷，全要靠政府和农民团体作切实的计划了。如政府须帮助工商业的发展一事，其实行之步骤，必须先以政府之力经营一两种国有企业，然后商人方肯相继投资；若政府再于保护上多加掖助，行政上严禁官吏舞弊，则信用立而经济界必渐呈活泼景象。结果不但中国资产阶级可望发展，便是广东今日失业的恐慌也才得相当救济。又如劳资间的纠纷和工会间的冲突，人人都知道必须改善，但改善的目的，决不是从消极方面强迫禁止所能达到，而是要党政府和民众团体共同磋商，希望在工资之适合规定上减少目前的工潮，在厂主行东和工人组织之绝对划分上，在工贼流氓之严行取缔上，在工会之统一运动上消灭工会间之冲突。更如最近广州学生的纠纷，许多人都以为无办法，其实无办法就是发生纠纷之源泉。广东今日的青年运动最大的急需，是在革命文化的提高。为要使封建文化之根本消灭，革命的建设的人才之层出不穷，民众知识之民主化，学校教育之办得有意义，均非党政府和民众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建设革命文化不可。

总之，不拘哪一条政纲，都会有怎样实施的必需和困难。而且不但怎样实施煞费讨论，便是为什么要这样实施，在党政府中、在革命民众中也必须经过几番口舌上和文字上的解释和

宣传，然后一切革命势力才能了解他本身的任务，努力为民主的政治斗争。然后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才能得到充实的发展，广东半封建的势力才能彻底打倒。

三

广东的政治争斗走上正轨，中国的国民革命根据地才能稳固。这不但广东的民主派的联合战线可以充实，半封建势力可以肃清，并且只有以这样的革命基础，才能影响民主革命势力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和增高，才能继续北伐，才能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革命的争斗到底。

所以我们现时应当认清敌我。敌人方面：广东一切半封建势力——买办、大地主、逆党、土豪、民团、土匪、贪官污吏，始终是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并且他们后边还有个发纵指使的香港帝国主义。我们民主派——国民党、省政府、工人、农人、小商人、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至 C. P. 和 C. Y.，都应该毫无迟疑地互相了解地努力联合这个民主战线，充实自己的力量，扫除革命的障碍。我们继续高呼：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

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中共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据杨澄最近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1）广州现时的政权仍是中派的政权；（2）最近所发生的许多事变，他们主观的原因虽是要打击 C. P.，而客观的结果 C. P. 并未受着什么打击；（3）中派现将右派和左派均拉过去结合在一块，左派之反 C. P. 是因我们工作中有注意不到的地方；（4）中派对于 C. P. 进攻的风潮所以不能扩大的原因，一是 C. P. 应付从容避免冲突，二是许多左派领袖极力运动消灭此风潮。其嘉对于这个报告有以下的意见：

A. 广东最近所发生左中右联合向 C. P. 及接近 C. P. 的左派进攻，杨澄策略的错误，均由（a）否认左派，（b）忽视左派领袖而来。

B. 否认左派的结果，必是 C. P. 代表群众与整个的 K. M. T. 冲突而自己陷于孤立地位。其实 K. M. T. 并不是整个的，甚至左中右三派内部亦不是整个的，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左中右派本身亦非固定不变。我们的策略是应该分别拉出接近我们于我们有利的分子与之合作。

C. 忽视左派领袖的结果，使我们与 K. M. T. 的合作更发生许多困难。杨澄在原则上虽忽视左派领袖的作用，但在

实际工作上，在最近事变中已感到须与领袖时时接近之必要了。

D. 以上两点主要错误若不迅速纠正，则我们与 K. M. T. 关系未来的纠纷尚要继续发生的。对于此问题，杨澄须详细检阅此次汉口中央特别会议的决议。

E. 在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四事我们须得让步：

1. 广大学生会的选举过去是我们的错误，如甘派一定要求由他包办，我们可以允许他放任他去做，他会碰着许多新的困难，仍要来与我们合作的。此所谓以退为进的政策。

2. 工农商学联合会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今甘等主用后者而反对前者，若我们定要坚持，这完全是感情用事了。

3. 在工农运动中我们对农运不能让步，因为现时农民所要求的都是生存迫切的要求，都是 K. M. T. 政纲所允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减租减息等）。然在广东工人运动方面则应大大让步，因为广州工人群众多是手工业工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行动已经达到现时社会经济所能容许的顶点，如自由封闭生产、纠察队捉人等，过此便只有工人夺取政权了。既然工人政权是目前绝不容许的，则我们对于此过分的行动便当让步。我们不可盲目的跟着群众左倾，广东还是小资产社会，若果我们利用小资产阶级政权以威骇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对于小商店主之过分要求），这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革命行动。我们正苦于无法阻止工人群众目前过分的行动（因为我们地位困难），现时政府所颁的四个办法，形式虽是反动的，实质却替我们解决了很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此办法应当承认。

4.《人民周刊》对政府态度，应站在善意的建议忠告态度发言，绝不可取恶意攻击形式。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